

中国新工人

吕途 著

迷失与崛起



王海军 山东籍在苏州打工的工友

看过很多的书，但真正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却不多，这本书却让我眼前一亮，让我受益颇多。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也在反思我们的生活！它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也让我知道了应该怎样更好的在这样的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孙恒 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

这本书站在新工人群体的立场和视角，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经历的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让中国的新工人们再也不在漂移中承受制度性的伤害，是国家和全社会的责任。

汪晖 清华大学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人直到1960年代以后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帮助一百多年来都找不着北的外来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基础——数以亿计的本源于农民小有产者的农村劳动力之迅即成长为自觉意义的工人阶级，客观地要归因于其对立面的极明显的自为特征得到制度供给者的悉心维护……

杨锦麟 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工人，是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级成分，数以亿计的新工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不可忽视的支撑点和顶梁柱。新工人没有迷失，新工人只有崛起，迷失是崛起之前的阵痛。崛起的新工人，为你们喝彩，为你们加油。

梁鸿 学者作家

有温度的记录，有深度的分析，有浓度的情感。这本书以全景式的记述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新工人生存之艰辛和痛苦，也让我们理性思考这一艰辛与痛苦背后的深层缘由。

王江松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处于社会转型和断裂中的打工者的遭遇、迷失和奋力挣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双重角度，描述和剖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我一口气读完后，感觉自己深受教益，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分享这本好书。

沈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在我看来，这部书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一部新工人群体成员自己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结论的著作，我认为这部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工人群体自我意识的生成

黄纪苏 学者、剧作者

中国新工人的出现，似乎无声无响，却是一件将改变历史的重大事。

上架建议：社会调查·中国新工人

ISBN 978-7-5118-3756-1



9 787511 837561 >

定价：39.00元

本书从新工人群体微观的故事引导我们走向社会结构层次的总体把握。中国经济的崛起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这就是新工人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打工群体。两亿多的打工者从农村来到城市，本书通过一百多个访谈故事来反映他／她们在城市待不下、却也回不去农村的迷失状态。本书强调，迷失是崛起的前奏，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中国新工人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中国新工人 迷失与崛起

吕途 著

蒋老师：

社会的进步^决取^绝于
我们每一个人！



吕途

2013年6月23日

法律出版社

中国新工人 迷失与崛起

吕途 著



吕途

2013年6月23日

法律出版社

工友和劳工机构工作人员、学者推荐

看过很多的书,但真正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却不多,这本书却让我眼前一亮,让我受益颇多。它来源于我们的生活,也在反思我们的生活!它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也让我知道了应该怎样更好的在这样的社会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曾有朋友问我,我的“家”在哪里?这时我往往会比较犹豫,我知道“家”的含义,但我却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从大的方面来说,我的老家在山东,但我们一家四口却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妈妈在老家,爸爸在烟台,弟弟在青岛,我在苏州),这样的家对我来说似乎只是一种寄托。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未来的家会在哪里?我也没有明确的定论,因为几年的打工生活已经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残酷!在城市买不起房,没有一份非常稳定的工作,就想在城市有个家似乎真的不那么容易!我只是一个普通打工者,像我这样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还有几亿人,看完这本书,我感受到了自己以前从来都没感受过的东西,让我的内心触动很大,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后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本书,这将会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它将会让我们的思想意识到达新的高度,让我们这个打工群体更加团结!人的行动取决于人的思想,当我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打算为更好的生活而去争取努力的时候,我们就离更好的生活不再遥远!我们也会创造出不一样的历史!

——王海军(山东籍在苏州打工的工友)

三十多年了,我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奔波、劳碌、流动、居无定所;因为各种原因,我们还被其他人群视为异类一样经常研究,似乎我们的需求与其他人的需要是不同的。难道我们在对于人的生活需要上真有与其他阶层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的代言?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我们曾经迷失过,但现在,就让一切成为历史吧!《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部真实展现打工者生活与心声的里程碑性著作,将预示着打工群体正式不卑不亢地登上历史的舞台!

——全桂荣(苏州工友家园负责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新工人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代价直接推动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近三亿的新工人群体用自己的行动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这本书站在新工人群体的立场和视角,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经历的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

——孙恒(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

1995年我带着改变家庭状况的目的偷跑到北京至今16年了,我的家到现在并没有因为我的努力而有所改善,现在家里没人了,父母弟弟都到北京来了,但是我对家的依恋还在,对家的回忆还在,对家的向往还在,我的家孤零零的在留守。前两天老家的发小打电话给我:“你家房顶塌了一半,屋里东西怎么办?”我强颜欢笑:“把门撬开,东西先搬到你家去吧。等过几年直接弄个新房。”家回不去了,再伤感我们留在城市也是必然,我们需要城市,城市需要我们。这也是历史的必然,留在城市,我想我们新工人已经准备好了!今天 是2012年3月15号,“两会”开完第二天,这一天值得纪念。

——王德志(北京同心互惠社会企业负责人)

当我第一次知道书中这些内容要面向全国、全世界的那一刻,无比的激动和惊讶,同时羡慕作者的才华。书中有访谈我们家的故事,三辈人生活方式不同,父母种地、我们打工、子女留守、夫妻分离,一家人难团聚,哪里像家哟!只是希望我们的子女不要像我们这样奔波辛苦,在农村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好了。华西村是我梦想的天堂。华西村应该没有人还要去外面打工吧?那里应该没有留守儿童吧?应该也不会有空巢老人吧?我不清楚,我听到的只是个传说。

——王发明(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惠民文化服务部负责人)

1993年,父亲为了养家糊口离开了亲人,“打工”这个有些神秘色彩的词语开始模糊地进入我的记忆;

2008年,为了人生理想我踏上了打工的路,结束了一家五口除爷爷外,没有过打工经历的历史;

2010年,我在日记《跨年记忆》里写道:十几年来,我们家就像一个客栈,你来我走,你走我来,只有年迈的爷爷没有离开过,十几年来,一家五口只有两次团圆……

2011年除夕,我依然继续着无法回家过年的现实,但有所不同的是,往年都是我打电话回家拜年,而这次却是家里打来电话给我拜年;

2012年3月,我回家探亲,像做客似的在家待了一个多星期,临别时爷爷低声唠叨着:这次出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爸爸说:“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接他们到北京玩”,他们明明知道我也只是穿梭在繁华城市里一无所有的过客,我不知道爷爷和爸爸的话,是否在重新定义和诠释着我及我们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杨猛(北京同心互惠社会企业)

让中国的新工人们再也不会再在漂移中承受制度性的伤害,是国家和全社会

的责任。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灵魂的轨迹。

——汪晖(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人直到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帮助一百多年来都找不着北的外来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基础——数以亿计的本源于农民小有产者的农村劳动力之迅即成长为自觉意义的工人阶级,客观地要归因于其对立面的极明显的自为特征得到制度供给者的悉心维护……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工人,是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级成分,数以亿计的新工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不可忽视的支撑点和顶梁柱。新工人没有迷失,新工人只有崛起,迷失是崛起之前的阵痛。崛起的新工人,为你们喝彩,为你们加油。

——杨锦麟(前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

有温度的记录,有深度的分析,有浓度的情感。这本书以全景式的记述让我们感受到中国新工人生存之艰辛和痛苦,也让我们理性思考这一艰辛与痛苦背后的深层原由。

——梁鸿(学者、作家)

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处于社会转型和断裂中的打工者的遭遇、迷失和奋力挣扎,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双重角度,描述和剖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的客观过程和主观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我一口气读完后,感觉自己深受教益,希望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分享这本好书。

——王江松(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在我看来,这部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以个案调查素材为基础,对当代中国新工人群体的基本工作和生存状况的描述——描述了他们身处“待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农村”,从而“迷失在城乡之间”的艰难境地,以及城市化和乡村衰败对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新工人”群体成员自己开展调查研究并形成结论的著作。我认为这部著作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新工人”群体自我意识的生成。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中国新工人的出现,似乎无声无响,却是一件将改变历史的大事。

——黄纪苏(学者、剧作者)

这本书没有套路,没有官话,而是活生生的生活。它带着田野和工地的味道,带着汗水和眼泪的味道,伴随着离别亲人长长的思念,伴随着旅途中无尽的大路,把那些在数字后面、报表后面的人的生活不加掩饰地摆在读者面前。它与故作姿态的高头讲章、远离现实的框架设计不同,它的支撑点是双脚、眼睛、耳朵和心灵。它告诉你,有这样一群人的生活,你不能假装没看见。

——刘忱(中央党校副教授)

“我有自己的名字”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

汪晖

这是一部关于新工人的著作，也是一部为了新工人而写的著作。这部著作由大量的访谈和细心的分析构成，作者通过持久的、广泛的对话，将自己融入这个群体的命运之中，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心去摸索这个群体的劳作的身体及其痛苦、欢欣，记录这个群体的灵魂的轨迹。她在记下这些青年男女的语言时，几乎将自己彻底地隐去，力图用他们的语言呈现他们的命运。但在面对其他的力量时，她又分明在争辩：不应该称他们为农民工，也不能将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人阶级，他们是新工人或新工人群体。她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在“代表”打工者说话，她就是从他们的命运内部提出问题。即便当她表述自己的期待时，也像是这个群体的成员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独特的。

与这种“贴近”的描写方法相关，作者对于习用的概念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她有时为一个不经意使用的概念起而辩论，仿佛不是她的研究对象，而是她自己的身份，因误读而受到了伤害。这种反应方式不但没有削弱她的分

析,反而增强了她的理论敏感。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是这部著作在两组概念上的选择:拒绝使用“农民工”的概念,转而使用“打工者”和“新工人”的概念,没有使用“工人阶级”概念,而是使用“新工人群体”这个概念。事实上,这两组概念的使用形成了作者观察打工者群体的基本路径或方法论。那么,如果他们就是人们习惯称呼的农民工,为什么称他们为新工人?如果他们构成了一个稳定的、立足于特定生产体系的社会群体,为什么不称他们为工人阶级?一句话,谁是新工人?

新工人无论在行业、地域和待遇方面多么千差万别,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能够被描述的社会群体,即“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也是中国在将自己打造为世界工厂过程中所创制的新的政策、法律、伦理规范、城乡关系和社会模式的产物。这一群体大多出身于农村并与乡村保持着亲缘关系,就像作者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却视农村为自己的“家”——那里不仅是他们的家乡,而且有他们的父母或者孩子。但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个易于被理解的概念,因为农村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回不去的家的符号,城市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归宿。在作者所属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墙上,悬挂着一幅《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图表,它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群体的历史形成:1978~1988,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他们的名字是“盲流”,至1988年,人数为2千万;1989~2002,也许可以称之为“农民工”阶段,其人数达到1.2亿;在这个时期,政府对人口的流动不再限制,但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性政策(暂住身份、遣送风险等)是常规性的;2002至今的阶段,作者称之为“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在这个时期,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劳动合同法得以实施。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常常用于在“回不去的农村”盖房子。

作者拒绝了农民工这一称谓,这不仅是对城里人的偏见的反驳,也是对

于政府、学者和打工者自己关于最终会回到农村的幻觉的否定。作者指出:与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第一代打工者不同,80年代以后出身的第二代打工者大多没有以务农为生的历史,90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打工者中的很多人没有种过地,他们在城市出生和长大。打工者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他们的后代也将城市视为最终的归宿,但他们心里的或者说符号性的“家”却在乡村——这是衰败中的、无法支撑其生存的、不能为其子女提供未来的“家”。这种介于城市边缘和乡村边缘的状态使他们“迷失于城乡之间”,但从生产、劳动和生存的基本现实看,他们不是农民工,而是新工人,理应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因此,用打工者概念替代农民工概念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基于对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准确描述。当然,这一描述仍然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即土地制度的因素。由于土地集体所有,只要户籍在农村,在外的打工者至少在理论上就拥有一定的土地(但实际上很多地方未再进行土地调整,新生代并不拥有土地),从而可以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或经济危机时代重返乡村。但这一前景伴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和可能的变迁而日益不确定。这也正是有关土地制度辩论的重要环节。

作者关于农民工和新工人概念的辩证还涉及另一更具有理论含义的命题,即新工人是一个阶级吗?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有关阶级概念及其相关命题的理论讨论,但她的用语——新工人群体而不是新工人阶级——却显示了对于这一理论问题的敏感。新工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所催生的“新兴的产业工人”群体。由于日渐地脱离乡村和土地,他们已经成为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的雇佣劳动者。这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生产或增值“资本”来维持生计,专靠出卖劳动而不是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取生活资料的群体,他们的祸福、存亡全部依赖于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就此而言,他们与经典的无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翻查有关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的研究著作,马上可以找到相关的界定,即“工人阶级是近代大工业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

这三种近代工业而产生和发展的”,而最初的产业工人“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企业里。”〔1〕仿造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说,新工人群体是中国将自己改革成为“世界工厂”的产物,是伴随跨国资本进入、中国国有工业转型和民间资本兴起这三种工业的和服务业的潮流而产生和发展的。如果说中国近代的产业工人绝大多数来源于破产的农民,那么当代中国的产业工人则来源于城乡差别日渐扩大时代的广袤乡村。因此,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群体,新工人可以定义为工人阶级。

但作者没有使用阶级概念来定义新工人,而更多地将他们描述为“新工人群体”。这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极为活跃,渗透在政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不同方面,展示出阶级概念的多面性——它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它是结构的,也是政治的。在改革时代,“世界工厂”的建构不仅召唤着资本,也同样召唤着作为商品的劳动。市场化和新工业化的另一种表达就是阶级关系的重构。但恰恰是在这个大规模重构阶级的过程中,阶级话语在中国或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了。除了少数案例,试图通过阶级意识召唤新的政治尝试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就当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状况而言,我同意李静君的如下判断,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验与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承相结合,在中国劳工的部分片断中生产出强烈且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转型研究‘重返阶级’(bring class back in)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仅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适用于工人阶级,也同样适用于资产阶级。”〔2〕阶级的视野对于理解中国劳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而言,都是必要的。

但同样必要的是:在“重返阶级”的过程中,需要对阶级概念本身加以再

〔1〕《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一册,主编刘明逵、唐玉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1页。

〔2〕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分析。这一工作不是本书的主要任务,但作者在使用新工人概念时透露的两点信息值得加以理论总结。首先,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新工人逐渐地形成了某种朴素的主体意识,但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均未构成清晰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便并入资本。”〔1〕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只是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并没有任何自我意识。因此,工人群体的客观存在并不等同于作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已经存在。用汤普森的话说,“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个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它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阶级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2〕

反观20世纪,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并非单纯地由工人们自身完成,而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政治过程的产物。除了政党的介入之外,无数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人、律师等介入工人的运动,共同为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从政治的角度看,阶级的形成也与对立面的确立密切相关。新工人群体的文化状态与这一过程的终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上述意义上,这部著作不但从日常生活和制度安排等各个方面描述新工人的客观存在,还通过展现新工人的生活世界,探索在他们的感受、意识和判断中正在积聚的群体自觉。新工人渴望提高工资,拥有住房和劳保,家庭团圆,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并用炒老板鱿鱼的方式(用工荒)表达自己的抵抗。在本书第十四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0页。

〔2〕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3、4页。

章“用工荒与新工人的形成”中，作者将“用工荒”描述为“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较力的一种表现”，“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打工者的抵抗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打工短期化，根据调查，新生代打工者的平均工期已经从三年一换向一年一换发展。作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打工者换工作的比例中，被老板开除只占少数，大多数打工者是因为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工作无聊和谋求更好的待遇或技术提升而离开的。还有一些工人出于对工作性质的道德判断（如一些造假制假的黑心工厂）而选择离开。这种灵活选择工作的方式当然有其客观条件（如更多的工作机会），也实际上带来了对自身的伤害（在提前离开的条件下，劳动合同法保护条款形同虚设），但其中蕴含的抵抗却是推动劳资关系改变的动力之一。新工人的抵抗也在文化上产生了自己的成果，那些源自新工人的写作、音乐和其他形式（如打工者博物馆）正在为这一群体的形成提供文化支持。然而，在新工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很难发现20世纪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活跃的政治进程。新工人群体的称谓本身似乎暗示了其形成的宏观条件与上个世纪的政治进程之间的重要区别。

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相较于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新穷人”群体，新工人群体的这种沉默更为令人深思。根据鲍曼的《工作 消费 新穷人》一书的解释，“新穷人”是“消费社会里的穷人”，或者说是那些为无力消费而苦恼、羞愧和自惭的人物。他们大多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或技术水平，生活方式与一般白领无异，却与新工人一样，处于城市的边缘。“新工人”与“新穷人”同样是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经济向金融资本、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中的产物，他们共同构成了“穷人”这一概念的两面，前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而后者则是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伴生物；前者在反复出现的用工荒、广本工人罢工、富士康工人自杀中显露自身的力量，而在阿拉伯的反抗运动、占领华尔街运

动、莫斯科街头和中国的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中，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后者的身影。“新穷人”的身份归属很不确定，政治诉求也更加多元，但其政治动员的能量却大大高于新工人；新工人在“世界工厂”的创造中贡献最大，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抵抗，但他们的自我意识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我们也可以想见：一旦新工人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政治图景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缺位是中国政治体制危机的最深刻的症候，因为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早已土崩瓦解。

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无声状态不仅是文化、教育及技术背景的落差造成的，也是一个重构阶级关系的政治过程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转型不仅涉及物质、法律过程，而且还涉及道德和政治过程。从宏观的角度说，这些过程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时是突进）中展开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使用“打工者群体”而不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另一原因，即新工人与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区别与对比。不仅在物质待遇、道德标志上，而且也在法律和政治上，打工者与老工人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位置。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涉及工人群体的两个方面，即新工人群体的创制与老工人群体的转型。站在新工人的立场，作者认为“对比过去的国企工人而言，过去的国企工人有国家工人的编制，享受国企工人的各种待遇，而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是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的待遇。”这一区分延续了有关城乡身份的思考，即新工人并不享有“过去的国企工人”的待遇——这里使用了“过去的”作为定语，因为现在的国企在招募工人方面与跨国企业或私人企业差别不大，即便新工人进入国企，他们也不同于老工人。但两者的区分并不只是停留在待遇方面，而在政治方面。老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单位，一个微型的小社会，而打工者的生存空间却是单纯的为资本增值而保持再生产的生产机构。在单位中，人并不仅仅与单一的资本发生关联，单位内部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持续的政治、文化、经济、亲缘的关系，也产生着劳动者参与的各种可能实践（单

位制度的演变及其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需要另文讨论);而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人与人之间并不发生关系,他们每一个人只是单一地与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发生在生产场所之外。就今天的情境而言,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各级代表机构中,很少看到新工人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与资本连体因而也只能被资本所代表。资本与权力垄断着中国的基本政治机构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政治现象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形成而产生的法律变革和政治变革的产物。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权利的问题现在主要的不是一个宪法和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法律权利的界定问题。

劳动的商品化不是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脱离了与这一市场经济发育相适应的国家介入(包括法律制定、政策和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理解雇佣劳工的形成。^[1]李静君特别强调新法律的制定与劳工状态的关系,她指出“除了服务于经济改革的需求之外(保护私有产权,契约、执照认可),这些法规还规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权益,制度化社会冲突的调节,并不经意间扩展了参数内公民的法律权利。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工会法》、《劳动法》以及《保护妇女权益法》都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影响。此外,包括劳工争议仲裁、社会保险、最低生活水平、失业救济等在内的一系列覆盖工人各方面生活条件的管理规则和社会政策也得以颁布”^[2]“如今的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私有产业中私人资本(海外及国内)和农民工之间,同样存在于经理制改革后的国企经理和老工人之间。劳工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剧增,不再是在企业层面上被基层党组织以个人命令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是借助一套外在、普遍的(法律)系统。尽管国家的执法能力还远不理想,但至少已经开始将阶

级冲突引入一个新的、扩展的法规领域,为工人确立其权益并为之斗争提供了新的法律诉求的维度。”^[1]除了上面提及的几项法律之外,当代劳资冲突也围绕着《劳动合同法》和《物权法》的相关条款而展开。

法律维权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将工人群体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斗争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就新工人与老工人的区别而言,后者的社会地位更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在1949年以后,一种具有清晰的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存在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作者引证的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理解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需要同时理解有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即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与一种普遍的利益密切相关,它不是为少数人或工人阶级自身而设定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待遇是与这一宪法权利——尤其是生成这一宪法权利的政治过程——密切相关的。不理解20世纪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文化的生成,也很难理解这一宪法原则的诞生。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阶级话语的消失、传统工人阶级的消亡和新打工群体的制造为这一宪法原则的空洞化提供了解释。法律维权通常集中于个人权利,围绕法律正义的斗争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会转化为有关政治正义的斗争,例如2003年由孙志刚案件而引发的废除收容制度的斗争,以及为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而展开斗争。换句话说,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存在着交叉点,但在多数情况下,法律正义只涉及个人权利,而不涉及有关一个社会及其形态是否正义的问题。

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用政治正义的命题替换法律正义,而在寻找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衔接之道,探寻法律正义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关

[1] Margaret Somers, "Class Formation and Capitalism: A Second Look at a Clas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7(1), 194, 1996.

[2]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 李静君:“中国工人阶级的转型政治”,载《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系。重提宪法问题实际上也是重提政治正义问题,它并不只是追问工人阶级是否真的是一个领导阶级,而在探寻是否存在着一个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或普遍利益的核心部分的政治进程。将工人阶级及其利益视为普遍利益,是为了重申劳动在当代生活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正义的核心是劳动的解放,劳动者的平等和自由。因此,当法律进程规范了工人斗争的框架之时,我们还应该问:这一法律进程是否还同时有利于促进实现这一普遍利益的政治进程的展开?新工人群体并不具备20世纪工人阶级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从未产生过宪法所规定的那种国家领导阶级的愿望,但这并不是新工人群体本身的缺陷所致,因为这种意识和愿望并不是单纯地从工人生活和境遇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一个基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互动的政治过程的产物;离开了20世纪的政党政治、工人组织、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我们无法解释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当代条件下,上述政治进程的各项要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用说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即便是形式尚存的政党政治也不包含丝毫有助于上述政治过程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在从自在到自为目的的论框架中讨论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这种意识是一个广阔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产物。

因此,不是新工人群体缺乏阶级意识,而是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终止了、推动这种阶级意识形成的政治力量转型了。如果将早期工人阶级的历史形成与当代新工人群体的状态做一个对比,一个清晰的差别恰恰在于国家在调节、管理、规范、形塑劳资关系方面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20世纪,资本的运作始终依托于各种权力,尤其是殖民主义国家和官僚体制的权力,但其形态却带有深刻的无政府力量的特征,劳资矛盾清晰地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对抗。在当代条件下,从自由劳动力大军的形成(如通过户籍制度的松弛和城乡关系的改变将农民抛入城市),到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从工人组织的形塑和限制,到金融体制的规范,国家扮演着资本与

劳动的双重代理人角色。然而,资本与权力的日益紧密的联盟使得国家对劳动权利的“代理”日益空洞化,但其作为劳动的代理人角色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在从政治的层面说,新工人的政治状态意味着政治代表性的危机,即声称代表其利益的国家或政党(政党国家化条件下的政党)与劳工阶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从而劳资对抗也经常地呈现为劳动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在20世纪,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政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工人的自我组织(工会)的形成也与政党动员密切相关。但是,伴随着政党从阶级性政党向“全面代表”的方向——亦即政党国家化的方向——转化,工人阶级不但失去了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代言人,而且也几乎无法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政治沉默的状态下,新工人也像马克思所分析的法国农民一样,在政治的层面,“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于是我们看到了代表资本利益的政客偶尔也会在道德的名义下“代表”工人说话,要求资方将无法维系资本长期运转的超经济剥削转化为经济剥削。在这个“被代表”的状态中,新工人除了寻求生存状态的某种改善之外,甚至不清楚自己的对立面何在,或者,是否存在着自己的对立面,自己的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仿佛一切的不平都可以在这些道德的言辞、政府的关怀和资方的守法过程中得以化解。

正是为了摆脱工人的这种“被代表”的命运,作者高度地重视新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评价他们在创造财富和创造新的社会关系方面的贡献。在大量的访谈中,她记录了许多工人的自主意识,并不因为这种意识是跳跃性的、片段的和自我矛盾的而加以舍弃。作者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细致地观察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7~218页。

前言

中国经济崛起了:2008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品出口国;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规模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10年7月底,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2010年经济总量(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中国经济的崛起造就了一个新的群体,这就是新工人群体。本书所指的新工人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新工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比过去的国企工人而言,过去的国企工人有国家工人的编制,享受国企工人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现在的打工者虽然在工作性质上是工人,但是却享受不到过去工人的待遇;二是新兴的产业工人的意思,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在城市的就业机会,逐渐形成了人数庞大的打工群体。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1],该《意见》中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定位,定义这个群体是“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并且“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频繁使用了三个词语:新工人、打工者和工友,在这里,这三个词语是可以互换的。

[1]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资料来源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载 http://www.gov.cn/jrzq/2006-03/27/content_237644.htm。

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和群体意识,这种自我表达是他们在经历了种种困苦、劳作、斗争和妥协之后产生的,其中缠绕着他们与城市、与资本、与家乡、与家庭、与亲戚、与朋友、与国家的复杂关系。汤普森很早就曾指出这一尝试的方法论意义:工人阶级的研究应该摆脱那种“天路历程”的正统观点,即“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驱者—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1]按照这种正统观点,只有成功者才会被记住,而迷失的状态、走不通的道路和失败的痛苦统统被舍弃在形成阶级意识的伟大道路上。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也是从一种与这种正统观点对立的“阶级形成”的角度观察新工人群体的诞生。

如今,新工人群体无所依靠。他们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自己与他人的相关关系中探寻新的动力和希望。在广本工人的斗争中,在富士康工人无声的抗议中,在新工人为改变自己的物质命运和文化命运的点点滴滴的微小努力中,我们听到了这个群体发声的愿望和要求。终有一天,人们会明白这个群体诞生的深远的政治含义。

2012年4月17日星期二

[1] 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第5页。

一方面,中国新工人从数量上来讲已崛起了: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发布数据^[1]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表明我国不仅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还促进了就业的稳定增加。”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表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新工人在工作中却迷失了: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所做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3]在深圳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年换一次工作,在苏州的新生代打工者平均每两年换一次工作。打工者的工作稳定性差别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内也许就换好几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十年都在一个厂里工作,但是总的趋势很明显,就是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

新工人在物质生活中也迷失了,找不到家在哪里:许多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乐业,在农村也找不到经济来源和发展前景,处于一种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状态。绝大多数打工者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只能在农村盖房或者在镇上买房,但这都需要花费和预支打工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收入,而农村土地的产出很难维持生计,小城镇没有合适和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打工者不能住在新盖或者新买的房子里,还是要一辈子在城里打工,结果小城镇和农村的房子只是一个“家”的符号而已。

新工人在精神追求上同样迷失了:这个社会貌似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好像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拼搏出自己的天地来,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

新生代打工者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刚出校门的时候踌躇满志——刚开始打工的时候努力拼搏——日复一日长时间的机械工作、有的还得经常上夜班让人变得麻木——然后失去人生的目标、只是日复一日地打工、近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

但是,中国新工人的主体意识也正在觉醒:工人意识的觉醒来源于他/她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经验;工人在生产中意识到工人劳动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和自身的工资待遇挂钩;工人换了很多工作以后发现,老板们几乎都一样,要赚钱就要压榨工人;在世界自由民主势不可挡的潮流中,工人发现自己失去了生命和自由,因为超长时间的工作让工人无法拥有自己的时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生命,没有生命,谈何自由。这些来自打工生活的朴素认识是工人主体意识崛起的前提。

中国新工人能否真正崛起将决定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能否真正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外商投资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创造中国新工人群体并不是来自世界和中国的投资资本的目的,而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资本和企业需要劳动力,这为农村户籍的打工群体创造了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但是资本和企业不会必然考虑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完整需求,这就造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我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规定了工人和人民的基本地位,但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以资本为中心的格局,工人和农民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证。在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

[1] “2011年统计公报评读”,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载 <http://www.stats.gov.cn>。

[2] “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资料来源于中国经济网,载 http://gov.ce.cn/data/button/200604/26/t20060426_6822432.shtml。

[3] 《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北京工友之家所做的调研报告(未出版),2009年。

《政府工作报告》上突出了“以人为本”^[1]的治国理念,开始纠正过去过度强调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为了保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为了建设一个和谐公平的中国,中国新工人必须承担起社会赋予这个群体的历史责任。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腾飞为新工人的崛起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而新工人崛起的必要条件是主体意识的崛起。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描述打工者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现状,以及打工者对自身和社会现状的反思。本书从微观入手进行现实状况的描述,并以此为基础从宏观上进行社会结构分析,认为这种进退两难状况并不是说打工者的发展是没有方向的。相反,中国社会到了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正在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打工群体正在谋求成为新工人、新市民和新公民的发展道路。从工友的故事中,我们虽然看到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步履艰难,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打工者在城市努力打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多数打工者尤其是新生代打工者的未来发展必然在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新生代打工群体精神和发展诉求的必然结果。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无预设研究法”,也就是一种没有假设前提的研究。无预设的研究并不等于没有方向和主题的研究,此次的研究主题是:“城乡之间和打工者的未来发展”。主要使用的研究工具是“半结构访谈”。我给这种研究总结方法起了一个名字,叫“拼图研究法”。中国很大,每个城市、每个村子都有其特点,所以,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每个城市、每个村子甚至每个人又都可以反映出中国现状的一个部分,当把这些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拼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我所反映的主题的中国现状的一个全貌;在完成这本书的草稿之前,并没有研究的题目,没有研究的结构,也没有研究的结论,在整理每个访谈故事的过程中,我把故事中所反映的问题提取出来,逐

渐进行分类和归纳,最后形成了结构和篇章。这就是我所说的“拼图研究法”。如果你玩过2000块组成的拼图你就更可以理解,在玩这种拼图的时候,要把颜色非常接近的小块找到一起,形成很多小组合,然后再把这些小组组合拼接成大组合,最后把拼图完成。如果书中所描述的故事,那一块块小小的拼图,能够引起你的关注和共鸣,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打工群体的现状和未来,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

本书访谈大部分是由作者本人来做的,部分访谈得到了一些同事和朋友的帮助。每个访谈的谈话时间一般是两个多小时,也有3个小时到6个小时的。访谈地点跨越了城市和乡村,我们分别在北京(访谈17名工友)、重庆(访谈6名工友)、东莞(访谈20名工友)、苏州(访谈9名工友)和武汉(访谈2名工友)进行了工友访谈,一共访谈工友54名,其中30名男性、24名女性。我们分别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10户)、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8户)、重庆(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4户,奉节县7户)和贵州(遵义县惠民村)调查了5个村子,访谈农户36户。在重庆访谈的6名工友的老家在重庆洪湖镇的坪滩村;在东莞调查的8名工友的老家在贵州的惠民村,在东莞调查的其他12名工友来自重庆奉节县。在城市进行工友访谈的时候,主要询问他/她们的打工经历以及和老家的联系;在农村进行农户访谈的时候,主要询问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以及和外出打工成员的联系。虽然本书的主要素材来源于“城乡之间和打工者未来发展”的专项研究,但是,书中第一手资料中也使用了一些以前和平时积累的研究素材和访谈记录,如第一编第五章的“北京中坞村拆迁调查”是在2010年1月做的。

全书分成四编。前两编主要是围绕着工友和农户的故事和具体信息写成的,第三编也会引用一些故事和信息,但是因为这一编会思考和论述一些社会结构层次的问题,因此也将引用一些二手资料。第四编探讨的是一些我认为的对社会发展起到核心作用的概念。这本书的结构和拼图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拼出一个个具体的局部画面,等整体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以

[1] “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资料来源于人民网,载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6/2393516.html>。

后,我们可以去品味和思考这个画面的结构、含义和给我们的启发。

本书的第一编是“待不下的城市”。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不仅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不仅在城市买不起房子,而且居住条件非常恶劣;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城市飞速地扩张与发展,甚至来不及考虑打工者的生存和发展,在城市的拆迁大潮中打工者更加被边缘化。

第二编是“回不去的农村”。在和工友的交流中,经常会听到工友说:“将来还是要回老家的”。当我具体问“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工友会说:“干不动了才回去!现在回去了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认为,“回老家”只是一种想象中的退路,其实这条退路并不存在。农村的耕地根本无法承载打工者返乡务农,而且按照现在的人均耕地规模,一年的农业收入往往赶不上在外打工半个月的收入,打工者是不可能选择回乡务农的;被打工的父母留在农村的孩子被称为“留守儿童”,看到他/她们给我的感觉是:衰败的老龄化的农村还在气喘吁吁地为城市孕育、输送着廉价劳动力。

第三编是“迷失在城乡之间”,在前两编微观层次表述的基础上,这一编描述了社会结构层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打工者未来发展的关系。第十一章描述的是打工者的一种迷失的状态,这种迷失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城市生活但是在农村盖房/买房。虽然打工者也知道不会回乡务农,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把房子盖在了村子里,如果去看看这些矗立在田间地头的楼房,你就可以发现,有很多是空着的,也有很多仅住着老人和孩子,这些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家的符号”;第十二章的前两节描述了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的迷失。第十三章描述了女性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以后所经历的角色变化和婚姻关系的

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第十四章描述“用工荒”现象。“用工荒”是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角力的一种表现,“用工荒”和打工者就业的不稳定是直接相关的,打工者虽然就业不稳定,虽然会不断变换工作,但是打工者会继续在城市打工。“用工荒”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就业虽然不稳定但是数量稳定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人群体已经形成。第十五章描述了对产业转移状况的零星观察和思考。第十六章试图论述农村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农村和城市是中国的左膀右臂,必须均衡发展,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城乡差距导致的,所以没有农村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发展。

第四编是“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这一部分讨论了公平、自由和道德这三个概念以及“家在哪里?”的问题。这里想要的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不是古今中外的评述,而是以工人的视角和最贴近工人现实的分析。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学到了最朴素而又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把这些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希望这些可以为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做出一点儿贡献。

本书的调研开始于2010年5月,大部分调查和访谈结束于2010年12月。2011年6月,为了最后一编的写作,进行了补充调研。2011年1月开始动笔整理调研资料并随后开始撰写本书,初稿完成于2011年10月,结稿完成于2012年3月。这里要感谢所有接受我们访谈的访谈对象,没有你们的真诚交流就没有这本书。也感谢所有给予本书支持和帮助的同事和朋友。

吕途
2012年3月

目 录

总述 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001

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 002

二、新工人群体的形成 007

三、新工人群体的概况 011

第一编 待不下的城市

第一章 工作在城市 018

一、工作很不稳定 019

二、工作不稳定的原因 019

三、满意的工作不等于满意的生活 027

第二章 居住在城市 035

一、下班之后“不能回家” 036

二、四平方米的空间——我们居住的地方 041

第三章 难团圆 053

一、家庭团圆 054

二、夫妻团圆 055

三、子女与父母团圆 058

第四章 打工子女在城市 061

一、关于“流动儿童”和“打工子弟”这些词 062

二、打工子女的现状描述 062

三、家长的心声 069

四、孩子的心声 073

第五章 拆呀,搬呀

——拆迁对打工群体的影响:北京中坞村拆迁案例调查报告 078

一、北京城乡接合部改造的政策背景 078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方法介绍 079

三、在中坞居住的打工者状况 080

四、拆迁的知情情况 082

五、拆迁对打工者的影响 082

六、工友对拆迁的看法 086

第六章 讨论 088

一、主动选择和无奈选择 088

二、是什么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090

三、打工者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平等待遇? 091

四、“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什么时候成为“新工人子女”? 093

五、在城市的住房保障离打工者还有多远? 094

第二编 回不去的农村

第七章 衰败的农村 100

一、所调查的五个村子概要 101

二、农业人口正在大幅度减少 105

三、农业生态系统正在瓦解 114

四、土地制度的困境 117

五、基础设施 121

六、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 125

七、乡村混混 129

第八章 有家难回 132

一、农业生产收入微薄 132

二、不能回家 141

第九章 农村里的孩子 148

一、留守儿童的数量 149

二、留守儿童的故事 152

三、照顾孩子的老人的故事 159

四、见不到孩子的父母的故事 161

五、留守儿童念书的学校的故事 163

第十章 讨论 165

一、新农村建设的希望在哪里? 165

二、让家庭团圆是社会的责任 167

第三编 迷失在城乡之间

第十一章 生活在别处——迷失在城乡之间 174

一、盖房/买房为了什么 174

二、生活是不确定的 191

第十二章 社会的断裂 198

一、三代人三个世界——王开力一家人的故事 199

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悬殊的收入差距 204

三、生活由“当下”决定 208

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211

第十三章 打工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214

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215

二、女性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 218

图表目录

图1 打工三十年历史图 009

表1 第一代打工群体和新生代打工群体的对比 010

表2 东莞某厂某车间工人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037

表3 北京皮村打工者的居住面积 042

表4 北京皮村打工者家庭现居地财产状况举例 044

表5 苏州打工者的居住条件 047

表6 北京皮村已婚并且有子女的家庭的家庭团圆状况 054

表7 深圳某工厂某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的家庭团圆状况 055

表8 东莞某厂某车间全家团圆和夫妻团圆的情况 055

表9 北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家长夫妻团圆情况 056

表10 北京皮村已婚打工者夫妻团圆情况社区随机调查 056

表11 打工者的年龄 080

表12 打工者所从事的职业 080

表13 拆迁带来的最大问题 085

表14 北京皮村工友对“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的回答 089

表 15	北京皮村工友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的回答	089
表 16	重庆赵大哥家庭结构表	108
表 17	河南孙福贵家的家庭结构表	109
表 18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李月清家农业投入产出计算	134
表 19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福贵二哥家农业投入产出计算	135
表 20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朱二先生家的农业投入产出表	136
表 21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仇先生家农业投入和产出表	137
表 22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余先生家农业投入产出表	138
表 23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杜春孝家农业投入产出表	139
表 24	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惠民村胡君家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表	140
表 25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王文贤家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表	141
表 26	在东莞打工、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农村的工友的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195
表 27	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工友的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196
表 28	东莞某厂某车间工人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197
表 29	各地打工者 2011 年最低工资标准对比	206
表 30	富士康在中国的扩张版图回顾——富士康建厂、用工和招聘信息汇总表	235

照片目录

照片 1	重庆某开发区富士康宿舍楼	028
照片 2	皮村的商业街	042
照片 3	皮村工友粟姐的家,屋子很小,几个人就把屋子挤满了	043
照片 4	屋子里面很小,也没有厨房,粟姐只能在外面做饭	043
照片 5	粟姐家屋子里面的家具很简陋,有的家具是用砖头支起来的	044
照片 6	这是在深圳打工的工友吴哥住的出租屋的门口	049
照片 7	吴哥住的出租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050
照片 8	这是吴哥住的出租屋里简单的家具	051
照片 9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小学	150
照片 10	7 岁的孩子还不会说话	150
照片 11	5 岁的孩子上 2 年级	151
照片 12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田间高耸的新房	180
照片 13	林婆婆站在房前	181
照片 14	林婆婆家 4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到处都空荡荡的	182

- 照片 15 老两口站在田间 183
- 照片 16 三层楼房里唯一有家具的房间 183
- 照片 17 新房成了储藏室 184
- 照片 18 这是王劲家在老家村子里倒塌的房屋 186
- 照片 19 王劲家给王劲的弟弟在镇里买的新房 186

总述

我们是新工人——打工三十年

197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它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2008年是中国里程碑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从经济角度来评价,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从人口结构角度来讲,中国完成了并且还在继续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理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发展虽然使中国成为世界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但是快速的经济也造成了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贫富差距巨大。资本的逻辑渐渐主宰社会发展,社会道德溃败、个人在躁乱的社会中迷失。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发生变化,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变革的影响,而在中国社会中受到改革影响最强烈的是新工人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1年户籍是农村的打工群体的人数已经达到2.5亿,而且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长。改革开放给打工者带来了机遇,但是大家都知道,农民最初进城打工是受到控制的,是随时面临被遣返的危险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只是给了打工者进城打工的机遇,而创出进城打工道路的是打工群体自身。从人数以及对整体社会结构的深远影响来讲,打工群体必须得到关注,审时度势地讲,我们必须正视打工群体作为中国的新

的工人群体的客观事实。可以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新工人形成的历史。

一、农民工、打工者还是新工人

“农民工”辩

2009年1月1日至3日,北京工友之家在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新工人剧场举办了“第一届打工文化艺术节”。来自各地的打工者、学者和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艺术节上丰富多彩的活动。在民谣专场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来自两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农民工”一词的使用发生了争执。一位代表不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另一位代表认为在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艺术节上更不应该使用“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词语。这一场景的出现自然是不愉快的,但是很多时候让所有人愉快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话语”冲突中获得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赞同使用“农民工”这个词的人大都认为,这个词说的是现象,是事实,并没有歧视的意思,认为这个词说的是,打工者来自农村,在城市打工,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是这样认为的人是否能再进一步想想,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民工”这个词的确已经不再适用于描述中国打工群体中的主流人群了,因为它不再代表客观事实。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季节性外出打工,农忙的时候回家种地,这个词用来描述打工者的双重身份是比较合适的。

到了90年代和2000年以后,多数打工者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期持续地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这时候如果继续使用“农民工”这个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词不达意,因为打工者从事的是工业或者服务行业的工作,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不是农民;第二,因为打工者户籍是农村,所以使用这个称呼,这样的逻辑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身份的差别待遇甚至歧视,

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需要改革的旧体制,而且用户籍身份来制约人口流动也不利于社会的进步;第三,很多时候称呼隐含着一种权益,用“农民工”来称呼打工者所隐含的意思是:打工者不是和城市人一样的平等的公民和工人;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打工群体自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公平和尊重的诉求,这种诉求具备了人数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生活体验和工作体验的物质基础,也正在成为一种精神需求。在调查中遇到的一个打工者说道:“称呼我们为农民工,就感觉我们好像永远不能翻身一样。”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词语已经到了需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不接受“农民工”这样一个称呼体现的是这个群体主体性的崛起。社会上普遍使用“农民工”一词是因为话语权并不掌握在打工者的手里。话语从来都是政治性的,没有权力和无法发出声音的群体总是被代表和被称呼的。2009年10月28日,在“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上,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小山有个发言,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称呼的道德和意义。小山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谈一下自我认同的问题,关于农民工身份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知识分子专家学者,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但是对于我们很重要,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们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的实践就没有意义。我们一直很排斥这个称呼。很多人认为我们有病,怎么会在乎这么个名字。很多人认为这是个事实。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忽视了道德。作为一个主体不能同样是两个东西,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不能买相反方向的两张火车票。这样的认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我们是谁?由谁说了算?我们自己说了算。自我认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我们感觉到了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同时是两样的东西,我们必须作一个选择。那么如果不作出这个选择,按照这个称呼做工作的时

候,就会有一个很可怕的境地。我以前在很多建筑工地做访谈,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工棚里,忍受那么恶劣的条件,问他们为什么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农民工啊”。认同了,接受了这个身份。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实践者,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假如我们认为我们是农民工,是一个奴隶,那么我们就丧失了能力。”

“打工者”辩

有一天,我和一个大学教授聊天,他说:“我也是个打工的。”我很无语,我在想:教授的老板是谁?

有一次,在一个工友座谈会上,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来参加了,他说:“这个世道谁不是打工的呀,我也是打工的呀!你们不要就想着普通工人需要维护权益,我们也需要维护权益。”

过去,大学毕业生倾向于被称为知识分子,但是现在大学毕业生广泛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很多工友告诉我,他/她们在生产线上经常会遇到大学毕业生和他/她们做着同样的工作。

过去,国企的工人不被称为打工者,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被赋予了国家和工厂的主人的地位。换句话说,对人的称呼不是由做什么工作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地位决定的。

在一个快速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如何称呼也需要三思了。从现实状况来看,进城务工人员是被雇佣的,是在给别人打工,所以可以被称为打工者,但是很多其他人也是被雇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者就不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专属称呼。那么到底谁是打工者?是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中,除了资本家以外所有人都是打工的?

本书最常用的称呼是打工者。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被资本所有者雇佣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打工者,那么这也许就包含了现代中国的绝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人口了。就本书而言,这里说的打工者是狭义上的,主要指在城市打工

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者。

“新工人”辩

新工人是一种诉求意义上的概念。在中国,工人这个词是有着历史的烙印的,说工人就让人联想到过去国企的工人,他/她们被赋予了工厂和国家的主人的地位,享受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我问他/她们希望怎么称呼自己的时候,一些人说希望被称呼为工人,因为他/她们觉得他/她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工友这个时候给予工人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工作的含义,不包括社会地位的含义,但是我估计工友对这个词的喜好一定和它曾经被赋予的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工人有一个概念;改革开放到现在,过去的工人在消失,新出现的是被当做廉价劳动力的打工者;现在,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那么就必须重视这2.5亿打工群体的诉求。过去三十年,是打工群体在人数上的形成过程,那么今后的几十年是这个群体谋求社会进步和群体地位的过程,而代表这个群体诉求和发展方向的词也许就是“新工人”。

用新工人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

第一,用于区分国企的“老工人”。今天,我们新工人争取的很多东西是国企工人曾经得到过然后又正在失去的。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真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又要去创造下一个三十年了,而这个任务落在了新工人群体的身上。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 Ching Kwan Lee 写了一本书在国外很有影响,书名是《依靠法律/违法》(“Against the Law”),^[1]书中对比了国企工人和新工人的不同。她称呼老工业区为“生锈带”(rustbelt),称新兴工业区为“阳光带”(sunbelt)。她认为在生锈带,老工人所拥有的是一种“社

[1]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5-17.

会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找单位、政府和国家；而农民工所拥有的是
一种“法律契约”，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我同意这
样一种观察，不过我们不能忘了，法制并不是孤立的，现在保护工人的法律一
一出台而且正在完善，但是损害打工者权益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而且打工
者维权也是步履艰难。可见新工人要依靠法制，但是社会的进步又不仅仅是
法律条文的健全。

第二，“工人”和“打工的”这两个词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工人这个词从历
史上讲还是被赋予了一定的主体性的含义，它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
位，而‘打工的’更多的是指自己是个被雇用的劳动者。

第三，“新工人”是我们的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
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
社会文化的冲动。

这里用新工人艺术团2010年出品的第4张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中的
一首歌曲来表达一下工友对称呼 and 身份的反思：

我的名字叫金凤

词曲：段玉

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在一家工厂打工。
长长的流水线，流走了我的梦想，
双手每天都在忙碌在那针线中，
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工作两年整。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

不甘于生活的繁重，我就去学了美容。

学习的日子很愉快，但工作却不是那么简单，
我要起早贪黑地把技术练，唯独是梦想着，
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

可天不遂人意，让我再一次地离去，
对生活热情的心，也跟着迷离……

后来我又去了饭店，做了普通的服务员，
被别人呼来喝去地使唤，不能有任何怨言，
觥筹交错的是杯杯的辛酸，
盘盘碗碗承载着多少梦幻！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

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

哎嘿依而呀儿哟！哎诶嘿依而呀儿哟！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啦…… 啦……

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

二、新工人群体的形成

这里所说的新工人群体的形成，指的是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新工人数

量的形成,也就是说,这些人作为中国新的工人群体的存在是既成事实;二是新的工人群体作为产业工人和服务行业劳动者的经历和体验已经形成。这两个方面代表的是一个群体的物质表现,并不能体现一个群体的精神内涵。从精神文化角度,新工人群体还有待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有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由孙恒和他的同事们在2008年5月1日创建的。孙恒是这样叙述创建这个博物馆的初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主流的历史中,我们听到的只是精英和资本的话语,听不到劳动者的声音。我们这个博物馆就是要记录普普通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历史放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陈列,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思考和进步。”

博物馆中央大厅中悬挂着温家宝总理的话:“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口号是:“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一进门的一面墙上悬挂着下面这张“打工三十年”的历史图:

下图对过去的三十年进行了梳理,将其分成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艰难的流动”,时间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从打工人数来讲,估计到1988年的时候达到了两千万。在这个阶段政府对农民外出打工是进行控制的,到城市打工的务工人员被称为“盲流”。

第二阶段是“打工热潮”,时间段是从1989年到2002年。从打工人数来讲,估计到2002年达到了1.2亿。在这个阶段,输出地政府对农民外出已经没有什么控制了。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为农村户籍人口进城打工提供了机遇,但是打工者在城市是暂住的身份,而且随时面临被遣送的威胁。

第三阶段是“打工者成为新工人、新市民”阶段,时间是从2003年到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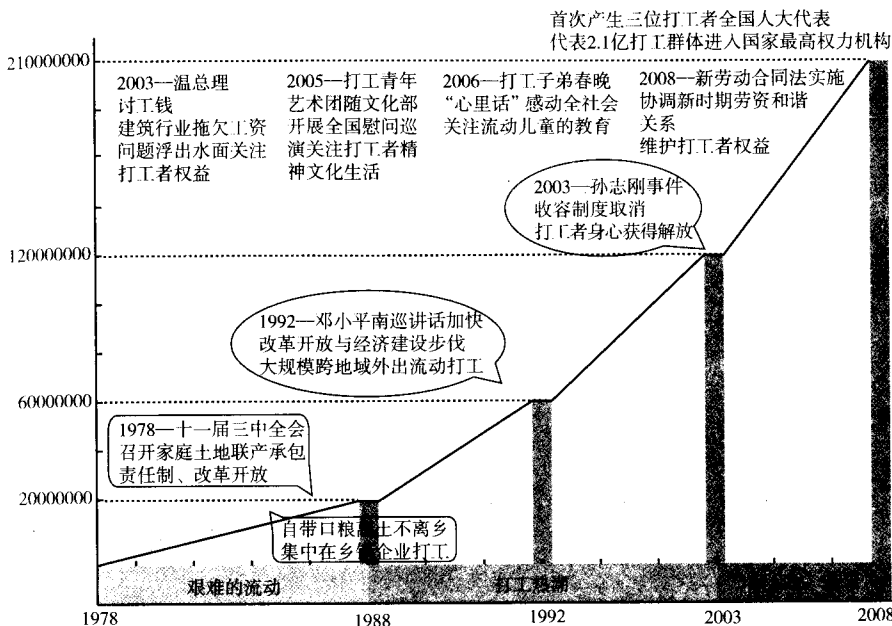


图1 打工三十年历史图

年。从政策沿革来讲,2003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打工者的身心得到了解放,不再为随时可能被遣返而寝食难安了。从打工者的数量来讲,到2008年年初,中国移民工的总数已经达到2.1亿人。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开馆,该展图也是那个时候设计和完成的,所以,三十年的历史截至2008年。

新生代打工群体

根据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抽样调查,^[1]新生代打工群体已经占到整个打工群体数量的60.9%。当新生代打工群体从人数上占到大多数的时候,打工群体的整体诉求就发生了变化,这直接影响了新工人群体的认同和精神文化层次的追求。经过三十年的代际变化,新生代的打工群体已经不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诉求决定着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和

[1] “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门户网站,载 <http://www.acftu.net/template/10004/file.jsp?aid=83875>,下文同。

社会发展格局。也就是说,第一代打工者到新生代打工者诉求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必将发生的变化。诉求并不是凭空降落的,而是打工者在长期生活、工作的物质和精神积淀中产生的。

下表对第一代打工者和新生代打工者进行了粗略的对比。

表1 第一代打工群体和新生代打工群体的对比

对打工群体的划分		出生年代	经历	认同
第一代打工者		70年代及之前出生	当过农民,会种地。80年代开始出来打工,很多是季节性工人。	认为农村是自己的归宿,觉得最后要回到农村度过晚年。
新生代打工者 (约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1%)	第二代打工者	80年代出生的	很多没有当过真正的农民,大多长年在外地打工。	虽然没有当过农民,但是,因为觉得无法在城市购房和长期稳定地工作,所以处于迷茫之中。
	第三代打工者	90年代出生的	大都没有种过地,很多在城市出生和长大。	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真正的认同,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

年纪大一些的人倾向于从时间上纵向对比,来评价此时的状况。而年轻人倾向于从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对比,来评价自己的位置。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更倾向于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打工给打工者带来的不只是工资收入,而且是整个视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新生代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在横向的对比中,他/她们看到社会的不平等,同时萌发梦想和诉求。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应该由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而决定,而不是由其从哪里来或者老家在哪里来决定。如果社会不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就会产生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移民人口的发展困境。

三、新工人群体的概况

谁是我们说的新工人群体

本书所说的新工人群体是指户籍身份是农民,但是已经离开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生活和工作,通过付出自己的劳动以换取工资或劳务报酬的广大各行各业的劳动者。

人数

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1〕}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表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2〕}显示,新生代打工者占总数的60.9%。

打工群体的收入水平

打工群体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是以他们的低工资和大多数人没有社会福利为代价的。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据统计,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在1417元”。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00家企业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

年龄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

〔1〕“2011年统计公报评读”,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门户网站,载 <http://www.stats.gov.cn>。

〔2〕“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门户网站,载 <http://www.acftu.net/template/10004/file.jsp?aid=83875>。

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性别比

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在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占66.3%,女性占33.7%。”深圳市人事局2009年进行的调查^[2]显示,在深圳的农民工中女性比例较高,男性占48%,女性占52%。

教育程度

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10月所做的《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3]显示,在所调查的移民工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2.5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2.7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0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6.67%,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占5.98%。

全国总工会所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经历的比例为67.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8.2个百分点……尽管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但是从接受教育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62.5%)新生代农民工仍停留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而接受过专业技术教育(中专、中技、职高、大专、高职)的比重尚不足四成(37.5%)。”

在总述的最后,和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在2004年出品的第一张专辑唱片《天下打工是一家》中的一首歌曲,共同倡导劳动的价值:

打工、打工、最光荣!

词曲:孙恒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高楼大厦是我建,

光明大道是我建;

脏苦累活儿是我们来干,

堂堂正正做人

——凭力气来吃饭!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嘿!

打工、打工、最光荣!

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

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

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

顶天立地做人

——勇往直前!

[1] “全总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载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6-21/2353233.shtml>。

[2] “深圳市农民工劳动保障情况抽样调查报告”,资料来源于深圳政府官网,载 http://www.sz.gov.cn/rsj/tjsj/zxtjxx/200910/t20091023_1214416_4686.htm。

[3] “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之一: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载 <http://www.stats.gov.cn/was40/reldetail.jsp?docid=402358407>。

第一编

待不下的城市

对于第一代打工群体来讲,由于年龄、知识和技能的限制,他/她们把自己定位在“农民工”这个标签上,认为自己老了是要回农村老家的;从情感上来讲也认定农村是家。也许可以说,对于打工第一代来讲,他/她们想要待在农村,但是现在却需要待在城市。

对于新生代打工群体来讲,从精神诉求和物质追求上,他/她们希望“家在城市”,当然这并不排除从情感上对农村的家的依恋和回忆。也就是说,对于新生代打工群体来讲,不仅是现实生存和未来发展需要他/她们待在城市,更主要的是,他/她们想要待在城市。

可见,不同年龄阶段的打工群体的诉求差别很大:对于第一代打工群体来讲,主要是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对于新生代打工群体来讲,主要是在城市的居住权和工作权的问题,当然,对于新生代打工者来讲,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也同样是重要的,而且是居住权和工作权的组成部分。

但是,打工者在城市的生活现状非常得不容乐观。

从工作上来讲:很多打工者的工资收入很低、难有社会保障、劳动时间长、工作内容枯燥乏味、没有发展前景。

从居住上来讲:很多打工者住在集体宿舍,私人生活成了工厂生活的延伸;很多打工者的居住条件非常恶劣,表现在:居住面积极为狭小,没有必要的生活设施、生活环境很不安全。

从子女教育上来讲:很多打工者的子女无法和父母在城市团圆,这造成了两代人生活的残缺;父母一方面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更重要的是,无法承担

教育子女的社会责任;子女缺失家长的教育和保护难以健康成长。

从精神文化上来讲:当社会允许打工者在城市居住只是为了购买他/她们的劳动力,当打工者在城市居住只是为了可以出卖劳动力、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活的时候,那么宿舍和打工者聚居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成了廉价劳动力的集中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地方,归属感和责任感都成了很不合时宜的词汇。

第一章 工作在城市

打工者换工作比较频繁,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有一些工友甚至一年换几次工作。工友换工作的原因很多,但都是因为对工作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如果我们问工友:“有多少人是出于兴趣或者喜欢做而从事现在所做的工作?”我们的统计结果一定是接近于零。打工者在做着他们不喜欢做的工作,工作的目的很大程度上仅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这就是打工者在城市的工作现状。

有些打工者因为各种原因暂时回到农村老家生活,他/她们都发现,无论城市工作和生活多么让人痛苦和无奈,还是比在老家生活更加可以忍受。一个工友告诉我:“回到老家,镇上的街道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头,实在无处可去。邻居和乡亲也大都是老人,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只能每天在家里看电视。实在待不下去。”一个女工打工将近10年回到老家以后,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忍受没有工作每天只是带孩子和做家务的生活,她告诉我说:“在厂子里,工作虽然累,但是姐妹们可以说说话,可以有收入,有工作心里觉得充实。”可见,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是仅仅由于生存需要而从事的工作也已经赋予了打工者不同的生命意义。

工作是打工者城市生活的核心,没有工作打工者就无法继续在城市待下去。工作是打工者的全部依赖,然而工作只为打工者提供了收入来源,却无法为打工者提供完整的城市生活。

一、工作很不稳定

下面的两个调查数据都显示出打工者工作的不稳定性。

全国总工会做的《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每年变换工作0.26次(也就是说平均3年就要换一个工作),传统农民工为0.09次(也就是说平均11年换一次工作)。在换过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主动提出结束合同的比例为88.2%,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数字16.9个百分点。接近五分之一(19.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近期有换工作的打算,超过传统农民工(14.9%)4.3个百分点。

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所做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在深圳的新生代打工者每一年半换一次工作,在苏州的新生代打工者每2年换一次工作。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发现,工友的工作稳定性差别很大,有的工友一年之内也许就换好几份工作,而有的工友可能10年都在一个厂里工作,但是总的趋势很明显,就是打工者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

二、工作不稳定的原因

在讨论打工者总换工作的原因的时候,我做的是经验性的分析,完全根

[1] “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门户网站,载 <http://www.acftu.net/template/10004/file.jsp?aid=83875>。

据工友所讲的故事来判断,并没有企图做任何数据分析。打工者自己选择离开是换工作主要原因,被老板开除的情况有,但是占少数。打工者自己选择离开的原因很多,从我下面要讲的工友故事中可以归纳出下面的原因:

- 因企业条件和工作性质所迫被动离开的: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工作无聊;

- 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主动离开的:为了谋求技术提升、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

- 道德的选择:觉得所从事的工作太没有良心了,就选择离开了。

一般来讲,工作不稳定是贬义的,因为工作不稳定多会导致收入不稳定和居住地不稳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频繁换工作也意味着工作机会比较多,这样的机会给打工者找到更好的工作提供一种可能性,也给企业造成压力迫使其改善条件。问题是,如果对于打工者来讲,换工作换来换去都没有出路,那么打工者就很难谋求长远发展;如果对于企业来讲,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且劳动力供过于求,那么工人的流动也不会必然促进企业用工条件的改善。

我下面要讲的是工友不断换工作的故事,这些是打工者、企业和社会必须去面对的无奈现状。

工作脏、工资还低

王佳(女)是贵州人,1981年出生,初中毕业,29岁。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到现在(2010年)打工12年了,中间生孩子休假1年,学日语1年,换过6份工作,最短的工作是第一份工作,做了5个月,最长的一份工作做了3年多。她是这样告诉我她的第一次打工经历的:

“1998年第一次打工,到了东莞,那个厂子是做印字的。做那个东西,手都脱皮了,弄到衣服上都洗不掉,都被氧化了。当时做了四五个月。第一个月发了250块工资,好高兴啊。250块钱对我来说很多了。去寮步镇上买衣

服,再买别的什么的就花了200块,不是一天花的,可能一个礼拜左右吧。200块就花没了,最后就剩50块。做了一段时间后,听亲戚和朋友他们讲其他地方的工资,就感觉自己工资太低了,工作也比较脏。当时有一个塑料厂招工,离我那儿也没有多远。我们几个就换厂了。也就是1999年换到那个塑料厂的,在那里做了一年吧。”

担心受工伤

聂夏云(女)是河南人,1990年出生,中专毕业,2007年开始打工,在断断续续打工的3年中换了5份工作,最短的做了1个月,最长的做了8个月。她是这样告诉我她的第一次打工经历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的一个塑胶厂里面,和我表姐一个厂,做手机外壳的,是出口的。2007年10月份进厂,到2008年6月份出来的。那个工厂待遇不好,也不包吃不包住,加班加点地工作,一个月最多可以拿到1700元。那个厂子里面的机器,你要是不小心手就会受工伤。有一个女孩子上夜班的时候,我跟她一个班,一点多的时候她的手就被压断了。自从她手压断之后,我每天晚上上班的时候感觉脑子里面就会听见救护车的声音,然后就特别的害怕,再加上那种气味,就受不了。”

老家村里的小餐厅不规范

王宇(女),河南人,1990年出生,20岁,高中毕业。在不到2年的打工生涯中,已经换了4份工作。她给我讲了她打工所做的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刚毕业的头半年在老家村子里的小饭店工作。饭店就在家旁边,很小的饭店。工资好低哦,一个月500元。我们村子挺热闹的,街面上两边都是商品房,然后中间有一段卖菜和卖肉的什么的。在老家饭店的工作时间长,很不规范。尤其是夏天晚上有夜市,搞到12点都很正常。没有给固定的休息时间,下午两点的时候是饭店生意很淡的时候,小饭馆老板总能为你找点事做。

比如说他让你穿羊肉串,或者包点饺子,让你闲不了,要不就叫你看着。反正小餐厅工作没有人可以干长的,我从8月份干到12月份就不干了。”

工作太无聊

陈若水(男)是湖南人,1980年出生,初中毕业。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一共换了10多个工作,最短的只做了半天,最长的做了3年。他给我讲了他在广州做保安的经历:

“2002年10月份我又到了广州,我堂哥介绍我在一个小区里面做保安。工资那个时候是6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一天上班12个小时,相当于两班倒。没什么事做整天坐在那里,因为坐在那里很无聊,就会想起以前的很多事情,然后就会想自己的一些感情的过程,还有打工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对我以前所走过的路有很系统的回忆。当时做保安做了两个月,我们那个小区里面有四个保安,那个时候天天就坐在那里,刚开始的话可能会想以前的一些东西,后来慢慢就无法忍受了,这也不是一回事,又学不到什么技术,又赚不到钱,还不如走了。”

胡恒建(男)是贵州人,1988年出生,念到初二,上过技校。2003年技校毕业实习时开始打工,在7年里,断断续续地工作,一共换过5份工作,最短的做了半年,最长的干了1年多,中途回了好几次家。他给我讲了他在东莞做保安的经历:

“2008年的时候在东莞塘厦做保安,做了应该是十个月左右。天天都要上班,工资一个月1100元,固定的,每天上十二个小时。你没满三个月,要扣钱的,扣了以后,大概就是九百多块。干满3个月以后,就扣得少些,但是也扣。这个工作太无聊,12个小时,两班倒,就是给厂里面把门的那些。太没意思,就坐那里玩儿手机,老板来了看见你玩儿手机,还要被罚款。上夜班的时候,更无聊,又不敢睡觉,老板随时都有可能来。然后就不做了,就回家了。”

回家待了好几个月呢。”

觉得工作性质没有出息

冉石峰(男)是重庆人,1990年出生。高一的时候辍学,然后开始打工,出来打工的三年中已经换了7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是做电话推销员,只做了一天;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重庆一家公益组织工作了一年。他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这份工作他只做了一个月。2010年9月,我在重庆和在那里工作的小冉聊天,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稀里糊涂不上学了以后,就想找个工作。当时县城里有一个朋友在酒吧里面,就去找他了。县城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工作,只能当服务员。当时觉得当服务员的话太没有出息了,干了一个月我就不做了。”

为了技术提升

陈若水(男)是湖南人,1980年出生,初中毕业。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一共换了10多个工作,最短的只做了半天,最长的做了3年。他给我讲了为了学到模具技术多次换工作的经历:

“2004年,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已经自立了,社会上那些骗人的把戏基本上已经骗不到我了,也不会希望别人介绍工作,都是自己找工作。我先去我姐夫的叔叔那里学做模具,我学了三个月后就自己出来找工作。那时候一直在深圳。我进了第一家厂,在里面干了半天之后,那个老板说我的技术还不行,这里不能要我。不过那个老板算好的,他把半天的工资结算给我了。”

第二次,我进一个厂里面做了一个星期。我刚进去那老板就要出差,他走的时候交代我一件事情,就是别人把材料送过来之后,按照图纸加工。我在加工的时候看图纸看错了,把它搞坏了,材料也报废了,我自己感觉不好意思,还没等他回来我自己就走了。工资也没有要。”

第三次,进到大康那里一个厂,在那里做了两个月。刚开始,老板让我开

车床,后来看我技术不怎么样,就叫我打杂,我就走了。

又换了一个厂,还是在大康,是一个模具机械加工厂。这里做的产品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做了两个月之后我就不想做了。因为做模具,是需要多做一些精密的东西,技术才会提升的。我想辞工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不要走了,给我加工资。后来,给我加了两次工资,过了年之后,我又辞工,他又给我加了一次。刚刚进去的时候是600元的底薪,那个时候600元的底薪比普工是要高的,另外还有加班费。到后来加到差不多900多元到1000元的样子,另外还有加班费。那个老板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听话,做事也比较勤快,有的时候不用安排就自己做了。那个老板人很好,我最后走的时候,他还想留我在那里做,还答应给我再加工资。我告诉他,以我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就只值那个工资,我只是想多出去闯一闯,想多学一些东西,多见识一些东西,做这行的见得越多技术提升得越快。我最后就走了。

然后我进到一个黑厂那里,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厂,没有工卡、没有合同、没有工作证。其实,这些东西在前面几个厂也都没有,只是前面的那几个厂老板还算比较讲信用,而这个老板一点信用都没有。那时候我进去,讲好的底薪是九百元,但是后来他拖欠我工资。我在进厂的时候就知道他这种人可能有点儿靠不住,就防着他。他那里不包吃嘛,我就说我没有生活费,要他先支付生活费,支付了两次,到该发工资时,他没发,说没钱。这个厂只有几个人,有的是他的亲戚,他们不着急要工资,我看他不发工资,我就走了。

然后,我又回到横岗,进了羽田电机厂,在一个模具房里面。这个厂还可以,稍微正规一点,按劳动法来的,22天制,一周休息两天。每天晚上一般是加班到九点半,礼拜六会加班,礼拜六算三倍工资的。那个时候包括加班费一个月可以挣到1900元。”

寻求更好的待遇

王开岭(男)是重庆人,1973年出生,初中毕业。1993年开始外出打工。

在这将近20年的打工生涯中,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开始是做建筑工,然后进工厂,学过修车,买车搞运输,最后又进了工厂。先后换过7份工作,最短的只做了几天,最长的做了4年。他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塑胶厂上班。他是这样描述目前的状况的:

“2007年10月份就到了现在这间新新塑胶厂上班,一直做到现在。厂里主要是生产塑料杯之类的产品,也有做耐克品牌。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有3000元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一个月可以调休四天,也可以不调休,这样就算加班工资。厂里有食堂,但是自己出钱,一餐3.5元。刚来的时候一个月只有1700元。干了一年多以后升为组长,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能吃苦,干活认真踏实。平时在管理方面,只要做到公平,就不会和下面的人有冲突。我们公司有一个主管,刚进厂两个月给我们做培训,我很听不惯,所以就和他顶嘴了。他其实也不懂实际的操作,刚刚大学毕业,我也不担心他解雇我,再说他也没有权力解雇我。我现在也不担心,因为现在找厂很容易,目前就有另外的厂打电话让我过去,只是我觉得还要在这里做一下,因为怕提升我的人难做。想去的厂在佛山,那里许诺给我的工资待遇底薪就是五千元,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在那间厂做主管,所以他极力推荐我去。我打算再做三个月左右之后过去那边。到时如果真的去那边,妻子也会跟着一起过去,现在女的找工作更加容易。这样还房贷的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了。”

感觉那个工作性质太没有良心

赵恒平(男)是重庆人,1986年出生,兽医大专学历。2008年大专毕业开始工作,在养殖公司干了7个月,在建筑工地给人看工地干了4个月,卖了3个月的寿险。他是这样告诉我那三个月卖保险的工作体会的:

“卖寿险,做了三个月。做××保险,真不是人干的,谎话说得不心跳。内行人骗外行人,真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他夸大了你也不知道。保险

本身倒不是骗人,公司说要如实告知,但是所有的营销员都不会如实告知。我们是保险代理人,一般不会给客户说什么免赔的,什么是能赔的,我们一般都说能赔。免赔的也说能赔。或者我们就不提免赔这个词,因为你没问我嘛。潜规则,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要尽量不让你抓到把柄,但是要把保险卖出去。一般出事比较少,如果出事了肯定要赔,只是会有一些细节问题。我们会说保险有很多好处,说得你心花怒放的,你要是个外行人,你就会买,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就不会买。商业保险是一种投资,是收入中高的人买的。社会保险当然不是,是大众的。商业保险是投资理财。我当时卖了一个保险,挣了两千多。卖保险真不是人干的。还有保险业内部激励制度跟传销一模一样。当你做那个工作的时候,赚钱的欲望特别大。主管或者主管以上的经理提成很多。一般的职员只有能签单才有钱,所以压力特别大。压力一大,大部分人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签单。十个人里面只有三个人能拿到高工资,其余七个人饿肚子,连工资都没有。支出挺大的,赚不到什么钱。卖保险的人都是钻到钱眼里的,但是嘴上却说得很好听,我当时听了就恶心,违心的话,没良心的。”

被开除

王开岭(男)是重庆人,1973年出生,初中毕业。1993年开始外出打工。在这将近20年的打工生涯中,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开始是做建筑工,然后进工厂,学过修车,买车搞运输,最后又进了工厂。先后换过7份工作,最短的只做了几天,最长的做了4年。他给我讲述了为什么离开了那份干了近4年的工作:

“1994年到惠州,最开始在一个建筑工地,做了半年老板卷款跑了,半年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领到。然后就进了一家电话机厂,一直做到1998年。在这间厂做得还不错,有一个老乡在厂里做保安,所以就介绍我进厂了。最开始一个月才400元左右,而且没什么休息,周六周日也要上班,每天上班大约

十个小时,偶尔才有一天休息。后来升到组长,工资1300元左右,包吃包住。那间厂有几千人。那时候觉得厂里管理方面还可以,但是还是无奈地离开了那间厂。当时离开厂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会拍马屁。组里的一个员工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故意将流水线剪断了,当时上面让我必须找出这个人来,所以我就将这个人找出来并开除了,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厂长的小舅子。后来厂长就让我走人了。”

三、满意的工作不等于满意的生活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工友对工作都不满意,但是也有一部分工友对工作本身是基本满意的。当听到工友说对工作基本满意的时候,在心里感到一丝安慰的同时我还是会继续追问:“那你打算继续做下去吗?”这个时候工友的回答却让我的心又收紧了,因为我得到的回答都不是肯定的,有的说:不会;有的说:不一定。也就是说,一份基本满意的工作对打工者的分量并不是那么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份基本满意的工作不重要。

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为什么一份基本满意的工作对打工者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有些打工者住在厂区的宿舍里,但是那里不是他/她们的家,很少有人会认为宿舍的生活是真正的生活。有些工友会租房子住在厂区外,但是那狭小简陋的临时住所也不是他/她们的家。工友即使在一间工厂一座城市工作了十几年,还是无法安顿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还是在疑惑自己的家在哪里,还是在疑惑老了住哪里去哪里。谁会对这样的生活满意呢?

这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背后的原因了,即很多工友即使在城市拥有相对满意的工作,也还是对城市生活很不满意,这是因为满意的工作不等于完整的生活。

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活应该至少包括下面三个内容:就业权、居住权和子女受教育权。可见,很多问题不是单靠劳资双方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

依靠政府、社会、企业和打工者多方共同来解决。



照片1 重庆某开发区富士康宿舍楼

说明:在富士康的大门口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很多人拿着行李离开,又有很多人拿着行李进来。富士康的工资和工作环境本身比较而言是好的,为什么人们会离开?在富士康的厂区内应有尽有:体育设施、医院、心理咨询、培训中心等,为什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宿舍楼下要安装防止自杀的网络?

下面的几个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工友的这种矛盾和无奈。

应该干不了多久——陈月菊的故事

在访谈中发现很多工友换工作是因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等原因,但是

也发现有的工友在工作条件较好、工资待遇也比较好的企业工作的时候也考虑要辞工不干,因为她/他们觉得这个工作不会自己的生活带来前景。但当我问“那么不干了以后想做什么?”的时候,工友往往又回答不出来。有的工友回答“想学技术”。当我问“想学什么技术”的时候,工友也不是很确定。一个总体的感觉就是,一些工友对究竟想干什么、想学什么、什么才是前途自己也没有看法,但是对现状却是不满的。

陈月菊(女)是贵州人,1992年出生,初中毕业。她给我讲述了从2008年初中毕业到现在的打工经历:

“我2008年初中毕业。开始就在家很近的地方上班。就在小餐馆里面当服务员。没干多久,我哥就让我去了茅台镇。在那里一个小餐馆里上班,去年(2009年)差不多快6月份了就回家去了。那个时候工资五六百到七八百。从早上八九点开始上班,上到晚上八九点。就看客人多不多,客人多的话到十点。也不存在加班不加班的,就这么多钱。小餐馆里,谁都做不长的。

我婶在东莞这边上班,她帮我先找到工作,然后我过来的。是一个纺织厂,还是蛮轻松的,只上8个小时,还要上夜班,三班倒,一千多块钱。那个时候还没有到18岁。

我听别人说广德厂还可以,我当时就想进广德厂,但是广德厂没有18岁进不去的,我到了18岁就进来了。今年6月份进来的。这个厂星期天的话不会加班的,不像其他厂如果是很忙的话必须得加班。星期六有的时候太忙就上5个小时,不忙上4个小时。工资每个月都差不多,一千七八这样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正班是8个小时,加班加3个小时,加到9点半下班。星期六加班4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每个月差不多都是这么多。不会说像其他厂一样,要么2000多元,要么就是保底。”

问:你对现在这个工厂还满意吗?

答:还可以吧,在我们那个部门还可以,我也没有看到其他部门。(星期

天不加班,每天工作和加班时间固定,所以每个月保证可以有1700~1800元的工资。)

问:你觉得你会在这儿干多久呢?

答:应该干不了多久。

问:为什么呢?

答:也就是干一两年,就出去。

问:去哪儿?

答:回家呗。回家学点技术或者干吗的。

问:你想学什么技术?

答:也不怎么清楚,随便学,看什么技术好,就学什么技术。

就像蚂蚁一样——刘海涛的故事

刘海涛在描述现在的工作时,从描述本身来讲,我觉得他对这个工作是满意的,否则不会一干就是3年;但是当我问他对这个工作是否满意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谈不上满意不满意”。通过后面的聊天,我意识到,这个回答并不是说刘海涛太挑剔或者不知道满足,而是说,我们工人对生活是否满意不仅仅取决于是否对工作满意。刘海涛在东莞的工作虽然从收入上来讲还可以,但是他还向往其他东西,包括:有业余时间和业余生活;在老家生活和工作,因为那里有更多的亲情和归属感。

刘海涛(男)是贵州人,1981年出生,技校毕业。在重庆、广州和深圳工作过,现在在东莞的广德厂工作,已经在这里干了3年了。他是这样跟我描述在广德厂的工作的:

“我在广德厂上班,厂子做运动用品。大概有6000多人,这在华南工业区来说算大的。在这个厂快做三年了。现在工资2500元。相当于技术工,不属于管理层。我们厂普工的工资大约是1800元,算加班在内,拿到手的是1800元左右。说实话我们那个厂里的管理(人员)不好做,工资不比员工高出

太多,但是压力大。现在的员工不好管理,这边现在缺人,你管得严人家不做了怎么办!现在员工没有错误,你也不能开除。有的时候员工闹一下脾气,跟你吵一架,你也没有办法。做管理有做管理的好处,做员工有做员工的好处,总体来说只要工资可以就可以。

这个厂上班的时间可以,一个月有固定那么多的休息时间,一周休息一天半。工资也可以。早上八点上班,周一到周五要上11个小时,周六上半天,相对来说稳定。我们讲的稳定一个是工资的稳定,每个月到了那个时间就能拿到工资;再一个是工作也稳定,不会说把你开除了。

我们厂现在就缺工,现在广东的厂90%以上的都缺工。流动性太大了。现在年轻的一代,90后的人更倾向于自由,进一个厂工资不怎么样,或者老管得严,搞两天跑了,就是这样的。”

问:你打工这些年,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开心的?

答:没有,我觉得打工很平淡的。

问:没有什么高兴的记忆?

答:没有什么高兴的记忆,没有中过奖。

问:在哪个厂子过得比较舒心?

答:就是现在这个厂子,上班的时间自由,工资都还可以。

问:像现在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你觉得满意吗?

答:还可以吧,谈不上什么满意不满意的。一般吧。

问:你觉得你十年以后会在哪儿?

答:这个很难说。我是2003年出来就没有再回老家去过。

问:估计一下?

答:像蚁族一样,像蚂蚁一样。觉得在哪里好,随时可以搬走的,没有什么顾虑,我们现在打工的都是哪里好就哪里去,如果不是高薪的话,肯定不会顾虑得很久。

问:你如果选择去一个地方,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工资吗?

答:工资是一方面,其他待遇,上班的时间,生活,上班自由不自由,就是相对来说,不是说绝对的自由,相对的自由。劳动强度这样的考虑。

问:如果有一个地方比这边工资待遇好,但是这个地方离你老家很远,不是在贵州或者四川,你会去吗?

答:这个也很难说,也有可能。

问:但是还是希望离老家近一点?

答:对,越近越好,回家方便,还是希望回去的。

问:是因为喜欢家乡的环境和生活习惯?

答:生活习惯也不存在的,就是说在外面流浪久了,哪里都能习惯,我到哪里都能习惯,在家里待的时间根本不长,从上初中以后就在学校里住校。

问:那为什么希望离家近一点?

答:在自己的家乡有一种归属感,强烈一点。

问:你老家也没人了吗?

答:在那个地方认识的人多一点,现在的在外面友情、亲情都很淡的,在家的话,亲戚朋友的,认识的人多一点,见到谁都可以打一下招呼,在外面现在社会那么混乱,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

问:你以后怎么打算?你长期准备在这边发展?

答:没有。

问:想将来再回老家?

答:看变化,家里那边好的话就可以回去。

问:怎么叫好?

答:现在说西部大开发,觉得我们那边可以的话就可以回去,去贵州或者重庆。那边离家近一点,感觉这边上班的时间太长了。在重庆那边上班的时间短一点,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像在这边打工的时候,在这边租一个房,晚上睡一下觉而已。早上去上班,晚上回来,就是睡一下觉,第二天起来再去上班,就是这样的工作。

问:老家上班时间怎么会短呢?也不短啊?

答:那边上班是8个小时,两班倒的,分白班和夜班比较好一点。那边都是这样的,大厂,小厂都是这样的,一天8个小时,都是分班的白天8点上到12点,2点上到6点,夜班上到3点这样的。但是一般的厂很少搬到我们那边去,一般搬到湖南。

问: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老家那边工资待遇可以的话,你就希望回老家那边的,在那边的城市生活,长期生活?

答:是,我姐也在那边,回去好一点。

问:是最近的打算还是以后?

答:有机会就回去,也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因为我姐姐、姐夫也在那边上班,如果找到好的公司的话就想回去。

问:你会回到村子里面吗?

答:不可能,不会回去的。

要付房款就必须做下去——王福连的故事

王福连(男)是重庆人,1980年出生,小学毕业。在打工的10年中,头3年换过几个工作,从2003年进了舒雅厂子之后一直做到现在,做了7年多了。他给我讲述了他在舒雅厂的工作:

“2003年的时候,就进了现在这间厂,主要生产德国品牌舒雅,不过现在德国已经将这个品牌卖给现在的香港老板了,现在生产舒雅和必雅两个品牌。中途也离开过两次。之所以一直进这间厂,还是觉得这间厂比较自由,工资也还可以,一般有两千多元一个月,如果加班多的话就可以拿到三千多元。

我反正暂时还没有打算转厂或者是辞工,还可以做一两年,因为还要付房款,经济方面也不允许不做呀。而且我们厂的工资也还算可以,比起别的厂还是要好一些。我们厂没货的时候,一个月保底工资是1500~1700元,这是上26天的工资。没有货的话,也不会放长假,组长也会安排你上26天的,

因为组长自己也要挣钱呀。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解雇工人,只是职员被解雇了一些,因为职员的工资高。我们这间厂很少缺货。我们去年(2009年)12月份在镇上买房了,做两年之后就可能会回到镇上去,想做生意,但是具体做什么现在还没想好。镇上人少,很难做生意。”

在这一章的结尾和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09年出品的第三张专辑《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中的一首歌曲:

在这里打工

词:民谣 曲:姜国良

远看这里像天堂,近看这里像银行;
到了这里像牢房,不如回家放牛羊。

个个都说这里好,个个都往这里跑;
这里挣钱这里花,哪有钞票寄回家。

都说这里工资高,害我没钱买牙膏;
都说这里伙食好,青菜里面加青草;

都说这里环境好,蟑螂蚂蚁到处跑;
都说这里领班帅,个个平头像锅盖。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就低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月尾就发愁,不知何年何月才出头。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

第二章

居住在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居住的状况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是居住权;二是居住条件;三是对居住地是否有归属感。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定了不同区域和城乡人口的居住权利。现在的政策规定是,户籍是农村的打工者可以在城市生活,前提是在城市就业并办理暂住证或者居住证。在和工友的交流中触及了居住权这个话题,对此,有的工友说:“我是中国公民,在任何地方居住只要有身份证就应该可以,办暂住证和居住证都是歧视。”本书没有对居住权这一更加宏观的层次进行详细分析,而将居住条件及家庭团圆这些比较现实的问题作为重点调研对象。

书中用比较翔实的数据和描述介绍了北京、苏州和深圳工友的居住条件。由于绝大部分打工者在城市都是住宿舍或者住出租房,所以这里根本就没有触及打工者是否在打工所在地拥有住房这个话题。在城市长期居住,但是在城市却无法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这是大多数打工者最大的苦恼。“有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地方住”是所有工友关心的首要问题。一个工友说:“动物都需要个窝,何况人!”我看到一个工友的飞信签名上说:“真想当一只蜗牛,走到哪儿都有自己的家!”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打工者有这样的感叹：真希望在城市有个家！在这里，家主要指的是住房。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有了住房，那么在城市就有了家了。反过来讲，即使全家所有成员都在城市，但是没有一个是住房，在城市还是没有家。住房和家的这种联系可以让我们得出一个判断，在一个地方是否拥有住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这个地方是否有归属感。当然，住房并不是归属感的全部。本章讲述了杜大哥的故事，他在城市拥有自己的高级公寓，但是他对城市还是没有归属感，也就是说，归属感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决定，这两个层次会互相影响，不同人的体会也会不同。

一、下班之后“不能回家”

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当工友告诉我“家在哪里”的时候指的都是老家。下班之后说“回宿舍”和“回租房”，或者说“回去”，几乎不说“回家”。工友每天住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但是每天都“不能回家”。也有的工友告诉我：“在城里都住习惯了，‘回家’反而不习惯了。”这种非常矛盾的叙述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居住的现实状况：打工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在城市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因此不觉得城市有自己的家。

以北京的房价为例，2000年五环地带的商品房价大概平均每平米3000到4000元，到了2010年这个地带的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10年的时间涨了7倍。按照打工群体的收入水平，一年不吃不喝在北京也买不到1平方米的地方。

在工友的帮助下，我在东莞铨讯厂的一个车间做了一个统计（见表2）。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在这34名员工中，有12名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了房子（占35%），有7名在村子附近的镇上或者市里买了房子（占21%），有1名在深圳买了房子（占3%），有14名没有自己的房子（占41%）。这个调查佐证了我们的判断，打工者在

打工地无法安家。

表2 东莞某厂某车间工人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N=34〔1〕)

（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

	人数	比例
在深圳买房	1	3%
在老家的镇上或者市里买房	7	21%
在老家的村里盖房	12	35%
无房	14	41%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工友王佳对她所工作的厂子的某车间的调查）

这样的状况绝对不是靠打工者的个人努力可以改变的。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地方住是自己个人无能，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住有所居”是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

下面要讲三个工友的故事，老赵是重庆某建筑工地的厨师，喻格是重庆一家大型超市的业务员，杜大哥是石匠和工厂老板。老赵常年住在建筑工地，老家的土房子已经40多年了，对于老赵和很多建筑工人来讲，也许就没有考虑过在城市安家的问题。喻格非常精明能干，对现实和未来的分析也很透彻，她不像别人那样在老家建房，但是她也知道自己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现在的出租房不是家，但是她的意志明确：一定要在城市立足。杜大哥是我访谈过的工友中最成功的一个，已经在重庆的高档小区买了单元房，在我看来他是唯一一个下班可以回家的人，但是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着将来要回老家，因为老家才是真正的家。

我盖的房子和我没有关系——和老赵的交流

老赵52岁了，重庆人，妻子47岁。在我访谈的时候，夫妻二人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老赵是厨师，妻子在工地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货。他们有一个

〔1〕 表示调查采样数，全书同。

儿子,24岁了,大学毕业,现在在北京打工。老赵告诉我:

“我是45岁的时候开始外出打工的,当时儿子读书需要钱,家里人生病需要钱。老家的房子盖了有40多年了,是土的,上面是瓦。房子应该还可以坚持十几二十年吧。村子里有很多人盖新房了,有60%的人盖了,都是打工挣了钱回去盖的。一般要花六七万元,盖两层。

建筑工地小工日工资八九十,钢筋工、钢木工几百块钱,抹灰的那个两三百块钱。工人都住在活动房里面。几十个人住一个活动房。工人年纪多大的都有,小的三十、二十的都有,二十几岁的少得很,三十、四十岁的人多一些。我们在这里打工,房子盖好了就走,挣了钱就走了,盖的房子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又买不起这个房子。就一直给人家盖。我没有什么落差的感觉,买这种房子都是几十万一套,我们又买不起。我打工没有遇到很难的事情。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们出来打工是从老板手里拿钱。如果你上班觉得不好就走好了。我会在外面打工到做不动的时候。”

动物也需要个窝——喻格的故事

喻格是重庆人,1975年出生,丈夫也是重庆人。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夫妻在重庆市打工,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两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喻格告诉我:

“重庆这地方消费很高,如果想有自己的房子,对我们打工族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期望。我现在租的这个公寓,是旧房,如果买下来差不多要35万元左右。35万元!我们可能一生都赚不了那么多钱。有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你怎么计划?!变化来了还不是一场空!像现在的房价,本来计划一年存一万,或者一年存五千,多少年之后可以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房价一涨,什么都泡汤了。

我们还没有想过在老家盖房子,盖了也是我们老了以后才去住,现在没

什么用处。我不羡慕盖了房子的人。不要说在农村老家盖房,就是在镇里面买房我都要考虑一下。不要说我手头上没那么多钱,就是手里面有那么多钱,现在叫我用十万二十万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我也不会买。买了有什么用?!在那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我要在这里立足。

社会不会满足每个人的要求,也不可能对你有很大的改善,它改善也是一点一点来的。像我们这样的打工族来说,至少要考虑孩子上学的问题,要考虑我们的工资比不了白领,也许白领买了房子后能够剩下的也不多,但是至少他们用一生的收入能够买到房子,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窝。

我们打工族不管怎么样,应该有一个立足的地方,就好比动物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连二手房也买不起。二手房首付的标准不一样,一般付到百分之五十。比如我现在租的这个房子,首付最便宜也要15万元。我们这样打工的话,多少年才有15万元?!不吃不喝都要好几年。家庭要开支,要吃还喝。住房是最大的问题。”

城里有房老家也有房——杜大哥的故事

这次在重庆,我们先去了重庆洪湖镇坪滩村,找到一些有子女在重庆市打工的家庭做访谈,然后请这些家庭的父母帮助我们和在重庆市打工的子女联系,然后我们在重庆市做对应的访谈。在坪滩村,我们访谈了杜大哥的父亲。当我们从重庆洪湖坪滩村开车回重庆的时候,杜大哥的父亲也上了我们的车。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担心他儿子在重庆不接待我们,还是他想随车去看看儿子。在村子里的时候,我们和他商量要访谈他儿子的时候,他和他儿子是通了电话的。估计那个时候就商量好了。

在我的想象中,我估计我们会去一个城中村或者一个打工者聚居区。到重庆后,我发现我们的车在城市中的一个花园小区里停了下来。面前是一座高档的高层住宅。我心里想也许我们要访谈的杜大爷的儿子在这个楼里干

装修吧。车停下后,杜大爷从车后面扛出一个大麻袋,里面装的是刚从地里收的新鲜的农产品。杜大爷的儿子从楼里迎出来,从父亲手里接过麻袋,自己扛着。跟随杜大哥我们上了电梯。高档的楼层地面、电梯和我们的麻袋形成鲜明的对比。出了电梯,我们进了一个装修一新的公寓里面。杜大哥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家,因为刚搬进来,家具还没有买齐全。

杜大哥是重庆人,47岁了,初中毕业。在重庆住了10多年了。有两个孩子,儿子24岁,女儿13岁。买了一套高档商品房,全家四口人都住在重庆市区里。杜大哥开了一个厂子,平时妻子照顾着厂子。给儿子买了一辆货车,平时儿子开车送货。女儿上初二,初中三年需要交5800元的赞助费。杜大哥告诉我:

“我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务农。24岁才出来,那是1987年,我姑夫带我出来打石头。广西、上海等地方都去过,哪里有活就去哪里。出去干的第一个月是9块钱一天,一个月之后就涨到15块。干到后来一天是300元。一年一般有四五个月在外面。我现在还继续打石头,还继续做雕像。比如,做一个雕像的活,用8拓石头,承包下来是12万元。2个人10多天可以完成。有的时候14万元的活,2个人20多天可以完成。这个手艺要有传承的,不是亲人就不教你。

我到重庆来以后,我媳妇才过来。我们一起在重庆有12年了。在重庆开了十年的涂料厂。我外出忙的时候,我媳妇照顾厂里的事情。涂料厂没有固定的工人,最多的时候会请两三个工人,一天可以有十多吨的产量。厂房有100多平方米的地方。

我6年前花13.8万元买了一套68.9平方米的二手房。那边拆迁了,就补了这套房子,有89.7平方米。现在这个房子价值59万元。我将来还是想回农村,在做不动的时候回去。这个房子是给孩子买的,小孩可以在城市。我回去可以多包一点地,搞个鱼塘,钓鱼什么的。我三年前在老家盖了一座房子,花了三万多块钱。我们村子里打工的人回去盖房子的不多。”

杜大哥请我们在家里吃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杜大哥的儿子和女儿也坐在那里。杜大哥的女儿根本不在乎我和她父亲说话。她打开电视,因为嫌我们说话声音太大影响了她而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她父亲提醒也不听。杜大哥的儿子一直坐在那里吃饭很安静。虽然很希望和杜大哥的孩子们交流一下,但是想到孩子们很可能反感或者逆反,所以我就没有尝试。临走的时候,杜大哥的儿子居然出来送我们,我很欣喜。我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你爸爸给你们买了房子,你们可以安心在城市住下去了吧?”他说:“不行,我将来也要回老家的。”我很诧异:“为什么?”他说:“反正感觉这里不是家,而且房子要给我儿子留着。”我目瞪口呆又不得不笑了:“你想想的真长远!”

二、四平方米的空间——我们居住的地方

打工者聚居区的生活和工业区的生活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打工者聚居区,虽然打工者的生活仍然简单、生活条件仍然简陋,但是很多打工者可以全家团聚。在工业区,工人好像是机器和厂方的一部分,很少有家庭有条件把子女带在身边。

打工者聚居区北京皮村的生活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地处北京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毗邻温榆河,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1万多人。根据皮村社区工会在2011年7月的初步统计,皮村大概有大大小小的工厂120家,工厂雇佣的工人从4人到200多人不等,平均每个工厂的工人有大约17人,这样统计下来大概有2000人在皮村的工厂上班。当然居住在皮村的打工者也有很多每天去附近和城里上班的。村里有两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民办小学,有近千名孩子在这两所学校就学。

根据《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在北京皮村居住的打工者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6平方米(见表3)。有一些家庭,即使有3到4个



照片2 皮村的商业街

孩子在一起居住,住房的面积也就是10多平方米。很多家庭因为住房和经济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把孩子留在老家。

由于工作和居住地都不是很稳定,再加上居住空间小和经济条件差,几乎所有打工者家庭的家居条件都不是很好,其中一个表现是家具非常少而且很简单。通过对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统计估算,一个家庭所有家具电器加起来财产价值也就是平均360元左右(见表4)。

表3 北京皮村打工者的居住面积

夫妻孩子(有的是部分孩子)住在一起的家庭的居住面积(N=74)		一个人在外面打工的居住面积(N=38)	
平均每户居住面积	16.6	平均每室居住面积	14.1
现居地家庭平均人口数	3.6	平均每室居住的人数	2.9
平均每人居住的面积	4.6	平均每人居住的面积	4.8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照片3 皮村工友栗姐的家,屋子很小,几个人就把屋子挤满了



照片4 屋子里面很小,也没有厨房,栗姐只能在外面做饭



照片5 粟姐家屋子里面的家具很简陋,有的家具是用砖头支起来的

表4 北京皮村打工者家庭现居地财产状况举例

访谈对象	家庭成员数	家具、家电	估计价值
粟姐	4	一个小桌子(放杂物)、一个大桌子(放碗筷等厨房用具)、煤气灶、电视机、风扇、电饭锅。	350元
李姐	4	电饭锅、小桌子(写作业、吃饭用的)、煤气灶、电视机、柜子、DVD、电风扇。	500元
童姐	3	小桌子、电饭锅、电扇、煤气灶、餐具。	300元
代姐	3	小桌子、电饭锅、电扇、煤气灶、餐具。	300元
平均值			360元左右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所有皮村的打工者都是租当地居民的房子住,一般都是租一个小房间,基本没有配套设施。有的有水龙头在外面,有的可以有空间摆个灶台在门口做饭,而有的就只能在屋里做饭。冬天要自己升炉子烧煤取暖。皮村的公共

厕所还算方便和卫生,也有三个私人开的澡堂。

皮村的房租不便宜。在2009年,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120元。2011年,皮村周边的村子都被拆掉了,很多周边的工友搬到了皮村,因此房价飞涨,出租屋房价已经涨了一两倍了。

新工人艺术团2007年出品的第二张专辑唱片《为劳动者歌唱》中的一首歌曲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像皮村这样的打工者聚居区的生活现状,在这里和读者分享:

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

词曲:许多

在这城市现代化的公寓别墅的旁边,
有着许多裸露着砖墙的矮矮的村庄,
村里住着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大伙来到这里求个发展……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
大伙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
大伙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
然后就去勇敢面对生活的艰辛……
哎!

村里的路弯弯曲曲,显得有些脏,
不管刮风下雨,老乡们总会在路旁卖菜:
河南的烩面、陕西的凉皮、杭州的小笼包……

大伙在这吃着家乡的东西。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

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戴着安全帽的乡亲们，

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

哎！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不曾失去方向，

我们挣来房租住在这矮矮的村庄，

旁边是乡亲们建的立交桥和洋房……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力量——

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

深圳和苏州工友在工厂宿舍的居住状况

宿舍的居住面积很小，在苏州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4平方米（见表5），在深圳是2.6平方米。

宿舍是没有窗帘的。如果睡在窗前，一大早阳光照进来就很难入睡了。宿舍的生活设备是很简陋的或者说没有什么生活设备。很多宿舍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没有晾衣服的地方、没有地方放钱，有的工厂宿舍甚至没有电源

插座。

在宿舍的生活非常不方便，冲凉很不方便。在深圳一个工友说：“冬天很冷了，晚上超过10点钟就没有热水了，加班到10点以后下班就麻烦了。我们要去饭堂旁边那里提热水。有的女孩子住六楼七楼，提不动热水上楼。夏天天气热的时候，热水开到晚上12点。”

在宿舍里很吵休息不好。大家上班时间不同，互相干扰，无法好好休息，更没有安静的环境看书学习了。在宿舍住的人很多，早上要排队洗漱。在宿舍偷盗现象严重，一个工友说，他们上夜班回来白天睡觉，有人午后进来把宿舍里三个人的手机都偷了。另一个工友说，他们厂子有一个晚上16间宿舍被偷。

宿舍不属于私人空间，不允许带朋友进来。

深圳和苏州在厂外租房的居住状况

和住工厂宿舍相比，居住面积并没有明显改善。在苏州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5.8平方米（见表5），比在宿舍居住多了约2平方米。

表5 苏州打工者的居住条件

居住类型	工厂宿舍	租民房	集宿区	
平均几个人合住	3人到8人，平均6个人左右	单独租，或者2到4人合租。2个人合租的占多数	6~11人一间宿舍，以8人一间居多	
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	4.1平方米	5.8平方米	4平方米	
居住条件	厕所	有的宿舍里面有，有的是几间宿舍合用	一般是几家共用一个厕所	在宿舍里共用
	洗澡	冲凉设备简陋，都没有通热水。要洗热水澡，或者是自己打开水回来，或者去外面的浴室	很少有洗澡的设备，即使有也很少有热水的。没有洗澡设备的，一般人们冬天去浴室花钱洗澡，夏天在厕所冲凉	在宿舍里共用，但是没有热水。要洗热水澡，或者是自己打开水回来，或者去外面的浴室

续表

居住类型	工厂宿舍	租民房	集宿区
家具	宿舍给每人提供一个床位。其他家具就根据不同工厂而不同了,有的连柜子、桌子和凳子都没有	家具多少取决于房东,提供的家具也都很简单,也有很多不提供家具	宿舍给每人提供一张床位、一个衣柜。房间里有一张小桌,两个凳子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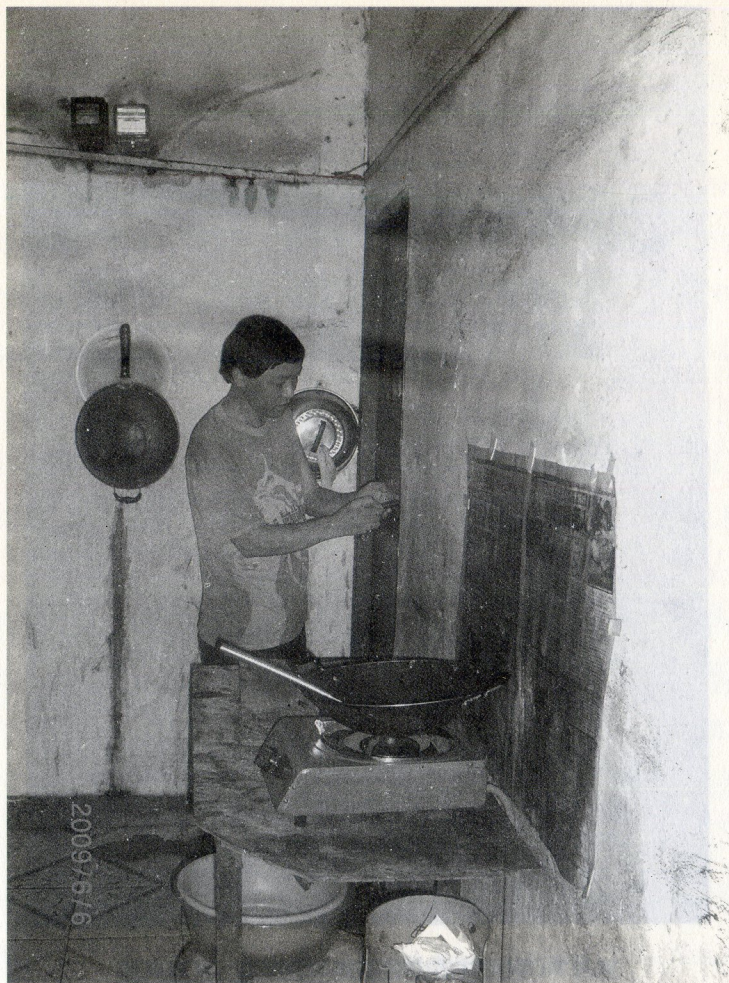
在苏州,8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房租要在 200 ~ 300 元之间。平均来看,如果在外面租房,20% 左右的收入要用来支付房租。

如果住在老房子里,没有防盗门也没有管理人员,很不安全,有的工友下班回家发现屋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偷走了。晾的衣服也会被偷走,放在外面的鞋也会被偷走。

生活设施很不方便。大多数民房都是使用公用卫生间,7 户到 10 多户共用一个厕所和冲凉的地方。在深圳看到这样的情况,几户或者十几户共用一个厨房空间,一家一个水龙头和水表。为了防止别人偷水,每家都把自己的水龙头锁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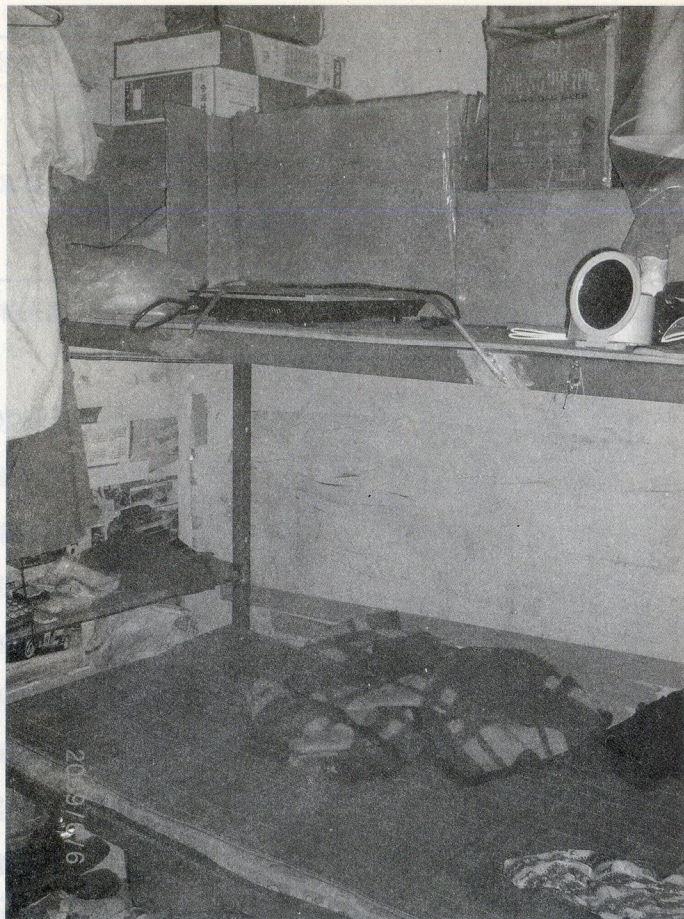
有的工友反映,房间之间是用木板或者石膏板隔起来的,隔壁很小的动静都可以听到。有的房间里光线很差,白天在房间里都需要开灯。

当然,在外面租房子的好处是有了一些自由,有私人的空间,朋友来了方便,可以自己做饭。



照片 6 这是在深圳打工的工友吴哥住的出租屋的门口

说明:吴哥住的出租屋的门锁很不安全,前几天刚刚被撬开了,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被偷走了。屋里非常狭小,也没有厨房,只好在楼道里做饭。2009 年 6 月 6 日那天和吴哥约好他下班后我们聊天,他下班的时候我正在访谈另一个工友,他就等了我一个多小时。我对他表示了特别的感谢,但是他反过来感谢我,说:“我理解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很感动。访谈以后我问他是否可以去他住的地方拍几张照片。我知道工友住的地方大都非常简陋,经常担心这个要求让工友尴尬。结果吴哥非常支持。他说:“你别担心,我理解”。



照片7 吴哥住的出租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

说明：吴哥和妻子一起在东莞打工。住的出租屋很狭小，只能放一张双层的单人床。上床放杂物，夫妻两个人就睡在下床。我是晚上9点多到吴哥的出租屋的，吴哥的妻子还没有下班。我了解到，吴哥有两个女儿，都在老家由妻子的妹妹照顾。提起女儿们，吴哥眼睛发亮，他说，孩子们非常懂事，学习成绩很好。

苏州集宿区的情况

(这一部分的内容由苏州工友家园的全桂荣撰写)

在苏州这边，打工者的居住地和工地基本上是分开的，工厂提供住宿的比较少，也就是说，工厂宿舍较少，有些大公司如佳能会建宿舍楼让员工居



照片8 这是吴哥住的出租屋里简单的家具

住，或者去承包一幢集宿楼给员工入住，但员工基本上还是得自己付房租。企业为了方便工人上下班，会请一些出租公司的大巴定点接送工人，只是车费还是得工人自己出。企业接送员工上下班的大巴也不仅局限在集宿区，在员工入住较多的农村、城中村、住宅小区都会有定点线路的大巴。

集宿楼，顾名思义，就是集体宿舍楼，又俗称打工楼。苏州2005年出台的一份文件指出集宿区的建设方针：“各市、区在外来人员集聚区域都要按规定和程序建设具有一定规模的外来人员集宿区”、“集宿区建设由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负责组织实施，以土地政策为原则，按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可由政

府投资建设、可由用工单位出资建设、可吸纳民资建设、可租用闲置厂房改建、可采取农民资金入股等多渠道形式建设。”可见集宿楼是以商业化方式运作的。

集宿区有大有小。小的只能住两三百人,大的能住六千以至万人,这样的集宿区就一般有五六幢集宿楼了。大集宿区里的楼大都每幢5至6层,每层有20到30个房间不等(每层楼的分布是中间一条过道,两边是房间),每个房间一般住6到11个人(普遍是8人)。算上晾衣服的小阳台房间面积大都在35平方米左右,有4张上下铺架子床,每张床位有一个小衣柜,有一个卫生间可供上厕所和淋浴(也有些厕所和淋浴间是分开的)。集宿楼可以说只要付钱,有空位,谁都可以进去住,每个床位短期住是每天10元,长期住是每月100元左右,都要自带铺盖。

有了对象或者有家室的人基本上是不会住在集宿楼的,可以说目前集宿楼不论其他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配套设施如何完善,都只适合于单身的人住。

第三章 难团圆

本章从三个层次描述打工者家庭团圆的现状:一个指的是核心家庭的所有成员(包括夫妻和子女)的团圆状况;一个是夫妻团圆状况;一个是子女和父母团圆的状况。打工者的家庭不团圆的情况非常复杂,可以有非常多的排列组合:如夫妻团圆,子女在老家;夫妻和部分子女团圆,部分子女在老家;夫妻子女各在不同的地方。

在打工者聚居区和在工业区打工的工友的家庭团圆状况差别很大。打工者聚居区一般是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处,村里的原居民都是当地人,当地人盖了很多出租屋出租给外地来打工的人。在很多这样的地方,外地人口大大超过当地人口。一些打工者聚居区里有专门为打工子女办的学校,有的地方当地的公办学校可以接收打工子女。在这里,一些打工者家庭可以全家团圆。在北京皮村的调查显示,全家团圆的比例达到71%。当然,当孩子需要上初中的时候,父母往往还是会选择把孩子送回老家,一个是经济上的原因,另一个是为了考高中和考大学做准备。在工业区或者围绕工业区形成的生活区和商业区就很不一样了。在这些地方,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打工者很少有条件把子女接到身边一家团圆。在深圳全家团圆的比例只有21%。

与全家团圆的比例进行比较,夫妻团圆的情况要好得多。在北京皮村的调查显示,夫妻团圆比例达到 86%~98%;在深圳达到 85%。夫妻团圆并不意味着夫妻共同生活的质量就一定好,但是夫妻团圆是保障夫妻生活质量的前提。

夫妻不团圆意味着夫妻要各自独立生活。下面讲了一个工友王佳的故事,她 27 岁结婚,结婚以后由于夫妻打工地不同就几乎没有生活在一起。王佳的看法是:喜欢经济独立的生活,而且担心两个人天天厮守在一起生活也不一定愉快。成人可以根据个人和双方的生活习惯选择如何生活,但是对于孩子来讲,家庭生活却是一种必需,一种健康成长必须有的条件。现在打工者的情况是,夫妻团圆的比例大大高于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比例。我们很难定量衡量孩子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对孩子成长的不利影响,但是众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的身心健康往往会受到消极影响。

一、家庭团圆

家庭团圆就是说核心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一起,包括父母和子女,当然这里不包括成人以后的子女。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和在南方工业区的家庭团圆情况差别很大,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家庭团圆的比例远远高于南方工业区。根据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研报告》的案例调查,在北京皮村,打工者全家团圆的比例达到 71% (见表 6);在深圳,全家团圆的只有 21% (见表 7)。在东莞,2010 年所做的案例调查显示,全家团圆的有 32% (见表 8)。

表 6 北京皮村已婚并且有子女的家庭的家庭团圆状况 (N=72)

	全家团圆(夫妻和所有的孩子都在皮村)	孩子和父母分开的(有的是所有孩子都在老家,有的是部分孩子在老家)
家庭数	51	21
比例	70.8%	29.2%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下表(表 7)是深圳某厂某车间工人家庭团圆的情况。丈夫、妻子和孩子全家团圆的比例只占 21%,其他家庭都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割裂的方式不同,主要是孩子和父母分离。

表 7 深圳某工厂某车间已婚且有孩子的工人的家庭团圆状况 (N=34)

	团圆状况	家庭数	百分比
1	丈夫、妻子和孩子都在深圳	7	21%
2	夫妻同在深圳,孩子在老家	22	65%
3	丈夫一个人在深圳,妻子和孩子在老家	2	6%
4	妻子一个人在深圳,丈夫和孩子在老家	1	3%
5	妻子孩子在深圳,丈夫在其他地方打工	1	3%
6	妻子在深圳,丈夫在其他地方,孩子在老家	1	3%
	全家团圆	7	21%
	夫妻团圆(1,2 合计)	29	85%

(资料来源:根据 2009 年工友凯伦对她所工作的车间的调查)

表 8 东莞某厂某车间全家团圆和夫妻团圆的情况

平均年龄	平均在该厂工作的时间(年)	夫妻团圆的比例	全家团圆的比例	平均有几个孩子	孩子在身边的比例
29.5	3	88%	32% (34 个家庭中有 11 个家庭夫妻和子女都在一起)	1.3	31% (34 个家庭的 45 个孩子中的 14 个在父母身边)

(资料来源:根据工友王佳在东莞铨讯厂某车间所做的调查)

二、夫妻团圆

同样,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和在南方工业区的夫妻团圆差别也很大。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夫妻团圆的比例高于南方工业区。在北京皮村,在打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家长调查中,夫妻团圆比例达到 98% (见表 9);在皮村社区随机调查中,夫妻团圆比例达到 86% (见表 10)。

表9 北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家长夫妻团圆情况(N=85)

	夫妻在一起	夫妻分开
家庭数	83	2
比例	97.6%	2.4%

说明:在北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学生家长调查中,除去两个妻子去世的,除去一个丈夫在服刑的,剩下的85个家庭中,只有两个家庭夫妻分开,一个是丈夫在老家干活,另一个是妻子在老家看孩子。我们没有把妻子去世和丈夫服刑的3个家庭在统计中加以计算。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表10 北京皮村已婚打工者夫妻团圆情况社区随机调查(N=59)

	夫妻在一起	夫妻分开
家庭数	51	8
比例	86.4%	13.6%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调研报告《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一位工友在她工作的东莞铨讯电子厂的一个车间做了调查,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全部都有小孩。平均生育孩子1.3个。34名员工中30名员工夫妻团圆,都在东莞打工,也就是说88%的夫妻是团圆的(见表8)。在深圳,夫妻团圆比例为85%(见表7)。

一个规律是,虽然夫妻在一起孩子不一定在一起,但是只要孩子在身边,夫妻一般就是团圆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皮村同心实验学校家庭中,夫妻团圆的比例达到98%。

短暂的家庭生活——王佳的故事

王佳是贵州遵义人,1981年出生,初中毕业。她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到现在打工12年了,一直在东莞打工,换过6份工作,现在在一家日资的电子

厂工作3年了,做日文翻译和材料采购工作。中间生孩子休假1年,在东北学日语1年。2008年8月通过同学介绍,王佳认识了丈夫,两个人通了一段时间电话,双方觉得挺好,然后就视频了一次,双方也觉得很好。然后王佳暑假就回家探亲,两个人见了双方的父母,然后10月份两个人就结婚了,第2年8月份就生了儿子。现在已经重新上班一段时间了。儿子由公公婆婆照顾,丈夫在遵义市上班,偶尔回家看看儿子。2010年11月12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王佳,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她告诉我:

“我在家的那8个月,我老公拿过两三次钱回来,一次一千块钱这样的,到后面就没有钱了。在家所有的开支都是我公公的钱。我丈夫每月工资有1700元。他虽然也省吃俭用的,但是他每个月会去买衣服,买很多衣服和鞋。我一次去他的宿舍,看到地上一排十几双鞋,都是白色的运动鞋,经常是穿了之后不洗,然后再另外买一双。我在家的时候,他也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能回去看我一次。他在市里上班,离我们镇挺远的,而且他们厂天天上班,平时厂里比较忙一个月只有两天休息。

他每次回来都穿一套新衣服。我就讲他:‘又穿一套新衣服回来了!’他说:‘没有,是旧的,买了好久了。这个便宜,才三四十块钱。’我说:‘你怎么不给我买一件?’他说:‘我又不知道你穿多大。’我说:‘你不会打电话问问我穿多大的。’后面慢慢我就觉得没意思了,每次你都穿新衣服,而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我结婚生孩子以前很瘦的,穿的衣服全是小号。一怀宝宝之后,买的都是孕妇装挺大的。等生了孩子后所有的衣服都不合适了。有时候就穿我婆婆的衣服。

其实当时闪电结婚我是想过后果的。我当时一下子就陷进去了,我知道如果时间一长,彼此了解得多了可能就不想结婚了。我27岁、他31岁才结婚的。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的。反而不喜欢两个人整天在一起,我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愿意隔得远一点,至少说比较自由,比较独

立,不愿意两个人整天吵吵闹闹的。我在外面的话至少我自己有自己的收入,我不会说受到任何金钱方面的一些拘束。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在家里他拿多少钱给我,我还要算一下我花多少钱,而且基本上钱都花在小孩子身上,我压根儿都没有买衣服。”

三、子女与父母团圆

打工者家庭的子女数目

北京工友之家在2009年在北京皮村社区做了一个调研,对皮村同心实验学校的家长和社区工友分别做了调查。对北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84名家长的调查发现,家长平均年龄为38岁,家庭平均子女数为2.2。独生子女家庭占15%,多子女家庭达到85%。3个和4个子女家庭的比例比独生子女家庭要多十几个百分点,达到27%。调查的85户家庭中,没有子女超过4个和以上的。最多的是4个孩子。

深圳的情况和北京打工者聚居区有很大的差别。在深圳一个工厂的一个车间案例调查发现: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为1.1;独生子女家庭占了大部分的比例,占到74%;非独生子女家庭也都是2个孩子,没有超过2个孩子的家庭。

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打工者聚居区和工业区的不同,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要素,那就是在皮村的学生家长的平均年龄是38岁。我们没有所调查的深圳工友的平均年龄的数据,但是肯定要年轻得多,因此不排除这些工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条件的变化会再生育子女。

子女与父母团圆的状况

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发现,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孩子和父母团圆的比例远远超过在深圳工厂区的比例。在北京打工者聚居区的调查显示,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比例达到64%到

70%;深圳的案例调查显示,打工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比例只有26%。东莞的案例调查显示,打工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比例是31%。(提示:子女和父母团圆,和全家团圆不是一个意思。比如,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在老家,另一个孩子和父母在城市,那么这个家庭是不团圆的,但是因为一个孩子在身边,所以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比例是50%。读者会发现前面全家团圆和这里子女和父母团圆的数字是不同的。)

难团圆——北京皮村工友小程的故事

小程和丈夫在北京皮村的商业街上开着一家照相打字复印店。小程1980年出生,河南人,丈夫是江苏人。小程1995年开始在广东打工。她在一家私人的羊毛衫厂打工,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多元钱。开始工作的两年挣的钱都给家里交农业税和帮助父母盖房子了。1997年认识了丈夫小汤,从那时候起,两个人就一起挣钱帮助小汤的家里盖房子。2001年有了大女儿,因为在厂里工作没有办法带孩子,孩子生下来就送回小汤的老家让奶奶带。从那以后女儿就没有在她们夫妻身边生活过。后来换了一家大的羊毛衫厂工作。2004年有了儿子。工厂的条件不允许把孩子带在身边,而又不能让老人同时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夫妻两人就辞职回到老家。但是在老家待不下去,没有经济来源。两个人这才来到北京,先是到尹各庄,在老乡的指导下,开了一家打字、复印、照相、洗印店。后来又来到皮村,继续开同样的店。

她/他们的小店一共只有不到20平方米空间,隔出不到6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只够放一张床和一个衣柜。2008年开始把儿子接到了北京皮村。2009年的时候,女儿都8岁了却从来没有带在身边生活过,小程心里非常愧疚。8月份女儿放暑假的时候就让奶奶带到了北京。全家5口人挤在6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必须有2个人打地铺。实在没有办法,全家只团聚了4天,就让奶奶把儿子带回老家了。女儿开始在这里不习惯,地方太狭窄,不认识小朋友,没有地方玩耍。夫妻两个带女儿去书店、游乐园、超市等地方,让女儿熟悉城市(至少是城郊)的生活环境。女儿开始很想念家乡和奶奶,但是母女情深,很

快女儿就适应了。但是,老家那边奶奶有些应付不了习惯了城市生活的孙子。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空间同时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夫妻两个决定还是把女儿送回去,把儿子接回来。

小程说,刚刚交了房租和水电,一个月光是房租和电费就要 1000 元钱,小店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开支。小程提起女儿就伤心,觉得自己没有本事。小程说,邻居卖菜的都可以挣到足够的钱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怎么自己家的生意这么不行,很着急,却想不出什么办法。小程说,皮村的房租一直在涨,如果再涨她们一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只能放弃。可是放弃了又该怎么办呢?!

2010 年下半年,把儿子也送回家由婆婆带着。春节过后,就想把孩子接过来,结果儿子很不愿意,儿子已经开始适应老家的生活了。在老家奶奶可以给按时按点做饭,院子很大可以随便跑,放学后也有小朋友一起玩。

小程一家人的团圆遥遥无期。

第四章

打工子女在城市

在北京有上百所专门为打工子女开设的学校,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很多没有办学许可证,办学条件也与公立学校相去很远,但是这些学校的存在为打工子女提供了在城市就学的可能性。关注打工子女的公益机构会筹集社会资源为这些学校的孩子们开设一些课外活动,包括课业辅导、摄影、绘画、戏剧和体育活动。这些活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靠大学生志愿者来完成。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参与这些志愿活动的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大学生对我说:“如果不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真不知道北京还有这么糟糕的地方。和这些孩子们接触多了以后,我发现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也可以有他/她们自己的快乐。”

我觉得摆在打工子女面前最大的挑战不是物质条件的欠缺(当然,我并不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也呼吁打工子女生活和教育条件的改善),而是思想和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影响。打工子女往往把课余时间消磨在看电视和看动画片上,电视节目里充斥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动画片里大多讲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动物寓言,看不到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更不要说反映打工子女生活的内容。主流媒体的问题反映出的是当今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的

问题。要想根本改变打工子女在城市生活和学习条件上的困境,前提是改变社会价值观,当打工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价值认可的时候,打工子女的生活和学习状况就得不到相应的改善。打工子女需要的不是社会对他/她们献爱心,因为他/她们本身并不是弱者,打工子女需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待遇。

在这一章,我们描述了一些在城市生活的打工子女的状况,并引用了几个家庭的故事来反映打工子女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通过孩子的故事和孩子的作文来看看孩子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的。

一、关于“流动儿童”和“打工子弟”这些词

现在我们一般称呼在城市的打工者的孩子为流动儿童或者打工子弟。和一些工友讨论了这些词,工友们不认同有些用词。工友说:“‘流动’像一个标签,感觉我们就要流动下去。”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的孩子被称为流动儿童自己是什么感觉?而“打工子弟”中的两个词也都有些让人质疑,一个工友说:“‘打工’给人一种不稳定的感觉,也有一种地位的意思在里面。”我对“子弟”这个词的性别意识问题有质疑,“子”多指儿子,“弟”是弟弟,都指男孩子。正是基于这些质疑,我觉得我们应该使用“新工人子女”这个词。“新工人子女”代表着希望和未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当然,为了方便主流习惯用法,本书多数情况下使用了“打工子女”这个称呼。

二、打工子女的现状描述

打工子女面临着城市儿童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

- 他/她们最大的问题是居无定所以及这种流动所导致的频繁更换学校;
- 很多打工子女不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只能在为打工子女开设的民办学校就读,而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比较差,而且师资也往往不够稳定;

●打工子女的父母往往工作时间长,而且没有休息日,这样他/她们经常得不到父母在生活上的照顾和在学习上的监督和辅导;

●由于户籍制度和社会对打工者及其子女的歧视,打工子女面临身份认同的尴尬。

但是,难苦的条件也赋予一些打工子女积极的影响:

●由于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子女的生活,一些打工子女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自立和照顾自己;

●由于很多打工者家庭有2个以上的子女,家庭中大一些的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需要照顾弟弟/妹妹,这培养了他/她们的责任心和生活能力。

流动对孩子的影响

不能安心学习:打工者之所以流动往往出于生活所迫。父母的艰辛、父母的身体有疾病、家庭的负担等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心理状态。很可能导致孩子不能安心学习。

没有朋友没有安全感:一名叫杨林的男孩对我说:“我们老是搬家。我心里老是想过去那些同学。我经常没有和同学打招呼就搬走了。本来和同学玩得很好,每天上学在一起走,问这问那的。后来,我就不愿意交朋友了,怕对不起别人。”

学习成绩差:在参加北京一家打工子女学校的家长会时,一位家长说:“我孩子都上3年级了,拼音都还不会。”

打工子女学校对孩子的影响

教师流动性大影响学生学习:打工子女学校教学条件较差、教师工资低、教师生活条件也比较差,但是教师的责任和负担却很多很大。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打工子女学校教师的流动性是很大的。经常换老师往往会对孩子们产生消极的影响。

课堂纪律很难维持:打工子女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影响着他们/她们的心态。一些学生不仅自己不能安心学习而且上课无法保持安静。遇到严厉

的老师还可以管得住,遇到好欺负的老师课堂纪律就难以维持。在这样的氛围下,想好好学习也难呀。

班级人数众多影响教学质量:据了解,公立学校对一个班级的学生数量是有要求的,比如,不能超过28人。这样的小班教学,对于知识的传授和与学生的互动都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对于很多打工子女学校来讲是达不到的。

按照主流价值观教育孩子使得打工子女更加迷失: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痛苦。辛辛苦苦供养出来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事业有成的成了房奴和车奴,而且为了保持优越的生活地位要继续拼命地挣钱。穷人和打工的每天拼命地干,结果不仅工资很低而且被人瞧不起。虽然大家都很痛苦,但是,大家都还是向着这些痛苦的目标努力着,也这样去教育着下一代。在下面杨林的故事里,杨林永远都忘不了一位老师对他说的话:“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就不能继续上学,将来只能给别人打工,就像你妈妈那样。如果有文凭,就可以自己挣别人的钱,去开店。”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欺负别人,另一个是被人欺负。更可怕的是,杨林想着自己的妈妈那么辛苦,累得眼睛都快看不见了,但是在老师的眼里,自己好好学习是为了不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人,这就是说妈妈那样的人是被否定的。这让一个孩子怎么去面对呐!这不一定是杨林老师的错,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没有给杨林的老师另一条教育孩子的方针。

儿童发展教育活动对孩子的积极影响:现在有一些民间公益机构设立社区儿童活动中心,或者在打工子女学校的支持下在校园里开展课后辅导和发展教育活动。通过绘画、摄影、戏剧、体育活动等方式在丰富孩子课余生活的同时,帮助孩子提高观察和思考的能力。我和一些参加了这些活动的孩子们进行过交流,很多孩子都把这些社区活动中心称为自己第二个家;很多家长也认为孩子不仅放学后有了可以去的安全场所,而且在学习进步的同时也快乐了起来。

父母和家庭状况对孩子的影响

父母没有时间陪伴孩子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多打工者家庭的父母工作时间超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10年的《“流动的心声”发展教育项目行动研究之二》^[1]的调查,在北京皮村,有约40%的打工者在社区自谋职业做小生意,为了多些收入,每天工作12到18个小时,而且没有休息日;有17%的打工者打零工,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都不固定;有43%的打工者在厂子里上班,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相对固定,但是工作也是很辛苦,每天平均工作时间是9.6小时,每个月平均休息两天半。在广州新桥村的调查显示,在新桥的农贸市场里摆摊的打工者一年365天除非特殊情况天天出摊,每天劳动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一对来自四川的夫妇,已经在新桥生活了十多年了,夫妻在农贸市场共同经营一个菜摊。妻子每天早上5点就开始卖菜了,一直到晚上9点左右收摊。丈夫每天半夜12点去进货,然后摆菜,上午也会帮助卖菜,下午回去睡觉一直到晚上。在新桥一个来自河南的女工,她在嘉群鞋厂工作,上班时间是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45分钟。父母这样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有的孩子去黑网吧,上网成瘾;有的孩子没有人监督学习和完成作业,结果学习成绩不佳;为了安全考虑,有的孩子被家长要求在家里不许外出,结果孩子没有玩伴孤独寂寞。

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中自身没有方向感和方法,因此就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由于自身对子女发展教育认识上的局限性,再加上中国教育体制的压迫,所以很多父母只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不重视子女的综合发展和心理健康。有些父母很想关心孩子的发展和教育,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比如,在广州新桥社会儿童活动中心,我遇到一位送孩子到活动中心来的工友王妈妈说,她很想教育好孩子,让孩子们有出息,长大了不像自己这样

[1] 《“流动的心声”发展教育项目行动研究之二》北京工友之家儿童项目组行动研究报告(没有正式发表),2010年。

辛苦,但是她意识到自己不会教育孩子,而且越着急越不行。她告诉我,有一次她晚上11点到家,检查孩子的作业,发现很多都错了,就很生气,把女儿从被窝里拉出来打,结果孩子只是哭,根本不能完成作业。

多子女家庭对孩子产生的影响:对比打工子女和城市儿童,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打工子女大都有兄弟姐妹,而城市儿童几乎都是独生子女。这对孩子的身心成长影响很大。一般来讲,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会少一些自我中心思想,也相对能够容忍“被忽视”,相对来讲对委屈和被误解的承受力也大一些。

家境贫寒孩子早早懂事:工友小陈告诉了我她为什么选择辍学的故事:

“2007年初中毕业时,我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选择了步入社会。我选择放弃升学的机会其实不是因为自己调皮成绩差,而是因为我不想再为家里增加负担。我当时已经考上市里的重点学校,我也报名了。在报名后的一天晚上,妈妈病倒了。妈妈平时身体就不好。病倒的那天,妈妈怎么也不肯去医院,因为家里经济不富裕。如果她去了医院就要花不少的钱,而且过不了几天我就要开学去上学,需要钱。所以妈妈为了我,为了省钱,就不肯去医院。我们怎么劝她,她都不愿意去医院。所以当晚我就拿起电话告诉老师,我不去读书了。之后,老师和亲人个个都找我面谈几次,劝我回心转意,回去读书,但我都拒绝了,我是铁了心了。这样的选择我从来未曾后悔过。”

一个人如果经历了这样的人生选择,这样的为了责任而放弃自己的选择,那么她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一定是不一样的。痛苦是人们不愿意面对和承受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历痛苦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往往很难理解责任的重量。

社会歧视给孩子所造成的不利处境

打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关于城市流动儿童的规模和结构,目前还缺乏详细的测算。据非官方估计,目前流动儿童的数量超过2000万。

从打工子女的就读情况来讲:

●北京:据凤凰网2011年9月报道,^[1]在北京有打工人员随迁子女43.37万人,其中70%在公办学校就读,其余大概10万学生在自办学校就读。这些自办学校(也称打工子弟学校)中有62所合法(有办学许可证)办学。有112所无证办学,有学生4万余人。

●上海:“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09年12月11日报道,^[2]上海模式,众多来沪打工的农民工子女纷纷入读当地的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目前已达整个在沪外来农民工子女人数的67%。政府通过给民办学校补贴的政策,打工子弟在民办学校也可以享受义务教育。

●广州:2008年广州市有流动儿童近47万人,^[3]其中有19万在公办学校就读,占40%;剩下的29万人都在民办学校上学,占60%。

没有户口和身份证:由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也由于很多孩子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打工子女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无法办理身份证,而没有身份证就会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很多问题。我认识一个工友,18岁了还没有身份证,打工挣了钱要全数交给家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身份证就不能到银行办理储蓄业务。

不被社会认可和认同:很多打工子女在城市或者城市的边缘长大。他们有些从来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事实上,他们已经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和生活,但是他们在身份上却还是农民。在北京和一些打工子女的交往中,他们会表达他们热爱北京的感情,问他们为什么热爱,他们说,因为在这里长大。北京和城市是他们的认同,但这种认同被他们的身份所否定。

在社会上和媒体中少有打工子女的声音:电视里的节目都离打工子女的生活非常遥远。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孩子们看这些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感想。

[1] “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载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7/8459337_shtml。

[2] “‘流动儿童’生根策”,载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http://nf.nfdaily.cn/epaper/21cn/content/20091214/Article106003FM。

[3] 同上。

孩子们也喜欢唱歌,但是流行歌曲中也没有反映他们喜怒哀乐的东西。儿童杂志也一样,都远离打工子女的现实生活。

杨林——一个流动儿童的故事

杨林出生于1991年,是在城市或者说城市的边缘长大的。他3岁离开家乡后,就一直在城市随父母和家人到处打工,只回过四川农村老家一次,而且只待了一个月。2009年5月12日我和杨林聊天,下面是杨林讲的他的经历:

“我妈他们开始出来的时候是给别人打工,后来觉得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干。就在广州包了砖厂,干了8年。我在广州也待了8年。1991年到1999年。8岁在广州上学,1年级就留级了四次,2年级留级了3次。我大哥二哥帮他们弄砖窑。

有一次我妈把钱放在家里,一共有400元,我拿了100元。那是要给工人发工资的,工人来了,我妈发现钱少了,凑了钱给工人发了。工人走了,我妈把我打了。问我为什么拿钱。我说,你们整天在砖窑里,不管我。周末也把我放在家里不管我。我后来又拿过几次钱,每次都被打,就不敢拿了。结果我在家也很少和爸妈说话了。

2000年搬家到北京,先在黑桥,待了3年,养猪。大哥、我妈和我舅三家一起养猪。这样热闹。租了个院子。在那上了几年学。过一条河就到学校了,挺近的。也是打工子弟学校。上了一个学期。那个学校后来没办了。我大哥在长店住,2004年就去长店的光明实验学校上学。后来我妈搬到长店了。3年级到4年级,留了两次级。

2005年又搬到通县。住的旁边有一个公立学校,我妈挺想让我去,我也想去,但是入学手续要求多,我成绩也达不到,合格分是70,就没有去了。就到育苗学校上4年级,上到一半,育苗学校合并到同心学校里。在同心学校从4年级上到6年级。6年级有半期没有上。当时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妈妈眼睛花,爸爸腰疼手疼。现在干重要的活都要我去。我当时上学总不交作业,

我告诉他们家里忙。老师去家访,妈妈告诉老师,因为需要我帮家里干活,而且说我学习不上进。第二天我去上学,老师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不能上学,只能给别人打工,就像你妈妈那样。如果有文凭,就可以自己挣别人的钱,去开店。到了同心学校后,我是打算好好学习,但是我心思不在一起。

妈妈老是搬家。我心里老是想过去那些同学。我也没有和同学打招呼就搬走了。本来和同学玩得很好,每天上学在一起走,问这问那的。同学们对我很好。同学去我原来住的地方找我,房东告诉他们我搬家了。学校里,总换老师,4年级、5年级、6年级都换过老师。教的东西都合不上。当老师的教一学期就走了,那就不是真正的老师。老师不像老师,没有固定老师教完整的课程。我2008年6月28日在同心实验学校毕业。”

杨林还讲了他小时候的一个小经历。他4岁的时候,他二哥带过他一段时间,他二哥是包工头,有时和工人一起在建筑工地开挖机,就经常把杨林带上放在后座上,杨林就经常看着二哥怎么操作。一次,他二哥干活,他在后座睡着了。等他醒来,二哥走了,挖机停在工地上。杨林就站在驾驶座上把挖机开回了住的地方。一个4岁的孩子自己开着庞大的挖机回来了,大家都目瞪口呆。同心学校的老师也一致评价杨林动手能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这样一个年轻人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三、家长的心声

下面是四个工友讲的他/她们和孩子的故事。王永贵的孩子虽然在身边,但是由于工作关系他几乎见不到孩子;陈满贤夫妇在很长时间轮流上白班和夜班以便可以轮流照顾孩子,孩子是和他/她们在一起了,但是夫妻却难得见面了;郝先生发现总搬家让儿子经常失去熟悉的邻居和小朋友,但是也让他长了见识锻炼了社交能力。王福兰的儿子14岁了,当了流动儿童又当留

守儿童,父母受折腾,孩子也受折腾。

孩子在身边但我见不到孩子——和王永贵的交流

王永贵(男)是河北人,31岁,妻子也在北京,他做装修,妻子做家政工。他13岁就不上学了,开始打工。开始在饭店里,后来修理摩托车,后来做装修。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他这样描述他的生活:

“大孩子在老家上学,小孩子现在在这边。我大儿子学习成绩挺好的,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说考了第一名。他还说回家让我给他买烤鸭呢。我小儿子从上幼儿园都没人管过。我很少和孩子在一起,所以对自己的孩子不是很了解。我一天回家几个小时,回到家家人都睡觉了,我在和不在没有什么区别。我回到家一般都是晚上九点了,早上孩子不醒我就起床了,我怎么去沟通!孩子在我身边不假,但是我没有跟他在一块共处的时间,我的职责就是想办法挣钱养他就行了,这是我的职责,就这么简单。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还有别的来钱的方法吗?我也想给我们两三天时间带他去玩儿,谁挣钱?谁养?难道今天有吃的明天就不吃了?”

夫妻上对班轮流照顾孩子——和陈满贤的交流

陈满贤(女),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1976年出生,34岁,小学毕业,19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了。她告诉我:

“到江苏打工,也到北京制衣厂上过班。1997年年底回家结婚,结婚后又出来打工1年左右,然后回家生小孩,小孩1岁多时又来到广东的一家餐馆打工。后来小孩3岁的时候就把小孩接到广东自己带,主要因为丈夫的哥嫂离婚了,他们的小孩由老人带着,所以自己担心老人带不了这么多。小孩在这里上幼儿园也没有人接过,因为大人都要上班,小孩就自己回家。幼儿园有接送车,一般送到楼下。小孩比较听话,除了父母和舅舅之外,任何人都没办法带走他。那时我们夫妻俩在一间厂上班,两个人安排成对班,每天上班12

小时,早上7:30和晚上7:30上下班,一个人上晚班,另一个就上白班,这样就可以轮流照顾小孩。

现在一个星期加班三个晚上,每天加班3小时,周末加一天班,这样一个月下来大约一千多元。小孩一学期学费1700元,不包括其他的杂费(比如书本费、校服费等),如果都加起来一年可能一共需要6000元左右。学校是私立的,现在外来打工的不能上公立学校。现在丈夫没有在厂里做事了,在外面做装修之类的。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一共有3000到4000元。反正两个人工资要节约点,可以存一个人的工资。

对于小孩未来的打算,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只要他愿意读,我都会送他读书。他现在回来做作业,我根本辅导不了他,有时就是他爸爸辅导一下。打算初中的时候送他回家去读,因为地方不同,考学的时候题目不一样。到时他要回家读书的话,可能要自己照顾自己,因为老人根本管不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想现在就回去。但是没办法,我姑姑四十多岁了还在外面打工,因为不知道回去以后干什么。家里那边做小生意的太多了,不好做。”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和郝先生的交流

郝先生是河北人,初中毕业后就来了北京,在这里打工有十几年了。他的经历是这样的:

“2003年到2007年做家具安装,2007年到现在一直做空调安装。最多的时候一年换了5次工作,搬家也搬了5个地方,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在北京要生活,主要是收入问题。现在做空调安装工作,整天要跑来跑去,北京的大部分路线都熟悉了。虽然在北京的时间很长,但来皮村还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几个月前,经朋友介绍,来到现在工作的这家空调安装公司。平时有活的时候就出去跑,没事就出来放松放松,跟同事来工友之家的社区活动中心打打球。我有一个儿子,来北京3年了,今年6岁,现在在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读小学一年级。孩子跟着我，孩子妈妈在老家。

我觉得我儿子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来皮村才10天左右，但对这边已经挺熟悉的，好几次都是儿子带我来到工友之家的电影院看电影，来新工人剧场看话剧。孩子一点都不怕生，跟我很不一样。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回答问题也怕。我孩子的这种性格挺好的，现在的社会，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必须要跟别人交流，跟社会交流，不然就孤陋寡闻。

我工作的变动给孩子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孩子在一个地方刚刚熟悉了，有了自己的伙伴，又要搬家，去陌生的地方，这对孩子来说，有时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变动，可能会让孩子感觉到内心的不稳定、不安全，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哪里才是自己最终的家。前几天，我带着儿子去了大兴，去看看原来住的地方，当房东告诉我们说，以前的邻居都搬走了，小伙伴都不在了，我儿子哭了，我心里也酸酸的。”

留守了又流动，流动了又留守——和王福兰的交流

王福兰(女)是重庆人，37岁，初中毕业，丈夫39岁，初中毕业，有两个小孩，大儿子14岁了，小女儿才2岁。2010年11月15日我拜访了她的快餐店，聊天中她告诉我：

“最开始的时候儿子在家由爷爷奶奶带，后来奶奶生病去世了，爷爷一个人带不了，没办法把他接到这里来上学。儿子在这里读书我们没有时间照顾，学校不负责任而且教学质量太差，在这里读了初中后回家读六年级成绩还跟不上。这里考试由老师随便写分数的，考60分可能会给你写成80分90分。这里的费用很高，学费需要两千多元，还有校车接送费和生活费，一学期下来一共至少需要四千元。他以前在这里上学我们花了好几万元钱。现在已经送回家里去读书了，我妈帮我看着，在家里的学校寄宿，每周回我妈那里一趟，主要将衣服拿回家洗一洗，或者拿钱零用。是公立的中学，学费很少。

小女儿是超生的，要交罚款，正在办户口。我在东莞这里生的我女儿，在医院生的，花了两千多元的费用。那时我想到自己带个小孩不好找厂，正好丈夫学过炒菜，所以坐完月子之后就开了现在这家快餐店。不过那时小孩好可怜的，几个月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后来长大一点忙起来就将她拴在桌子上。所以以前女儿在这里身体很不好，不是感冒就是拉肚子，因为刚端碗给她喂饭，有人来吃东西，就没办法喂她吃了。最后只好把她送回家让我爸爸妈妈照顾。现在回到家里小孩就好多了。不过，我爸妈他们的农活也多，也很难。明年打算把她接过来上幼儿园，到时看我爸爸妈妈他们来一个人帮忙带小孩。

生意还可以，但是现在物价太高，所以赚得也不多，一个月除掉开销之后，两个人一共也就四五千元。但是很辛苦，早上七点钟要起床，晚上一两点钟才睡，所以睡觉很少。早上需要去超市买菜和肉，有一些东西可以打电话让人家送过来。开店比起在厂里打工要自由很多，而且感觉会好些，反正是自己的。不过打算做到明年天气热的时候就不做了，因为夏天没什么人吃酸辣粉，我老公早就不想做了，他觉得太累了，但是我还是想继续开。的确太累，自己从开店以来瘦了二十多斤，不过如果我老公不想做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做起来。老公说不开店再慢慢看做点其他的。在老家做生意也不好做，以前在老家的镇上也卖过衣服，但是没有什么钱赚，做同样生意的人太多了。”

四、孩子的心声

这里选一个孩子的故事和一篇孩子的文章来反映在北京生活的打工子女的心声。孩子的故事是根据北京东三旗社区的一个孩子的访谈整理出来的，访谈是2010年由北京木兰社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齐丽霞做的。

孩子写的文章来自一本专门为在城市生活的打工子女出版的月刊《流动的心声》。月刊是由北京工友之家儿童项目组编辑出版的，2008年5月出版

了第一期,现在每期印刷5000册,免费发送到北京50多所打工子女学校。

小越的故事

我叫小越,今天十岁了,我老家是河南的。我很喜欢读书,成绩也不错,一直都在班上考前十名。我最喜欢语文了。

我一直在老家长大,跟姥姥生活在一起。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到北京收废品了。那个时候,我大姐已经出来打工了,她帮别人卖衣服。二姐正上初中,弟弟才四岁。爸爸妈妈把二姐和弟弟带着一起去了北京,把我一个人留在姥姥家。

妈妈每年回家一次,都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会给我买很漂亮的新衣服。我可开心了,但是每次只会在家里待三四天。每当妈妈要走的时候,她都没有告诉过我,总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就走了。然后姥姥才给我讲,妈妈已经走了!我会特别难过,会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哭,会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多希望妈妈永远不再离开我啊!妈妈走的那一天会特别难受,等过了那段时间,会慢慢好起来,重新和小朋友一起说说笑笑,玩游戏。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妈妈去接她们,我却每次自己回去,心里就特别难受,会回到家里自己哭。

我们家里只有弟弟一个是男孩子,爸爸妈妈特别宠爱他。什么事情都会依着他,有好吃的东西都会让他多吃一点,有时候会不给我吃,背着我只给弟弟一个人。我觉得很不公平。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妈妈出去,就留给弟弟十多块钱,让他买东西吃,却只给我一块钱。还有,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弟弟会多一些,如果我问弟弟要,爸爸就会打我,妈妈虽然不会打,但是她在分东西的时候,会一开始就多分好多给弟弟。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偏向弟弟,因为他是男孩子,爸爸妈妈觉得他将来可以养活他们。我觉得我长大了也可以养活爸妈的,我这样跟爸妈说,可是他们却不相信!他们告诉我,女孩子不如男孩子,就算是男孩子学习不好,也可以干大事!我才不相信呢,如果连字都不认得,没有出息,将来谁会让你做事情啊!我弟弟就很不爱学习,只比我

小一岁,现在却还在念大班。爸妈也很发愁,就想着如果念不成书,将来让他学开车。

妈妈在我九岁的时候把我接到北京来了,是因为姥姥要照顾舅舅的小孩子,在北京我也可以受到好一点的教育。我就住在东三旗的废品站的货点里,房子比老家的小多了,还要交钱,每个月都要交一两千,好贵啊!有时候想,还不如在老家呢,但是爸爸妈妈在这里,还说要挣到好多好多钱才回老家。现在每天妈妈五点钟就会起来,去西直门收铁,晚上九点有时候十点才能回来。爸爸是收旧木头的,去搞建筑的地方收这些旧木头,可以走得晚一点,七点钟离开家,晚上七八点就回来了。他们每天都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妈妈更苦更累一些。爸妈经常回来很晚,我常常去路口接他们,想他们能够早点回来吃饭。

我现在的学校离我们很近,比在老家近多了。还有更开心的是,这里学校有图书馆,里面有好多好看的书,我最喜欢看作文书和童话故事,还有一些书是教育怎么做人的,我也喜欢!

听说东三旗要拆了,对我来讲是很突然的事情。开始最担心爸妈要把我送到老家去,让我一个人在家。但是听爸妈讲他们是准备再找别的地方,继续收废品,也准备把我带到身边,另外再找学校继续读书。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我是比较胆小的人,很怕和陌生人说话,好不容易来这里有几个好朋友,和大家也都熟悉了,却又要搬家,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

我将来长大了想卖儿童服装,因为我从品德书上看到全世界有六亿小朋友呢,如果我开个大大的服装店,就可以赚很多钱,我只想每个月能赚几千块啦!赚到钱最想给妈妈买新衣服,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妈妈给自己买过衣服,她穿的衣服不是爸爸的就是自己收来的!

在北京住得不好——家丽的故事

我是一个在北京上中学的学生,我16岁,在我记忆中搬家都搬了四次了,搬得东西都弄丢了。

了第一期,现在每期印刷5000册,免费发送到北京50多所打工子女学校。

小越的故事

我叫小越,今天十岁了,我老家是河南的。我很喜欢读书,成绩也不错,一直都在班上考前十名。我最喜欢语文了。

我一直在老家长大,跟姥姥生活在一起。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到北京收废品了。那个时候,我大姐已经出来打工了,她帮别人卖衣服。二姐正上初中,弟弟才四岁。爸爸妈妈把二姐和弟弟带着一起去了北京,把我一个人留在姥姥家。

妈妈每年回家一次,都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会给我买很漂亮的新衣服。我可开心了,但是每次只会在家里待三四天。每当妈妈要走的时候,她都没有告诉过我,总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悄悄地就走了。然后姥姥才给我讲,妈妈已经走了!我会特别难过,会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哭,会特别想妈妈,那个时候多希望妈妈永远不再离开我啊!妈妈走的那一天会特别难受,等过了那段时间,会慢慢好起来,重新和小朋友一起说说笑笑,玩游戏。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的妈妈去接她们,我却每次自己回去,心里就特别难受,会回到家里自己哭。

我们家里只有弟弟一个是男孩子,爸爸妈妈特别宠爱他。什么事情都会依着他,有好吃的东西都会让他多吃一点,有时候会不给我吃,背着我只给弟弟一个人。我觉得很不公平。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妈妈出去,就留给弟弟十多块钱,让他买东西吃,却只给我一块钱。还有,吃东西的时候,总是弟弟会多一些,如果我问弟弟要,爸爸就会打我,妈妈虽然不会打,但是她在分东西的时候,会一开始就多分好多给弟弟。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偏向弟弟,因为他是男孩子,爸爸妈妈觉得他将来可以养活他们。我觉得我长大了也可以养活爸妈的,我这样跟爸妈说,可是他们却不相信!他们告诉我,女孩子不如男孩子,就算是男孩子学习不好,也可以干大事!我才不相信呢,如果连字都不认得,没有出息,将来谁会让你做事情啊!我弟弟就很不爱学习,只比我

小一岁,现在却还在念大班。爸妈也很发愁,就想着如果念不成书,将来让他学开车。

妈妈在我九岁的时候把我接到北京来了,是因为姥姥要照顾舅舅的小孩子,在北京我也可以受到好一点的教育。我就住在东三旗的废品站的货点里,房子比老家的小多了,还要交钱,每个月都要交一两千,好贵啊!有时候想,还不如在老家呢,但是爸爸妈妈在这里,还说要挣到好多好多钱才回老家。现在每天妈妈五点钟就会起来,去西直门收铁,晚上九点有时候十点才能回来。爸爸是收旧木头的,去搞建筑的地方收这些旧木头,可以走得晚一点,七点钟离开家,晚上七八点就回来了。他们每天都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妈妈更苦更累一些。爸妈经常回来很晚,我常常去路口接他们,想他们能够早点回来吃饭。

我现在的学校离我们家很近,比在老家近多了。还有更开心的是,这里学校有图书馆,里面有好多好看的书,我最喜欢看作文书和童话故事,还有一些书是教育怎么做人的,我也喜欢!

听说东三旗要拆了,对我来讲是很突然的事情。开始最担心爸妈要把我送到老家去,让我一个人在家。但是听爸妈讲他们是准备再找别的地方,继续收废品,也准备把我带到身边,另外再找学校继续读书。但是我还是很担心。我是比较胆小的人,很怕和陌生人说话,好不容易来这里有几个好朋友,和大家也都熟悉了,却又要搬家,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

我将来长大了想卖儿童服装,因为我从品德书上看到全世界有六亿小朋友呢,如果我开个大大的服装店,就可以赚很多钱,我只想每个月能赚几千块啦!赚到钱最想给妈妈买新衣服,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妈妈给自己买过衣服,她穿的衣服不是爸爸的就是自己收来的!

在北京住得不好——家丽的故事

我是一个在北京上中学的学生,我16岁,在我记忆中搬家都搬了四次了,搬得东西都弄丢了。

我现在一看见拆房子的和盖房子的,我就想跑,看见盖房子就会想到我会不会被砸中呢?我就赶快走。

搬完家后一看房子太小,又太贵,只能将就着住,离学校又远,三更半夜就得起床,睡眠不足真烦人。

那些房东只为将来拆房子时多给些钱,钱越多越好,不顾住客的感受,人又多,什么人都有,乱七八糟,这家丢了东西,那家丢了东西,就都在这骂,骂得特别难听。

而且院子的路脏得跟猪窝似的,根本没有办法形容。人又那么多却只有一个水龙头,接桶水都得排队,等好半天,且房子的墙也不隔音,从第一间到第四间房子说一句话都能听得见,实在不方便。

我就只有一句话想说:在北京住得不好。

(作者:培新学校 张家丽,摘自《流动的心声》月刊总第16期)

我这里选用新工人艺术团2007年出品的第二张专辑唱片《为劳动者歌唱》的一首歌曲来反映孩子们的心声。

小小的渴望

词曲:段玉

我住在一个村庄,但这里不是我的家乡,
从小随着父母四处漂荡,风餐露宿习以为常。
我有着明亮的眼睛,也有着无尽的渴望,
满面的尘灰朝着天空,也没有美丽的衣裳。

哇哇!哇哇!这是弟弟的哭声在响,
哈哈!哈哈!这是妹妹的笑声在响,
啊啊!我在渴望,憧憬那美好在远方。

不久后我将离开村庄,再次随父母去远方,
我将离开欢乐的校园,为生活奔波飘荡。

哇哇!哇哇!这是弟弟的哭声在响,
哈哈!哈哈!这是妹妹的笑声在响,
啊啊!我在渴望,憧憬那美好在远方。
啊啊!何时能不再飘荡。

第五章

拆呀,搬呀

——拆迁对打工群体的影响:北京中坞村拆迁案例调查报告

全国上下都在进行着拆迁,北京进行的是城乡一体化改造,而在西安和武汉等地进行的是城中村改造。关于拆迁的报道有很多,多数是关于当地居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如果对城边村和城中村有所了解,就会知道,在这些地方外来人口比当地人口多很多,少则多几倍,多则多几十倍。可以想象,在这些地方进行拆迁,对外地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本地人的影响。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关于外地人受到拆迁影响的报道。

在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区分两个概念,那就是所有权和居住权。打工者的确对城市的土地和房产没有所有权,但打工者租了房子居住在一个地方是有居住权的,这个居住权同样要受到尊重和保护。许多国家都有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即使是违法居住)超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享有了在此地的居住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外来打工者同样有权在拆迁过程中申诉自己的权利。

一、北京城乡接合部改造的政策背景

综合各种报道的信息,北京市政府认为需要改造的行政村一共有 227 个,

2010 年开始,北京对需要重点改造的 50 个村子进行改造。^[1] 这 50 个重点村均位于北京市城乡接合部,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和大兴 9 个区,总面积约 117 平方公里,涉及户籍人口 18.3 万人,其中:农民 14 万人、居民 4.3 万人、流动人口近 69 万人。另据报道,^[2] 计划拆迁农居民约 13 万户,解决搬迁安置农居民 30 万人,疏解流动人口 120 万人。不同报道口径中对所谓流动人口的数据一下子就差了 50 多万人。报道中,对当地居民是“安置”,对所谓流动人口是“疏解”,从中可以读出完全不同的态度。

二、调查地点和调查方法介绍

该案例调查的地点在北京市景山区的中坞村。据居委会介绍,当地人口有 7 千多,外地人口有 2 万多人。根据我们的观察和了解,外地人口数应该高于甚至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但是我们无法估计具体的数字。与中坞临近的北坞村是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的第一个村子,已经在 2009 年拆迁了。北坞村当地人口 2 千多,外地人口有 2 万多,外地人口是本地人口的 10 倍。在城乡接合部打工者聚居的村子里,外地人口一般是当地人口的 5 到 10 倍,最高也有到 20 倍的。2010 年 1 月,我们对中坞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参与调查的是几位同事和志愿者。一共访谈了 32 名工友,其中男性 17 名、女性 15 名。我们采用的是问题单调查的方法。也就是说,针对观点和看法性的问题的回答是开放式的。在下面的调查统计中,经常可以发现,有些问题的统计的人数不到 32 人,这是因为有些工友没有回答我们的一些提问。

[1] “北京年内将搬迁改造 50 个重点村 2/3 原村回迁”,载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2010-04-02/032019991547.shtml>。

[2] “北京市今年搬迁安置农民 30 万人”,载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0/1103/02/6KHH6IMN00014AED.html>。

三、在中坞居住的打工者状况

打工者的年龄

根据中坞的调查,打工者的平均年龄为38岁。调查对象中最小的年龄是25岁。从下表可以看出,多数的打工者属于第一代打工者,占69%。

表 11 打工者的年龄(N=32)

年龄	人数	比例
25~30岁	10	31%
31~40岁	12	38%
41岁以上	10	31%

中坞的打工者来自哪里

所调查的打工者有将近一半来自河南,占47%。也有来自河北、山东和四川等地的。

打工者的职业和收入情况

打工者所从事的职业包罗万象,访谈了三十多位工友,有二十多个不同的工作内容。给别人打工和做生意开店的打工者的人数最多,分别占了40%。

表 12 打工者所从事的职业(N=30)

职业	人数(人)	百分比
给别人打工(清洁工、保洁、小时工、饭店洗碗、装修、出纳、室内设计、培训、促销工作、教师)	12	40%
做生意、开店(卖杂货、卖床上用品、小超市、熟食店、路边卖烧饼、卖菜、粮油销售、餐厅、修车)	12	40%
自谋职业(司机、摄像)	2	6.7%
家庭妇女	2	6.7%
失业	2	6.7%

打工者的收入很不稳定。一个导致收入不稳定的因素是季节性,很多生意受季节、天气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当然也有人为因素的影响,拆迁就是最大的影响之一。而给别人打工的工友也会受到失业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收入不稳定。

在访谈对象中,收入很不稳定而无法估计月收入的有7位。处于赔本状态的有1位。打工和自谋职业的12位工友的人均月收入是2058元。做生意和开店的平均家庭月收入是3760元,人均月收入约为1880元。

打工者的居住状况

根据调查,在中坞打工的工友平均外出打工的年数是9年,已经在北京平均居住7年了,已经在中坞平均居住3年半了。

工友的居住条件都很差。平均每户的居住面积是10平方米。平均每月的租金为341元。家庭平均每户有2.7个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平均每人的居住面积是3.7平方米。

有7户做生意的工友告诉了我们他们商铺的面积,排除一个做修车的工友(因为他的商铺面积很大,有200平方米,比较特殊),平均商铺的面积为21平方米。平均每月的租金为1630元。

所有访谈的工友的出租屋里都没有任何必要的生活设施,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水龙头。大家去公共厕所,去公共澡堂。有的在屋子里的一个角落做饭,大部分在外面搭个篷子做饭,有的就在露天里做饭。

一位做保洁的工友告诉我,她租了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每月房租300元,水费一年50元,电费1块钱一度,网费每月40元,闭路电视每月10元。

一个工友租10平方米的小屋开小卖部并维修电器,这10平方米的空间既是店铺也是居住的地方,住的地方占一小部分,大概有3平方米。租金每个月700元,不包括水电和暖气费。

四、拆迁的知情情况

知情的途径

多数人都是从口口相传途径知道拆迁的消息的。在问及从哪里知道拆迁的信息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的24名工友中的21名（占88%）说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别人包括：老乡、邻居、房东等。一个人说是从宣传栏里看到的，一个人说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人说：“看到有人测量土地，猜测到的。”

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吗？

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有确切的消息，但是都人心惶惶的。这个调查是2010年1月做的，后来了解到中坞是2010年5月拆的。

问关于拆迁的消息时，工友是这么回答的：

“村里没有什么消息，也和村里不打什么交道。”

“房东也不肯说，房东想的是要租房子，他们怎么可能跟我们说实话呢！房东说拆不拆不一定。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清楚。”

“大家都说不准，有说明年的（2011年），有说（2010年）五一之前的，但是肯定会拆，因为都量过地了，我看到过。”

五、拆迁对打工者的影响

经济影响

很多工友都有过搬家的经历，导致搬家的原因不只一种，但是在北京拆迁引起的搬家是很普遍的。访谈中遇到一位叫张丽的工友，她32岁，来自河南信阳。她和丈夫收废品为生。她们是2001年来北京的。来北京以后已经搬了快10次家了。她说，尤其是刚来的时候，北京到处都在拆，差不多每半年

就要搬一次。2004年来中坞后，算是住的时间最长的了，一直住到现在。

当问工友上次搬家有哪些经济损失的时候，有20位工友给予了回答，有10位工友说，经济上的损失不大。有10位工友说经济上有损失，其中有几位工友说很难计算具体的经济损失有多大，另外有几位工友估计上次搬家损失分别约为：6000元、3000元、1200元等。上次搬家损失6000元的工友是开超市的，已经在中坞开超市有2年多了，他说：“上次搬家，物资上有损失，已经交的房租不退，搬到新的地方刚开始生意一般不好，合起来的损失大概有6000块。”

只要是做生意的，换地方是一定要蒙受经济损失的，搬家要停业，会有经济损失；搬家以后要重新培养客户，所以经济收入会降低；做生意的搬家时往往要搬运一些货物和器具，那么就要产生相应的搬运费，等等。

子女上学受到影响

所调查的工友中有22个家庭有学龄和学龄前的孩子共30个（在统计时去掉了一个有7个子女的家庭，因为实在是特例），有17个孩子和父母在中坞一起生活，占57%。其他的孩子被留在老家。在如此艰难的物质条件下，在入学如此困难的情况下，都有至少半数的孩子跟随父母在城市中生活。可以推测，如果北京的入学和升学政策对打工子女一视同仁，那么和父母共同生活的孩子会更多。

孩子处于上学阶段，家长面对拆迁最着急的就是搬家后孩子去哪里上学。有学上是一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样居无定所导致孩子频繁转学，对孩子的身心和学习成绩有很消极的影响。工友张丽告诉我们，她有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岁零1个月。大儿子由于经常搬家换学校的原因，学习断断续续的，成绩很差跟不上，没有考上中坞的学校。现在把孩子送到位于香山的巨龙文武学校，是一个民办的学校，封闭式管理，每年收费10000元，孩子一个月回家一次。孩子去这个学校以后状况好些了。

对职业选择的影响

当问及工友搬家以后是否还会做同样的职业的时候,30位工友中的24位说“会”,占绝大部分;3位说“不能”,3位说“不确定”。可见,拆迁对大多数工友的职业选择没有影响。

一位做清洁工的工友说:“搬家以后,一般情况下会继续干这个,因为干的时间较长,公司也比较信任。”

一位收废品的工友说:“先还收着吧!觉得自己文化不行,也找不了一些大公司的工作。”

一位卖床上用品的工友说:“还会做这个工作,也没别的可以做的,也不会别的技术。”

一位开熟食店的工友说:“当然继续做这行,没有别的可做,这行也熟悉了。”

拆迁不会让工友离开城市

当问及工友会不会回老家的时候,回答了这个问题的29位工友中有24位回答说“不会”。有5位回答“可能会”,其中3位妇女说有可能陪孩子回家念书,因为这里学费贵,家里又没有人照顾孩子。有1位工友说在老家买了房子,可能考虑回老家发展。

工友具体是这样说的:

- “没有(考虑过)。老家没有经济收入,只能种地,地又很少。”
- “不可能回老家,地都包给别人种了,没有可能自己再回去种地。”
- “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去,近期没打算回老家。”
- “老家没地,是煤矿地区,地被征收了,有一些企业,但是收入太低。老家都是通过钱来衡量你,人情淡薄。如果能在北京买房,回去干嘛?可是买不起房,最后还得回去。回去都是混不下去的了。”

其他影响

当问及工友“面临即将到来的拆迁,你觉得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时,我们发现,经济损失并不是工友担忧的最大问题。接近半数的工友担心的首要问题是:要找房子做生意也要找住的地方。

表13 拆迁带来的最大问题

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权重
找房子、找地方	12
孩子上学	4
经济损失大	3
从零开始	2
工具不好运输	1
没有大问题	5

(注:工友可以罗列不止一个问题,因此表中得出的人数是权重)

工友具体是这样说的:

- “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找房子和孩子上学的问题,到处都在拆,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住楼房肯定住不起。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是大问题,学校肯定也得拆,但是孩子去哪里读书呢?”
- “主要是房子问题,找房子不好找,而且搬迁的消息出来后,村里走了不少人,感觉至少走了三分之一,生意也受到了影响,我是开熟食店的。”
- “自己干活再苦再累也无所谓,但是孩子上学怎么办?打击太大了!”
- “刚盘下来的店就都赔了,无能为力,难过。”
- “经济上也会有损失,虽然是开车的,但是我们是黑车,要靠老熟客才行,没有认识的人也赚不了钱,到了新地方,不知道多久才能生意好。”
- “茫然。还没有适应又要搬走。”
- “习惯了这个地方,不太想搬。”

六、工友对拆迁的看法

拆迁现状是否公平

当问道工友这种拆迁现状是否公平的时候，18位工友做了回答，其中13位工友说不公平，同时表达了对这种现状的无奈。5位工友说无所谓。

工友是这样说的：

●“不公平，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社会本来就很不公平，有的老板在那边俱乐部一辆车不少于20万元的，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呢！”

●“觉得不公平，但是我们是外地人，又有什么办法？”

怎么能改变现状

8位工友表达了“没有办法”或者“不知道”的态度。7位工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主要的看法都是希望政府能够有所作为。工友具体的看法和建议如下：

●“希望有自己的房子，就不会老是搬家了，但是又觉得没有可能，做一辈子也不可能在北京买房子。”

●“有一个管理机构，专门负责外来人口的事务，包括孩子上学和稳定的住所等。”

●“政府多考虑外来人口的需求、状况以及子女的上学问题；多建一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希望能给外来人专门批一块地方。”

●“国家盖一个集中的几百间的房子专供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有保安看管，即有自己的社区管理，安全稳定，至少5年不用搬迁。”

●“政府想拆就拆吧。希望有好的政策，给我们提供便宜的房子，廉租房之类的。”

●“政府给予适当补助。”

这里选用北京皮村同心实验学校阳光少年队2009年到2010年演出的《流动的心声》音乐剧的一首歌曲来反映拆迁对孩子们的影响：

是不是又要搬家？

词曲：熊亚州

根据皮村同心实验小学黄婧涵的故事整理

访谈者：李清等

妈妈呀，今天怎么了？时间还很早，你已经回家。
家里呀，怎么空空的？是不是，又要搬家？

这些年呀，搬了好多次啦。每一次，都那么慌张。
同学们啊，会舍不得我呀，还有老师，他会牵挂。

妈妈呀，这次走得匆忙，来不及，说些心里话。

再见吧，我的同学呀，我们不能，再一起玩耍。

再见吧，我的老师呀，我不能，再听您的课了。

再见吧，我的同学呀，我们不能，再一起学习啦。

再见吧，我的老师呀，我不能再，跟您聊天了。

妈妈呀，新家在哪里呀？那里的村庄，有没有学校？

妈妈呀，新家在哪里呀？那里的学校，有朋友吗？

那里的学校，有朋友吗？有朋友吗？有朋友吗？

第六章 讨论

一、主动选择和无奈选择

一个人生活的位置和发展的方向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外在的作用有多大？内在的作用有多大？这不是一个能够量化回答的问题。每一个人在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都有可能有不同的回答。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一个群体方向明确的时候，人生道路和群体发展就有可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无论道路多么曲折。

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1]提出了“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概念。在这个调查中，问题单里有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一个是“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估计很多调查员在做访谈的时候会认为这两个问题有重复啰唆之嫌。但是问题单的设计者在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基于这样一个观察和认识：很多时候，工友的选择是无奈的选择，并不是主动的选择，但是很

[1] 《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北京工友之家所做的调研报告（没有正式出版），2009 年。

多社会政策为了降低社会和经济成本却把工友的无奈选择作为说辞。第一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无奈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主动选择。

调查结果充分说明了工友的无奈选择和主动选择有着巨大的差别（见表 14 和表 15）。在问及“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时，多数（65%）工友回答说“回老家”；在问及“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9%）的工友回答说“回老家”，有五分之一（21%）的工友回答“没想过”。回答“没想过”是很可以让人理解的，生活的现状和无法控制的社会环境让人不能主动去设想未来。但是，我们认为，即使是这些回答“没想过”的人一定也想了，也许只不过处于一种不能想和不敢想的状态。

表 14 北京皮村工友对“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的回答（N=152）

如果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人数	百分比	
回老家	99	65.1%	
继续打工生活	做小生意	9	5.9%
	继续找工作	21	13.8%
	不会没有工作	6	3.9%
	学习	1	0.7%
没想过	16	10.5%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表 15 北京皮村工友对“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的回答（N=143）

以后的打算是什么？	人数	百分比	
回老家	13	9.1%	
继续打工生活	挣钱	21	14.7%
	创业	19	13.3%
	在北京买房	10	7.0%
	一直待在这里	20	14.0%
	学习技术	6	4.2%
一切围绕着孩子	24	16.8%	
没啥打算/没想过	30	21.0%	

（资料来源：北京工友之家 2009 年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上亿的打工者主动选择在城市,而且这种选择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要求,那么政府和社会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打工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参与社会劳动和承担家庭责任。当打工者已经用行动承担了社会责任的时候,政府和社会是否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职责。现在,打工者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待在城市,但是为了安全和养老的考虑却不得不把房子盖在老家农村里,或者买在老家小城镇上。这样无奈选择导致了亿万打工者在城市无家可归,也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农村和城镇的房子空置)。

二、是什么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

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我读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楚天都市报》2009年8月22日发表的题为“农村改革30年——农村巨变的历史脉络”的文章,^[1]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文中认为,农村改革30年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8年的黄金十年,农村改革启动,农民的自发改革转向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改革;第二阶段:1988~2002年的曲折十五年,农村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充满了曲折;第三阶段:2003~2007年的历史跨越五年,走出曲折历程的中国农村改革开始进入新阶段。

还有一篇文章是《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1期的一篇题为“农民流动三十年”的文章,作者是赵树凯。文中认为,农村改革的三十年,也是农民流动的三十年。观察这三十年,可以从两个侧面进行:一个是农民的表现,另一个是政府的表现。从政府表现的角度来看,这三十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具体说是1978年到1993年,基本上是“无政策”时期。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后半期到21世纪之初,

[1] 徐勇:“农村改革30年——农村巨变的历史脉络”,资料来源于360doc个人图书馆网站,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621/10/112033_3980074.shtml。

具体说是1994年到2002年,政策纷纷出台,但政策导向以限制为主,包括出台了若干新的歧视性政策规定。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新的政策以促进平等对待、重视保护权益为基本特点。赵树凯认为,最近几年是改革以来解决农民工问题进展最好的时期。

北京工友之家在2008年创办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主展厅的展览主题是:“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口号是:“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未来。”他们拥护温家宝总理号召的价值理念:“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他们对过去的三十年也进行了梳理,并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艰难的流动”,从1978年到1988年;第二阶段是“打工热潮”,从1989年到2002年;第三阶段是“新工人新市民”,从2003年至今。

对比上面对过去三十年的回顾,从时间段上出入不大甚至吻合,但是从视角和主体性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这里提出一个发展社会学的问题:是政策主导发展还是发展主导政策?我在和工友做访谈的时候,问过工友一个问题:“你觉得打工者可以做什么来改变现状吗?”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能做什么呀?还不是政府说了算,老板给钱老板说了算。”有时候我会和工友交流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政府控制大家出来打工,大家不还是出来了;后来城市需要我们却不欢迎我们,我们不还是留下了。所以到底是什么说了算哪?”这时候我和工友往往都会陷入沉默。

三、打工者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平等待遇?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大赦,现在被称为“合法化”,指的是给没有合法居住身份的人合法身份。从2010年年底到2011年年初,比利时就进行了一次“合法化”,有3万多人按照规定的时间在2010年12月20日之前提出了申请,到2011年上半年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人拿到了合法

身份。有资格申请合法化的条件包括:^1在比利时不间断居住5年以上;(2)目的地是比利时的合法入境;(3)期间在其他欧盟国家没有申请过身份合法化;(4)没有犯罪记录;(5)有可以融入社会的证明(比如说:可以说当地的语言,在当地有朋友);(6)对于那些居住3年以上但是不到5年的人,需要提供身份合法化以后可以拿到月收入在1500欧元以上的就业合同的证明。很多人,包括很多中国人,都在这次身份合法化中拿到了比利时身份证。这些中国人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一般都是在打黑工,工作的地点一般是在中国餐厅。在欧洲身份合法化中获得身份以后,就可以享受很多和欧洲当地人同等的待遇。要补充的是,在比利时,即使是无证移民,子女也和当地人一样可以免费入学。对比欧洲,感觉在一些方面,中国农村户籍的人在城市受到的待遇,好像还不如外国人在欧洲受到的待遇。当然,现在中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城市开始了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很多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而施行居住证制度。

2010年“两会”期间,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陆学艺在接受采访中谈:^[2]“我们调查过,如果户口制度放开了,有的农民工会留在城市,有的不会,特别是年纪大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愿……(打工)年份很重要的,你可以根据打工的记录、居住的记录。当然要设计一些步骤。尤其是紧迫性的问题要先改革。比如,小孩上学,还有住房,包括温总理提出的农民工廉租房的问题,经济适用房的问题都要考虑。现在国家要改善民生,其实有些改善民生举措是要花钱的,社保也好,医疗也好,而户口改革不一样,只要把这两亿人的‘农民’两个字去了,变成工人了,他马上就不一样了,他就得到改善了。所以我觉得是到了紧迫的时候了,而且现在户口改革的条件也成熟了。”

[1] 关于比利时“合法化”的信息是笔者从比利时华人朋友处获得的信息,提供信息的朋友本人在比利时无证居留了将近8年,并在2010年12月提出了合法居留申请,于2011年3月获得批准。

[2] “户籍改革成两会热点话题 专家称改革条件已成熟”,载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c/GB/61937/182920/183264/11076494.html。

四、“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什么时候成为“新工人子女”?

我们都知道,留守儿童的数量大于流动儿童。这样的一个现象是综合的因素造成的,包括:(1)打工者收入低,无法支付孩子在打工地的开销;(2)打工者工作时长、没有休息日,所以无法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周末和假期也无法照顾孩子;(3)打工地的公立学校不接收孩子入学,上私立学校学费贵而且教学质量无法保证;(4)在工地无法参加中考和高考;等等。

2011年的“两会”期间,打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是讨论的焦点之一。在回答网友关于打工子女上学问题时,温总理说:“这是我们中国存在的一个独特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两手’。一手就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村的学校建好,使优质教育资源不要都留在城市,让好的教师到农村去支教。另外,我们对农民工进城、孩子上学不因户口而受到影响,特别是义务教育。我相信你的孩子不管是留在家里还是随你出来,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1]

查阅相关资料,我发现已经有了一些关照打工子女入学和就地参加中考的政策。例如,据报道,从2008年开始,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打破户籍限制,打工子女可在流入地参加中考并报考高中阶段学校,也可按照本人意愿回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考试录取。^[2] 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前接受采访时表示,^[3] 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随父母进城的打工者子女在流入地和城市孩子一样,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其次才是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于打工者子女在就

[1] “温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 回应人民网两会调查热点问题”,载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017334.html。

[2] “安徽:率先打破户籍限制 打工子弟学校成历史”,资料来源于工友家园-城边村网站,载http://et.chengbiancun.com/2011/1027/19551.html。

[3] 袁贵仁:“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中、高考很快落实”,资料来源于东方网,载http://news.eastday.com/c/20111h/u1a5775851.html。

读地参加中、高考的时间表,袁贵仁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但他表示时间不会很长。

当我们称呼2亿多的打工者为“农民工”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孩子就会被称为“流动儿童”;当我们称呼打工者为“新工人”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是“新工人子女”了。我们的目的不是改变称呼,而是争取权益。现在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并没有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在城市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现在城市中有这么多的打工者子女能够和父母团聚,是基于打工者家庭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付出。近期,政府和社会都开始重视打工者子女的教育问题,并在城市和乡村开始开展针对打工子女的关爱活动。政府应该进一步考虑进行针对打工者子女教育问题的政策改革,这符合打工者的诉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五、在城市的住房保障离打工者还有多远?

联合国适当住房问题特别报告员拉克尔·霍尔尼克曾对媒体表示,住房不是一个拥有四面墙和一个屋顶的商品,而是一个使人们能够生活在安全、和平和尊严之中的场所,^[1]住房权更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种权利。我们通俗地来理解,住房权利就是一项基本人权。而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是现代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人民日报2011年3月7日报道,国家发改委6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公布:“未来5年,要建设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明年1000万套,后面3年还有1600万套,使保障性住房的覆盖率达到20%。对于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廉租房,实行廉租房

制度。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提供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在发改委十二五规划的3600万套住房的覆盖范围内,没有明确指出户籍不在当地城市的打工者是不是在保障房的保障范围内,但是国家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导向是非常明确的。事实上,城镇的低收入群体中的大部分是外地务工人员,他们应该平等享受保障房的保障。

据腾讯新闻2011年9月20日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要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

从2011年政府出台政策的态度来看,打工者可以看到在打工地住有所居的希望了,但是真正打工者离住房保障有多远还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情况。

[1] “‘天量保障房’尤需铁腕问责”,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载 <http://www.chinanews.com/estate/2011/02-28/2872443.shtml>。

第二编

回不去的农村

打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打工群体,已经无法回归农村。这样一个现实是由多方面原因导致的:首先,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所以小农户的农业收入微薄;其次,城市就业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城市一个人一个月的收入相当于甚至大大高于小农户全年的收入;最后,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决定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同时也决定了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打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上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

根本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途径的确是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在带来城市和工业繁荣的同时却导致了农村的没落。农村户籍的年轻人都到城市去打工了,农村里剩下的大都是老年人和小孩子。这样的现实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巨大的危机,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不能没有自己强大的农业生产。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同时应对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新农村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减少农村人口也许有利于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失导致农村建设没有劳力和人才。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资本所挟获了,我们不希望看到农村和土地最后也被资本所挟获。

为了应付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现状的不乐观,打工者采取了两个对策:一个是“营造退路”,另一个是“自我麻痹”,这两个对策是相关的。“营造退路”就是在老家盖房或者买房,“自我麻痹”就是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老家。问题是,当退路最后被证明不

是出路的时候怎么办,问题是我们可以麻痹自己几年甚至十年,但是不能麻痹自己一辈子。打工者虽然无法回归农村也不想回归农村,但是因为在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最后很多打工者还是把“物质的家”(房子)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我们2亿多的打工群体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是想象中老了以后才能回去的地方(养老院)。这样的一种分裂不仅造成“生活不在当下”的精神痛苦,而且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很多打工者用一辈子的血汗只是为自己建设了一个回不去的“养老院”。

第七章 衰败的农村

很多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了就可以回老家了。首先，不知道打工者这一辈子能不能挣到足够可以养老的钱；其次，等打工者有一天回到老家的时候这个老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还能生存下去吗？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忧是因为我所看到的农村正在衰败：

- 农村的人口在减少，而且减少的是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是正在失去劳动能力和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

- 农业生态系统正在逐渐瓦解，人们使用过量的化肥和农药，人们没有体力或者没有动力施用农家肥了，在有些地方，如河南有的村子，农业生产作物单一而且不再从事家庭畜牧业生产了；

- 农业基础设施从建设到管理都有很大的问题，在一些地方由于引水设施无法使用，农户无法继续耕种水田，有的季节连干净的饮用水也喝不到；

- 从农村基层组织来看，中国只给了农民村民自治的法律，但是没有给落实法律的空间，所以在中国的农村很难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从村民自治到行政管理这两个层面往往都是缺失的，就算不缺失也只起到勉强的维持作用，很少起到建设的作用。

一、所调查的五个村子概要

下面是该调研中去过的5个村子的简单介绍。这些总结是通过询问村里不同的人然后把信息收集到一起得到的。如果在村里找到了村长和干部，那么所了解的信息就完整一些。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简介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有400多户人家，1800多人，劳动力有800多，学生大概有近600人。去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只靠农业生产没有办法维持生活。

在北大段村，土地每5年一调整，2010年又该调整了。

全村的耕地面积有2200亩，一个人只有1亩地。这里是一片大平原，农作物种植的品种单一，就是玉米和小麦。作物的产量很好，一亩地一种作物能产1100斤左右。

有200亩地是大队的，每一组里面还有20多亩机动地，承包给村民，这个承包费用来管理水库和维修什么的。改革开放以后再没有集体经济了。集体经营无法维持，就都卖给个人的了。变压器是国家的。唯一集体的东西就是灌溉设备，包括水泵和机井。

现在村子里和周边都没有工厂和企业了。1996年的时候有个化工厂，是集体的，2001年就关了。1985年的时候村子里还有地毯厂、绣花厂和面粉厂，都是集体的，1990年以后就都没有了。后来有两家私人开的搅拌饲料厂，开了四五年，生意不好，1999年也关了。现在就有一个私人的加工米面的作坊，就是加工玉米，弄成玉米糝儿，做早上吃的稀饭。

村子里有一所学校，有10个老师，也就有50多个学生，现在条件好的就去县城读书了。还有一个私人幼儿园，娘俩开的，女儿是学幼师的。到了初中，家长就送孩子去镇上或者县城去念初中了。也有和父母去打工地念书

的,但是这样在少数。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简介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一共有 670 户左右,有 2361 人。以前是三个村子,现在合并成一个村了。整个村的面积有 14.5 平方公里。最高的地方海拔 1800 多米。现在整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人数的 50% 左右,可能有一千多人外出打工。80% 的外出打工者的小孩在家里,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田地通常由家里的老人种,或者是送给别人种。

可耕地面种有大约 2700 亩,水田大概 60 亩,荒地大概有 400 亩。一般一个人大约有一亩地。山区没有办法用机械耕作,地理条件太差,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都是山坡。田地里一般种的都是玉米、土豆、红薯、黄豆、油菜和大米。种的最多的是红薯和玉米,因为要用来喂猪。大米比较少,因为大都没有水田。种的大米大部分是自己吃,也有卖的。卖的主要是大米和土豆。现在吃玉米的比较少,一般的家庭都会买米吃。以前的时候没钱去买米,就天天吃玉米。现在很少人吃玉米。以前的经济收入全是靠养猪,有的家庭可能会养七八头或者是十来头猪,现在最多也就养四头左右。主要因为养猪赚不了钱,而且成本高,加上粮食和人工,根本就不划算,再加上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所以就没有再养那么多猪了。

电是国家给钱装的,电费由供电所来收。村里有一部分公路是由国土局出钱修的,最开始是为了方便种烤烟,但是由于烟草局觉得这里种的烟草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标准,所以将烤烟的计划取消了,路就没有都修好。后来全是自己村里的人集资继续修的,现在还欠四万多元。饮用水方面:正在准备建一个水库,这样大家就可以吃上比较干净的水了。

农民之间合作的比较少。建房也是给人家钱,以前的时候是可以请人帮忙,做农活也是你帮我我帮你,但现在都是给钱。在山区,农业合作有一些困难,因为每家的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村里有贫富之分,合作起来也有一些麻烦。而且,现在村里就只有老人和小孩,合作起来会有很大的难度。

村里的学校一共就二十几个学生,一个小学班和一个学前班。大部分的小孩都到镇上去读书,一年交点书费,大约几十元就够了。镇上的幼儿园就贵一点,一学期要交 260 元。村里的学校一直面临被解散的危险,因为小孩太少了,镇上一直想把村里的学校拆散,村干部不同意,因为觉得有的孩子太小了,去镇上读书不方便。2011 年 2 月学校终于解散了。

村里有医生,但是不住在村里,这些医生开的诊所都是私营的,一般他们自己开药店。现在有农村医疗保险,是自愿买的,村里有 80% 的人都有买医疗保险。

村里的山本来有林业员,但是林业员管不了,一般只有村里的干部才管得了。

村干部有 4 人,村书记、村会计、村支书和计生协助员。村干部每三年选举一次,今年就要换届了,很快就要选举了。村书记先由村民投票,再由村支部和所有党员投票。村支书是由全体村民投票。村里的日常、政策宣传等都是由村干部负责。村里也会经常开会。一年有五六次大的会议,每个村的自然队召开会议,村民大多会参加。现在调整后 有 8 个生产队,原来有 23 个生产队。现在全村有约 40 多个党员,如果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讨论,就会召开党员大会。以前种多少烟草有指标,去年前年都有,有大约 200 多亩的指标,有的家庭可以收入上万元。这些就需要村干部去安排和协调。有时需要种一些新的作物,村里会开会讨论。

村书记现在所住的房子是原来国家的一个水电站,水电站搬走了,就由村书记买下来住,房子装修好了以后村里开会也在这里。如果要想办电站还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投资七八十万元才可以。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简介

坪滩村有 987 户,3026 人,其中 1340 多人外出打工;有耕地面积 2500 亩,平均每人八分多地。有一半多的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家,有三四百个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地去了。

土地有很多撂荒的现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平均每人0.6亩田,0.4亩旱地。1981年包产到户之后“有生则增,有死则减”,但是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4组简介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四组有80多户人家,有300多人。三分之一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大多去广东了,也有去贵州和重庆的。大概有一半的人家里有出外打工的父母留下来的孩子。有的留下一两个,还有留三个的。村里的孩子都在镇里上小学,中午在学校吃饭,早餐、晚餐在家里吃。村上小学的教室都还在,就是没有老师和学生了,全是空的。学校是八几年的时候盖的,花了20多万元,现在就废弃了。

土地在2000年调整过一次,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半亩田半亩地。

村子附近没有什么企业。只有一个砖厂,那里有80多个工人;夏天时有一个麻绳厂,附近也有人去那打工。

村子里虽然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但是打工在外的村里人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子,最少的花三四万元,最多的花20多万。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简介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有765户,3200人,其中850人外出打工。有17个村民组,有4500亩土地,其中田大约有2000亩。现在村里就剩老人和孩子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将来这些年轻人老了有的会回到村子里,有的就留在外面了。据村长估计,这两种可能性的人数基本上一半一半。据村长了解,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中有1/3的人现在已经在城里买了房子,有200多人吧。惠民村有50多户人在贵阳,其中有20多家人在贵阳已经买房子了。

村里有一个中心小学,设置一到六年级,还有一个学前班。中心小学有

教师30个左右,大约有250个学生。还有一个教学点,有一位老师十几位学生。据了解,学生中有一半的父母外出打工,都是靠爷爷奶奶带着。

土地自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很多人家把土地租给大户种植烟草或者蔬菜,2010年的租金是500元一亩。

二、农业人口正在大幅度减少

农村人口的减少应该对缓解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压力有好处,但是当移民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也就是说,出去的都是青壮年而留下的都是老年人的时候,农村和农业就会衰败。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看农村人口减少的状况:

- 村庄在消失:在山区的有些地方人口迁移出去后,有的小的自然村已经消失了;

- 去农业化:从河南和重庆两个家庭三辈人的生活地和就业情况来看,“80后”和“90后”没有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这种去农业化的现象必然导致农业人口的减少;

- 老人无人照顾:农村只剩下老年人和孩子,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有的老年人几乎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是却仍需要照顾自己的生活;

- 旧房“人去瓦破”、新房“人去楼空”。

村庄在消失

在东莞访谈的12位工友的老家在重庆奉节县。这里就拿奉节县的两个村子为例来说明外出打工对当地的影响。在奉节县吐祥镇的齐玲村,陈树山一个人在家里养牛,妻子和儿子在东莞打工,山上现在只有他这一户人家了。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一位农民反映,他家旁边的一个自然村原来有100多人,现在只剩下3个人了。

山上只有一家人了——陈树山在山上养牛

在东莞访谈了王开香和陈赢连,王开香是陈赢连的妈妈,她有43岁了,在东莞打工,陈赢连23岁,也在东莞打工。王开香的丈夫陈树山在老家的山里种田养牛。王开香的老家在奉节县吐祥镇齐玲村。他们家住在山上。山地已经承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因为住在山上的人家或者出去打工了,或者搬到山下了,现在山都没人管了。陈树山从2007年开始养牛,现在已经养到20多头了。

当我听到和看到陈树山养牛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觉得从这个例子中看到了好的趋势:山上人口减少,一户人家可以使用的草场面积足够大,可以促进畜牧业的发展。当问陈树山未来10年的打算的时候,他说:“10年后可能还是会继续养牛,20年之后可能就没有力气了,但是只要动得了还是会继续养牛的。”但是,在后续调查中,我就无法确定这个好的案例是否会延续下去了。儿子的婚姻当然是王开香和陈树山的头等大事,但是每次提亲,女方的头一个条件就是:需要镇上有房子,否则免谈。现在夫妇俩商量想把牛卖了给儿子在镇上买房子,一头牛可以卖1万元左右吧。儿子不同意,儿子说:首先,自己将来肯定不会回到镇上去住,所以买房子是浪费;其次,不想这么早成家,觉得受约束。

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宋金英反映的情况

在东莞访谈了王开新(父亲),王福连(儿子)和何玉清(儿媳妇),他们都在东莞打工,老家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母亲宋金英一个人在老家照顾5岁的孙子。宋金英54岁了,没上过学。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就是王福连。丈夫2010年春节后开始在东莞打工,做清洁工。说到村子以后会是什么样,她说:“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了,现在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房子已经倒塌了,他们如果挣到钱了就会离开这个村子了。如果村里人多一些当然最好了,但是别人通常不会来,交通也不方便。有钱的人都会选择将房子建在镇上,或者是城市,人们只会往方便的地方去住。”

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王振海反映的情况

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的时候访谈了王振海夫妇,王振海69岁了,他老伴68岁,两人都没有上过学。有三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女儿39岁,大儿子37岁,二儿子35岁。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7岁了。说到村子的未来时,他说:“以后村里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年纪大的会死,年轻的又不想回来这里住。我们旁边的村子(自然村),以前有上百人,可是现在整个村子就只有三个人了。”

去农业化的“家谱”

在这一小节对两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形成了两个相对完整的“家谱”。

赵大哥来自重庆,家里有6个兄弟姐妹。也许是因为计划生育进行得好吧,6个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也许是因为计划生育吧,6个家庭的唯一的子都是男孩。

孙福贵来自河南,家里有7个兄弟姊妹,这些家庭中凡是结婚有孩子的,都生了不止一个孩子,也许正因如此所以性别比例没有失常。

两个家庭都有明显的强烈的城市移民的趋势。20岁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个务农的。我和赵大哥的儿子聊天,他24岁,他告诉我,他的初中和高中同学没有一个在农村的,而且他也不认为他的任何一个同学将来会成为农民。

赵大哥家“家谱”

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了赵大哥,他是工地上的厨师,约好了在他做两顿饭的间隙见个面聊聊天。赵大嫂也在,在工地上老板开的小卖店里卖东西。赵大哥告诉我:

“我52岁了,初中毕业;我爱人47岁了,小学毕业。我45岁以前都是在老家种地也做杀猪的生意。2003年开始外出打工,家里经济实在太困难就只

好出来了。

最初的时候是在重庆青木关摩托车配件厂做。工作了一年。那个时候工资不高,七八百。工作时间八小时。我觉得工资低就走了。后来就一直在工地做饭了。现在月薪是一千八。

老家在重庆巴南区的一个村子里。老家还有爸爸妈妈,都73岁了。他们年纪大了,不种地了,种点小菜吃。兄弟姐妹有6个。我是老大。兄弟姐妹大都在重庆打工。

大妹妹52岁,在打工,大妹夫在皮鞋厂打工。有一个儿子,25岁了,在广东打工。

大弟弟47岁,做建筑,做小工,弟妹在做库管。有一个儿子,22岁了,当过兵,当兵回来又在水电学校读书了。

二弟也在建筑工地做小工。

二妹40多岁,在老家,二妹夫在做零工。有一个儿子,刚大学毕业。

三妹43岁,在老家,三妹夫在外面打工,做衣服。有一个儿子,15岁了,在读初中。

小妹41岁,在家种地,四妹夫在摩托车配件厂干。有一个儿子,18岁了,初中毕业出来打工,在重庆的一个摩托车配件厂。”

表 16 重庆赵大哥家庭结构表

重庆一家人	平均年龄	人数合计	男性	女性	务农	打工	大学毕业工作	上学/幼儿
第一辈	73	1	母亲去世	父亲73岁了				
第二辈	46	7	3	4	3	4		
第三辈	21	6	6	0	0	2	2	2

孙福贵家“家谱”

孙福贵是1968年出生的,河南焦作人。有两个孩子,儿子18岁了,女儿20岁了,都在北京打工。老母亲83岁了,在老家。2000年之前在家乡附近的黑

砖窑干过很多年,主要是做机器的维修,也在陕西的砖窑干过维修,在山西一个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北京做锻造。他告诉我:

“我大哥58岁,离婚了,没有孩子,在村子里生活。

我二哥54岁,很大年纪才结婚,我嫂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儿媳妇在家里带孩子。大儿子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

我三哥46岁了,是单身,一直在老家照顾我老母亲,种地为生。

我四哥44岁,在北京做保安,我四嫂也在北京。他们有3个孩子,大儿子19岁,在河南修武县打工;二儿子17岁,上高二;小女儿5岁(抱养的)。

我大姐56岁了,和丈夫在老家镇上开五金店。他们有3个孩子。大女儿30岁,在老家镇上开发区的一个大厂子里(大用公司)打工,女婿在河南新乡打工,他们有一个7岁的儿子;二女儿27岁,在县城做生意,女婿是船员,工作半年休息半年,他们有一个4岁的儿子,一个2岁的女儿;儿子25岁,和父母在县城的五金店里工作,他有2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

我二姐51岁了,在村里务农,姐夫在山西做木工。他们有4个孩子,大女儿22岁,在北京上大学;二女儿大学毕业了,在北京的一个体检中心工作;三女儿在县城上高中;小儿子在读小学。

我小妹39岁了,在村里务农,妹夫在山西的砖厂烧火。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8岁,女儿6岁。”

表 17 河南孙福贵家的家庭结构表

河南一家人	平均年龄	人数合计	男性	女性	务农	打工/经商	大学毕业工作	上学/幼儿
第一辈	83	1	父亲去世	母亲83岁				
第二辈	49	8	5	3	5	3		
第三辈	20	17	7	10	0	9	2	6
第四辈	5	8	5	3				

剩下无人照顾老人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是快速的,经济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转型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很多人要承担代价。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在承担着沉重的发展代价。她/他们在维持着农业生产,她/他们抚养了自己的儿女又在抚养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现在的问题是,她/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谁来照顾和抚养她/他们哪?

过去流行说农村只剩下“三八”“六一”部队了,意思是只剩下妇女儿童了。现在青壮年妇女也已经很少了,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在我调查的这几个村子里,只在河南的北大段村里遇到中年妇女在家里照顾孩子和从事农业生产,在其他地方男女青壮年都出去了。

78岁的王明超——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2010年11月我在新民镇和农户交流。见到王明超的时候,他正在和另一位老人一起坐在屋外晒太阳,两位老人都是孤身一人,身边都没有亲人和孩子照顾。我当时很“天真”地问,村里既然孤寡老人越来越多,有没有可能大家组织起来也可以互相照顾。老人说:“但是不能一天不回家呀,家里虽然没有什么,但是不照应也不行呀。”老人告诉我:

“我78岁了。老伴去世7年了。我现在只种了一点点地,大部分承包给别人种了。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女儿46岁了,在农村老家生活。女儿的一个儿子今年西南大学刚毕业。

大儿子47岁,在贵阳打工,帮别人卖货,就住在那商店里。他有一个女儿20岁。大儿子经常回来,就是看我,没有别的事。从贵阳回来单程车费是50元。他每次回来给我二三百块钱。

小儿子40岁,单身,在浙江打工,不知道他做什么,几年没有打电话了。大儿子的女儿,还有女儿的孩子会打电话回来。有一次我女儿的孩子给她叔叔打电话说,你给爷爷拿点儿钱吧,爷爷没有钱花。小儿子回答,他赚的钱都

不够自己花。

现在的收入就来自出租地的钱。家里有五个人的地,租出去换点钱,然后就是粮种的补贴。出租4亩地,每亩500元,一年有两千块钱的收入。

身体还可以,就是小病,感冒这样的。如果有事情,打电话大儿子就回来。”

62岁的张婆婆——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我是在2010年9月去斑竹村和农户交流的。我在村里的一个小卖部遇到了张婆婆。她挑了一点儿面粉在小卖店换挂面。张婆婆告诉我:

“我62岁了,解放那一年生的。现在家里是四个人。儿子(34岁)、儿媳(36岁)还有一个孙女。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儿子做建筑,砌砖,媳妇在电子厂。孙女10岁了,和我在一起,读4年级。我还有一个女儿,22岁,出嫁了。

我现在住的房子三十多年了,是泥巴墙的。

家里有4个人的田地,两亩田,两亩地。没有水牛。养了两只鸡。

儿子儿媳五年没有回来过了,就看今年能不能回来。现在一两个月打一次电话,以前是几年都不打。

我身体不好,但是即使自己病了,还是要自己去做事情,还是要做农活要照顾孙女。我有胃病和风湿。”

68岁的王振涛——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王振涛68岁,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他这样描述现在的生活:

“我以前是工人,所以现在每个月有一点点补贴,大约300元,是由民政局补的。现在种了三个人的田地,加在一起有两三亩。喂了一头猪,没有养其他的牲畜,现在就是一个人生活。

一年的收入主要是自己的民政补贴和女儿们寄的钱,开销主要是买化肥和种子、农药之类的,一年需要五六百元。以前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可是现在都是老人,所以只能靠自己。化肥主要是车运到村里,给钱就可以了。

儿子在广东读了一个技校,读一年之后,就在广东上班了。现在出去三年多了,一直没有回来过。儿子从来没有寄过钱回来,两个女儿一年会寄两百元左右。

二女儿93年出去打工的,出去十几年就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因为她母亲去世,还有就是上个月因为在镇上买房回来过一次。二女儿希望我过完年之后去广东那里,叫我不要再种地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不管去还是不去,以后可能都不会种地了,因为年纪也大了。村里的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而且不在一起。太辛苦。”

人去房空

在我走访的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里都看到了空房的现象。有的房子是人去楼空、屋残瓦破;有的房子还偶尔有人照看,还很残破的样子;有的是新房子,但是或者上着锁,或者只有老人和孩子住在里面。

家里的沙发成了老鼠窝——和薛淑兰聊天

薛淑兰是河南焦作人,1975年出生。丈夫去世了,现在自己带儿子在北京生活,儿子刚上了初中。自丈夫去世以后,淑兰就很少回老家了,因为希望远离伤心地和是非地。我是在北京采访的她,说起老家的房子,她告诉我:

“我们家堂屋两间,东屋三间,旁屋两间,房子挺多的。我们家地震过一次,就是去年(2009年),大梁原来就裂个缝,地震后裂缝更大了,找我们叔叔去弄了一下,要不房子该塌了。我娘家的父母离我家不是很远,骑电动车20多分钟就到了。有一次,我父母去我那空房子,发现院子里面草长得很高,一开门出来个黄鼠狼。我妈妈说,房子没人住就不成样子了。进屋里一看,老鼠在沙发下面弄成窝了。我妈妈说这不行,得管管。现在隔三差五就过去。

我们这次春节(2010年年初)回去,家里弄得可干净了。这样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水管裂了,沙发都发霉了——和孙福贵回家

孙福贵是河南焦作人,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有两个孩子,儿子18岁,女儿20岁。在我做访谈的时候,他、他妻子和女儿都在北京打工,儿子本来在北京打工,当时刚回到老家。孙福贵初中毕业以后先在姐姐家的五金店做学徒,后来在家附近的砖窑上做机器维修;2000年以后到外地打工,在陕西的砖窑上做过维修,在山西的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北京做锻造的工作。在北京和孙福贵做过几次访谈后,孙福贵同意带我们回老家看看。2010年8月,我们来到了孙福贵的老家,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路上都很顺利,交通非常便利。但是孙福贵领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无法请我们到屋里做客。一进院子,发现院子里都是水,原来院子中央的水管裂了。进屋以后,屋子里都是发霉的味道,沙发都发霉了,我们无法入座。找来几个小板凳坐下,结果大批的蚊子来袭。最后我们只好出来了,到孙福贵83岁的老母亲家去落座。他告诉我:

“我99年盖的房子。我其余几个哥哥的房子都是家里给盖的,我的房子是我自己盖的。我就是这个命运吧,自己要自理。

我们村子宅基地很少,不是那么容易批。有了这片地,将来就是去盖它,也有地方盖。没有了去哪盖?再去买就不容易了。我申请宅基地申请了6年,一直下不来。我那个组的组长不签字。后来我抢占了现在的这个宅基地。

现在在农村盖房的话就要十几万,我一个同学说:‘这样花,还不如到县城去买房子。’现在考虑考虑,农村为什么要盖房子?在外面住为什么要家里盖?要有一个归宿啊。我村里有一个人,乱七八糟的不好好干,没钱花了,就把他在老家的房子卖掉了,卖掉以后现在回来了怎么办?卖掉了,钱很容易花掉的,等回来了再去买,不是那么容易。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如果城市里容得下我们的话,就会在城市里;如果容不下我们的话,还是回老家安逸一些,有保障,有土地。”

三、农业生态系统正在瓦解

由老人经营的农业必然是“夕阳农业”,我走访的多位老人告诉我:他/她们年纪大了,干农活力不从心了,如没有力气挑农家肥所以就放弃继续施用农家肥,没有力气种榨油的油菜了等。但是下面河南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导致农业瓦解的原因还包括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的巨大反差,也就是说,当家庭其他成员的打工收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时候,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成员没有动力花费大的力气投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上,在河南这主要表现在大量施用化肥,不使用农家肥,作物品种单一,不再从事畜牧业生产等。

不再养猪了——在河南省的北大段村

2010年8月去了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北大段有400多户,1800多人。村民估计,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在农户家访谈的时候,根据以前在农村调查的经验,我很自然地会问家里养了几头猪,让我很吃惊的是这里已经很少有农户养猪了。不养猪就意味着不再施用农家肥了。单一的作物种植,又不施用任何农家肥,这样的农业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

海云家的情况

海云家有5口人。她42岁,小学毕业,在家里种地照顾家;丈夫40岁,初中毕业,在外面做建筑工;公公63岁;大儿子17岁,上到初一就不继续读了,现在在北京打工,搞建筑;小儿子14岁,在镇上念初中。她告诉我:

“家里有五亩地,种玉米、小麦、还有一点儿花生。没有种菜。没有养牲

畜。以前喂过猪,喂了十几个,后来也喂过七八个。现在不喂了。饲料也贵,喂了长大了市场又不好。家里面的农田都是我一个人种。收麦子的时候用机器,收玉米的时候就自己掰。种的时候有的时候用机器,有的时候人工。玉米都是卖,小麦就是自己吃。平时需要买点大米和菜。”

孙二哥家的情况

孙二哥54岁。因为家里兄弟多生活困难,所以很大年纪才结婚,妻子带来了3个孩子。大儿子在村子附近的砖厂打工,儿媳妇在家里带孩子。大儿子有3个孩子,2个女儿1个儿子。他告诉我:

“地里种玉米和小麦,不种任何其他的经济作物。玉米收了以后种小麦,一年收一季玉米,收一季小麦。玉米都是播种机种的。不养牲畜,以前养过,后面就不养了,没有时间。以前养猪,8年前吧。养少不行,养多了容易生病。生了病也不知道用什么药。”

不再施农家肥了——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以前在农村养猪的用处是多方面的:一是过春节要杀猪,还可以把猪肉处理好以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吃;二是现金收入的来源;三是可以积肥。在河南的北大段村,农户几乎不养猪了,但是在我访问的四川和贵州的村子里,很多农户还是养猪的,但是养猪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养猪主要是为了现金收入了,过年杀猪的功能已经淡化,也不再施用农家肥。在我访谈的农户中,没有一户施用农家肥的。农户都知道施用化肥会造成地力下降,但是由于留在农村的都是年纪较大甚至是年纪很大的人,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眼看着土质下降——王文贤的话

王文贤和老伴都58岁,都没有上完小学。大儿子37岁,初中毕业,现在在镇上自谋职业。女儿30岁,在东莞打工。今年(2010年)种了3亩玉米,套

种的红薯;8分地的辣椒;还有1亩2分的谷子。他告诉我们:

“今年没有种菜籽,年龄大了,种不下来了,挑不动。现在种地都用化肥了,前几年都用农家肥的,前几年挑也快,现在不行了。用化肥以后能看出来土质下降,但是挑不动也没办法,只能让它下降。”

老人在勉强维持着农业生产——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我2010年去了河南、四川、重庆和贵州的农村,在农户访谈中发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年纪都很大。在我接触的农户中,没有发现40岁以下的农民。70岁以上还在维持着农业生产的老人也不在少数。

宋金英家的情况

宋金英54岁,没上过学。老伴57岁,也没有上过学。她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在东莞打工。丈夫也于今年(2010年)春节时到广东打工,做清洁工。她一个人在老家照看5岁的孙子。她说:

“现在水田没有种,经常腰痛得厉害,所以水田给别人种了,别人不给任何粮食。自己种了点地,主要是种的玉米(一年可以收1000斤)、土豆(1000多斤)、红薯(3000斤)和黄豆(几十斤),所收的粮食一直都没有卖,全是自己吃或者是给猪吃。去年种过油菜,收了90多斤菜籽,榨油有30多斤,今年太累了,所以就没种了。水田从去年开始就给人家种,现在吃的米都是以前种的剩下来的。喂了几只鸡和两只鸭,没钱用,就把鸭子卖了,一只25元,刚卖了小孩就生病,又给他拿药了。

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回来吃午饭。下雨也会去地里干活,下雨的时候就披着塑料胶纸干活。一般农历的五月是农忙时,六月、七月份就主要收土豆,九月、十月就主要收红薯,现在就主要收一些黄豆。冬天就没什么事情了。我今年自己在家还玩了些,因为我早早就安排把应该收的都收了,其实如果不生病的话,这些农活对我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所以他(丈夫)

在家的時候我們不和,主要他不著急,做事慢吞吞的。”

王振海家的情况

王振海69岁,老伴68岁,两人都没有上过学。有三个孩子,女儿39岁,大儿子37岁,二儿子35岁。女儿出嫁了;大儿子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小儿子还没有找到对象。都在外面打工。老两口现在带着女儿的儿子,7岁了。他描述了一下家里农业生产的情况:

“今天(2010年11月21日)由于一整天都在地里收黄豆,从早上吃了早饭就一直没回家吃饭,现在天黑了才回家煮饭吃。

我们种着4个人的田地,具体也不晓得有多少。修公路占了很多的地,但是没有任何补偿。远的地都荒了。田可能有一两亩,地差不多四亩左右。种的粮食除了吃的,卖的钱根本就不够开销。小猪仔也需要本钱,几个小猪就需要一千多元。生活开支没个底。油是自己家种的油菜自己榨油。不过今年很少有人种,太辛苦了。平时做饭也会烧柴,只是现在年纪大了,砍柴比较吃力。也需要烧煤,一年差不多需要一千多元买煤,主要是冬天烤火时烧煤。

年龄大了,有时会有一些病痛,一个月可能需要两百元左右,其实主要是医疗方面需要钱,比如上次牙痛就花了六七十元钱。”

四、土地制度的困境

耕地对中国非常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吃粮食和吃肉。耕地对打工者还重要吗?一个人如果不再种地了,那么耕地应该不重要了吧。耕地也许对打工者不再重要了,但农村的土地还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主要是因为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打工者从名义上不能放弃土地,但是从行动上已经放弃农业了。

在武汉我和一位来自湖北农村当过村长的工友老陆聊天,我问他的看

法,他说了两点:

●“土地一定要继续保持集体所有,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避免严重的贫富分化;二是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根据人口变化情况进行土地调整以保证土地公平和合理地使用;

●“农村土地未来只有规模化经营才有出路,但是一定不能让老板买了土地。不过这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我就回去给地主打工去了。”

在河南的北大段村,每5年调整一次土地,这是我去年调查中发现的唯一一个还进行定期土地调整的地方。在贵州的新民村,土地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也就是说80后都没有土地;在四川的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在重庆的坪滩村,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也就是说,1996年以后出生的人都没有土地。这说明很多打工者即使在老家有住的地方,但是也不一定有土地。住在农村但是不种地,乡镇的就业市场又很狭小,看来打工者如果真的有一天回到自己建设的养老院也一定是在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但是那时候就需要被人照顾了,而谁可以照顾这些人哪?现在80后的父母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留在农村甚至照顾着孙子孙女。但是不久的将来谁来照顾这些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80后的在农村的父母?同样,等到80后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回农村吗?如果回去谁来照顾他们呢?

在重庆的坪滩村,我遇到了在那里建设生态农场的朱老师。朱老师的想法是,先从农民那里租一些土地过来,进行生态农业的技术示范,然后带动村民加入生态农业中来。朱老师负责联系来自重庆的客户订购生态蔬菜和其他农产品。2010年在坪滩村见到朱老师的时候,她告诉我,现在已经有20多位客户订购她们的产品,问题是供不应求。这个案例让我看到一种希望。但是后续的访谈和跟踪了解也让我看到了这中间的问题和挑战。朱老师告诉我,技术示范和农户参与都步履艰难,而且农场的管理也存在问题,需要一位

可以扎根农村的人,最好是当地的能人来带领,她当时告诉我她正在和一位深得大家信任的原来的小队长商量,看他是否愿意负责农场的日常管理。

总之,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挑战巨大。像朱老师这样的农场或者其他创新模式能否有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安排。下面就描述一下所调查的几个村子的土地制度的现状。

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8月去的北大段村。在北大段村,土地每5年一调整,2010年又该调整了。有些外出打工的家庭把土地租给村里的人,一般是300元左右一亩。在村子里访谈期间,我看到在村子的墙上张贴出了整个村小组的村民名单,有名字的村民才可以在土地调整中分到土地。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户村民家里人全都外出打工了,孩子也上了寄宿学校,老人也去世了,结果在名单上就没有这家人的名字。村里一个关心这家人的人赶快通知了这户人,据说会在下次张榜中补上。村里调整土地是按照户籍人口来调整的,因此外出打工人口是有权分得土地的。

2010年6月,我访谈了在北京打工的薛淑兰,她1975年出生,儿子小学6年级。她丈夫去世了,她和儿子在农村的家就在北大段村。下面是她告诉我的关于村里分地的事情:

“我们村子是五年调一次地,我们三个半人的地,就是我们三个加上他爷爷半个人的地,因为另外一半在我丈夫的哥那里。我不在家,把地给别人种了,他们给的价钱可低了,我想有人种就行了。我们对面那家说一亩地给320块钱,我说行。结果原来有一家要租地我没给的那家跑到这家说长道短,这家也不租了。后来一个很好的远房亲戚要种,我就给他比别人要付的还低,给的280元。后来又给孩子的姑姑种了。今年要动地,动过以后就剩我们娘俩的地了。原来一个人一亩零二,现在不知道多少了。估计一亩地吧。今年我回去告诉孩子他姑姑,有人管就行了。人口还是增加得快,计划生育还

是没有抓到位。”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2010年11月我去了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在惠民村，土地从1979年包产到户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很多人家把土地租给大户种植烟草或者蔬菜，2010年的租金是500元一亩。

在村里，我和秦先秀交流了关于土地调整的事情。秦先秀和丈夫都5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有孩子了。二儿媳妇在家带孩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打工。她告诉我：

“家里一共有三亩多地，三亩多田。小儿子没有地。大儿子和女儿有地。1979年分的地，以后没有调整过。家里的田地只种一部分，就靠我一个人种，因为孩子的爷爷在村里当干部。其余的地有的包给别人，有的是送给邻居。今年包了两亩给别人，500块一亩，别人种大葱。这里的地不好，最主要的没有水，水源条件比较差，水稻田没法耕种的。今年的田里种了2亩玉米。”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2010年9月，我去了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在斑竹村，土地在10年前（2000年）调整过一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村里平均每人只有半亩田半亩地。

我没有见到村领导，据说村领导大都住在镇上。我也没有见到村组长，因为他到附近的一个砖厂去打工了，只见到了组长的妻子。组长的妻子告诉我，小组的土地是30年前分的。10年前调整过一次，那时候全都动了。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

在重庆洪湖镇的坪滩村，土地有很多撂荒的现象，土地没有人租，给别人种的话也没有任何回报。平均每人0.6亩田，0.4亩土。1981年包产到户之

后“有生则增，有死则减”，但是，1996年10月30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了。

五、基础设施

在河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的几个村子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村级以上的道路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村里的道路仍然坑洼泥泞；几个村子都得益于农村电网的改善，所以现在用电可以得到保障；农村的灌溉和饮用水状况非常差，很多地方还存在旱季断水的情况，饮用水的卫生也得不到保障，不过有的村子已经开始修水池以便改善用水状况。

不知道住在城里的居民有没有想过城市和乡村在基础设施上的差别和不公平。城市的道路交通非常发达，有没有城里人被要求出劳力修路？有没有一个城里人被要求集资修路？而农村人集资修路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奉节县的一位村领导说：“现在国家在基础设施上大量投入，比如水、电和交通等。以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想进入城市或者是乡镇，就是因为这些设施不太好，一旦这些解决好之后，村里的人还是会觉得在村里不错的。”我非常希望这位村领导的话可以实现。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

灌溉水

王开正和老伴都61岁了，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村里当干部，女儿在东莞开一家快餐店。老两口现在种了六七个人的田地，还帮女儿带着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外孙子现在上初中，平时住在学校，周末会回来。外孙女两岁。他告诉我：

“家里有水田但是没有种，因为没有水，以前种水田要从邻村弄水过来，经常会为争水打架。所以现在干脆不种水田了，改为旱地。”

饮用水

王开正告诉我：

“喝水的水池是自己打的，一个水池需要两三千元，一般是自己一家做一个水池，现在听说要全村做一个大的水池，听说要花几十万元，到时国家会出一些钱，但是每个村民可能也要出钱，只是现在还没有开始做。”

王振涛（68岁，老伴2005年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去世。有2个女儿1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伴在的时候帮着带过孙子孙女。）告诉我：

“喝的水主要是从上面的水渠里直接搭条水管到家，其实水还是很脏的，因为水渠里的水是从发电厂发完电之后流下来的水。以前家的旁边就有一个水塘，但是水塘的上面有猪圈，所以水就很脏很臭，现在就没有再吃了。现在正在准备修水厂，可能又需要交钱。”

电

王开正说：

“村里偶尔会停电，冬天会停电，现在不会有不够电的时候，只是有时候需要检修。去年（2009年）村里农网改造（就是将电线和电杆全换成新的），国家会出很多钱，村民每家需要出200元。”

王振涛说：

“现在很少停电了，以前到冬天的时候，就经常会停电。现在只有检修的时候才会停电。”

村领导说：

“电的安装全是国家给钱装的，电费是由供电所来收钱。”

路

王振涛说：

“今年村里修公路，一人交费100元。”

村领导说：

“村里的有一部分公路是由国土局出钱修的，最开始是为了方便种烤烟，但是由于烟草局觉得我们种的烟草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标准，所以将烤烟的计划取消，路就没有都修好。后来全是自己村里的人集资继续修的，现在还欠四万多元。”

燃料

王开正说：

“做饭一般是烧煤，也可以烧柴，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去砍柴，而且现在年龄大了，也没有办法去砍柴了。烧煤一年需要两三千元，因为冬天需要生火取暖。”

贵州省遵义县的惠民村

灌溉水和饮用水

秦先秀和丈夫都55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有孩子了。女儿在家带孩子，二儿媳妇在家带孩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打工。她告诉我：

“水来自山上，有一个水池，接水管，通到家家户户。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水很紧张。如果雨水不好，水就干了，就没有山水，没下雨的话水井就没有水。这样天旱的时候，就要从河里抽水，有一台机器把水抽到山上，再抽到水池里，流到每家每户。如果机器坏了，就只能去水井里挑。今年就断水了，弄了两三天。平时是山上的水，井都是封的，水质是好的也干净。每年缺水的

这两三个月的水质就很差了,因为河里抽的水要通过水沟,因为河很远,一个多小时距离。水质量太差了,眼不见为净,那个水里养鸭子、养鹅。河里的水抽来主要是用来灌溉,在干旱季节的时候就喝这个水。

干旱季节抽水受益的主要是我们这个组,其他的组也可以,但是他们是拿钱买的,他们不看机器,我们要看机器的,一家分十天半个月的。以前没看,结果别人把变压器偷走了。当时承包给别人守,一千多块钱守一年,那天他没有去,在家里做事,什么时候被偷的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追求责任,就是大家摊钱,把它装好。抽水的时候一个小时48块钱,是这个机器抽一个小时的费用、加上人工的工资、还有一些维修的钱。谁家用水谁支付钱。假如你家不种水稻,不打田,就不抽水。我们这个水池在这里,有10多家喝这个水,就平摊这个水钱。

家里一共有三亩多地,三亩多田。这里的地不好,最主要的没有水,水源条件比较差,水稻田没法耕种的。今年的田里种了2亩玉米。”

村领导是这样描述相关情况的:

“村里有5个提灌站,就是负责灌溉和引水。最大的提灌站是我们这个组的提灌站,配套建设由国家烟草公司投资的,现在它的产权已经下放给村民组了。灌溉面积是500亩。产权下放之后,开始是村里管理,后来村里没有精力和时间,就把产权下放给村民组管理,现在全权由村民组负责,村里就是协助一些工作。比如说每年的抗旱村里必须要协助,如果出现大的问题村里要联系上级相关部门协助改进。举个例子讲,今年(2010年)上半年贵州出现几十年不遇的天旱,村上面有抗旱资金,上面拨的钱是按照机械的大小、管理的范围匹配下来的。如果大型的机器出现问题,比如,机器烧了,修理费都是上万的,我们老百姓承担不起,村里要负责向上一级主管部门反映,争取维修资金。”

路

王文贤和妻子都58岁了,儿子37岁了,外出打工十多年,刚回到镇上工作。女儿30岁了,在东莞打工。他/她们告诉我:

“我们这个村民小组有60户。60%的人都在外面,三四十岁的人都在外面打工。农村这些年没有大的发展。也有变化,像公路,原来是没有车子的,现在车子可以通了,好的就是这一点。这个路修到村口有六七年了,我们村出的劳力。但是这个路没有下雨的话好一点,下雨的话好多车都上不来。”

六、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

在农村,有村民自治的法律,但是落实法律的空间却比较小。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从村民自治到行政管理两个层面都是比较缺失的。在个别的地方也可以看到村民小组的小队长在起作用,但他们的作用是维持和传达的作用,很少起到真正的组织和建设的作用。

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村民建房的高度没有约束和管理,结果村民争相抬高地基、抬高门楼和房高,导致很多问题,如用农田里的土壤垫高地基导致农田土壤流失并导致灌溉和机械耕作困难;没有排水设施,抬高的地基造成邻居低地基的房子灌水,导致邻居房子地基受损。很明显,这个村子的村级管理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很让人质疑。

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5组,陈永正已经当了很多年小队长了,他老伴、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去重庆打工了,但是陈队长舍不得离开。经过陈队长和村民10年的努力,通往村子的道路终于修成水泥路面了。陈队长了解村民小组里的每一户人家,145户人家里谁出去打工了、谁在哪里打工、谁家有几个孩子等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农村需要这样当地的、负责任的、对家乡充满无法割舍的感情的带头人。不过,在后续调查中我了解到,陈队长已

经不再担任小队长了。

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8月到北大段村走访的。在北大段走访期间没有和村里的领导直接交流。通过和村民的交流,最直接的感受是村里比较缺乏社区管理和治理。给我这个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村民争相抬高盖房宅基地的高度和建房高度,而村里却无人问津。一位村民这样说:“现在盖房子,一户比一户盖得高,地基抬高了,水排不出去,就会破损其他的房子,没办法,邻居都在盖。村里没有人管。”我问村里的一位退休老教师,是否附近的村子也存在北大段村这样的情况,他说一个村子一个样。他介绍我去离北大段不远的修武县郟封镇小文案村看一看,他说那里还可以看到过去大集体的时候留下的村社管理的效果。

在小文案村我很幸运,在街上遇到了热心的村民,不仅把我领到家里做客,而且告诉了我村干部的家在哪里。我去拜访的村领导已经当村干部9年了。据村干部介绍,小文案村有4300多人,大概1000户。以前没有人外出打工,这几年才有人外出打工,估计今年(2010年)外出打工的人有130多人。小文案村给我的最突出的两个印象是:第一,房子的规划很好,都是一排排的,也不会高低不齐,也不存在邻居地基高矮不同和建房高度不同的问题;还有就是村里的街道和房前屋后有排水设施,虽然看起来已经有些年久失修了,但是很明显还在发挥作用。

我跟小文案的村领导提出了我的疑惑,为什么这里的房子很整齐,他告诉我:

“文化革命结束那段时间,我们村子辉煌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村搞新农村建设。距离现在已经28年了,我这个房子就是28年以前盖的。我当时去河南省第一家搞新农村建设的村子去学习,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以后,搞新农村建设。老房子,空房子都利用起来,改成一排一排的。”

我说,那些都是过去了,现在人们为什么没有像北大段村那样相互攀比争相拔高。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问:北大段村房子一家比一家盖的高,结果水都会流到地基低的人家,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

答:我们只能说暂时没有这个现象。

问:怎么做到的呢?

答:说明素质问题,我们村子群众素质还是比较好的。我们有严格的规定,具体的尺寸。高度和样式都有标准。

问:万一有人不遵守怎么办呢?

答:人还是很好管理的。有人不听,大家都会指责他。农村毕竟是农村,跟城市不是一个标准的,农村人的素质还是没有城市人素质高,也免不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的坪滩村

我在2010年9月去了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的坪滩村,在5组组长陈永正的陪同下走访了农户。坪滩村有987户,3026个人,其中1340多人外出打工;有耕地面积2500亩,平均每人八分多地。有一半多的孩子被外出打工的父母留在家,有三四百个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地去了。陈队长所在的5组有145户,449人,其中229人外出打工;有田303亩,有土186.5亩;63个孩子跟父母在外,38个留在家。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修路的。通过了解情况,我知道,如果没有陈队长的投入和组织工作,村里通往城里的这条路可能到现在还是石子路。他告诉我:

“村里通往城里的路一共用了10年才修好。路是1999年开工的,到2001年的时候修成了石子路,可以通车了。中间8年就是那个样子。然后2009年又开始把它修成水泥路了,到现在(2010年)终于水泥路面了。如果

这两年不是因为修路我可能就进城了,儿子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村里。”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二件事情是关于组织村民开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农村组织村民开会是很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也只是走走形式。在和陈队长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关于组织村民开会的事情,陈队长的认真负责让我很吃惊。陈队长告诉我:

“我是小队长,我的任务是宣传上面的政策,给群众开会,讲解政策,让群众了解政策,支持政府。最近一次给群众开会是(2010年)8月16日,开了户长会。第一是宣传重庆这个书记的指示,就是围绕重庆的发展;第二个就是给群众办一些什么的;第三个就是农村的养老保险,要把这个宣传到位,给群众讲。”

听陈队长讲这些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他讲的也许都是套话,会开没开都不一定。我就追问了一下有多少人参加了。他说有74人参加。我很好奇地追问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结果陈队长到里屋拿出一个本子,在本子上记录了参加会议的每个人的名字。他边给我看边解释:

“我写得很清楚,一共是74个人,是我每家每户去喊的。我们一般会选在一个农户家里面开会,有时候在屋里有时候在外面。我们今年开了四次会了。要协助农民各个方面的,就是跟农民说明这些。比如说昨天,群众给我说了一件事情,要让群众吃上自来水。现在有的家是自己弄了。现在要弄成统一的自来水。现在计划马上要开展饮水工程。是镇政府直接派人过来弄。”

陈队长给我印象深刻的第三件事情是关于是否离开村里到城里和儿女团聚的问题。陈队长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目前都在重庆打工。老伴也在重庆做家政工。儿女们不希望陈队长一个人在老家,希望他去城里。陈队长一

直犹豫。陈队长说:

“我也想过出去打工,但是村里要换届了。现在要把谷子晒干了。如果出去就要把谷子卖了,猪卖了才能去。村里也不是没有别人,但是,我们要服从安排的,如果组织上希望我继续干我就要继续干。当然,我也可以申请不干。”

2011年3月,我给坪滩村去了电话,了解到陈队长在换届中不再担任小队长了,然后他就去了城里。最近又回到村里了。那段时间正在商议是否带头做有机农业的事情。

七、乡村混混

这一节在初稿里是没有的。本书的初稿完成以后,复印了一些送给工友和相关同事征求意见。下面的故事就是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一个叫王思成的同事讲给我听的,是他2012年春节前后经历的真实故事:

“我老家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子,户籍人口有1550人。我爸爸妈妈都57岁。我爸爸1989年就开始外出打工了。我1986年出生,我们两个现在都在外面打工。我中专毕业,2004年开始外出打工,一直到现在。我弟弟1990年出生,现在也在外面打工。我外出打工后很少回老家,今年(2012年1月)春节我回去了,这之前3年都没有回去。”

我的家乡是一个瑶族自治县,当地政府想把我们那个地方打造成瑶族之乡。从2008年开始,各种建设项目就开始了,包括修铁路和公路。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村委会还挺好的。后来修路开始拨款,村委会就开始腐败了。村里有一伙年轻人勾结在一起,就像形成了“黑势力”一样。通过各种手段,这帮年轻人的头头,一个30多岁的混混,当了我们的村书记。他们捞钱的途径

有两个:一个是上面的拨款;另一个是村民集资。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村里以前很少有集资的情况,也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户集资过几块钱吧。但是,自从这群年轻人把持了村委会,就开始各种集资活动。2008年的时候,村里在过节的时候集资,请外面的戏班子来唱戏,最后公开财务的时候,还剩下2万多块。然后,村委把这个钱打牌给花完了。这以后每年都找理由让大家凑钱。

2011年,这帮混混打牌输钱,借了高利贷,并因为打牌和高利贷的事情跟外村人斗殴,砍伤了外村好几个人,据说被砍成重伤。这几个人本该被抓起来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这帮人和当地公安局里的人也有勾结,所以每次来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先躲起来。

2011年10月的时候,这伙人通知我们村各家各户,说要集资修自来水,每户集资500元。在外打工的人他们电话通知。他们也打电话给我了,我说我回不去。他们说如果不回去就罚款1500元。村委这伙人里有一个是我的亲堂哥,他给我说了情,这才没有罚我的钱,只是让我这次春节回去的时候补交了500块。村委说了,谁家不交钱就剪谁家的电线。

后来,村里人才知道了他们犯下刑事罪行的事情,也了解到被砍伤的那些人要求先赔偿9万元才可以进一步协商解决办法,这个自来水集资的钱是为了平息这个事端的,而不是真的为了修自来水。大家觉得,虽然集资的500块不是为了修饮水工程,但是如果平息了这个事件也可以。但是,最后才知道,集资的钱其实是用来还了村委打牌欠下的高利贷。

这次过年的时候(2012年1月),这帮人又让年轻人凑钱,每个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出资300元。我没有去,我弟弟去了。我们兄弟两个每人出了300元。

最近(2012年2月),上面拨款80万元下来修路,但是据说这个数额还不够修出整个路段,所以还需要每人筹资100元。但是经过村委会最后讨论后,又变成每人筹资120元。问题是,周围其他村修路根本就不用村民

集资。

今年春节(2012年1月),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回去了,但是,很多人过了初二就离开了。连父母都跟打工的子女们说:没有什么事情就走吧,村里没法待。但是,他们要筹集钱,即使你人不在,也会给你记着账的。”

我同事家乡的这个状况也许是个极端情况,但是这个极端情况也反映了乡村社会那些无所事事的青年人问题。

第八章 有家难回

很多打工者在老家的村子里盖了房子或者在老家的城镇买了房子,但是他们不知道住在家里的滋味,因为他们回不了家,这是因为:第一,农业收入非常微薄,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所以不能住在老家的家里;第二,为了盖房或者买房,打工者已经预支了自己接下来十几年的收入,所以他们必须继续打工;第三,打工的生活是受老板控制的,打工者没有假期可以回家,也就是说,短暂的回家对打工者来讲都是很难实现的。

一、农业生产收入微薄

下面列举了几个地方几个农户农业收入的情况。在这样的农业收入水平下,打工者即使在农村盖了房子也无法回家安居。打工者的收入不高,但是农民的收入比打工者的还要低很多。拿下面收入最低的一对四川农民夫妇和打工者的收入比较(按照2009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417元),两个人一年的农业收入不到一个打工者月收入的一半(计算方法:540元/1417元),一个四川农民的月收入是广东打

工者月收入的2%(计算方法:540元/2人/12个月/1417元);拿下面收入最高的河南的农村妇女来讲,她一个人的月收入是广东打工者的一半(计算方法:9290元/12个月/1417元)。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两户的情况是,一户4亩多地一年的纯收入是5758元,1亩地一年的纯收入是1440元;另一户6亩地一年的纯收入是9290元,1亩地一年的纯收入是1548元。在北大段村,负责农业生产的都是妇女,丈夫外出打工,很多是做建筑的。这与我调查的其他地方很不相同。我分析之所以夫妻二人还留下一个人种地,而不像其他地方只留下老人种地,这与河南农业收入相对高一些有关。河南虽然农业收入比其他地方好些,但是农业收入本身很难维持家庭的整体生计,因此丈夫必须外出打工。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两户的情况是,一户2亩多水田地(水田和旱地)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1650元,1亩的纯收入是611元;另一户的6亩多田地的纯收入只有540元,1亩的纯收入是90元。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的两户的情况是,一户3亩多田地一年的纯收入是810元,1亩田地一年的纯收入是270元;另一户4亩多田地一年的总纯收入是1754元,1亩田地一年的纯收入是439元。第二户之所以收入高些是因为养了猪,我把养猪的投入产出也算在一起了,这样也许才符合那里农业系统的真实情况。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两户的情况是,一户7.5亩地,3头猪一年的总纯收入是8280元,平均1亩地1年的纯收入是1104元;另一户5亩地,3头猪一年的总收入是2270元,平均1亩地1年的纯收入是454元。两户之间的差别很大,差别在于养猪的收入情况。

在四川、重庆和贵州,虽然农业生产的收入甚微,但是这微薄的收入仍然在维持着老人们的生活。此次调查发现,很多家庭的子女很少给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寄钱。很多子女寄钱往往是因为老人为自己抚养孩子,寄的钱是用来支付孩子的费用而不是赡养老人。

下面投入产出计算的方式很不规范,如把水田和旱地的收入和产出没有区分计算;把养猪的收入和种植的收入算在了一起作为农业收入等。这样做的原因是:一是为了尊重农民的习惯,因为农民买东西的时候不会一一记账,所以往往只给一个总数;二是觉得符合生产习惯的计算方式也许更可以反映实际情况。当然,如果读者发现计算和逻辑中出现错误,请及时指出。

1.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

北大段有400多户人家,1800多人,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人外出打工。全村的耕地面积有2200亩,一个人只有1亩地。这里是一片大平原,农作物种植的品种单一,就是玉米和小麦。作物的产量很好,一亩地一种作物能产1100斤左右。

表 18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李月清家农业投入产出计算

4 亩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小麦	玉米
化肥	400 元	400 元
浇水 3 次	180 元	180 元
除草剂	12 元	20 元
农药	60 元	50 元
矮壮素		20 元
种子	200 元	110 元
机械收割	200 元	
机械脱粒		10 元
机械耕地		320 元
总投入	1052 元	1110 元
产出	1100 斤/亩×4 亩=4400 斤	1100 斤×4 亩=4400 斤
销售价格	0.9 元/斤	0.9 元/斤
用途	卖 3000 斤吃 1000 多斤	全部出售
总收入	3960 元	3960 元

续表

4 亩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小麦	玉米
4 亩地的年纯收入	2908 元	2850 元
每亩地单季作物的纯收入	727 元	713 元
每亩地双季作物的纯收入	1440 元	

表 19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福贵二哥家农业投入产出计算

6 亩玉米小麦的投入产出		
投入	小麦	玉米
化肥	400 元	300 元
农药	40 元	40 元
浇水	80 元	70 元
收麦子	100 元	
耙地切杆		480 元
总投入	620 元	890 元
收成	1000 斤/亩×6 亩=6000 斤	1000 斤/亩×6 亩=6000 斤
销售价格	0.9 元/斤	0.9 元/斤
总收入	5400 元	5400 元
总纯收入	4780 元	4510 元
每亩单季作物纯收入	797 元	752 元
每亩双季作物纯收入	1548 元	

2.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的斑竹村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四组有80多户人家,有300多人。三分之一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大多去广东了,也有去贵州和重庆的。村子附近没有什么企业。只有一个砖厂,那里有80多个工人;夏天时有一个麻绳厂,附近也有人去那打工。

和朱一先生的交流

朱一先生,56岁。老母亲健在,80岁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都结婚了;二儿子刚生了儿子。家里有六口人的田地,水田三亩多,旱地三亩多,很碎杂,在不同的地方。田地都没有自己种,给别人种了。

问:你不是把地租出去了吗,是租给村里面任何一个人还是租给亲戚?

答:随便一个人就可以种。

问:租金呢?

答:不要租金。

问:不付租金给不给你一些稻谷呢?

答:不给,现在跟人家要租金就没有人要了。

问:为什么呢?

答:不赚钱,农活也多。

问:赔不赔钱?

答:不赔钱。

问:能赚多少钱吗?

答:一亩地的稻谷可以收到一千斤,一亩地还是赚六七百块钱。

和朱二先生交流

朱二先生53岁。有四个孩子,老人在重庆教书;老二在县里卖保险;老三在新疆打工;老四在县城做临时工。只有朱二先生一个人在家里种地,只种了2亩多。根据朱二先生的描述我们列了下面这个农业投入产出表。

表20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朱二先生家的农业投入产出表

1亩半水田、1亩2分旱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	稻谷和玉米
租牛	90元		
农药			90元
化肥			80元
种子			130元
总投入	390元		

续表

1亩半水田、1亩2分旱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	稻谷和玉米
收成	1200斤	1200斤	
用途	卖了一点儿	卖了大部分	
销售价格	0.9元/斤	0.8元/斤	
总收入			2040元
总纯收入			1650元
每亩田地的纯收入			611元

和仇先生交流

仇先生61岁,妻子56岁。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四个孩子现在都在外面打工。家里三亩多水田,三亩多地,是6个人的田地,一个人只有半亩水田半亩地。下面的农业投入和产出表是根据仇先生的描述整理的。

表21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仇先生家农业投入产出表

3亩水田、3亩旱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玉米3亩	稻谷3亩	玉米稻谷一起
种子			300元
化肥			1800元
除草剂			60元
总投入			2160元
产出	今年受灾,没有什么收成	3000多斤	
用途		卖了2000斤,自己吃1000多斤	
销售价格		0.9元/斤	
总收入		2700元	
总纯收入			540元
每亩田地的纯收入			90元

我知道这些表格很不规范,是因为我是按照农民的叙述和习惯来进行归

纳的。这样虽然看起来不规范,但是也许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仇先生家的农业生产显然比朱二先生家的要差很多,主要原因是仇先生家的玉米遇到了灾害所以几乎绝收。从这两户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按照朱二先生的情况,平均1亩田地一年下来的纯收入也就600多元,按照仇先生家的情况,平均1亩田地一年下来的纯收入只有90元。

3.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

坪滩村有987户,3026个人,其中1340多人外出打工。有耕地面积2500亩,平均每人八分多地。村里一半多的孩子被父母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也有三四百个孩子跟随父母到打工的地方去了。我走访的农户都在坪滩村5组,5组有145户,449人,其中229人外出打工;有水田303亩,有旱地186.5亩;63个孩子跟父母在外,38个留在家里。

和余先生交流

余先生65岁,妻子58岁。他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37岁,在重庆修车,女儿30岁,在重庆一个超市打工。儿子有两个女儿,现在由老两口照顾。余先生是重庆钢铁公司的退休工人。现在老两口种着家里的地。下面的表是余先生家里3亩多田地的投入产出情况。

表22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余先生家农业投入产出表

2亩多水田、1亩多旱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	花生	大豆	稻谷、玉米等作物一起
种子					220元
化肥					1200元
薄膜					30元
耕牛	150元				
除草剂					30元
总投入	1630元				

续表

2亩多水田、1亩多旱地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	花生	大豆	稻谷、玉米等作物一起
产出	2000斤	只收了300斤,因为遭野鸡叼了。往年可以收上千斤			
用途	自己吃一半,卖一半		自己吃点儿,能卖100斤	豆子能卖80斤	
销售价格	1元/斤		3.5元/斤	1元多点儿/斤	
收入	2000元		350元	90元	
总收入	2440元				
总纯收入	810元				
1亩田地的纯收入	270元				

和杜春孝交流

杜春孝74岁,老伴70岁,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重庆鸭场打工,二女儿在村里,三女儿在福州的服装厂打工。儿子有手艺做石雕,到处跑。老两口一起照顾5岁的孙女,地里的活也都是老两口做。

表23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杜春孝家农业投入产出表

2亩多水田、2亩多旱地、1头猪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红薯	稻谷和玉米
种子			46元
化肥			250元
薄膜			
耕牛	60元		
农药、除草剂			0

续表

2 亩多水田, 2 亩多旱地, 1 头猪的投入产出			
投入	稻谷	玉米、红薯	稻谷和玉米
灌水	10 元		
猪饲料		500 元	
总投入	866 元		
产出	1800 斤	卖 1 头猪 1000 元	
用途	都自己吃了	都用来喂猪	
销售价格	0.9 元		
总收入	2620 元		
总纯收入	1754 元		
1 亩田地的纯收入	439 元		

4.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

据村干部介绍,惠民村有 765 户,3200 人,其中 850 人外出打工。有 17 个村民小组,有 4500 亩耕地,其中水田大约有 2000 亩。现在村里就剩老人和孩子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和胡君交流

胡君四十多岁,中学毕业;妻子四十多岁,小学没有读完。家里现在住的房子是 1962 年的时候建的,快到 50 年了。儿子 1988 年出生,22 岁,在东莞打工。家里种了七八亩田地,都是夫妻二人种。除了种地,养了 7 头猪、2 头牛。2010 年 3 头猪卖了 6000 元,一头牛卖了 2700 元。胡君也从山里挖兰花回来种植,等开花的时候到集市上去卖,2010 年卖兰花的收入一共两三千元钱。

表 24 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惠民村胡君家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表

七八亩田地、三头猪的投入产出			
投入	玉米三四亩,撒些黄豆; 红薯七八分	辣椒一两亩	水稻一亩多
所有投入,包括肥料、 农药、种子等	1500 元		
猪饲料(3 头)	1500 元		
买小猪(3 头)	600 元		

续表

七八亩田地、三头猪的投入产出			
投入	玉米三四亩,撒些黄豆; 红薯七八分	辣椒一两亩	水稻一亩多
总投入	3600 元		
产出	三头猪卖了 6000 元	600 斤	1200 斤
用途	都喂猪了	卖	自己吃
销售价格		8 块/斤	0.9 元/斤
总收入	11880 元		
总纯收入	8280 元		
1 亩田地的纯收入	1104 元		

和王文贤交流

王文贤和老伴都 58 岁,都没有上完小学。大儿子 37 岁,初中毕业,现在在镇上自谋职业。女儿 30 岁,在东莞打工。老两口去年(2009 年)买来两台机器,打包谷和谷子的,一共花了 480 元。

表 25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王文贤家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表

5 亩田地, 3 头猪			
	玉米 3 亩套种红薯	辣椒 8 分	谷子 1 亩 2
投入合计(包括种子、化肥、农 药、灌水、打田、买农具等)	2000 元		
产出	三头猪,卖了 2000 元	170 斤	自己吃
销售价格		7 元/斤	0.9 元/斤
总收入	4270 元		
纯收入	2270 元		
1 亩田地的纯收入	454 元		

二、不能回家

由于在城市无法安居,所以打工者即使在城市打工多年,还是会把农村

的老家当做“家”。但是,长期在外的打工生活已经改变了打工者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些打工者真的回老家的时候,即使已经盖了自己的房子,却发现自己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了。所以说,打工者“不能回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需要打工维持生计、需要挣钱盖房、没有假期,但是主观原因也已经越来越重要,就是打工者已经不愿意再回去了。

1. 不打工就买不起“空巢的家”

我下面讲的这个家庭是真正的空巢家庭,因为老家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个家庭有三口人,父母和儿子。父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二十几岁的儿子根本就不想回去,但是那个遥远的空巢是他们唯一的家。为了在村里买房子冉明艳家花了2万多元钱,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必须出来打工。我相信,过几年买房子的钱应该就可以还上了,但是他们一家三口会回去吗?回去做什么呢?也许有一天会回去,就像冉明艳说的:“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

冉明艳的老家在重庆奉节县的红阳村。冉明艳40岁,没上过学;丈夫46岁,念过四年书。他们有一个儿子,1991年出生,19岁。现在一家三口都在东莞。她告诉我:

“我丈夫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的时间。2004年的时候,煤矿倒闭才没有做了。2007年的时候,我们去了江苏拆房子,因为买房欠债必须出外挣钱还债。去年来到东莞。我丈夫现在一个月可以挣一千三四百元,灰尘很重,每天上班需要戴口罩和耳塞。我丈夫在外面上班,我拿货在家里做点儿手工。

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留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包括睡久了也不行。我现在也没有进厂,主要就是拿一点手工活在家里做,帮家里人做饭。我现在做手工也做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如果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可以挣500~600元。

2004年在村里买了同村的人的房子,花了两万元。原来家里就只有一间房,实在住不下,所以就买了同村的房子。是同村的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就把那房子卖给我们,我们又花了一万六装修。不过买了现在也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现在就是用锁锁着的。

我们现在还欠了一两万元的债没还。那年我们本来存了一万七千多元,当时儿子在家读书拿了七千元,剩下的一万元就全部被我在江苏做手术用光了。

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

2. 没有时间回家也没有钱回家

打工期间没有假期所以很难回家探亲。即使有了假期,如果旅途遥远路费太贵,打工者也会选择不回家。下面三个工友的故事反映了三种不同的情况:一个是丈夫外出打工难得回家,留妻子在家,夫妻长期难得相见;另一个是儿子在外打工无法请假,老父亲病重也无法前去照顾;还有一个是女儿在外打工,旅途遥远车费昂贵,所以多年不曾看望在农村的母亲。

我已经成了木头人——和海兰交流

海兰家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她42岁,小学毕业,丈夫40岁,高中毕业。有三个孩子,大儿子正在复读高三,二儿子10岁在上学,刚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三岁半了。她告诉我:

“我们1990年结婚,从结了婚我丈夫就开始打工了。

他最开始在焦作做建筑,焦作离家近,两三个季度就回来一次。结婚的第四年我们也喂过猪,结果赔了。然后又去包窑,包了两年,又赔了。只好又出去做建筑,又把腿砸折了。后来在附近的新乡饭店待过一年多,洗碗什么的,不挣钱。只好又出去做建筑。去过陕西,在陕西的时候有时间就回来,有

的时候是半年来一回。后来又去东北几年，在东北就不一样了，春节的时候才能回来一次。他现在在石家庄，今年就没有回来过。

我和丈夫打电话，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挂了。他在家时间太少了，两个人见面的时间也少。两个人都成木头人了，在一起也不说话。”

爷爷得病爸爸也不能回家照顾——和赵恒平的交流

赵恒平(男)24岁，四川重庆人，兽医大专毕业，现在在北京一家公益组织工作，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告诉我：

“我爸爸在重庆一个建筑工地做厨师，一个月工资一千八，没有休息，不能请假。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家也闹了矛盾。我爷爷突然得了大病，动手术，我爸爸作为长子没有回去，因为工作不能请假。矛盾就在这，不能请假，请假就没有工作。我说：‘爸爸你不要把钱看得很重要，家庭更重要。现在也不是很缺钱，因为现在我没有在读书了，不需要家里的钱了。’我爸爸知道家里生病的人太多了，必须要挣钱。”

十多年没有见到妈妈——和陈满贤交流

陈满贤(女)，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1976年出生，34岁，小学毕业，丈夫37岁，高中未毕业。19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了。她告诉我：

“我们刚在镇上买了房子，原因就是老家太偏僻了，到镇上走路需要几个小时，很多地方都不方便。上次买房的时候我回去了一次。现在也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不再出来打工了，因为现在很难说。以前我妈不想我嫁到外面，所以不让我出来打工，直到订好婆家之后才让出来打工。现在虽然嫁得很近，离婆家只有几分钟路程，但是却十来年没有和妈妈见过面了，因为一直没有回去过。直到今年才回家见到自己的妈妈。现在回家路费也很贵，为了节约所以就尽量少回家。嫁到婆家已经十三年了，也只回去过了两次春节。”

3. 有家不回

在访谈中遇到的多数人还是认为总有一天是要回老家的，很多人都说等干不动的时候就回老家了。但是，访谈中也有打工者强调，即使在老家盖了房子也不想回去，因为自己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已经不再习惯老家农村的生活。

我回家已经不习惯了——和陈若水交流

陈若水告诉我：“我现在回家已经不习惯了，横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陈若水1980年出生，湖南株洲人。他告诉我：

“我们家5口人，爸爸妈妈在老家。我姐比我大5岁，小学没有上完，然后就去深圳打工了。我哥比我大3岁，哥哥中专毕业，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毕业以后就出来打工了，也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从普工做起。

爸爸妈妈在老家种着家里的田地。我家是六口人的田，就是六亩左右。地是自己开荒的，在山上或河滩上，种一些菜、花生、红薯、玉米之类的，但我不知道面积有多少，因为是东一块西一块的。

我初中毕业时，没考上一中，就是我们县最好的学校，只考上了农校。本来是想读农校的，也是属于高中，但是后来没读。那天我姐陪我到那个农校准备报到，但是看了学校的现状以后就没报，觉得那个学校挺破烂的，加上我爸妈也不支持我再读，他们觉得读农校是浪费钱，像我哥一样，读了两年中专，钱花了很多，一点用都没有。

我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一直到现在，一共换了10多个工作，最短的只做了半天，最长的做了3年。在广州、番禺、东莞和深圳都干过。在饭店当过服务员，在旅行箱厂、玩具厂、运动器材厂干过，当过保安，也自己干过生豆芽的生意。

我老家的村子刚好在湖南和江西交界那个地方，我们那里是一个比较偏

僻的地方,我们回家的话先坐到我们县城,是终点站;然后从县城坐到我们镇,也是终点站,从县里到我们镇里面坐车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70分钟左右;到我们镇上后走路到我们山里面,就是40分钟左右。”

2002年的时候,我自己盖了新房子。那个时候光盖没有装修,是后来装修的,盖的时候花了五万多。盖房子的钱,爸爸妈妈给了些,大部分是我自己赚的。然后装修房子时花了一万多。我去年(2009年)还在继续修,因为一直没建厨房,去年就在后面建了一个厨房,把院子围了一下,这些大概一共花了6000块钱。我建了冲水的厕所。我们的自来水是从山上接的,是真正的自来水,就是一跟管子从山上接下来的,山上的水位置高,有压力就自己下来了,都不用抽水机。

我记得我头几年出来打工的时候会很想家,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个概念了,反而我在外面漂习惯了,我已经把横岗当成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了,因为在那里待的时间特别长。从我1997年出来打工到现在将近十二三年了,我在横岗那里待了差不多有七八年,对那里每一个街道都非常熟悉,到那里之后我感觉回到我的故乡一样。现在回到家里反而会不习惯。回到家以后我就是看电视,也去邻居家串串门。现在已经跟家里人不熟悉了,像跟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在一起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客套几句,见了面打个招呼,就是那样。回家一般就是看看电视,很少出去走,因为现在农村除了看电视就是打牌。”

4. 无家可归

根据北京工友之家在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1],在北京皮村工友中的调查发现,第一代打工者中73%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而新生代打工者中只有37%在老家有自己的房子。

在工友的帮助下,我调查了东莞某工厂的一个车间,车间一共34名工人,平均年龄30岁,最大的38岁,最小的22岁。有24名80后工人,平均年龄28岁。这24名工人中有13名(占54%)已经盖房或者买房了。这个比例在新生代打工者中应该说是偏高的,因为这个车间的新生代工人中没有“90后”,年龄都接近30岁。

家里的房子已经垮掉了——冉石峰的故事

冉石峰(男)是重庆人,1990年出生,20岁,家里还有爸爸、继母和一个妹妹。2010年9月,我在重庆和在那里工作的小冉聊天,他告诉我:

“我高一的时候住在我姑姑家里,因为被姑姑说了几句就赌气不上学了。然后就出来打工了。出来打工的三年中已经换了7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是做电话推销员,只做了一天;最长的一份工作了一年。

我爸呢,因为家里没钱,他得出去找钱回来,因为工资低,而且我妈妈去世前一直生病,所以家里一直很穷。我们家的房子1998年的时候已经垮掉了,就这么一间房子,那个墙还是斜的。一直也没有钱盖。我们每次回家,都住我叔叔家里面。”

[1] 《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北京工友之家所做的调研报告(没有正式出版),2009年。

第九章 农村里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和打工的父母一起在城市边缘居住的打工者子女一般被称为“流动儿童”,而被留在农村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当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这样称呼这些孩子对研究分类很方便,但是,在生活中,面对一个个打工家庭和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这样的称呼就显得那么的冷酷和定格。这里我们也用了这两个称呼,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用这些词的时候心里是有保留的。

在和工友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她们:“打工这么辛苦,有什么盼头?”,很多人会回答:“多挣钱,供孩子上学,希望他们不再像我们一样辛苦打工。”辛苦打工是为了孩子,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孩子却不能带在身边,很多要留在老家接受教育。父母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儿女不能享受父母的关爱和教育。造成留守儿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打工家庭收入低,因此没有经济条件把孩子带在身边;(2)打工者往往工作时间很长,没有时间照顾孩子;(3)地区分割的入学和升学的制度规定,制约了打工子女跟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生活和就学。

很多年轻工友是曾经的留守儿童。农村长大的“80后”、“90后”青年几

乎没有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村是留守儿童要离开的地方。见不到父母的孩子故事是令人心酸的、照顾孩子的老人的故事是令人心酸的、见不到孩子的父母的故事是令人心酸的、留守儿童们念书的学校是简陋的和令人心酸的。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道理呢?

一、留守儿童的数量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1]测算出中国农村0~17周岁留守儿童约5800万名,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名。农村留守儿童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的比例为28.29%,即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

在此次实地调研中,根据对村乡镇学校的调查和农村社区的调查,不同地方情况不同,有的地方大概三分之一的孩子被留在老家,有的地方80%的孩子被留在老家。下面就是所调查的几个村子的留守儿童数量的情况。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的情况

2010年11月在对红阳村的探访中,村干部介绍说:

“现在整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占全村人数的50%左右,可能有一千多人外出打工。80%的外出打工者的小孩在家里,一般都是爷爷奶奶带着的。村里的学校只有一个班和幼儿园一个班,一共就是二十几个人,另外的村子也只有一个班。大部分的小孩都到镇上去读书,一年交点书费就可以了,大约几十元就够了。幼儿园就贵一点,一学期要交260元。”

[1] 高文书:“留守和流动儿童教育现状”,资料来源于中国网,载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rkid/2009-12/21/content_19106126.htm。



照片9 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小学

说明:2011年11月我们去做调研的时候,学校还在,学生也在上课。镇上一直建议把村里的学校拆散,村干部不同意,因为觉得有的孩子太小了,去镇上读书不方便。后来得知,2011年2月学校关门了,村里的孩子们只能去镇里上学了。



照片10 7岁的孩子还不会说话

说明:这是当初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小学的幼儿班,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穿黑色衣服的孩子已经7岁多了,但是还在上幼儿园。他爸爸妈妈打工没有时间照顾他,把他托付给他姑姑照看,他姑姑也没有时间照顾他,就每天把他单独锁在房间里,所以他一直不会说话。现在他被外婆接到身边照顾,虽然还不能说出完整的话,但是已经开始发声了,性格也活泼起来。



照片11 5岁的孩子上2年级

说明:这是当初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红阳村小学任教的余老师,这三个孩子都是她2年级班里的学生,两个矮个子的孩子只有5岁,但是已经上2年级了。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城里打工,把孩子托付给余老师照顾,住在余老师家,一直跟余老师的班级上课,所以已经上到2年级了。

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的情况

2010年11月,我在惠民村拜访了村领导,他告诉我:

“我们村里有一个中心小学,设置一到六年级,还有一个学前班。中心小学有教师30个左右。大约有250个学生。还有一个教学点,有一位老师,十几位学生。据我了解,学生中有一半的父母外出打工,都是靠他的爷爷奶奶老人带着。”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的情况

2010年9月,我拜访了斑竹村4组,小组长的妻子告诉我:

“我们这里有80多户人家,可能有一半的人家的家里有出外打工的父母留下来的孩子。有的留下一两个,还有三个的,加起来能有60多个,带到深圳去的有70多个孩子。”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的情况

2010年9月,我拜访了坪滩村第五村民小组。根据陈队长对村民的了解,该小组有145户,449人,其中有229人外出打工。村里63个孩子跟父母在外,有38个孩子留在家里。

二、留守儿童的故事

这里并不是要系统分析留守儿童的问题,这里只是收集了一些留守儿童的故事。这些故事很多是年轻的打工者的回忆,他/她们是曾经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有家难回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因为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没有父母愿意和子女分开。讲这些故事是希望这些故事不要一直重复下去。

轻易辍学

姑姑批评了几句就辍学了——冉石峰的故事

冉石峰(男)是重庆人,1990年出生,20岁。家里还有爸爸、继母和一个妹妹。2010年9月,我在重庆和在那里工作的小冉聊天,他告诉我:

“我是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估计那会儿我两三岁。出去以后很多年才回来一次,三年五年回来一次吧,拎着大小箱子就回来了。

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好好地上学,不能贪玩了,我在学校里特别的低调,也不闹事,该上课上课,该睡觉睡觉,自己看自己的书,困了累了就睡会儿。高中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没人管你。我还积极的参加学生会,竞选班长。还当了一个星期的班长。

那个时候我住县城我姑那里。后来我们那里有一个牡丹节,我去看牡丹了,那天晚上看得太晚,我怕吵到他们就上了一晚上的网,第二天就直接去学

校了。我姑姑他们给我拿钱过来,说我怎么还不听话啊。我就想,已经一年了,这一年没让家里操心过,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我怎么不懂事呢,夜不归宿是什么事啊。我当时特别的郁闷。他们就说,也管不住我了,让我以后别去他们家了。他们当时说的是气话,但是我后来就不去了。后来就稀里糊涂地离开学校了。”

三叔去世老师不给假就辍学了——王涛的故事

王涛(男)1991年出生,19岁。王涛家里三口人,爸爸43岁,妈妈40岁。全家都在东莞。妈妈身体不好不能上班,就在家里做手工挣点儿钱。爸爸在厂子里上班。王涛在东莞的一家厂子上班,现在每个月工资有1800元左右。2010年11月我在东莞访谈了王涛一家,说起怎么出来打工的,王涛告诉我:

“我上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出来两年多了。当时因为和班主任关系不好,所以就不想读了。主要是因为三叔去世了,向班主任请假,但是班主任不给假,还说三叔去世和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话,和班主任吵了一架,我就直接告诉老师不读了,所以后来就没去了。”

过早辍学

没人可以管住妹妹了——聂夏云的故事

聂夏云(女)1990年出生,30岁,河南人。夏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1992年出生,妹妹1994年出生。她爸爸在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她妈妈在她六年级的时候也走了,都在郑州打工。夏云在郑州上的技校,学了两年,学的是数控,2007年毕业实习出来就分配到工厂了,学的东西用不上。夏云在苏州的一个工厂工作了2个月;在深圳一家塑胶厂工作了8个月;在深圳一家模具厂工作了8个月;出来卖衣服1个月,赔本了;又进一家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了5个月。夏云现在在苏州一家公益机构工作。夏云的弟弟2008年开始打工,妹妹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了。2010年7月,在访谈夏云

的时候,她讲了妹妹辍学的经过:

“我妹初中都没毕业,就出去了,初二她都没有上。她当时在我们村隔壁的另一个县上的初中,那个学校不好,那里面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我妈妈不让她在那个学校上,她偏要在那儿上。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上了一个学期后就开始学坏了,成绩就下降了。小孩学坏最容易了。搞得村子里面的人都说她闲话,每次我爸爸回家他们都会告诉我爸,然后我舅舅也会打电话说管不住她了。然后初一没有上完,就被我妈妈带到郑州那里去了,就去服装厂里面给人家做打杂的,在那里面待了有半年。”

对待男孩和女孩的差异

带儿子出来,把女儿留在老家——和陈若水的交流

陈若水(男)是湖南人,1980年出生,(30岁)初中毕业。家里有5口人,爸爸妈妈在老家种地。姐姐比他大5岁,小学没有上完就去深圳打工了。哥哥比他大3岁,中专毕业,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毕业以后专业也用不上就出来打工了,也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2010年7月我访谈了若水,他告诉我:

“村里的亲戚包括我哥哥、姐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把男孩子带到外面来了,女孩子留在家里。我姐姐她们的女儿都是家里的老大,生活上可以自理的,自己可以洗衣服。以前大家挣钱很少,根本没办法把孩子带到外面来,现在他们的经济条件稍微会好一点,可以把他们带到外面读书。这几年发展得比较好一点,我哥哥现在把他儿子带到外面,但是他会感到很多的压力,花费太高,而且小孩子总是要有一个人看着,上学放学要接送。现在,留下的孩子比以前少了,有条件的都带出去了。我感觉以后的趋势是带来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父母会想跟自己的小孩子分开,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都会带在身边的。像我那个舅舅就带了儿子在外面,还有一个女儿就丢在家里,因为他的条件应付一个就已经够困难的了。”

在城中村学校里的男生大大超过女生

2010年3月28日(星期日),我在西安高家堡的西安工友之家的社区儿童活动中心进行了一次小调查,22位同学帮助我进行了调查,这些同学都来自高家堡小学。高家堡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因为地处城中村,本地学生只占三分之一。根据我们调查的数据,学校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大约是140:100。

2010年4月22日(星期四),我在广州番禺新桥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也进行了一次小调查,15位同学帮助我进行了调查,这些同学都来自新桥学校。新桥学校是公立学校,大概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地学生,三分之二是外地来新桥务工人员的子女。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学校男生和女生的比例大约是144:100。

我估计,之所以学校的性别比如此失衡,是因为:首先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中本来性别比例就失调,再加上很多打工者家庭把儿子带在身边,把女儿留在老家。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小学的时候就自己照顾自己——和聂夏云交流

2010年7月访谈了聂夏云(简介见上),她描述了自己照顾弟弟妹妹的经历:

“没有人照顾我们。早上就去学校上早自习了,然后等到我们晚上七点放学之后,我们回来自己做饭吃。我爸我妈刚出去打工的时候,我刚上小学六年级,弟弟妹妹才上小学一、二年级。没有人照顾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都不管我们。我们都不会做饭,谁做的好吃就吃谁做的饭。做饭的时候经常会打架。可能一顿饭会三个人来做,我做一点儿,他们觉得不好吃,他们再开火再做。那个时候做饭就做最简单的。我记得我第一次蒸馒头的时候面没有发好,然后蒸出来是那种很硬很硬的,我弟弟妹妹就不吃,我一个人吃了一个月,然后弟弟妹妹就买馒头吃。我们还会自己压面条。偶尔我们也会改善一

下生活,就是自己炸油条。我舅舅和我姨会过来看我们。庄稼大部分都是我舅舅和我姨他们来干。我们的姑姑不帮助我们。我妈妈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我爸爸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回去一次,我打电话让他回来,他就会回来,回来最多在家待两天就走了。一家人基本上就是过年才能团圆。”

觉得童年很不幸福——和冉石峰交流

冉石峰(男)是重庆人,1990年出生,20岁。高一的时候辍学,然后开始打工,出来打工的三年中已经换了7份工作了,最短的一份工作是做电话推销员,只做了一天。2010年9月,我在重庆和在那里工作的小冉聊天,他告诉我他小时候的经历:

“刚上初中的时候还挺好的,我考到市里的第三中学。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允许我继续在那里上学了,我爷爷说的理由是那个学校旁边有一条河,怕我去游泳什么的。主要是学校特别的远,坐车也不方便。然后就转回到镇上上学了。在县城的费用可能要高一点,而且还需要住在学校。在镇上上学的话,不用住。上初中的那时,交钱给学校,每天中午在学校里面吃一顿。那时候比较爱玩儿了,我很想下午和大家打打牌,弹弹弹珠,但是不行,我得早点回来抱孩子。我姑姑在她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就去了广东工作了,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看着。我姑姑的丈夫属于小流氓式的,反正整天不知道都干些什么,回来还和我爷爷奶奶吵架什么的。我童年的感觉就是什么都不顺,没时间玩儿,特别的闷,在学校做完作业就回家,回去以后就是抱孩子。爷爷奶奶他们得干农活的,如果我回去晚的话,就得被臭骂一顿,还好他们不打我的。我爷爷奶奶特别地疼我,不打我的。但是就是条件不允许,需要我去抱孩子。早上我起来得特别的早,八点半上课,我六点就起来了,十五分钟就到学校了,就坐在那里,也不看书,就坐那儿,和朋友聊天什么的,都不爱看书,心里就是想家里的事情,特别的烦。每天不日不夜的都在想这些事情。上初中时就渐渐地懂事了。晚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我想这些事情就流泪了。”

不知道父母在身边会是什么感觉

2010年9月见到朱彩虹时她13岁,上六年级,家在四川省邻水县斑竹村。提到爸爸妈妈时她说:

“父母外出打工是因为她们要挣钱供我上学,要照顾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打一次电话。他们一年回来一次,但是有时过年都不回来。我不知道父母不在身边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没有感觉似的,因为我爸爸妈妈没有多长时间在我身边,我一直都是跟着公公婆婆长大的。不过,我很想很想爸爸妈妈能回来陪我度过快乐的童年。我希望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因为希望有多一点我妈妈爸爸的爱。”

当年的留守孩子已上大学

王劲(女),1986年出生,24岁,大学毕业,现在在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爸爸46岁,高中毕业。妈妈也是46岁,没有上过学。现在爸妈在江苏拆房。有一个弟弟,20岁,初中毕业,现在在浙江打工。2010年11月,我在深圳王劲的住处做了访谈,她给我讲了自己成长的经历:

“大约是1993年的时候,我爸一个人先去了宜昌,到1995年的时候,我爸妈和弟弟一起去了宜昌。弟弟一直在宜昌由爸妈带着。爸妈主要是在那里卖煤球,以前生意不错,随着用煤气的家庭越来越多,生意就不太好了。到2006年左右爸妈来了广东打工。大约一年前吧,他们就去了江苏拆房。由于爸妈每天忙于挣钱,没有时间照顾弟弟,所以他一直都很调皮,以至于成绩不好,初中毕业后就没再继续读书了。弟弟中途被送回来过一个学期,由我负责照顾弟弟,那时爷爷也和我们在一起,不过爷爷年纪很大了,不能照顾我们,我们需要自己做饭吃。由于我们两个年纪都小,有时我们会打架,所以爸妈又把弟弟接到宜昌。”

我初中是在镇上的中学住宿,周末就回到我的叔叔家。初中的时候学费

不太多,大约一学期300到400元。在学校吃饭和零用一个月一百多元左右,因为在镇上消费水平低。初中快结束的时候,不想回到学校上学,就想让爸妈给我转学到他们身边,至少不用自己洗衣服。条件来说的话,父母身边并不一定好,因为他们在外打工也很节约,主要是想在他们身边,可以跟他们在一起,主要是我那时就不想洗衣服。

高中是在县城上学,学校文理科加起来有十个班,一个班有60到70人,重点班的同学差不多都考上大学了,整体的上线率是70%。高中的时候一学期学费600到700元。高中的时候一个月可能就要花三百元左右,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还可以,加上县里的消费水平也高,我自己那时也有一些奖学金。高二的时候开始住在老师家,那一年成绩很好,因为在老师家可以用洗衣机洗衣服。高三的时候,妈妈回到县城租房照顾我,然后考上大学。

那时我会经常打电话给爸妈。爸妈一般不会给我寄钱,一般都是一次性给我一学期的钱,然后由我自己掌管。一到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去爸妈那里。小时候自己不能一个人去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人来接我,后来上初中之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他们那里。没有感觉和爸妈疏远,因为一个学期或者是十一长假都可以和他们见面。反正离得也很近,坐船一个晚上就到了。2006年我上大学了,爸妈也到广东来打工来了,但是我去爸妈那里相对没那么多了,因为长大了,也有自己的朋友圈。

我2005年的时候考上的长江学院,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

大三的时候,我就来深圳看了看,我姑姑帮我找了一家早教机构上了一个月班,主要是先感受一下找工作的情况。大四的最后一学期就出来了,因为主要是实习阶段,所以我就找到了科技园的一家公司,主要是销售防静电服,底薪只有一千多元,如果有业务再加提成,公司那时正准备上市,所以没有精力来培养我们这些刚出来的大学生,后来我回学校答辩。拿到毕业证之后就就把这份工作辞掉了。之后我又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但是觉得好无聊,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所以就又到处找工作。后来就找到现在这家物流公

司。现在的公司我还是比较满意,待遇也还可以,现在工资4000元左右,每个月、每个季度都有奖金,而且也会发一些福利用品,中午在公司吃饭,生活也还可以,感觉发展的空间比较大,而且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重视。

虽然有的大学同学素质也不怎么样,但是觉得上了大学之后,可能胆量方面会大一些,知识的累积可能对自信心有很大的提升。刚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找适合的工作很不容易,那时也会很纠结。所以就有同学会说,还不如不上大学早点出来找工作,因为现在很多公司招工的时候就要求有几年的工作经验。但我觉得上大学还是对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在读书的时候就考了‘报关证’,现在我们公司招人就需要有这个证的。

我的规划是在五年内能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吧。其实我不想在深圳,因为这里房子太贵,除非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哈哈(笑),但是仔细想一下,有钱的人也不一定幸福,所以到时看未来的老公在哪里吧。我在想可能到那些不是很大的城市吧,比如海南就不错,重庆也还可以吧,未来发展也可能很快,所以现在也确定不了。我现在的户口还放在学校,如果我现在想转成深圳户口也很容易,只是我现在还没想转。我明年的时候看看要不要把户口转过来,因为我的户口放在学校不能超过两年,如果超过两年的话就会将户口转回原籍。对于社保我也没感觉到太好,因为还有几十年,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公司交的社保也很低,只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的社保。”

三、照顾孩子的老人的故事

留守儿童的数量超过流动儿童的数量,一些孩子得到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的照顾,一些孩子就长期寄宿在学校里。大部分情况下,打工的家长会负担孩子的现金支出费用,但是老人需要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有些情况下,老人还要依靠农业的收入来支付或者补贴孩子的花费。农村、农村的老人在为城市承担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重任。在这里只讲两个小故事。

杜春孝(男)74岁,老伴70岁,住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重庆鸭场打工,二女儿在村里,三女儿在福州的服装厂打工。儿子有做石雕的手艺,到处跑。杜春孝和老伴一起照顾5岁的孙女,地里的活也都是老两口做。2010年9月,我在村里拜访了杜春孝,说起照顾孩子的孩子,他这样告诉我:

“三女儿在福州的服装厂打工。她有个15岁的儿子,在洪湖镇上念初中,就由我老伴照顾。儿子有两个孩子,孙子14岁,孙女5岁。儿子本来在长寿租了房子,因为孩子在那里读书。现在小的一个弄到洪湖来了,在洪湖上幼儿园,大的一个还在长寿的镇上念初中。儿媳妇的工作是帮别人煮饭,她经常去洪湖,住在她小妹买的房子里。儿媳妇外出打工的时候,她婆婆去帮助照顾长寿的孙子。我老伴平时周一到周五在镇上照顾外孙子和孙女,已经有两三年了。要做早饭,做午饭和晚饭。孙女在幼儿园,中午就要去接送。下午又要去接,要跑好几趟。有时候他们会不听话。他们有时候会想妈妈。三女儿她在外面的开销都很大,今年她婆子妈死了。她给我们钱的时候,我有时候不要。”

宋金英(女)54岁,没上过学。住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老伴57岁,也没有上过学。她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在东莞打工。小儿子结婚了,孙子5岁。丈夫也于今年(2010年)春节时到广东打工,做清洁工。她一个人在老家照看5岁的孙子。提起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孙子,宋金英说:

“今年(2010年)主要是丈夫寄钱回家。他在东莞打工一个月有950元钱,他大都寄回来了。小孩的学费都是从这个钱里出的。小儿子由于去年(2009年)刚买了房子,所以钱也比较紧张。以前没有买房的时候一年寄500元。我能理解小儿子没钱寄。现在孩子一个月的开销至少要200元左右。小

孩生病一个月可能要花一百元左右的药费。如果生病了,要走路去镇上看病,如果病重了需要医生来村里的话,要负责给医生包车的钱,光车费来回就要50元。所以通常没有人请医生来村子,都是自己走路去镇上看病,得走一个多小时。地有十几块,因为都是很小块的,所以种地的时候就要跑来跑去,小孩也要带到地里去。今年种红薯的时候,小孩在地里冻哭了,有时自己想想觉得也很可怜。”

四、见不到孩子的父母的故事

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打工地

刘珍兰1984年出生,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丈夫29岁。她们有一个儿子,4岁,在老家由娘家的爸妈照顾。我2010年11月在东莞见到了刘珍兰,她告诉我:

“我结婚后也一直住在娘家。家里有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还有爸爸妈妈。大哥有个儿子,二哥有个女儿。妈妈57岁,爸爸61岁。爸爸上了大学,毕业后在镇上做教师,现在退休了。家里就是妈妈、大哥和二哥三个人有田地。平时家里只有爸、妈、我老公,我儿子和我哥的儿子,他们5个人。

1999年我初中毕业以后第一次出来打工。2006年我结婚之后就没有在外面上班,就没有钱了。2006年10月就生小孩了,一直带他,带到一岁半。2008年我又出来了。

如果把孩子带到这里上学,一定要有足够的钱,很贵的。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带孩子过来上学,每个学期最少是几千块钱。我说你们夫妻要拿一两个月的工资给他报名的。孩子在学校每天也是吃不好的,你想想在学校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生活,有那么多的学生。每天到时间就要去那里接孩子的,否则孩子被丢在那里会很不安全。我们同事的孩子上学的地方都是私人开的,

杜春孝(男)74岁,老伴70岁,住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在重庆鸭场打工,二女儿在村里,三女儿在福州的服装厂打工。儿子有做石雕的手艺,到处跑。杜春孝和老伴一起照顾5岁的孙女,地里的活也都是老两口做。2010年9月,我在村里拜访了杜春孝,说起照顾孩子的孩子,他这样告诉我:

“三女儿在福州的服装厂打工。她有个15岁的儿子,在洪湖镇上念初中,就由我老伴照顾。儿子有两个孩子,孙子14岁,孙女5岁。儿子本来在长寿租了房子,因为孩子在那里读书。现在小的一个弄到洪湖来了,在洪湖上幼儿园,大的一个还在长寿的镇上念初中。儿媳妇的工作是帮别人煮饭,她经常去洪湖,住在她小妹买的房子里。儿媳妇外出打工的时候,她婆婆去帮助照顾长寿的孙子。我老伴平时周一到周五在镇上照顾外孙子和孙女,已经有两三年了。要做早饭,做午饭和晚饭。孙女在幼儿园,中午就要去接送。下午又要去接,要跑好几趟。有时候他们会不听话。他们有时候会想妈妈。三女儿她在外边开销都很大,今年她婆子妈死了。她给我们钱的时候,我有时候不要。”

宋金英(女)54岁,没上过学。住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老伴57岁,也没有上过学。她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苏州打工,二儿子在东莞打工。小儿子结婚了,孙子5岁。丈夫也于今年(2010年)春节时到广东打工,做清洁工。她一个人在老家照看5岁的孙子。提起一个人在老家照顾孙子,宋金英说:

“今年(2010年)主要是丈夫寄钱回家。他在东莞打工一个月有950元钱,他大都寄回来了。小孩的学费都是从这个钱里出的。小儿子由于去年(2009年)刚买了房子,所以钱也比较紧张。以前没有买房的时候一年寄500元。我能理解小儿子没钱寄。现在孩子一个月的开销至少要200元左右。小

孩生病一个月可能要花一百元左右的药费。如果生病了,要走路去镇上看病,如果病重了需要医生来村里的话,要负责给医生包车的钱,光车费来回就要50元。所以通常没有人请医生来村子,都是自己走路去镇上看病,得走一个多小时。地有十几块,因为都是很小块的,所以种地的时候就要跑来跑去,小孩也要带到地里去。今年种红薯的时候,小孩在地里冻哭了,有时自己想觉得也很可怜。”

四、见不到孩子的父母的故事

无法把孩子带到城市打工地

刘珍兰1984年出生,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丈夫29岁。她们有一个儿子,4岁,在老家由娘家的爸妈照顾。我2010年11月在东莞见到了刘珍兰,她告诉我:

“我结婚后也一直住在娘家。家里有大哥、大嫂、二哥、二嫂,还有爸爸妈妈。大哥有个儿子,二哥有个女儿。妈妈57岁,爸爸61岁。爸爸上了大学,毕业后在镇上做教师,现在退休了。家里就是妈妈、大哥和二哥三个人有田地。平时家里只有爸、妈、我老公,我儿子和我哥的儿子,他们5个人。”

1999年我初中毕业以后第一次出来打工。2006年我结婚之后就没有在外面上班,就没有钱了。2006年10月就生小孩了,一直带他,带到一岁半。2008年我又出来了。

如果把孩子带到这里上学,一定要有足够的钱,很贵的。我们这里有一人带孩子过来上学,每个学期最少是几千块钱。我说你们夫妻要拿一两个月的工资给他报名的。孩子在学校每天也是吃不好的,你想想在学校里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生活,有那么多的学生。每天到时间就要去那里接孩子的,否则孩子被丢在那里会很不安全。我们同事的孩子上学的地方都是私人开的,

不会像正规的学校那么尽责,一定要送到大人手上什么的,不会的,除非是幼儿园的才会给你送到手上。我们老家的学校还是可以的。我们是新民镇,孩子上镇上的中心小学。”

13年只见到孩子3次

王开山(女)36岁,重庆市奉节县人,小学毕业;丈夫熊大义,36岁,小学毕业。有两个女儿。2010年11月访谈了王开山,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1993年的时候通过妇联组织出来找的工作。2001年我出厂一次,那时回家生小孩。那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请假,所以就辞工回家生小孩了。不过那时也没有听说有产假,现在虽然也有产假,但是组长不批假,所以有的同事要生小孩也是辞职回家生小孩。

现在孩子在家由爷爷奶奶带。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县城买了房,所以他们就搬到县城照看小孩上学。大女儿成绩也还可以,现在上初三了,小女儿上小学三年级。现在两个小孩一年读书就要一万元左右,因为大女儿读的学校比较好,所以学费很贵。在农村有一个儿子还是最好的,不过以后我们老了,女儿可能会孝顺一些。

我们一般好几年才回去老家一次。今年我们俩八月回去过一次,在家待了十多天的时间,正好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从1997年到现在13年的时间,我们两人一个人回去了三次,一个人回去了两次。每次回去也就十来天,厂里请假也不好请,一般请假最多就15天,还包括周末的时间。两个女儿都很听话,爷爷奶奶可以管得住,也已经习惯我们在外面了,当然也会想我们。

我们也想小孩,但是也没有办法,为了多挣一些钱,我们根本没法将小孩接到这里上学,因为这里消费太高了。反正我觉得我们没有长期跟小孩在一起,感觉感情没那么好,她们一般也就是跟我们打一下电话,说一下话,但是没有太深的感情。我们也很想把小孩接到一起,但是钱太少了,如果工资高,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五、留守儿童念书的学校的故事

2010年11月在对龙泉中学的探访中,刘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学校是初中,一共27个班,每个年级9个班,大概有2600多名学生,学生都来自周边的村镇。留守儿童大概有770人,我们学校现在几年都无法和这些孩子的父母相见的。学校男生比女生多200人。

我们这里比较穷,想办个大的计算机房或者是大的活动室之类的,但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都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现在的电脑房一共只有三十台电脑,一堂课只能有一个班去电脑房,而且上课也是两到三个人共用一台电脑,所以这方面是很欠缺的。如果我们学校有条件的话,可以多一些电脑让孩子们用,可以和自己的父母视频一下,或者在老师的指导下上一些网站学习一些东西。这些年毕竟发展了,留守儿童从经济方面来讲根本不缺,最缺的是周末的娱乐或者是其他的安排。我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组织起来让他们打球,但是雨天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室内的活动场所。

现在天气冷了,学校没有浴室,留守儿童可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所以他们可能几个月才可以洗一次澡。其他的学生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他们一般回家就可以洗澡。

还有我们学校现在没有食堂,他们每天吃饭都是站在露天里,如果下雨就很麻烦。不过这个食堂现在已经申请到项目,现在正在建设中,让学生以后可以坐在食堂里吃饭。

学校没有图书馆,但也有一些图书可以借,只是没有读书的环境。目前网上的东西比书更加可以吸引学生。

现在留守儿童最大的难度就是周末的管理问题。我们学校想周末将学

生组织在一起,但是没有这种环境。我们不想让他们周末到外面去上网,但是在执行中还是有一些困难。我们的老师也会给一些留守学生当‘代理爸爸’”。

第十章 讨 论

一、新农村建设的希望在哪里?

新农村建设首先需要人,而农村只剩下老人了;

新农村建设需要带头人,而我们的基层干部或者缺失或者蜕变了;

新农村建设需要资本和市场,而资本和市场的利益导向却使得农村和农业进一步衰败。

面对新农村建设问题,一些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温铁军老师出版的著作《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中,温老师回顾了中国从1998年开始重视“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沿革。温老师认为:

“新农村建设作为新时期缓解‘三农’困境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既不应该再是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从农业提取剩余支持工业、从农村征发劳动力支援城市基本建设所形成的城市本位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及其在改革中形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得以延续的制度路径依赖所推行的城市‘化掉农

村、城市去‘统’农村,更不可能是一切唯农村是举的保守主义或者一切唯农民意愿是从的民粹主义的‘三农’本位论’……缓解‘三农’困境要依靠两手:一是各级政府使用‘看得见的手’来促使‘三要素’回流;二是要靠农村亿万群众的劳动之手直接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来改变农村基本条件。”〔1〕

李昌平老师在《大气候》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而且给出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2〕书中强调了“农民自主性和中国自主性。”书中论述道: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转让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占农村经济70%的经济总量被5%左右的资本家拥有”。说到“新农村建设”,李昌平老师写道:“中国100年来已经开展了四次新农村建设,这次是第五次……应该始于2003年”。李昌平老师认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是:

- 新农民组织建设
- 新生产关系完善
- 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 新公共服务和新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
- 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科学规划与建设

中国在过去的60多年里经历了很多动荡和变革,土地也经历了很多的制度变革。从新中国成立的土地私有,到合作社,到现在土地承包制度。从世

界范围来看,农业都是一个无法和工业平等竞争的产业,因此从欧洲到美国都有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小农场主仍然步履艰难。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地方小农的农业收入非常微薄,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计。中国不能没有农业,这是关系到中国安全的大事,但是我们就快没有农民了,我们的农业该怎么办?我们的农村谁来建设?也许中国农村衰败的现状正好让国际资本和中国资本看到了商机,因为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它们进一步控制中国农业的契机就马上到来了。

二、让家庭团圆是社会的责任

社会主流中有一种意识,认为是城市和工厂的老板给了打工者挣钱的机会,所以打工者不仅应该感恩戴德,而且应该自己消化和支付进城打工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代价。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经济腾飞的30年,是打工者进城打工的30年,是社会财富剧增但贫富差距也剧增的30年。经济的腾飞是全国各界和所有劳动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而劳动大军中的主力是2亿多的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这些人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她们自己的生活却很不乐观:工资待遇很低、居住条件很差、子女在城市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而且只能回原籍参加中考和高考、子女在农村或者由祖父母照顾或者寄宿在学校长期没有家人的关照。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虽然社会并没有无动于衷,但是社会行动主要以关爱活动为主。我的感觉是,关爱活动如果深入社区并且持续进行,那么可以为打工者解决家庭的实际问题,但是,如果只是流于形式,那么这样的活动也许只是把这些人当做被施爱的弱者,而不能改变结构性的问题。

企业和社会应该承担打工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需要。完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成本不应该也无法完全由企业来承担,更不应该把社会成

〔1〕 温铁军:《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页。

〔2〕 李昌平:《大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3~57页。

本转嫁到打工者和其家庭身上。政府、社会、企业和打工者要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现在留守儿童的养育和照顾的任务大都落在了农村的年迈老人身上。城市不仅剥夺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而且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加给了贫穷的农村和农村老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是社会的责任,留守儿童能够和父母团聚也是社会的责任。

在这一编的结尾和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10年出品的第四张专辑《放进我们的手掌》中的一首歌曲《他们说》:

他们说

词曲及演唱:段玉

那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村庄,
 村子里的人要靠外出来打工
 全村只剩下年迈的老人
 和不懂事的孩子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孩子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

 已经离开村庄多年
 在外受的苦只能心中体会
 他怀念生养他的土地
 可现在却满是钢筋水泥混凝土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孩子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

又是一年桃花飞
 期盼的眼光盼啊盼儿归
 为了生活又要外出去打工
 团聚的日子转眼飞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孩子
 他们说
 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

我们说
 我们本是一家人
 为什么呀!
 要分开
 为什么呀要分开

我们说
 我们想念我们的孩子
 我们说
 我们想念我们的母亲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第三编

迷失在城乡之间

在前两编微观层次表述的基础上,这一编将描述社会结构层次的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与打工者未来发展的关系。打工者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这种迷失最明显的特征是:一方面他/她们在城市艰难生活,住所简陋狭小;另一方面他/她们在农村盖房/买房。虽然也知道自己不会回乡务农,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把房子盖在了村子里。当你看到那些矗立在田间地头的空空的楼房,或者很多仅住着老人和孩子的新房,那些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家的符号”。打工者迷失在城乡之间,对城市、农村和自身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打工者的迷失并不是打工者个体的问题,而是转型期间的社会问题。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不能公平享受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的时候,社会就发生了断裂,打工群体就在社会断裂中迷失。

在和打工者相关的社会结构层次的话题中,有两个问题和打工者的发展和出路密切相关:一个是“用工荒”,另一个是产业转移。我认为,“用工荒”是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角力的一种表现,“用工荒”在有些地区比较严重、在有些地区并不存在;企业在和政府的角力中要强化“用工荒”的严重程度,以便获得政府的重视和优惠;企业在和打工者的角力中通过媒体宣传“用工荒”的严重程度,以便吸引打工者前来就业;打工者在和企业的角力中处于弱势,但是打工者的力量在于用脚投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改善用工环境。“用工荒”和打工者就业的不稳定是直接相关的,打工者虽然就业不稳定,会不断换工作,但是会继续在城市打工。“用工荒”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就

业虽然不稳定但是数量稳定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人群体已经形成,打工者也许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但是可以选择离开,这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

产业转移本身是资本追求廉价劳动力和更高利润的选择,但是从客观效果上也给落后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一些远离家乡长年在外打工者带来了在家乡就业的可能性。本书没有针对产业转移作调研,在这里把这个话题提出来是希望国家和社会不要把产业转移单单作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手段,也应该主动考虑到打工者的利益和需求。如果是这样,那么也许打工者不仅可以“返乡就业”,而且也可以在家乡安居乐业。

在十几年以前,从政府、学者到打工者自己,都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最后是一定要返回农村的。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社会和打工者都认为新生代打工者不会回农村了。打工者的工作、思想、消费观念城市化了,但是打工者的工资待遇、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没有城市化,再加上抱着打工者终归要返乡的陈旧观念不放,和不想承担打工者社会成本的急功近利的企业和社会政策,打工者现在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这样所造成不只是打工者的境遇尴尬(身份认同、无法归属城市,又不能回去农村),而且直接造成经济资源的浪费(打工者投资建房却不能居住),直接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不平等、社会不公平、打工者子女的教育和发展受伤害)。

第十一章

生活在别处——迷失在城乡之间

外出打工是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的选择。摆在我们眼前的现实是：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但是城市无法安家。那怎么办呢？只好回老家了。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现在是不能回老家的，所以只有将来回老家了。既然将来要回老家，那么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呀。所以，我们两亿多人每天忙忙碌碌都在为将来不在此地的生活做着准备。

我们下班“不能回家”，我们的生活不在此地，我们的生活不在当下。

我们在为“彼岸”、为将来进行着投入，将来和“彼岸”是我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我们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

一、盖房/买房为了什么

从调查了解的信息来看，打工者买房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家，有个窝；第二，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第三，为了让孩子上学方便。

本书已经多次分析了这第一个目的的臆想性了，在我看来，这个家就是

个“养老院”，因为年轻的时候是不会回去的，而且到了老的那天能否回去也不一定，所以这个家只是个符号。

再分析一下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而盖房子或者买房子。同样的道理，连父母辈都能动弹的时候都不会回老家，年轻一辈会回去吗？真的回老家的那一天会住在几十年前盖的或者买的房子里吗？所以这个房子也只是个符号。

为了孩子上学而买的房子是唯一眼前有实用价值的房子，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买房子的比较少，大多数打工者选择在镇上租房子，或者让孩子住校。

也就是说，打工者盖房和买房主要是出于前两个目的，而按照本书的分析前两个目的都是只有符号意义，所以说，打工者现在都是在为符号意义而盖房和买房。但是这个符号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更好的出路的时候，符号的意义就显得非常重要，是维持人精神不倒和继续努力的动力。

1. 打工只为了建设新农村“养老院”

在中国的城市有很多“房奴”，这些人贷款买房，每个月还款，可能要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发达的美国和欧洲也一样。虽然这些人是“房奴”，但是他们起码住在自己出卖一辈子心血才可以拥有的房子里。这里讲的故事是中国的打工群体，很多人没有房子，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却也许只能在老了干不动了以后才能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因为这些人在城市买不起住房，只好在村子里盖房子或者在老家的城镇买房子，而为了偿还买房子的贷款并维持生活就必须一直在打工的城市生活。这样，我们的打工者辛苦一辈子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个养老的地方。

在河南焦作市武陟县的北大段村，大部分村民都是在村子里自家的宅基地上盖房子，这是因为这里农业的收入相对较好、交通便利而且一些家庭的壮年妇女还守在农村家里照顾农业和孩子，但是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性都在外打工。

在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的斑竹村，站在高坡上望去可以看到稻田里突兀

起来的一座座新建的房子，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造价，而这些房子年轻的主人都不在。有的房子里住着80岁的老人和10岁的孙女，有的房子是空的暂时作为存放粮食和秸秆的仓库，有的房子只有漂亮的外墙而里面都没有装修。

在访谈中，有一位年轻的女性拒绝盖新房，她说：“盖了房子我又不回去住，如果是为了儿子盖，我怎么知道我儿子将来是否想住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位年轻的女工在婆婆和丈夫的压力下还是要挣钱盖房。

打工只为建设“养老院”，这是打工者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如果农村只是养老的地方，那么就不只是悲哀了，是危险了。

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

我是2010年8月去的北大段村。从北京过去感觉交通很便利。下了火车可以坐公交车。公路一直通到村口。村子里的主路也很平坦是水泥路面，但是小路就是土路了，下了雨很泥泞。在村里，大家都有一个烦恼，就是很害怕邻居盖房。以前村里会统一管理盖房子的高度，后来村里没有人管了，结果一家房子比一家盖得高。这样做的原因是觉得盖得高风水就好。现在的问题是，那些不讲风水的或者没有能力讲究风水的也必须重新盖房，因为村里没有统一的排水设施，邻居的房子比自己的高了以后，自己的房子处于低处地基就会被水淹泡，久而久之房子就垮了。在外打工的人很多都在村里盖了新房，因为这里是归宿。在田间可以看到一些很深的大坑，这是盖房子垫高地基挖土留下的。这些大坑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危害，灌溉水会浪费在坑里，农机操作也会有风险。

北大段村的情况就是：没有社区管理，只有小家的建设，最后的结果是小家也难保。

下面是老家北大段村的工友孙福贵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就是盖房的苦恼。孙福贵，1968年出生，42岁，有两个孩子，女儿20岁，儿子18岁，两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2000年之前孙福贵在家乡附近的黑砖窑干过很多年，主要

是做机器维修，也在陕西的砖窑干过维修，在山西一个电厂干过，在天津的工地干过，2010年7月做访谈时，孙福贵在北京做锻造。盖房子是农村最大的事情也是他最大的苦恼，他给我讲了村子里盖房子的事情：

“农村讲究风水，我们那里主要讲究的是房子的高度。别人比你高，你比别人高，别人又比你高，没有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房子是死的，但是它在逐渐的长高。据说我们村子的住宅现在越来越高，田地有很多大坑，因为要挖土来垫高宅基地。

我1999年盖的房子，比我邻居的高了一点，高了三公分吧，他们就找事。我只好把梁拆下来，当时正是村里管得严的时候，现在没人管了。其实，我那个房子不高，就是按照规定的一丈二，一丈二就是四米。但是他们却说高了。

家里的房子盖了10年了，现在得重新盖了。就是因为我的东邻居新盖的房子比我的房子高了。现在我不能盖，我要等我西邻居盖了以后才能去盖。农村就这么麻烦。我总之必须盖房子，不盖不行，儿子大了。农村就是这样，出来打工的钱，全花在房子上了。

我儿子以前对我说：‘你盖不盖都行。’说是这样说的，但是他前两天打电话又说：‘爸，我同学家都把房子盖好了。’这都是压力。现在在农村盖房的话就要十几万元。我一个同学说：‘这样花，还不如到县城去买房子。’农村为什么要盖房子？在外面住为什么要在家里盖？要有一个归宿啊。

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将来怎么办？在城市还是回老家？如果城市里容得下我们的话，就会在城市里；如果容不下我们的话，还是回老家安逸一些，有保障，有土地。”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

我是2010年9月去的斑竹村。先坐飞机到了成都，然后坐上去邻水的大巴，一路上大部分是高速公路，很通畅。在邻水再换上去镇上的大巴，虽然要

走很多山路,但是路况都很好。斑竹村就在公路旁边。下了公路,村里的小路就是土路了,很窄,而且没有修出路基,再加上山区地势高低不平,到了雨天村里的路就更难走了。

我爬上一户人家的屋顶,放眼望去,有很怪异的感觉。由于地势不平,田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突然会在稻田里耸立起一座崭新的楼房,一般都有3层高甚至4层。这突兀的楼房和旁边弯曲泥泞的土路和周围起伏的稻田与不远处的灰暗的老屋形成鲜明的对比。

干到60岁就不干了——和朱一先生的交流

朱一先生56岁。老母亲健在,80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结婚了;二儿子刚生了儿子。家里有六口人的田地,一共田三亩多,地三亩多,很碎杂,在不同的地方。田地都没有自己种,给别人种了。他告诉我:

“我40岁才开始出去打工,之前一直在家里面种地。我老婆比我出去的早,她打工二十多年了。我、我老伴和我女儿都在一个厂打工,是广州新唐的一个很大的制衣厂。我干的是技术活,工资挺高,一个月有3000元到4000元。老伴和女儿也在那里打工。女儿在那里打工2年多了,她技术好,一个月工资可以拿到4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后来也在那家制衣厂打工。大儿子的技术最好,是制版的,工资高;儿媳妇的工资可以达到2000多元。现在小儿媳妇刚生了孙子,儿子儿媳妇都在家里歇着。儿媳妇在家带两年孩子,然后再出去。到时候就让奶奶回来带孙子。

我这次是辞工回家盖房的。我们厂里面如果辞工不批就得自离,就丢掉一个月的工资,如果两个人回家的话至少得损失五六千。所以,我是批下来才回家的,要提前争取嘛。我过阵子再回去厂里工作几年,最后一次出去,干到60岁就不干了。我去年(2009年)3月回来开始盖房。盖了三个多月,雇了10多个工人,工钱三万多元钱。四层楼,盖房子一共花了17万元。14万

元是材料的费用,3万元是工钱。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小女儿贡献了一万多元,二儿子一万多元,其余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这房子也有大儿子的一份,他以后有钱了也会有贡献。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村里没有谁家不盖房的。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自家的田里盖的。老房子还在,我妈妈住在老房子里。”

为老人建设“新”农村——我和朱一先生的对话

问:你能不能想象一下20年之后我们村子是什么样子的?

答:20年以后我们村子会有大的变化。

问:是什么样子的?

答:现在搞新农村,大家住在一起集中规划。

问:那你这房子不就白盖了吗?

答:我这里不会白盖的,就规划在这一块。

问:那别人家盖的房子怎么办?

答:肯定搬迁有补偿。

问:有新农村建设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村子里还是像现在一样只有老人和孩子住呢?还是什么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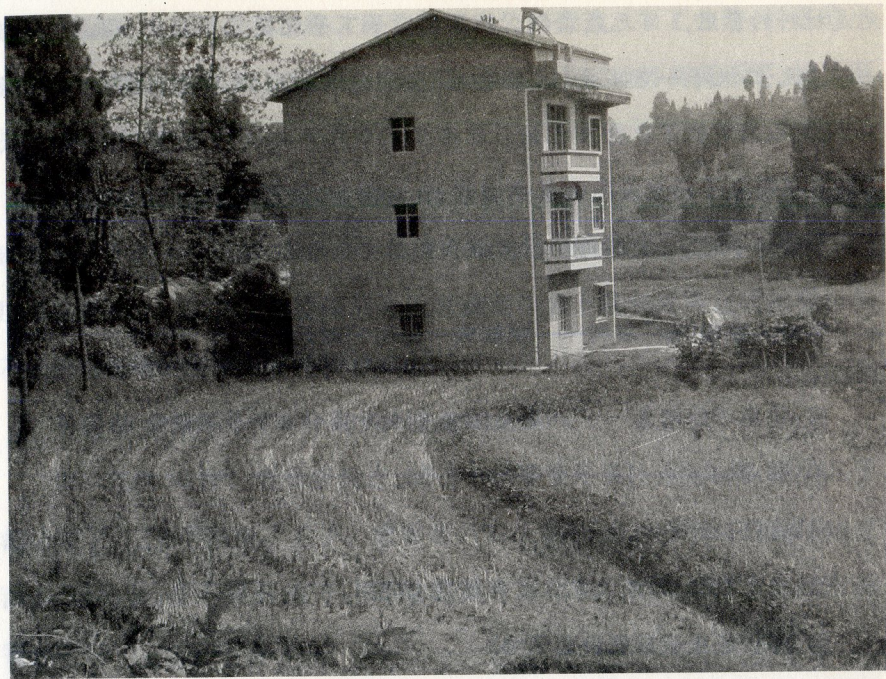
答:20年后肯定还是老年人多。

问:新农村就是给老人和孩子的新农村了?

答:是啊。

在400多平方米的日子里——参观林婆婆的家

站在田埂上,我看到不远处的田间有一座非常高大漂亮的房子。顺着小路弯弯曲曲地走下去就到了楼前。我很冒昧地敲门,林婆婆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林婆婆的允许下,我逐层参观了林婆婆家的新房子。一共有4层,地面都铺了地砖。每层都有抽水厕所,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在2层和3层还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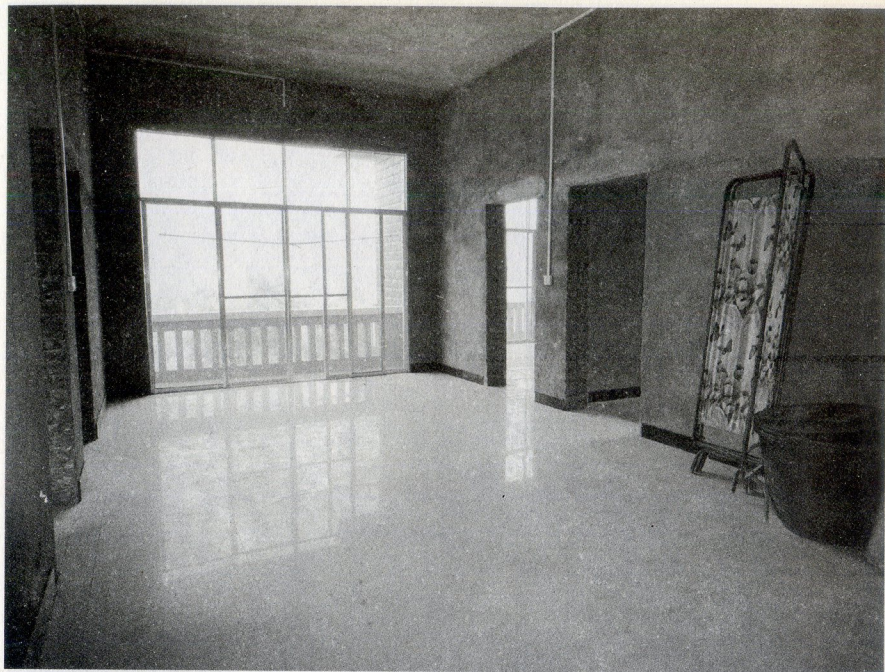
照片 12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田间高耸的新房

洗澡的浴室。我试了,都有热水,原来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2楼客厅很大,有红木的家具。一间卧室有新的红木床,另一间有张旧双人床。林婆婆说,她平时和孙女就睡在那张旧双人床上。所有房间都装修好了,但大都是空的,只有2楼有家具。不过,2楼也还是显得很空旷。想象一下,这4层楼每天只有林婆婆和小孙女两个人住。据邻居说,林婆婆的儿子是个小包工头。林婆婆告诉我:

“我81岁了。丈夫去世三十多年啦。我有一个儿子四个女儿。儿子40岁咯,他和他媳妇在打工,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孙子跟他爸爸妈妈在一起,孙女10岁了,在这里上学。这里就是我和我孙女住,其他人都去打工去了。这个房子是儿子打工挣的钱,花了二十几万元。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家里有4个人的地,都给别人种着。”



照片 13 林婆婆站在房前



照片 14 林婆婆家 40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到处都空荡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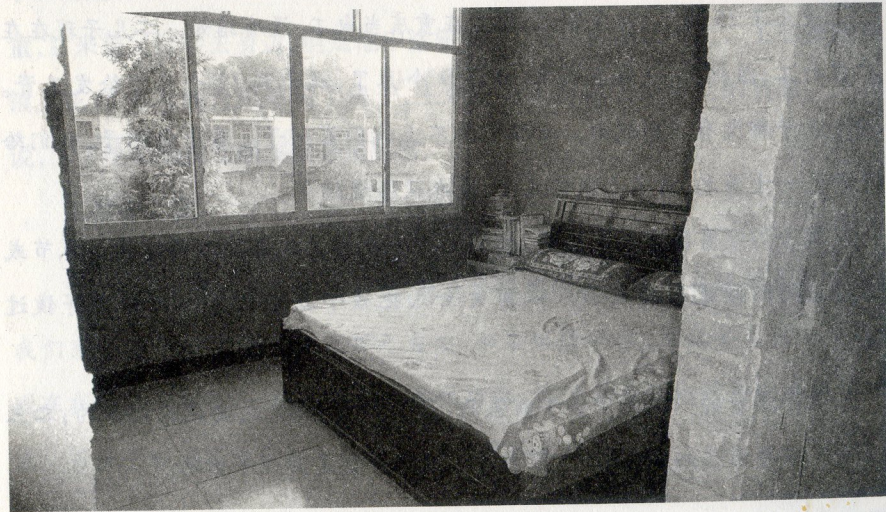
新房子只是储藏室——住在仇先生家

仇先生 61 岁,他老伴 56 岁。他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我 2010 年 9 月 2 日就住在了仇先生儿子的新房子里,他们夫妻一直都还住在紧挨着的老房子里。新房子有四层,外部的墙面贴了瓷砖,房子内部几乎没有装修,地面和墙面都是裸露的石灰。楼梯没有扶手,楼梯和房体之间还有缝隙,感觉整个建筑很粗糙。房子设计了卫生间,但是现在都堆着杂物,什么还没有装。上厕所还是用屋子外面的茅坑。新房子里面只有一个房间的地面铺了地砖,里面摆了一台孤零零的电视,电视的对面摆了一条木头板凳。整个房子里面几乎没有家具。做饭在老房子的厨房里,用烧火的灶台,用非常昏暗的电灯泡。水是从山上引下来的。仇先生夫妇告诉我:

“大女儿 32 岁了,结婚了,两个人都在广东打工。他们有三个孩子,都跟父母在广州。大的两个是女子,小的是娃。他们大女儿都 9 岁了,二女儿 5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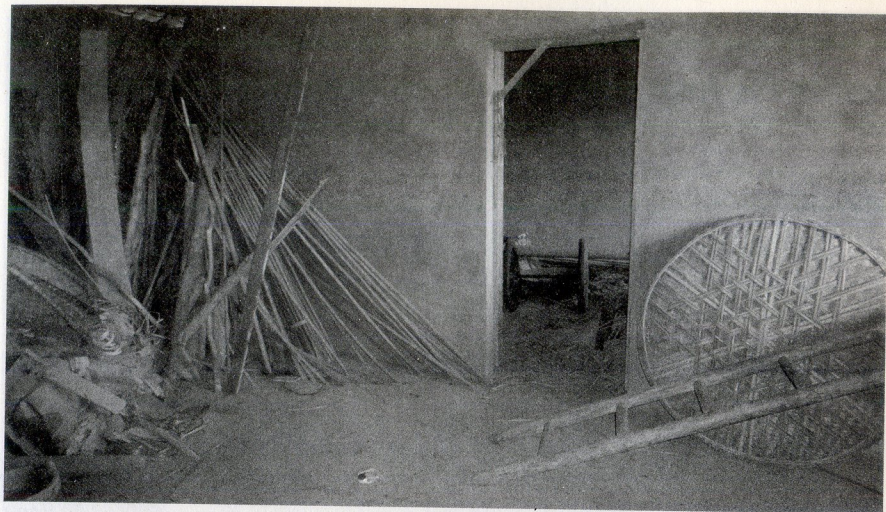
照片 15 老两口站在田间



照片 16 三层楼房里唯一有家具的房间

说明:在斑竹村调研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这个房间里。老两口一直没有搬到新房子里住,仍住在新房旁边的老房子里。

多,小儿子 2 岁多。小孙女从两岁半到今年(2010 年)一直在老家由我们照顾,今年 7 月 11 日接走了。大女儿 17 岁出去打工。我们没有钱用,只有让她出去挣点儿钱。



照片 17 新房成了储藏室

大儿子 25 岁了,初中毕业,现在在重庆当电工,没有结婚。二儿子现在在广东打工,做机床,一直压工资,干了 9 个月了,说干到 12 个月才给发工资。两个儿子都没有说到媳妇。女孩子看不上我们家孩子。有个女孩子,我们给了聘礼一千多元,看不上我们儿子,钱也没给退回来。

孩子们没有往家里寄过钱,他们把房子弄好了就再没有寄过钱。春节或者回来的时候也不会给钱。以前大女儿把孩子放在这里的时候会寄钱过来。

这个房子的一楼是十多年前盖的,花了 1 万多元,主要是我们出的;二三层是三四年盖起来,花了 3 万多元。大部分钱是大儿子出的。”

2. 打工买房为了儿子结婚

老家地处偏僻农村的男孩子如果没有能力在镇上买房子,说亲就有些困难,除非小两口在外面自己私订终身。很多父母虽然已经四五十岁了但还在外面打工,因为只有打工挣钱才能在镇上买得起房子,才能帮助儿子娶回媳妇。当我问年轻的小伙子将来会不会住在家乡镇上父母给买的房子里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经常是否定的,因为年轻人首先不想回到偏僻的小镇,再就

是在家乡小镇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镇上的新房好像只是仪式的一部分,一个有资格说亲的符号。

下面用王劲家的故事来描述“打工买房为了儿子结婚”这个情况。

王劲是个女孩子,24 岁,大学毕业,现在在深圳工作,月工资 4000 元左右。老家在重庆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王劲的父母现在在江苏做拆房子的工作。王劲有一个弟弟,20 岁,初中毕业,现在在浙江打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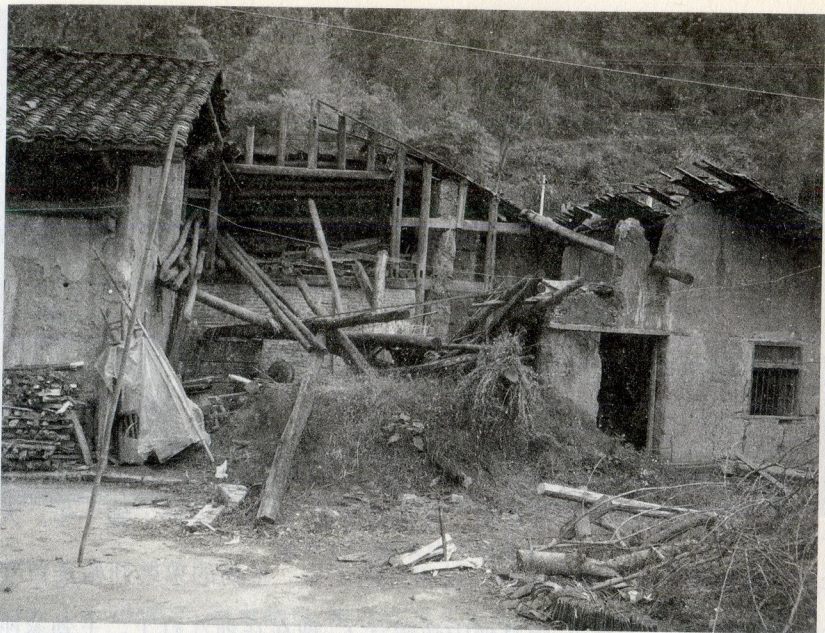
2010 年 11 月我在深圳访谈了王劲。春节前后,一位朋友去了王劲的老家红阳村,正好赶上王劲的父母回家,也了解了一些情况。王劲曾经是留守儿童,她是幸运的,遇到一位好老师,她高中期间住在老师家里一段时间,从生活和心理上都得到较好的照顾。在她高考前,妈妈回家陪了她一年。大学学历让她有幸可以在深圳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王劲的弟弟开始是留守儿童,后来被父母接去身边,但是他中途辍学了,现在在浙江打工。王劲家刚在镇上花 15 万元钱为弟弟买了房子,王劲也为买房做了经济上的贡献。王劲说,为了给弟弟找女朋友就必须买房。

王劲告诉我:

“我家村子里的房子常年不住,现在已经倒塌了。现在在镇上买了房子,我们家买房子好像花了十五万元左右,如果装修的话,可能要再花一些钱。现在我们交一部分了,我也会拿一些钱出来,到时再差钱的话再向亲戚借一点。买房子的原因还是为了弟弟,他将来要找女朋友嘛。”

王劲的爸爸 46 岁,高中毕业;王劲的妈妈也是 46 岁,没有上过学。王劲的父亲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好像是 1992 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亲戚介绍,我们几个到宜昌打工。那时家里很穷,一年辛苦下来,不但没有钱余下来,而且还可能会欠债,所以就一起去了宜昌。到那里最开始是在煤厂上班。后来发现卖煤球生意



照片 18 这是王劲家在老家村子里倒塌的房屋



照片 19 王劲家给王劲的弟弟在镇里买的新房

说明：图中快盖好的楼房中有一套就是王劲家的。

不错,就开始卖煤球给一些餐馆。

其实我们卖煤也存了一些钱,当时可能也有十多万元吧,那时要是把这些钱拿来在县城买房就好了。但是拿去和朋友合伙投资旅行社,被朋友骗了,10多年的积蓄就被人家骗光了,一切都又回到零。到王劲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我们在宜昌的生意也越来越差,烧煤的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只好放弃留在宜昌。跟着同村的人到惠州打工,在一家家具厂上班,由于我一直没有进过工厂上班,都自由惯了,在工厂里天天被人管着觉得很习惯,所以在那里干了大约一年就不想做了。

看到同村子好多人在江苏拆房子也挣不少钱,只是听说有点辛苦,所以想去试一下看看。刚开始也有点不习惯,因为夏天天气热,要在外面晒着,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工资也还可以,至少一天可以挣100元左右,两个人加起来一天也差不多200元,这样算起来也还觉得可以。再说一起的人全是我们一个村子里的人,大家在一起也有照应。所以这几年我们就一直在江苏拆房子,当然这中间会不停地转换工地,反正也很习惯了,现在每年都会回家过年。

儿子今年也一起回来了,主要是因为刚找了一个女朋友,这次女朋友也回家了,是我们同村的女孩,他们决定于(2010年)1月24日订婚。早点把他的‘个人问题’确定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让他们自己先相处一段时间,然后看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结婚。”

3. 打工买房为了孩子在镇上上学

在调查中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孩子在镇上上学,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为爷爷奶奶在镇上租个房子好能够照顾孩子。有的家庭就在镇上买个房子为了以后住,也为了眼前孩子上学方便。现在镇上的房子也很贵,调查中了解到的在镇上买房子的价格没有低于15万元的。打工的父母把房子买下来以后大都必须继续打工,因为要还房款。有的父母想回去住在新房子里陪孩

子,但是镇上的经济一般都不发达,很难找到工作,做小生意的竞争又非常激烈,所以,一般打工的父母很难能够享受自己的新房子。

如果买了房子只是为了老了以后住,觉得不仅浪费而且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就是老了以后真的会住在几十年前买的房子里吗?时过境迁,几十年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如果买了房子自己虽然住不了但是孩子现在可以住,这种情况起码不是那么浪费。

下面用王福连一家人的故事来描述“打工为了孩子在镇上上学”的情况。

我在东莞见到了王开新(父亲),王福连(儿子)和何玉清(儿媳妇),他们都在东莞打工。2010年11月14日,我在王福连一家在东莞住的出租屋里和他们进行的交流。他们住的地方是典型的“握手楼”。屋子很窄,一张床就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屋子里有厕所,很小的那种,估计胖子需要挤才进得去。

王福连的老家在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母亲宋金英在老家照顾5岁的孙子。红阳村非常偏僻,到镇上没有公交车,到县上也需要3个小时。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大多数打工的人们还是在家乡盖起了房子。村里也有几十户人家在镇上买了房子。

从北京到红阳村很遥远,先要坐20个小时的火车到宜昌;然后坐从宜昌到奉节的快艇,需要3个小时;然后坐从奉节到青龙镇的公交车,大概需要2个小时;从青龙镇到红阳村没有公交车可以到,可以在镇上包私人的车,价格在50元左右。

王福连的一家人

王福连的爸爸57岁,40多岁的时候在家里的坡上种地不小心摔倒导致残疾,现在还有一根钢管在腿里,可以走路但是会跛脚,2009年到东莞做清洁工,工资一天80元,不是每天都有工作,一个月大约挣950元。王福连的妈妈54岁,在老家帮助照顾5岁的孙子。老家的房子盖了有五十多年了。王福连有个哥哥,32岁,一直没有找到对象,2011年2月经人介绍找到了对象,并在春节结婚了。对方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矿上赔偿近20万元钱。王福连30

岁了,和妻子一起在东莞的同一间厂子里打工。

王福连梦想回镇上做生意

王福连,30岁,小学毕业。在打工的10多年中,头3年换过几个工作,从2003年进了舒雅厂子之后一直做到现在,做7年多了。他告诉我:

“去年(2009年)12月在镇上(奉节县青龙镇)买房了,是别人开发的商品房。房间有112平方米,一层是一个门市。现在只交了4万元定金,马上又要交5万元的预付款,等拿钥匙的时候就付清全部的款,一共可能需要15万元左右。钱不够的话,就只有向亲戚朋友借钱。买房的目的主要是小孩,村里的路不好走,很多地方都不方便。我想再干两年之后如果可能就回到镇上去,想做生意,但是具体做什么现在还没想好。”

何玉清想回镇上去带孩子

王福连的爱人何玉清是贵州人,25岁,初二的时候贪玩就辍学了。18岁开始出来打工。她告诉我:

“2004年的时候认识他的,是在外面玩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我爸妈不同意,他家里同意。现在父母当然都同意了,小孩都5岁了。两人回过贵州三次。那年雪灾的时候带着小孩回贵州,背着小孩走了一整天,运气挺好的,遇到几个大学生一起,他们帮忙背小孩一起走,也觉得挺开心的。”

2005年生小孩,不过小孩一岁多的时候才办结婚证,主要是因为小孩要上户口。怀孕之后有一年没有上班,小孩在东莞生的。生小孩的时候没有花太多钱,找了一个接生婆在家里生的,那个接生婆是老乡介绍的,大家都找她。本来讲好是300元钱的,但是后来接生婆看到是男孩,就要收600元,只好给了600元钱。在家里生的原因主要是花钱少,如果去医院的话生个小孩就要花几千元,如果是剖腹产的话就更多了,需要七八千元钱。生小孩的时候婆婆在这里侍候,小孩三个月的时候就由婆婆带回老家去了。现在有两年

多没见过小孩了，一是因为路费贵，来回至少就要花一千多元，二是厂里也不好请假。

打算镇上房子装修好之后，一个人回去带小孩，让小孩在镇上上小学。小孩现在在村里上幼儿园，一学期275元。现在经常会给小孩和老人打电话，一个星期都要打好几次，我喜欢打电话。家里老人和小孩都经常生病。也想过把孩子接到这里来上学，但是这里的生活费用实在太高了，小孩在这里上学也很贵。老人不愿意在到这里来，一个是不习惯，还有就是她担心她来广东老房子就倒了。老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的，是土房子，有五十年左右了，快要倒了。

如果现在有钱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主要是想有一些本钱，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做生意。房子底下是门市，楼上就是套房。开发商和政府合作搞的。房子的产权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政府让开发商做一些公共设施，所以到时候产权应该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听说在镇上买房办房产证之后，农村的地就要收走。不过现在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等以后才知道。我们镇子很小，主要是农业，没有任何工业，到县城都需要三个小时左右。”

宋金英想继续住在村子里种地

王福连的母亲宋婆婆54岁了，没上过学。她是这样描述她的生活的：

“孙子才5岁，每天上村里的幼儿园。早上七点左右我送他去学校，等老师到了之后就回来，下午一点多又去学校接。周末在家的时候如果要到地里干活就带孙子一起去地里。

小孩不想妈妈，只想爸爸，因为妈妈打电话比较少，爸爸经常会打电话。小儿子本来想让我去广东，这样小孩也可以在那里读书。我主要担心和儿媳的关系处不好，所以怕麻烦，自己待在村里还好些。不知道明年小儿子要不要回来装修房子，如果装修好了，自己也不想去镇上带小孩。让小孩的妈妈自己回来带小孩。自己在村子里还可以种一些菜或者是粮食，这样他们吃

的就不用钱去买。

现在住的土房子还是父辈留下的。其实砖墙要比土墙热一些，现在没有人建土墙了。房子以前会漏雨，去年大修了一次，将很多坏的瓦换掉了。一共花了三百元左右。”

二、生活是不确定的

一般来讲，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很多变化，有些是主动的，有些是被动的。中国社会快速变化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潮，在“城市待不下，农村回不去”的情况下，打工者的生活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包括：工作不稳定；居住地点不稳定；孩子何去何从不稳定；年轻的母亲要选择陪伴年幼的孩子还是外出打工；看不到发展前途但是仍然在迷茫中挣扎；等等。

1. 重要的不是首要的

在聊天中，很多工友会告诉我：孩子最重要、自己辛苦打工也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但是从打工者的现实生活状况来看，很多打工夫妻把孩子留在老家常年不能和孩子团聚和照顾孩子，很多打工夫妻即使把孩子带在身边也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所以这是很矛盾和纠结的，打工者不能做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事情，结果是，孩子是打工者思想和情感上认为的最重要的东西，但在行动上打工者给予孩子的时间却是最少的，对大多数打工者家庭来讲，打工挣钱养家和盖房是首要的。

2010年11月10日，我在东莞访谈了在那里打工的刘珍兰。她1984年出生，26岁了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丈夫29岁。他们有一个儿子，4岁，在新民镇由珍兰的爸妈照顾。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纠结和不确定：

问：你觉得现在什么对你最重要？

答：现在就是孩子最重要，我现在心里面想的都是孩子，等他大一点了，应该会好一点。

问：听你嫂子说，你准备打工到春节前然后回去，这次回去之后想在当地找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就不再出来了，是这样吗？

答：对。但是如果想把房子修起来了，就还是要出来的，因为外面的工资高一点。

问：如果是一个月存一千元，一年一万元，十年十万元。是不是需要再出来打工十年，最后就可以安心的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了？

答：看现在这个情况是要不了十年的，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挣钱的，我老公也会的。

2011年年初，我对珍兰的情况进行了后续跟踪，得知，珍兰春节过后没有留在家照顾孩子，又来东莞打工了。

2. 计划赶不上变化

工友心里对生活和工作都是有想法和期望的，但是现实条件很难满足这些愿望的实现，甚至相去甚远。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即使有想法和计划，那也是在将来；眼前有计划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自己无法逾越客观条件的限制。

2010年11月11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程云。她老家是贵州的，37岁，高中毕业，打工15年了。丈夫32岁，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新民镇惠民村。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东莞，丈夫在工厂打工，程云带小孩的同时帮助房东做房管挣点儿钱。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面对未来的种种矛盾和不确定性：

问：你们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呢？

答：我的生活向来都是计划不如变化，每次都有计划，但是……

问：就是可能会变，但现在有什么计划呢？

答：计划没有什么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能继续打工就继续，如果打工不下去的话，就回去种田。

问：你会种田吗？

答：谁说我不会的，可以说只要我愿意去做的话，我就可以去做。

问：你觉得20年以后，你会住在哪里呢？

答：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啊！如果顺利的话，我会住在城市，如果不顺利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住在农村了。

问：什么地方的城市？在哪里？

答：就是我的老家，遵义。我个人认为还是不想回到山区农村的。首先就是从教育的方面，偏远山区的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3. 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打工者在城市很难落脚很难扎根，但是需要在城市谋求发展和需要打工挣钱来维持生计。打工者的工作、思想、消费观念城市化了，但是打工者的工资待遇、生活环境和社会保障没有城市化。一方面，一些打工者抱着终归返乡的想法不放；另一方面，急功近利的企业和社会政策不想承担打工者的社会成本。打工者现在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

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各不相同。在东莞打工的陈满贤刚在重庆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为了买房子向亲戚朋友借了10多万元，所以她必须继续在城市打工。在重庆打工的喻格说她既不打算在村里盖房也不打算在镇上买房，因为她不会回去住，她也不认为自己的女儿们有一天会回去住，虽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打工一辈子在城市也买不起房子，但她还是要在城市立足。在东莞打工的熊大义在重庆老家已经买房子了，他在外打工多年也一直买了社会保险，他希望能够继续在城市生活，但是如果不行，回老家也得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

陈满贤的故事

2010年11月14日,我访谈了在东莞打工的陈满贤,她是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34岁,19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她告诉我:

“今年(2010年)10月刚买了房,在吐祥镇买的,一共花了二十二万元左右,除了自己的钱之外,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自己有十几万,其余的都是向别人借的。以前我妈不想我嫁到外面,所以不让我出来打工,直到订好婆家之后才让出来打工。现在虽然嫁得很近,离婆家只有几分钟路程,可也是十来年没有见过妈妈了,因为一直没有回去过。直到今年才回家见到自己的妈妈。嫁到婆家已经十三年了,只回家里过了两次春节。如果有条件的话,我想现在就回去,只是不知道回去以后干什么。现在新房旁边有很多人在卖小吃,做生意的人太多了,所以小生意也不好做。”

喻格的故事

2010年9月6日,我访谈了在重庆打工的喻格。她是重庆洪湖人,1975年出生,35岁,丈夫也是重庆人。她们有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8岁。夫妻在重庆市打工,和另一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两个女儿在农村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她说:

“重庆这地方消费很高,如果想有自己的房子,对我们打工族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期望。我现在租的这个公寓是旧房,如果买下来差不多要35万左右。35万!我们可能一生都赚不了这么多钱。有一句话‘计划没有变化快’,你怎么计划?!变化来了还不是一场空!像现在的房价,本来计划一年存一万,或者一年存五千,多少年之后可以买一个房子,到时候房价一涨,什么都泡汤了。我们还没有想过在老家盖房子,盖了也是我们老了以后才去住,现在没什么用处。我不羡慕盖了房子的人。不要说在农村老家盖房,就是在镇里面买房我都要考虑一下。不要说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手里面有那

么多钱,现在叫我用十万二十万在镇上买一套房子,我也不会买。买了有什么用?!在那里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没有。在这里,不管环境好还是不好,我要在这里立足。”

熊大义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故事。下面熊大义的故事给人的初步感觉是他城乡之间可进可退,但是如果仔细看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游刃有余主动选择的可进可退,而是无奈之下的两手准备。但是,这毕竟比进退维谷要强很多。

熊大义(男)36岁,小学毕业。有两个女儿,在老家县城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妻子和他一起在东莞打工。他们2005年在县城买了房子,孩子和老人就住在那里。提到未来的打算,熊大义说道:

“我们打算先将两个女儿抚养长大,让她们自己可以挣钱了,我现在养老保险也买了这么多年了,到时我可以回村子里种地。要说问想待在哪里的话,还是老家比城市好,在这里我们始终外地人。不过现在这里的本地人没有以前那么歧视外地人了。对于未来的打算,也不是很担心,反正现在养老保险也买了这么多年了。加上我们村子里也还有房子和地,所以到时实在没办法也可以回村子里。”

附录:打工者买房和盖房情况的统计

表 26 在东莞打工、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农村的工友的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谁	打工情况	买房情况
刘珍兰,女,26岁	外出打工10年了,现在在东莞一家鞋厂打工。	娘家父母在老家新民镇上给买了块地基,现在挣钱,准备贷款盖房。
粟茉莉,女,27岁	11年前就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东莞和丈夫一起,丈夫上班,自己在家带小孩。	正在挣钱准备盖房或者买房,在哪里盖、在哪里买还没有定,觉得以后会在贵阳生活。

续表

谁	打工情况	买房情况
王佳,女,30岁	12年前开始外出打工,现在在东莞一家日资企业工作。	婆家父母在丈夫老家新民镇上给买了块地基,自己不想盖房子,因为觉得以后不会住在那里,但是婆婆和丈夫希望在那里盖房。
刘海涛,男,29岁	外出打工13年了,现在在东莞打工。	老家没有人了,没有盖房也没有买房。希望将来回重庆,但是未来的事情说不好。
程云,女,37岁	打工15年了,现在在东莞,丈夫打工,自己带小孩同时帮助房东做房管挣点儿钱。	没有盖房也没有买房。希望将来回遵义。
王力,男,37岁	打工有20年了。刚从东莞回到老家尚稽镇。	打工期间受工伤,2010年用工伤赔款在尚稽镇买了房子,买房花了15万元,装修花了2万元,欠了6万元的债。

从上表看,所访谈的6位工友中只有一个工友买了房子。

表 27 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工友的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

谁	打工情况	买房情况
陈满贤,女,34岁	外出打工14年了,现在她和丈夫一起在东莞打工。	2010年10月在老家吐祥镇买了房。一共有四层,一楼是门市,上面三层住人,一层有八十平方米左右。一共花了22万元左右,自己有十几万元,其余的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王福连,男,30岁	打工10多年了,现在和妻子一起在东莞舒雅厂工作。	2009年12月在镇上(奉节县青龙镇)买房了。房间有112平方米,一层是一个门市。现在只交了4万元定金,马上又要交5万元的预付款,等拿钥匙的时候就付清全部的款,一共可能需要15万元左右。钱不够的话,就只有向亲戚朋友借钱。
王东,男,46岁	外出打工18年了,现在和妻子一起在江苏拆房。	2010年在青龙镇上买了房子,花了15万元左右,如果装修的话,可能要再花一些钱。

续表

谁	打工情况	买房情况
王开山,女,36岁	外出打工17年了,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东莞打工。	2005年的时候在奉节县城买了房,那时包括装修才花了八万元左右,80平方米左右,现在房涨价到20万元左右。村子里的房子6000元卖给同村的人,不过留了一些地和两间房。
王开岭,男,37岁	外出打工17年了,现在夫妻两个一起在东莞打工。	是入赘的女婿。2010年在妻子老家重庆市万州区买了房,100多平方米,一共花了19万元。现在才交了3.5万元,以后按揭,现在每个月需要交房款3000元。
王福兰,女,37岁	外出打工17年了,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东莞开一家快餐店。	1998年的时候花了5万元钱在青龙镇上买了房,当时向别人借了一些钱。
冉明艳,女,40岁	生了孩子以后就一直生病,无法工作和劳动。一直靠丈夫打工维持生活。去年和丈夫一起来到东莞,丈夫在外面上班,自己拿货在家里做点儿手工。	2004年在村里买了同村人的房子,花了2万元,又花了1.6万元装修。不过现在很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王开香,女,43岁	以前和丈夫一起在外面,丈夫打工,自己照顾孩子。后来自己在东莞打工,丈夫在家种地养牛,有8年了。	2000年在老家的山上盖了房子。现在正打算在镇上买房。

从上表看,所访谈的8位工友都有房了,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2位在村子里买了房子或者建了房子。

表 28 东莞某厂某车间工人买房和盖房情况统计(N=34)

(整个车间有34名员工,男性16名,女性18名,平均年龄30岁,全部已婚。)

	人数	比例
在深圳买房	1	3%
在老家的镇上或者市里买房	7	21%
在老家的村里盖房	12	35%
无房	14	41%

(资料来源:根据2010年工友王佳对她所工作的厂子的某车间的调查)

第十二章 社会的断裂

在隔离的社会里——这种隔离可以是指城乡间、区域间或者国家间的——社会差异不会产生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本研究创造了“精神臆化”这个概念,意思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是他的归属感和精神却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间里,但是维持这种状态的精神支柱却在另一个空间里;维持一个人现在状态的动力来源于通过这个状态不可能实现的一种臆想),因为人们是通过个人经历的纵向对比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比如在农村,当我问五六十岁的人对现在生活的感受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可以是:“现在好,交通好了;生活好了;也很自由,想种什么庄稼就种什么,想去什么地方就可以去什么地方。”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回答:“过去大家平等,可以相信东西的质量和价格,现在什么都不能相信了。”在这样的回答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随着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变化及对个体的影响。

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生活在城市中产阶级住宅区里的富人开着车、住在优雅的居所里;同样在这个社区里还住着保姆、保洁、保安,他/她们提供各种服务,但是住在地下室或者拥挤简陋的宿

舍里。这时候打工者的感受不是来自和农村老家的对比,而是来自和眼前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人的对比。在同一个空间却生活在巨大的差异中,这样的社会差异直接产生社会的断裂并导致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人生活在分裂的状态中,这是社会的症疾,而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在2002年提出“断裂的社会”这个概念,^[1]他指出:“一个断裂的社会,并不是仅仅使社会断裂成两个部分,而是断裂成多个部分。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本章的前两节描述和论述社会断裂对打工群体的直接影响;后两节论述的是为什么社会断裂导致打工者从物质生活到精神归属的迷失。

一、三代人三个世界——王开力一家人的故事

2011年11月15日,我们在东莞拜访了王开力(父亲)、冉明艳(母亲)、王涛(儿子)一家人;2011年11月21日,在重庆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我们拜访了梁延青老人(王涛的祖母)。可以这样归纳这一家的三代人:

第一代是纯粹的农民:梁延青72岁了,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最远只去过镇上,不习惯也不愿意去城市生活。过去的一些年,她一直帮助照顾孩子的孩子。现在这么大年龄了还在做力所能及的农活。

第二代是在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王开力和冉明艳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农村老家的房子成了空屋。他们认为只有老了干不动了的那一天才会回到老家的空屋去养老。

第三代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王涛辍学后就外出打工了,没有在农

[1] 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资料来源于360doc个人图书馆网站,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104/14/16099_318139.shtml。

村生产和生活的经历。他的工作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和个人各种条件的限制下,王涛意识到了自己实现城市发展之梦的艰难,但是这不会阻碍他继续在城市打工和生活。

从上面三代人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生产方式对生活方式的影响:(1)农业生产在科技进步的帮助下进入了可以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投入而获得农业高产的时代(同时随着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危机),这就使现在农业可以由少数人和老人来维持。(2)科技的创新和人们对各种办公用品、生活消费品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工业区和庞大的工人群众,也制造了打工群体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带来了王开力一家三代人的巨大差异。

王开力的大家庭的整体情况

梁延青老人72岁,丈夫十多年前喝农药自杀了,自杀的原因是生儿子的气。他们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

大儿子就是王开力,46岁。外出打工以前在老家挖煤,一直干了十多年。2004年煤矿倒闭了,所以才出外打工。梁延青老人帮老大家带过小孩,就是说照顾过王涛。

二儿子44岁,去广东打工一共有六七年了,现在他们一家人都在广东惠州打工。二儿子刚出去打工的时候,梁延青老人也帮忙带过他的儿子,前年二儿子的孩子不再读书,也出去打工了。

三儿子去世了,去世前在镇上买了房子。也帮忙带过他的孩子。

小儿子也在广东,现在三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有老婆。小儿子和老人没有分家,家里一般的开销都是小儿子寄钱回来。其他的儿子全都分开住了。买化肥的钱都是小儿子寄钱的,具体的钱数不一定,化肥一年要600元左右,加上种子之类的一年一共要一千多元;生病一年可能需要花几百元钱。家里的电视和洗衣机、摩托车之类的东西都是小儿子买的。小儿子每年春节时会

回来看看老人家,一般会在家待一个月左右。

女儿嫁到山东,前年回来过一次,有时也会给老人寄点钱。

王开力的妈妈梁延青的情况

说到老人现在的生活,梁延青说:

“我现在种着一亩多地和五分左右田,都是自己在种,平时也请不到人,所以就只有多买一些化肥,这样就可以省力一点,就不用挑粪便去地里。以前种地不用什么化肥,主要是将猪的粪便挑到地里去。因为现在村里都是老人,没办法请人,只能是自己慢慢种,没有力气种了。一个月需要开销一百多元到两百元左右,买面、米和支付电费之类的。

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会一直待在村里。我一生去得最远的地方就只有镇上,以前丈夫在世的时候一年可能只会去镇上一次。我没有上过学,那时女的不会让读书的,也没有什么学校。解放后,生活方面变化很大。解放以前经常吃不饱,生活很苦,吃树皮。以前有过大集体,那时也吃不饱。由于家里孩子太多,一直生活都比较艰苦。生完最小的孩子之后(70年代末),生活才慢慢地变好一些。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整体的生活、交通和政策都好了很多。现在国家不用收农业税,而且一年会退回80元左右。一年有600元的低保。我觉得毛泽东让所有的人民解放了(老人家的墙壁上贴着毛泽东的像),这让我们大家感觉很好,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十几年前建的,那时小儿子和四儿子一起建的,小儿子花钱盖房,一共可能花了三万多;四儿子出钱装修,花了两万多;所以一共花了六万元左右。不过现在非常后悔,不应该建,应该在镇上买房子,这里的房子也卖不出去,即使有人买,也最多只能卖一半的价格。”

王开力的情况

王开力46岁。见到王开力的时候已经快晚上9点了,他刚刚加班回来,他每天晚上要加班到8点半左右。他告诉我们:“我只上到小学4年级,辍学

后就在家种地。从1994年开始在家附近的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的时间。2004年的时候，煤矿倒闭才没有做了。那时住在家里，一般是早上7:30去上班，下午4点回。工资是按照产量计算。1994年的时候，一个月500元左右，到2004年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到2000元。一般都会天天去，有事情的时候可以不去上班。由于那是以前三峡监狱的煤矿，以前都是服刑的人挖煤，后来这些人撤走之后就由一些私人老板经营煤矿，都是不合法的，当时那种矿很多，全是我们本地的人在那里做。

“2007年的时候，我去了江苏拆房子，那时老婆跟我一起去那里了。因为买房欠债必须出外挣钱还债。去年（2009年）来到东莞。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可以挣一千三四百元，灰尘很重，每天上班需要戴口罩和耳塞。这间厂920元的底薪，加班费7.93元/小时，星期六、星期日就10元多一小时。去年在长安的厂子里周末加班都是按照1.5倍计算，从今年起才按照2倍计算。

现在这间厂也不会做太久了，找到合适的厂我就会转厂。我昨天去老乡那边的厂去看了一下，听说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是计件的。所以有机会想去那边做。具体什么时候去，我会再考虑一下。我要看看厂里的工作条件，比如高温、空气环境之类的。我还没有进到厂里看，但可以通过老乡打听得更加仔细一点。我昨天是去玩，只是顺便问了一下，想打听得更加仔细后再考虑转厂。昨天老乡说上个月上了22天班拿了2400元的工资。其实昨天本来打算去我堂弟（就是在塑胶厂当组长的王开岭，我们也对他进行了访谈）的厂看一下现在要不要人，可是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就没去他那里。现在周末都不用上班，现在厂里是淡季，不加班就没有什么钱，所以我就周末到处去看一下，现在就还要再看看。

以后应该不会住在（东莞）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房租一个月100元，房间太小，里面只能放一张床，人要是长

胖了在里面转身都困难，我们煮饭都是在外面煮的。如果租大一点的房，房租就会贵一些，我们在外面，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一个月煤气要30多元，再就是水电费一个月需要交20多元左右。然后就是两个人的生活费，需要1000元左右。我中午在厂里吃饭，晚饭一般会回来吃。其他的开销就没什么了。”

冉明艳的情况

冉明艳40岁。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东莞出租房的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她说出租屋太小，只能放下一张床，外面地方还大点儿。屋里很暗，白天在屋里干活也需要开灯，白天在外面做可以省电。她告诉我：“我的身体一直都很不好，是当年生孩子留下的病。我现在坐久了或者是站久了都不行，包括睡久了也不行。我现在也没有进厂，主要就是拿一点手工活在家里做，帮家里人做饭。我现在做手工也做不了多少钱，做手机上面的挂件，一天如果做2000个才可以挣14元，一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元。

“2004年在村里买了同村的人的房子，花了两万元。家里就只有一间房，实在住不下需要买房，所以就买了同村的房子。是同村的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所以就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了，我们又花了一万六装修。不过买了现在也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现在就是用锁锁着的。我们现在还欠了一两万元的债没还。那年我们本来存了一万七千多元，当时儿子在家读书拿了七千元回去，剩下的一万元我在江苏做手术用光了。

以后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房子根本买不起，迟早还是会回老家。”

王涛的情况

王涛1991年出生，19岁。他告诉我：

“上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开始到惠州二叔那里进了一家五金厂，底薪才770元，周六加班不给加班费，平时加班也比较多，一个月下来有一千五百元左右，是个只有几十人的小厂。干了四个月就离开来到东莞了。”

在东莞，堂哥帮忙介绍进了现在的美泰厂，对这间厂还比较满意。厂里主要是生产芭比娃娃的，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两班倒，早上7:30到晚上6点下班。以前这间厂有一万六千人左右，现在只有八千人了，主要因为订单较少。每个星期日休息，周六要加班，有加班费的。

每个月没有给父母交钱，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之类的。现在我一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打电话一个月100多元。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以前是扣2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两百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七八百元。

我自己喜欢上海，想到那里发展，觉得重庆的气候不好，也不喜欢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自己想做生意，比如超市之类的。不过现在也没本钱，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

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美金七千多，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的，还有显示屏的。我没有觉得不公平，也没有办法，因为到处的厂都是这样的。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二、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悬殊的收入差距

收入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质量，但收入水平是一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之一。下面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不同群体的收入状况。这个对比很

粗糙，因为数据的来源、统计口径和年度都有出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据所代表的趋势是正确的。这里以打工者月平均收入为1748元为对照（该数据是全国总工会《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1〕}中公布的统计数字），下面的就是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打工者的收入比农民的收入高出很多，拿我调查到的收入最低的一对四川农民夫妇来讲，每人的月平均收入是广东打工者月收入的2%；拿我调查的收入最高的河南的农村妇女来讲，她一个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广东打工者月收入的三分之一（27%）；

- 深圳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3倍到7倍；
- 上海外企管理人员的工资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10倍到33倍；
- 央企高管的收入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18倍到25倍；
- 国企金融高管工资是普通打工者收入的95倍到3154倍；

在中国流行一种意识，好像市场经济和竞争就会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所以人们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通过刘植荣的分析，^{〔2〕}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确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1. 农民的收入

根据本书2010年的农户调查：

- 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农民仇先生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6亩多田地，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540元，这是夫妻二人共同劳动的结果。
- 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农民余先生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3亩多田地，这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810元，这是夫妻二人共同劳动的结果。
-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农民李月清家2009年到2010年种了4

〔1〕“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资料来源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门户网站，载 <http://www.acftu.net/template/10004/file.jsp?aid=83875>，访问日期：2012年3月31日。

〔2〕刘植荣：《85%的人应该涨工资》，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版。

亩多地,这一年下来的纯收入是 5758 元,李月清的丈夫常年外出打工,农业生产由李月清一个人承担。

2. 打工者最低工资标准

表 29 各地打工者 2011 年最低工资标准对比

	工资(元/月)	较去年同期的变化
江苏	1140	+19%
上海	1280	+14%
重庆	870	+28%
浙江	1310	+19%
广东*	1300	+18%

*:不包括深圳

(信息来源:渣打银行,Shai Oster,“中国工资上涨终结全球低通胀时代”,2011年5月9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页)

3. 深圳各类型企业平均工资情况

2010年11月,job88市场调研对深圳400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了调研和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了2010年深圳企业的工资情况,发表了《2011薪酬调查报告》:^[1]

- 总监平均(月)工资:11355
- 经理级平均(月)工资:8675
- 主管级平均(月)工资:5516
- 员工平均(月)工资:3404

4. 外企管理人员收入

每日经济新闻网2007年5月18日公布了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太和顾问”发布的“2006~2007年中国薪酬分析报告”的部分结果,结果显示,上

海的整体薪酬水平依旧全国最高。^[1] 在上海的外企中:

- 总监层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8万~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1.5万~69.2万元,月平均工资5.13万~5.77万元)

- 高级经理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4.6万~5.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5.3万~41.5万元,月平均工资2.94万~3.46万元)

- 中层经理的全年现金收入平均达2.7万~3.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0.75万~24.75万元,月平均工资1.73万~2.06万元)

5. 央企高管平均年薪

有资料显示,2004年至2007年,国资委监管的央企高管的平均年薪分别为35万元、43万元、47.8万元和55万元,每年增长14%左右。国资委统计数据指出,2006年直属于国资委的149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平均薪酬为53.1万元(月平均3.22万元);^[2]

《京华时报》2011年5月9日报道,能源企业中的中海油员工均薪38.67万元(月平均3.22万元),高管均薪460.5万元(月平均38.38万元)。

6. 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

2008年年中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身价排行榜”显示:^[3]

-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董事长以6616.1万元年薪位居榜首;
- 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董事长分别以2285万元、1748.6万元年薪名列二、三;
- 其他国企金融高管年薪也大都都在200万元左右。

[1] “上海薪酬水平全国最高 外企经理年收入超20万”,资料来源于新浪网页,载 <http://tech.sina.com.cn/it/2007-05-18/08331514097.shtml>。

[2] 李荣融:“央企高管年薪并不高 平均60万元左右”,资料来源于新华网,载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1/09/content_12782173.htm。

[3]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排名公布 马明哲身价最高”,资料来源于网易新闻,载 <http://news.163.com/08/0529/08/4D3MP84K000120GU.html>。

[1] “2011薪酬调查报告”,资料来源于百度文库,载 <http://wenku.baidu.com/view/ec9c3903de80d4d8d15a4fc8.html>。

7. 世界工资研究报告

刘植荣在他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中详细罗列了中国工资水平和世界工资水平的比较,他说:“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1〕报告显示:

- 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 GDP 的 25%,世界平均值为 58%;
- 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 21%,世界平均值为 50%;
- 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6 倍,世界平均值为 2 倍;
- 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 98 倍,世界平均为 5 倍;
- 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 3000%,世界平均为 70%。

三、生活由“当下”决定

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应该由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而决定,而不是一个人从哪里来或者老家在哪里来决定。如果社会不遵循这样的原则,那么就会导致移民人口的发展困境。下面用两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从时间和空间上都要由‘当下’来决定”。

粟茉莉的故事

2010 年 11 月 11 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粟茉莉。她是贵州遵义县人,1983 年出生,27 岁,16 岁开始出来打工。她丈夫 28 岁,中专毕业,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技术员,工资两千多元。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儿子 5 岁,小儿子 1 岁。大儿子由农村的婆婆照顾着,粟茉莉现在在东莞带小儿子,她准备孩子大一些后也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能够继续打工。说起刚出来打工的日子,粟茉莉告诉我:

〔1〕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 32 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资料来源于共识网,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jij/article_201001206313.html。

“刚开始爸爸妈妈不让我出来打工,说是我年纪太小了,但是我还是出来了,那是 1998 年我 16 岁。就来了东莞,进了一个玩具厂。工作是村子里一个姑姑给我介绍的。她已经在那儿工作了,然后把我带去。一共在那里工作了六年。记得我刚刚来的时候工资特别低,加班费一个小时才 1 块 1 毛 1。那个时候加班特别多,都没有什么休息的时候,中午吃饭只有 15 分钟,晚上都加到两点,一个月可以挣七八百。现在好了,还有星期天什么的。这 6 年工资慢慢涨上去了,2002 年加班费涨到 1 小时 2 块,2004 年离开那个厂的时候工资差不多 1000 元钱。底薪涨了一点,涨到 540 元,开始都没有底薪的规定,就是说一天 11 元钱。

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是蛮节约的。我记得刚来的时候,白天不在厂子里面吃,我就吃五毛钱的油巴。我还买了十五块钱一箱的泡面,然后我就天天吃泡面,吃得脸都肿了。那是刚开始的一个月。后来发现那样是不行的,晚上还是蛮累的,有一次上班的时候就晕了。第二个月我就在厂子里面吃了。

不加班的话,连自己的生活费都不够。只有加班多,才有钱的,一天才几十块钱。那个时候我每个月给自己留两百元,剩下的都寄回家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周围的姐妹也都是这样的。到了我快结婚的时候,就是 2003 年吧,就开始自己会留一点儿,但最后也没有留下什么,就是花光了,不知道花哪里去了,自己也剩不下什么钱。

现在房租每月 280 元。我们做饭用煤气,现在小罐是 47 元,大概可以用半个月。如果吃好一点,钱就是不太够的。有一次我老公发工资,发了两三千块钱,很快就花完了,就没有钱了,一直等着下次发工资,根本没有存钱。”

胡清的故事

2010 年 11 月 26 日,我在贵州省遵义县尚稽镇拜访了胡清一家人。胡清

1976年出生,33岁,上了3年学。丈夫37岁。两个人过去都在东莞打工,后来丈夫受工伤,用工伤赔款,两人在镇上买了房子。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9岁,儿子5岁。说起刚出来打工的日子,胡清告诉我:

“我是1996年开始打工的,我表姐在东莞上班,就是在东莞富竹山那里做,我表姐带我去的东莞。刚开始去的时候,工资好像是500多块,我连续干了3年,最后好像涨到1200块。那时候我要结婚了。

当时赚到500块钱挺满意的。那时候在家里经常半年都见不到钱。刚开始的时候,我都寄回家,自己只用几十块钱,当时都寄给我爸。一年以后,慢慢地就觉得出去时间长了,就想去享受一下。有钱了就去买衣服什么的,就是会花一点钱了。刚开始的时候,感觉钱放在手里还舍不得花一样。后来就很少给家里寄钱了。我们两个人有时候会出去玩,慢慢地就大手大脚地去用钱,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大量地去用钱,自己过得快乐就行了,就没有想到自己的爸爸、妈妈的事。也会想到他的爸爸、妈妈,会给他家很少地寄一点,我的爸爸、妈妈就不寄了。”

粟茉莉刚外出打工的时候不舍得花钱吃饭,每天吃方便面,吃得脸都肿了。现在如果一家人吃得好一些,丈夫一个月的工资3000多元很快就花光了。胡清刚出来打工的时候,觉得一个月挣500元钱很满意,钱拿在手里不舍得花,但是打工1年以后,花钱就开始大手大脚了。刚外出打工的时候,打工者衡量自己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时候是和家乡的情况做对比的,就像胡清说的,“那时候在家里经常半年都见不到钱”。打工时间长了以后,打工者就逐渐用当地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来衡量自己的状况了。打工者用此时和当地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来感受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程度,而如果社会和企业继续用农民工原来和老家的状况来衡量打工者的待遇,就会产生断层,就会产生诸多的失衡和社会问题。

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农村的老年人和迷失在城市的年轻一代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他们感受生活的态度和视角差别很大。老年人是通过个人经历的纵向对比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前面“三代人三个世界”一节对比了三代人的情况,在和梁延青老人的交流中,老人就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对比了大集体和改革开放。她的感受是:“现在的生活就很好了,整体的生活、交通和政策都好了很多。”在这样的回答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随着时间变化所产生的变化及对个体的影响。之所以在农村的老年人是这样感受生活,主要是因为,虽然社会开放了,但是他们仍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社会里,他们对外界的了解不是亲身体验性的,也不是亲眼所见的,而是通过媒体和道听途说来的,这种非体验性的信息一般对人的冲击不会特别大。

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一代就不同了。打工给打工者带来的不只是工资收入,而是整个视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打工带来了人口的高度流动,在打工过程中,各阶层的人群的接触也是非常频繁的。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前面一节对比了不同群体和阶层的收入情况,问题是这些人虽然收入和生活状况差异巨大,但他们工作空间是交叉的,有的情况下生活空间也是交叉的。这时候打工者的感受不是来自和农村老家的对比,而是来自和眼前这个生活环境中的人的对比。

下面的两个故事是在北京朝阳区皮村的两个打工者的故事,一个是木匠,将来的理想是自己开厂做老板;另一个是大学毕业生,将来希望能够找到一份高工资的工作。当老板、当白领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的梦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曾先生的故事

2010年9月9日,一位在北京工友之家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访谈了工友曾先生。曾先生20多岁,贵州人,初中毕业。以前在贵州跟着父亲办厂学技术也学办厂的经验。2010年随父亲来到北京皮村,现在在一家木门厂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没有休息日。月工资4000元左右,自己在外边租房,一个月租金150元左右。除去吃饭、房租之类的,一个月也还可以存点儿。平时也没什么事情,下班后就是跟同事打打牌、逛逛街、上上网,有时间来工友之家办的皮村社区图书馆看看书。

谈到未来,曾先生说:

“打工不是我唯一的选择,将来有条件了就可以自己办厂。资金倒不是太大的问题,主要是员工的素质问题。只要自己生产的产品好,就不怕卖不出去。我想在天津拥有自己的厂。现在自己还年轻,趁现在工作机会多积累工作经验、人际关系等。不过这个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对于未来还是充满期待的。”

小萍的故事

2010年9月11日,一位在北京工友之家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访谈了在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的小萍。小萍是大学毕业生。小萍来自内蒙古通辽市,1986年出生,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2010年7月毕业。她讲了自己短暂的打工经历:

“来北京之前在内蒙古那边做过保险推销员和幼师。做保险没有底薪,还要500元押金,只参加了一个月的培训就离开了;幼师实习期间一个月工资是800元,不包吃不包住,转正之后也就是1200元左右。今年8月来的北京,到现在差不多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在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现在自己的主要工作是“替班”,因为一共有6个互惠店,每个店的店员轮流休一天,这

样的话我们大家每周都能休息一天。在这边一个月工资1200元,管住不管吃,周六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机构吃饭,平时只能自己买着吃。现在主要的想法是先稳定下来,赶紧挣点钱把自己在学校申请的8000块的助学贷款还了。

其实毕业前我有过对以后美好的设想。可是在通辽接触的两份工作都觉得很不顺心。自己身边的同学在哪里的都有,比如有一个还在通辽,现在工资1500元左右;也有几个来北京的,一个月工资在2200元左右。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一份工资高一点的工作,自己在学校时考过一个初级营养师的资格证,平时有空也看看营养学方面的书,希望今后能够在这方面有所收获和成就。”

一个在高档社区工作的家政工告诉我:“我当然也希望住上洋房、开上汽车”;一个小包工头告诉我:“我的老板只抽顶级的中华烟,那样子太帅了,他就是我的榜样。我这辈子就希望能够拥有一辆宝马。”2008年10月,我们在深圳做过一个调查,调查中问及了工友对未来的打算,30名(其中25名是“80后”)工友中有一半说希望将来自己做老板、至少自己做小生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乡”,这很正常。但是,现实是“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

第十三章

打工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除去平时积累的调研和访谈,此次专项调研一共访谈了54名工友,其中30名男性、24名女性。这样的性别比例可以保证在讲述工友故事的时候,同时反映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在这里把女性问题和社会性别关系问题单独用一章来讨论,目的是希望我们在任何议题中都要关注性别视角。这个性别视角并不一定专指女性视角,也可以指男性视角,因为两性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方产生影响。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那么女性在这种城乡移民中更多的是迷失还是获得了可能性?还是两者兼有?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比以前好了呢还是糟糕了呢?这也许是一个无法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有些方面我们进步了,但是在有些方面又有很多问题,而且是以前未曾遇到的问题。我对温铁军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综观现状,我们看到了很多糟糕的情况,那么“最好的时代”指的是什么呢?也许指的是这个时代同时也充满了机遇和可能性吧。观察女性打工者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的时候,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

有这样一句话:“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衡量女性的进步与否。

第一,女性经济收入水平。如果女性没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丈夫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那么女性是不独立的。女性有了经济收入是否就是一种进步呢?应该说“是”;但是这还取决于女性对自己的收入有多大程度的支配权;而毋庸置疑,女性有收入是对收入有支配权的重要前提。

第二,社会交往的广泛程度。因为社会交往多了才能见多识广。

第三,婚姻自主权,但是其实这一点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

第四,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是女性最终获得进步和解放的关键。

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1. 婚姻观念和模式的改变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媒人介绍年轻男女相识,然后年轻男女“短暂”相处,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就订婚然后结婚了。结婚被认为是“完成人生大事”,婚姻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单位”和“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生活状态中,当家族和血缘同时也是生产、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核心时,这样的一种婚姻传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现在这个人口长期快速流动的时代,这样的传统正在面临冲击。

王永贵的故事

王永贵是河北人,31岁,妻子也在北京,他搞装修,妻子做家政工。他13岁就不上学了,开始打工。开始在饭店里,然后在建筑工地、接着修理摩托车、后来做装修。打工地点主要是在河北邯郸和北京。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谈到婚姻生活,他说道:

“结婚的时候没有领结婚证,年龄不到。在我们老家就是那个风俗,过了二十岁相亲就特别难了。二十不大吧,但是姑娘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嫁出去

第十三章

打工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除去平时积累的调研和访谈,此次专项调研一共访谈了54名工友,其中30名男性,24名女性。这样的性别比例可以保证在讲述工友故事的时候,同时反映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在这里把女性问题和社会性别关系问题单独用一章来讨论,目的是希望我们在任何议题中都要关注性别视角。这个性别视角并不一定专指女性视角,也可以指男性视角,因为两性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另一方产生影响。打工群体迷失在城乡之间,那么女性在这种城乡移民中更多的是迷失还是获得了可能性?还是两者兼有?

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比以前好了呢还是糟糕了呢?这也许是一个无法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有些方面我们进步了,但是在有些方面又有很多问题,而且是以前未曾遇到的问题。我对温铁军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综观现状,我们看到了很多糟糕的情况,那么“最好的时代”指的是什么呢?也许指的是这个时代同时也充满了机遇和可能性吧。观察女性打工者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角色的时候,我对这一点的体会尤其深刻。

有这样一句话:“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标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衡量女性的进步与否。

第一,女性经济收入水平。如果女性没有经济收入,完全依靠丈夫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那么女性是不独立的。女性有了经济收入是否就是一种进步呢?应该说“是”;但是这还取决于女性对自己的收入有多大程度的支配权;而毋庸置疑,女性有收入是对收入有支配权的重要前提。

第二,社会交往的广泛程度。因为社会交往多了才能见多识广。

第三,婚姻自主权,但是其实这一点对男性和女性都适用。

第四,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主性是女性最终获得进步和解放的关键。

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1. 婚姻观念和模式的改变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的传统都是媒人介绍年轻男女相识,然后年轻男女“短暂”相处,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就订婚然后结婚了。结婚被认为是“完成人生大事”,婚姻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单位”和“生产生活的共同体”。在相对封闭的乡村生活状态中,当家族和血缘同时也是生产、经济和社会交往的核心时候,这样的一种婚姻传统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现在这个人口长期快速流动的时代,这样的传统正在面临冲击。

王永贵的故事

王永贵是河北人,31岁,妻子也在北京,他搞装修,妻子做家政工。他13岁就不上学了,开始打工。开始在饭店里,然后在建筑工地、接着修理摩托车、后来做装修。打工地点主要是在河北邯郸和北京。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谈到婚姻生活,他说道:

“结婚的时候没有领结婚证,年龄不到。在我们老家就是那个风俗,过了二十岁相亲就特别难了。二十不大吧,但是姑娘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嫁出去

了,你娶谁去!都是这个习惯。谁家的父母不想自己家的孩子早成家,都是那种想法。谁家的姑娘她妈她爸不想给她找一个好的家庭,都想尽快找好。我19岁结婚,只比村里其他同龄人早一年。结婚之后也没有压力,吃老爸的,花老爸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照顾,我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看孩子。

如果有人问我幸福不幸福,那我先要问:什么叫幸福?我们那的风俗是,就是过不下去了,特别不开心也不会离婚,这是农村风俗,感觉离了婚非常丢人。我个人对她有一百二的不满意。如果说农村赶上北京这种风俗,结婚十个离婚就得十一个。”

胡恒建的故事

胡恒建是贵州人,1988年出生。爸爸妈妈都是四十几岁,现在家里就他这一个孩子,原来有个妹妹,9岁的时候得病没有及时治疗死了。胡恒建念到初二,上过技校。2003年技校毕业实习开始打工,在遵义干过快一年,后来就一直在东莞打工。2010年11月12日我在东莞塘厦见到了在那里打工的胡恒建。我们聊了很多,下面是我们关于找女朋友的对话:

问: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

答:没有。我打电话回去,我老妈总说,都22岁了,赶紧的。

问:22岁大吗?

答:是啊,我也觉得也不大。但是,在老家,跟我一个年龄的,还有比我小的都结婚有孩子了,一个同学的儿子都很高了,可以叫我叔叔了。这种压力你体会不了。

问:你说说你的压力吧,看我能不能理解。

答:家里的压力啊,要是让我说一个所以然来,我也说不出来。

问:那先凑合着找一个。

答:如果想凑合找一个的话,估计19岁我就结婚了。

问:你一直不找是因为想找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是吗?

答:随便凑合找一个的话,有什么意义呢。

问:在老家不是会有人提亲的吗?

答:老家的女孩子都跑出来了,现在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就出来打工了。

问:但是我好像听他们讲,老人都希望年轻人在老家相亲,比如春节的时候,不是吗?

答:有好多人春节的时候都不愿意回家。

问:为什么呢?

答:车费贵嘛。又挤,又贵。像我们坐汽车的话,要五六百块,我们平时回去的话,都要四百块。做火车的话,便宜一点儿,但要坐三天三夜,慢车,走一个站停一个站。

问:是不是因为女孩子比男孩子少了,所以不好找了?

答:要找一个差不多一点儿的。

问:自己满意的?

答:不是自己满意的,得志同道合的,说不到一起的话,也没用。

从王永贵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对妻子的不满意。从他的话语中,我体会的意思是:如果他是北京人,那么他早就离婚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北京人,或者因为他是农村人,所以他就不能离婚。也就是说,虽然王永贵已经长期不在农村老家生活了,但是在婚姻问题上,他仍需要遵守老家的传统。他这样做一定是因为农村老家对他仍然意义重大,否则农村老家的看法没有必要影响他在北京生活的决策。

从和胡恒建的对话中,可以体会到他的压力,同时可以感受到他对婚姻的态度。他认为婚姻的前提首先是爱情,用他的话是志同道合。他之所以在抵抗传统婚姻的压力,是因为他认为没有情感的婚姻是没有意义的。

2. 男女交往关系的改变

在人口流动和城市生活的冲击下,打工者从农村带来并保留的婚姻传统

正在受到冲击。当农村和老家仍然在打工者的生活中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婚姻传统的彻底改变也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超前于婚姻传统改变的是男女交往的过程。在传统模式下,虽然男女交往不一定会走向婚姻,但是男女交往的目的是走向婚姻。在打工生活中,这样的一个模式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打工男女交往后走入婚姻,但是很多交往后分手,还有很多的情况是:交往本身就不是为了走进婚姻。

陈若水的故事

陈若水是湖南株洲人,1980年出生,30岁,初中毕业。家里5口人,爸爸妈妈在农村老家,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在外面打工。陈若水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在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地打工有十多年了。2010年7月1日,我访谈了当时在深圳工作的陈若水。谈到他的感情经历的时候,他告诉我:“我看周围的同学朋友在外面交往了女朋友,回老家后就分手了,他们在一起几个月过得很开心,最后分手就分手了。我看到周围的同事建立恋爱关系的时间特别快,一两天就建立了,说分手马上又分手了。我才意识到对感情是没有必要那么认真的,从我自己身上看到人对感情的认识的变化过程。我后来也变了,变得不是那么单纯,也喜欢去控制别人的感情,用很难听的话就是喜欢玩弄别人的感情。我后来遇见一个四川的女孩子,在遇到她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喜欢她,但是又想控制她的感情,完全抱着一种玩的心态,不把感情当做一回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来去去很痛苦,后来很厌恶那个地方,我就想离开那里,就辞工了。”

二、女性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

下面讲了几个女性的故事:

●黄晴不想回家,觉得家里没劲儿;她觉得她不需要自己存钱,因为将来结婚的时候丈夫家会给彩礼钱。

●王艳华认为:女人一结了婚就是家庭,有了孩子就是孩子,感觉自己都是次要的。

●吴先生的妻子觉得上班辛苦只挣1000多元钱,婆婆照顾孩子,自己每天出去打麻将;

●王佳和丈夫两地分居,虽然结婚了但是双方都习惯了单身的生活,王佳想回家照顾孩子培养感情,但是婆婆和丈夫希望她打工挣钱盖房子;

●程云高中毕业,很有工作能力,为了照顾儿子不能做自己喜欢的教师工作,内心痛苦但是强迫自己安于现状;

●王开香是这些女性中年纪最大的,43岁。她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和自己要什么,她喜欢在工厂工作因为简单不麻烦,她不喜欢回农村老家,因为干农活累而且气候不好。她打工挣钱养活自己也支持着丈夫在老家养牛的投资。她说等老了干不动了的时候才回老家。

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对女性的影响,就像黄晴,虽然对外界充满了向往,但是传统性别关系角色的影响让她把自己定位为依赖者,这样下去她也必将成为一个依赖者。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工人、孩子和妻子这些多重角色冲突中痛苦挣扎没有出路,就像程云。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进入婚姻以后成为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柱,不仅要挣钱养孩子,还要挣钱盖房,就像王佳。这里最有独立性的是王开香,她自主选择在城市打工,挣钱给丈夫在老家养牛,而且丈夫让她回去她也不回去。不容否认的是,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为女性提供了可能性,提供了独立的可能性。经济独立是独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比如,对于王佳来讲,她虽然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她的思想是不独立的。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现状,它有很多糟糕的地方,有很多无奈的地方,让我们不得不做无奈的选择或者别无选择,但是它具备了一定的开放性,给了人们可能性。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来讲,女人要结婚要生孩子,必然导致在工作上 and 独立性上受到影响,那么男女平等到底有什么出路?

首先,我们希望女性能够有自己选择的可能性,由女性来决定是更多地选择事业还是更多地选择家庭;

其次,社会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社会责任并制定支持女性就业的社会政策,以便让女性可以不间断地就业;

最后,也会有女性进行极端的选择,就是当社会和家庭不给予女性足够支持的时候,女性选择不结婚或者不生孩子,那么就不用面临多重角色冲突的烦恼了。不过这种后现代选择在打工群体中还很少见。而且这种选择也许对实现男女平等有积极作用,但是对社会健康发展却很不利。

1. 女性仍保持着传统的婚姻观念

黄晴是河南省兰考县人,1989年出生,21岁。她父母在老家,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也都在外面打工。2010年7月2日我访谈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黄晴。说起相亲的事情,黄晴告诉我:

“我可能是出来习惯了吧,现在不想在家里待着,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待着特没劲。也不是说在外面有劲,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是不想在家待着。我爸爸现在一直催我回家,他说最晚到明年(2011年)的12月必须回家,过年之前就要把我嫁出去。现在在农村,因为男孩子多,女孩子少,说媒相亲都是媒人带着男孩子去女孩子家,让女孩子看,如果看中的话就再聊,看不中的话就走了。

现在我爸说不要我的钱了,但是我还是会给他钱的,因为我觉得我要钱没用,我现在用不着钱,而且我觉得我自己留着钱没什么用。如果我以后找婆家的话,人家会给一大堆钱的,那么多钱就够我用了,这是生女孩子的好处。现在在我们农村,如果一家有四五个女孩子的话,那人家就会觉得他们家发了,就是这样的,很多彩礼钱。然后说谁家如果有两个儿子的话,那就惨了。”

王艳华是河南周口人,30岁,离婚了,有一个5岁的儿子,放在老家。艳

华在北京一家商店做营业员。现在她又找到了意中人组成了新的家庭。谈到婚姻和家庭,艳华说:

“要找对象就要考虑他这个人负不負責任,他对孩子负不負責任,对家庭不负责任。我离婚以后开始不想找,原因就是涉及孩子。有了孩子,感觉自己都是次要的。现在我很幸福,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很好,走路都手拉着手。”

2. 女性角色和行为的多样性

和吴先生的交流

吴先生是重庆市洪湖镇蒲新村人,1974年出生,36岁。他1992年开始外出打工,先做了4年拾荒的活儿,后来挣不到钱就不做了。现在给运输公司打工,做的是装车,把小车装到大车里面,已经做了14年了。1999年结婚,有个10岁的儿子。我2010年8月底9月初的时候在重庆市长寿区洪湖镇坪滩村进行了走访,在农户走访过程中,我提到希望去拜访他们/她们在重庆打工的子女。后来我们从坪滩村回重庆市的时候,我们在村里拜访的坪滩村4组的小队长陈队长和余先生就陪我们一同去了重庆,陪我们访谈了他们的孩子。吴先生是陈队长的女婿。我们是晚上快9点到的陈队长的儿子和女儿家的。他们住在一个陈旧的高层公寓楼里,两家共用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算一下,陈队长的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子和外祖母一共有7口人住在这里。我们到的时候,陈队长的孙子和媳妇已经都休息了。陈队长的女儿出去打牌去了。我们是11点离开的,陈队长的女儿打牌还没有回来。和吴先生说起他妻子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爱人呢?

答:她在打牌,晚上娱乐打牌。

问:那她白天上班吗?

答:现在没有上班,以前上班。

问:以前做什么?

答:以前在超市打工。

问:现在为什么不上了?

答:她说工资太低了,等工资高了再去做。

问:工资多少?

答:有一千一二,她嫌太低了,又太累,自己觉得没有意思。

陈队长答:时间太长,主要是做销售的。

问:要做多长时间?

答:早上七点钟,晚上十点钟回来,十三个小时。

陈队长答:就是时间太长。

问:她上那个班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时间照顾儿子?

答:我妈妈在,我妈带孩子。

王佳的故事

王佳是贵州遵义人,1981年出生,29岁,初中毕业。她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到现在打工12年了。2008年10月结婚,第二年8月生了儿子。为了生孩子和照顾儿子,她请了1年的假。现在已经重新上班一段时间了。儿子由公公婆婆照顾,丈夫在县城上班只是偶尔回家看看儿子。2010年11月12日,我在东莞访谈了王佳,谈到家庭和婚姻的时候,她告诉我:“我现在在外面挺好的,虽然离小孩挺远的,我挺放心的,因为我公公很细心。我在外面的话至少我自己有自己的收入,我不会受到金钱方面的一些拘束。但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了,在家里他拿多少钱给我,我还要算一下我花多少钱,而且基本上钱都花在小孩子身上,我压根都没有钱买衣服。他也不会给我买衣服,也没有买过其他东西,结婚的那些衣服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访谈虽然过去了,但是我和王佳仍然保持联系,2011年2月17日和王佳在网上聊天,王佳告诉我她很想回去照顾孩子,增加和孩子的感情及对孩子的教育。因为没有资金,

自己不能创业,就不知道回去可以做什么。她本来打算做完上半年就辞工不做了,但是家里(婆婆与丈夫)希望她继续工作两三年。把家里在镇上买的那个地基(房子)建起来。

3. 女性在多重角色中的挣扎

程云老家是贵州的,37岁,高中毕业,打工15年了。在遵义工作过、在重庆和昆明教过书、在东莞的幼儿园当过幼师、也在东莞的工厂打过工。丈夫32岁,也是贵州人。他们有一个5岁的儿子。现在一家人都在东莞,丈夫在一个工厂打工,程云照顾孩子同时帮助房东做房管挣点钱。2010年11月11日,我在东莞见到了程云。谈起家庭生活,程云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2003年结婚的。2004年怀孕了,我当时在老家那边教书。2006年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我把孩子交给他奶奶,出来到东莞这里。我进了一家电子厂。进厂之前,我一个零件都不认识,那个管理人员给了我机会,他说我一个晚上必须把零件的名字都背下来,然后才决定是否要我。当天我搞到后半夜两点就搞定了,第二天就通过了。那个时候我没带孩子在身边,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只干了四个月孩子就病了,我就回去带孩子了。

在老家我去找幼儿园的工作,我没有幼师资格证,我告诉园长我有教学经验,他通过看我的言谈举止就接受了我。因为音乐方面我不会,我就教学前班的语文数学什么的。我在那个幼儿园做了快到两年的时间。

孩子2岁的时候,就是2008年,我带孩子来到东莞。开始我从外面拿货回家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找到一个学校去上班,那是比较大的一所学校,什么年级都有,从幼儿园到初中。我在那个学校的支教上班,孩子可以免一百元的学费。我自己带着孩子,晚上也要照顾他,很累,年龄又大了,精力也差。一用脑子就睡眠不好,睡眠不好,就影响很多的东西。在幼儿园上班需要学习新的东西,像学习钢琴,这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容易了。我儿子总是生病,上班经常带在身边,同事之间就有意见什么的。如果我请假的话,

一罚款就罚六七十块钱，根本就不划算，所以我干脆辞了算了。所以在那所学校的幼儿园也就干了半学期。

我现在也在工厂拿货出来在家里做。

今年(2010年)5月就遇见我以前租房子的房东，以前我跟他说过，如果以后别人不看他房子了，我愿意帮助他看，他就问我还愿意不愿意帮他看房子，我说可以，所以现在就帮房东看房子了，工资就是五百块。

那天楼上来了一个得忧郁症的女人，我觉得如果我想不开的话，我早就得忧郁症死掉了。现在就都想得很开了，就是看着自己的儿子，现在也没想什么了。”

4. 打工使女性独立成为可能

王开香43岁，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开始和丈夫一起在外面，丈夫打工，自己照顾孩子。后来自己外出打工，这样有8年了。现在在东莞一家工厂打工。有一个儿子，也在东莞打工。2010年11月14日，我见到了王开香，她告诉我：

“我就习惯在工厂里做，反正就那些事情，我今天做了五十元，明天我努力就做一百元。我挣的钱都是我老公要回去了，一年两万元都寄给他了，主要是他拿去养牛了。他家里很勤快，一个人种了五个人的地，自己家有三个人的地，还包了别人的地种，还养了两头猪，20头牛。我打算一直到外面干，到老了走不动了就回去。如果以后儿子找老婆生小孩了，就要回家带小孩，在这里带小孩的花费太高了。我出外打工十几年，现在已经不习惯家乡的生活了，每次回家待上一段时间就很想再出来。丈夫在家养了二十多头牛，很想让我在家一起发展养牛，可是我完全不想。以前在家一年到头根本没有什么钱余下，现在丈夫养牛的本钱全是我打工所挣的钱，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丈夫：‘不要让我留在家里，我每年会给你寄生活费和日用开销，但是我不愿留在家和你一起养牛。’”

第十四章

“用工荒”与新工人的形成

“用工荒”是企业、政府和打工者进行角力的一种表现，“用工荒”在有些地区比较严重，在有些地区并不存在；企业在和政府的角力中要强化“用工荒”的严重程度，以便获得政府的重视和优惠；企业在和打工者的角力中通过媒体宣传“用工荒”的严重程度，以便吸引打工者前来就业；打工者在和企业的角力中处于弱势，但是打工者的力量在于用脚投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改善用工环境。“用工荒”和打工者就业的不稳定是直接相关的，打工者虽然就业不稳定，虽然会不断换工作，但是打工者会继续在城市打工。“用工荒”现象告诉我们：一个就业虽然不稳定但是数量稳定而且在不断增长的工人群体已经形成。打工者也许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但是可以选择离开，这是弱者的武器，但是在运用这种武器的过程中打工者会加深作为工人群体的一种认识，这也是新工人群体形成的一个过程。

一、是否存在“用工荒”

阅读媒体报道的时候，口径是非常清楚的：中国存在严重的“用工荒”。

在进行工友访谈的时候,发现东莞和苏州的情况很不同。在东莞,工友告诉我,工厂里长年缺工;在苏州,虽然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工友反映不存在“用工荒”现象。那么到底是否存在“用工荒”呢?也许这取决于从哪个视角来看,和从谁的视角来看了。

1. 从企业角度来看,存在“用工荒”

自2003年有关于“用工荒”的报道开始,这个话题现在年年见诸报端。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的数据显示,^[1]广州目前(2010年)用工总量为683万人,缺工15万人以上,深圳市缺工20万人以上。佛山用工缺口高达28.3万人,较去年增长60%以上,劳动力供求情况由去年的1:1变为目前的1:3,一个工人对应三个岗位。

现在中部和西部也开始出现“用工荒”的情况,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这个现象我也在工友访谈中得到了一些印证。2010年11月我在东莞访谈了在那里打工的刘海涛,他在当地一家口碑很好的广德厂工作。他告诉我:“据我了解现在广东90%的企业都缺工,我们广德厂也缺工。现在管理人员都不能对员工随便斥责,因为要留住工人。”

2. 企业存在“用工荒”,但中国不存在“工人荒”

通过分析相关信息和报道,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很多企业的确存在“用工荒”,但并不是因为劳动量的供给减少了,也就是说虽然存在“用工荒”,但是并不存在“工人荒”。

[1] “求解民工荒的真相”,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315/15127567237.shtml>。

[2] “‘用工荒’蔓延国内各大城市 吹响产业转型升级号角”,资料来源于新华网,载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2/25/c_121121905.htm。

2011年3月2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十二五”期间就业市场总体看仍是“供大于求”。^[1]尹蔚民说,由于我国现在尚有一亿农民需转移就业,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还不会过去。我没有找到最新的全国总体情况的数据,但是从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农村外出打工的人数在增加。那么当有些地方或者有些企业出现“用工荒”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工人去了其他地方和其他企业,也就是说工人在流动。从全国情况来看,打工者在东部就业的还是占大多数,但是打工者从东部向中部和西部流动的趋势明显。

3. 在打工者眼中“用工荒”是“用工谎”

打工者说“用工荒”是“用工谎”的首要原因是,工友对薪金收入水平很不满意。按照“用工荒”的逻辑,如果存在“用工荒”,那么企业就必须通过涨工资等手段来吸引工人,但是实际上大多数企业没有这样做,所以工友推出的结论是“用工谎”。

我在网上查到太和顾问发表的“2011年度‘用工荒’现状调查”^[2],该报告共收集近270家企业(包括:外资、国有和民营)的反馈问卷,从调研反馈的结果看,企业在2011年的用工招聘过程中,几乎60%的企业只选择了小幅提升薪酬水平,而有1/4的企业今年的招聘过程中薪酬基本不变,只有少数企业(仅占14.8%的企业薪酬涨幅在20%以上)以较大幅度提高薪酬水平。

工友反映,工资的确有所增长,但是物价的上涨大大超出工资上涨的水平,所以实际收入水平等于没有提高。

4. “用工荒”是企业说给政府听的

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各地政府为了争取富士康在本地落户展开了激

[1] 尹蔚民:“劳动力供大于求 中国人口红利长期仍存”,资料来源于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载 <http://news.cntv.cn/20110322/101507.shtml>。

[2] 《2011年度“用工荒”调查报告》,资料来源于百度文库,载 <http://wenku.baidu.com/view/93b1c30b581b6bd97f19ea5b.html>,访问日期:2012年3月31日。

烈的争夺,这是因为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的落户意味着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拉动。《大河报》2010年8月11日的题为“揭秘富士康入郑路线图 各地争夺谈判近似肉搏”写道:[1]“以武汉为例,2007年4月,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正式奠基。仅过3年,在2010年上半年,武汉富士康出口就达到7.73亿美元,占到武汉市出口总额的将近1/5。”各地政府争夺富士康,富士康在与各地方官员的谈判中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让地方政府提供更优惠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压低运营成本。

从各地政府争夺富士康的做法,和富士康在当地落户后政府帮助企业招工的做法,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已经要挟了政府。这个时候,当企业们大喊“用工荒”的时候,那么政府为了留住企业、为了让企业“生存”,会进一步“让利”,让政府的利就是让工人的利。

企业的思维逻辑是:反正打工者无论如何都要出来打工,所以企业不愁招不到工人。这样的逻辑就促使和加重了工人的流动,所以出现“持续性用工荒”,因为打工者会持续流动以期谋求更好的出路。

二、“用工荒”的表现和原因

经过阅读和观察,我发现“用工荒”有三种形式,包括“脉冲式用工荒”、“春节前后用工荒”和“持续性用工荒”。造成这三种“用工荒”的原因有所不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持续性用工荒”,因为“持续性用工荒”反映的是中国整体用工环境的问题。

“脉冲式用工荒”

这种“用工荒”主要是由像富士康这样大型企业进行扩张导致的。当像

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进行扩张的时候,短时间内用工需求量剧增,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冲击,导致“脉冲式用工荒”。根据新华网郑州2010年8月29日的题为“富士康在郑州大规模招工致当地企业加薪留人”的报道,[1]富士康郑州公司厂区2011年年底达产后,用工规模在15万人以上,而整个河南省向省外输出的劳动力约为1千多万人。

“春节前后阶段性用工荒”

如果关注新闻报道,那么报道“用工荒”最集中的时段是春节前后,也就是说存在春节前后的“阶段性用工荒”。导致这种“用工荒”的原因是打工者虽然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但是不能在城市安居,而且很多打工者的孩子留在老家,这种家庭的不团圆导致了打工者在春节期间的集中返乡,从而导致春节前后的“阶段性用工荒”。

《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30日发表题为“刘易斯拐点还是中国拐点?拐点论困扰中国经济”的文章,[2]文中提道:“贺雪峰常年在基层搞乡村建设,这位总是‘站在农民立场研究问题’的学者认为,表面看民工‘年年荒’,其实只是春节才‘荒’。农民打工的工资并不随工龄增加而增长,甚至会随年龄增长下降——这时候回家过个节,再想一想,是否换个地方碰碰运气。当农民工还在家乡考虑要去哪里务工时,工厂却迫不及待要开工生产,‘用工荒’叫得山响,好像到处都缺工。实际上,随着节后农民工大量外出,‘用工荒’的企业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又将农民工当作机器对待了’。”

“持续性用工荒”

“用工荒”现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行业和企业中,当然严重程度会有区别。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用工企业的工资、待遇不能

[1] “富士康在郑州大规模招工致当地企业加薪留人”,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29/113820996395.shtml>。

[2] “是刘易斯拐点还是中国拐点 ‘拐点论’困扰中国经济”,资料来源于新华网,载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3/30/c_121245671.htm。

[1] “揭秘富士康入郑路线图”,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henan.sina.com.cn/finance/y/2010-08-11/15408845.html>。

留住工人,同时也由于工人应得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所以也有很多人称“用工荒”为“待遇荒”和“权益荒”。

本书的第一编第一章描述了打工者在城市工作的不稳定现状和工作不稳定的原因。打工者自己选择离开是工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被老板开除的情况也有,但是占少数。打工者跳槽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包括:被企业条件和工作性质所迫而离开的(工作条件差、劳动保护差、工作无聊);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为了谋求技术提升、为了谋求更好的待遇);道德的选择(觉得那个工作性质太没有良心了)。

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朋友给我描述了他对武汉富士康厂区几个突出的印象:一是在大门口看到很多人拉着箱子往外走,同时有很多人拉着箱子往里进;二是厂区里面应有尽有:心理咨询室、体育设施、医院、培训中心、商场等;三是宿舍楼下面都拉着网子,是用来防止跳楼自杀的。看到这些现象,我们不禁要问,富士康厂区有这么好的条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比其他企业要高,怎么还有那么多工人不断离开?怎么还有工人会去跳楼?究其根源,打工者不仅仅是个工人,同时是男人、女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他/她们有作为完整的人的各种需求。工厂里面的环境再好也是工厂,不应该成为工人生活的全部。“谋求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活”是产生“持续用工荒”的根本原因。第一编第一章里所阐述的“满意的工作不等于满意的生活”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三、“用工荒”产生的影响——工友体会到的 用工环境的变化

虽然打工者对用工环境很不满意,但是在持续“用工荒”的影响下,用工环境还是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工作比以前好找了

2010年11月13日我访谈了在东莞工作的刘海涛,他1981年出生,贵州人,技校毕业。在重庆、广州和深圳工作过,现在在东莞的广德厂工作,已经在这里干了3年了。他告诉我:

“我是2000年3月份过来广州的,我当时找工作找了半个月,骑着自行车到处去转。看人家有没有招工启事,问一下,进去的时候看一下,问一下在面上班的工资怎么样,上班的时间是怎样的。一般没有技术的话,男孩子做的是苦工,工资很低,时间很长。不像现在这样的,现在找工作的话哪里都好找,不管是哪个厂子。”

2007年,我到东莞这里来了,在广德厂(广德运动器材用品厂)上班,厂子做运动用品,这在华南工业区来说还是算大的。在这个厂快做三年了。现在工资2500元。相当于技术工,也不属于管理层。说实话我们那个厂里的管理不好做,像我们厂里基层管理还不一定有员工好,反正一个月下来不会低于那么多工资,管理层工资也持平,差不多,我们反而更好一些。压力没有那么多,现在的员工不好管理,这边现在缺人,你管得人家不做了怎么办!现在员工人家没有错误,你也不能开除。有的时候员工闹一下脾气,跟你吵一架。做管理有管理的好处,做员工有员工的好处,总体来说只要工资可以就可以。

我们厂现在就缺工,现在广东的厂90%以上的都缺工。流动性太大了,现在年青的一代,90过后的人更倾向于自由,进一个厂工资怎么样,或者老大大管得严,搞两天跑了,就是这样的,流动性强。”

用工年龄放宽了很多

在十多年以前,女工都很年轻,所以打工的女性被称为“打工妹”,现在这个称呼实在不能再代表这个群体了,因为女工的年龄跨度已经相当大了,很多女工已经30多岁,甚至40多岁了。在我访谈的女工中,年纪最大的是43岁。

从富士康招工的情况看,年龄也放宽了。比如:2010年江苏淮安富士康招工的年龄要求为22~28岁,而2011年为17~32岁;2010年太原富士康招工的年龄要求是年满17周岁,且不得超过28周岁,而2011年为17~35周岁。

招工对男性的性别“歧视”减轻

2010年11月13日我访谈了在东莞工作的刘海涛(简介同上)。他告诉我:

“2000年刚来广州的时候很多厂不招工,一般的厂招工的时候都不招男孩子。我找工作找了半个月,骑着自行车到处去转,看人家有没有招工启事。”

不过,这种招工对男性的性别“歧视”还继续存在,比如很多中介不收女性中介费,而男性找工作就需要交中介费。

管理层对待员工的态度好些了

2010年11月10日,我访谈了在东莞工作的刘珍兰,她是1984年出生的,老家在贵州省遵义县。珍兰从2001年开始在东莞的裕成鞋厂工作,进进出出几次了。她告诉我:“2001年第一次来到东莞黄江镇北岸村,那时周围都是荒地。我们厂主要做NB鞋。我刚到这里来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我的工号是8000多号。等到我2010年3月再来的时候,我的工号是107583。从2007年开始厂里的管理人员就很少骂人了。从2009年开始辞工的时候就不会再拖欠工资了,辞工也不会被推迟,厂子从那时起就一直处于缺工的状态。现在辞工的时候厂方都会尽力挽留。”我估计工人的工号代表的是厂子当时录用过的工人的总数,也就是说,来一个新人就增加一个工号。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这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工厂人员流动非常频繁的现况。

附录:富士康在中国的扩张版图回顾

富士康在中国的快速扩张是中国的幸运还是不幸?是打工者的幸运还

是不幸?富士康从沿海向内地扩张是内地的幸运还是不幸?富士康向内陆扩张是打工者实现回家乡梦想的机遇吗?分析中国的“用工荒”现象的实质,可以从富士康现象中看出端倪;分析中国产业转移的影响,可以从富士康现象中开始分析。

媒体对“用工荒”情况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我在搜索这些报道的时候发现,谈到中国打工者的情况就无法避开富士康。在搜索富士康的情况的时候,我发现富士康如此庞大,如果了解它的情况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解。在不断搜索富士康的全面情况的时候,我发现真正了解富士康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是如此的零散和间断。我花了10多天的时间,搜集了很多很多信息,最后把我认为相关的信息汇总到了下面的表格里,而且都注明了出处。通过对这个大表的分析,我得出了下面初步的几个判断:

(1)富士康用工人数在逐年增加,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仍将大幅度增加。从下表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趋势。另外,根据新浪网新浪科技2010年12月10日题为“富士康大陆员工数量突破100万”的报道:^[1]“12月10日晚间消息,富士康科技集团通路事业群董事长、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特别助理胡国辉周五表示,富士康在大陆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100万。胡国辉今年(2010年)8月曾表示,到明年(2011)年底,富士康员工数量有望增加到130万,而当时(2010年8月)为92万。”

(2)富士康用工人数的增加是因为其在内陆省份的产业扩张。从报道上看,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富士康在做从沿海向内陆的产业转移,因为其在江苏和深圳的厂区的用工人数并没有减少,但是其在内陆身份的投资和用工规模却大幅度上升。从在成都和郑州的投资和用工情况看,到今年年底富士康就将新增用工人数44万:

[1] “富士康大陆员工数量突破100万”,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tech.sina.com.cn/it/2010-12-10/21084969686.shtml>。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7月26日题为“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内迁之争落幕”的文章报道:^[1]“鸿海集团将投资富泰华精密电子(成都)1200万美元、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2000万美元、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2000万美元、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1200万美元”;另据报道,^[2]成都2011年6月份左右要完成富士康成都项目25万人的招工目标;富士康郑州公司厂区2011年年底投产后,用工规模在15万人以上。

(3)从富士康的招工信息来看,普工的工资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4)从招工条件的变化来看,富士康的确存在招工难的问题。从招工年龄的上限的提高就可以判断企业在放宽招工标准。举两个例子:

●2010年江苏淮安富士康招工的年龄要求为22~28岁;而2011年为17~32岁^[3]。

●2010年太原富士康招工的年龄要求是年满17周岁,且不得超过28周岁;^[4]而2011年为17~35周岁。^[5]

[1] “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内迁之争终落幕”,资料来源于搜狐新闻,载 <http://news.sohu.com/20100726/n273752561.shtml>,访问日期:2012年3月31日。

[2] “富士康成都招工25万人 薪酬不敌外省一半难留人”,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载 http://tech.ifeng.com/it/special/fushikangzhangxin/detail_2011_02/12/4638876_0.shtml。

[3] “[招工信息]富士康人事专员”,资料来源于中劳网,载 <http://info.chinalao.com/f78/77692/>。

[4] “2010年太原富士康招募”,资料来源于易登网,载 <http://taiyuan.edeng.cn/xinxi/33403731.html>。

[5] “太原富士康2011年最新招聘”,资料来源于河津588网,载 <http://www.hejin588.com/zhaopin/hejin/844-123295>。

表 30 富士康在中国的扩张版图回顾——富士康建厂、用工和招聘信息汇总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1988年在大陆落户	员工数:超过10万 招工信息:年龄:1985~1989年期间出生;基本工资:400~500元;加班费每小时5元 ^[1]	员工人数:近30万名 ^[2]		招工情况报道:富士康于春节之后紧急招聘了3000人,但近期已经不再招聘新员工 ^[3] 。2009年上交深圳市的税收就超过3亿元人民币 ^[4]	员工数:45万 ^[5] 招工情况报道:2月,节后用工缺口约5万人;2月24日一天求职者近万人。公司从大年初三开始招工,这两天出现了高峰。每天录用人数都达四五千人。 ^[6] 招工情况报道:8月中旬,拟招聘5万余人,将陆续推出118场专场招聘会。与年初火爆的招聘现场相比,此次招聘现场门庭冷落。基本工资将不低于1200元/月,通过三个月的考核后基本工资不低于2000元/月	招工信息:收入范围:2000~3000元/月;年龄要求:17~30岁;招聘人数:100人;加班费:平时10.7元/小时,周末14.28元/小时;节假日21.42元/小时 ^[7] 学历:初中以上
开始投资建厂				招工信息:年龄16.5~24.5周岁;男,身高1.65米以上;女,身高1.55米以上;视力0.8以上;初中文化以上;待遇:基本工资840元,综合工资1400~2200元,包吃住三餐	员工数:3万员工 ^[8] 2006年富士康一期投资廊坊之前已达成相关意见,富士康将分三期投资37亿美元到廊坊。到今年为止,一期投资的8亿美元才刚刚完成 ^[9]	招工信息:年龄:16.5周岁;不限;男女不限;户口不限;身高:男生≥1.68米,女生≥1.55米;标准薪资加上加班费等,月收入大约在1740~3200元 ^[10]
						深圳
						河北廊坊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北京					员工数:2万多 ^[11]	招工信息:本外地男女不限;年龄18~34周岁;基本工资1800元,转正后基本工资2500元,综合月薪3500~5000元以上 ^[12]
天津	1998年建立了生产手机电池的小厂	员工数:1000余名 ^[13]	2008年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生产手机外壳的小厂			招工信息:年龄:男:16~30周岁,女:16~35周岁;学历:初中以上学历;薪资待遇:每人每月基本工资1200元;每月平均薪资1800~2300元 ^[14]
山东烟台	富士康(烟台)科技园是山东省引进的重点项目,于2004年1月在山东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 ¹⁵	7月正式投产运行 ^[16]	员工数:5万人 ^[18]		员工数:8万 ^[19] 山东出口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042.9亿美元。其中,仅烟台富士康一家企业就贡献了90.8亿美元,占到全省出口总值的近1/10 ^[20]	目前正低调在烟台建设全球最大的液晶彩电基地——拟与索尼合资建设该基地,设计规模为3000万台,将新增900亿元产值和5万个就业岗位,相当于再造一个“烟台富士康” ^[21] 招工信息:基本工资:1200元/月;收入范围:1800~3500元/月;招聘人数:不限;年龄要求:16~35岁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河北秦皇岛		秦皇岛市政府昨日(2)日公告,3月31日已与富士康集团签约,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承诺,未来三年内至少投资10亿美元,员工人数将超过3.5万人 ^[22]			到2010年年底,估计用工量6000人 ^[23]	招工信息:男女年龄,18~30周岁;基本工资1407元,每月综合工资2500~3000元左右 ^[24]
辽宁营口			富士康(营口)科技园是辽宁省重点项目,于2008年在辽宁营口市投产 ^[25]	招工信息:需求人数:200~300人/月;年龄:16.5~23周岁;男女不限;待遇:试用期工资:580元(营口区最低生活保障工资)+120元奖励基金+特殊岗位津贴30~100元,预计月工资收入(含加班费)1300~1500	员工数:1300多人 ^[26] 实习期间:底薪700元/月+加班费(依公司规定,按实际加班发放),月收入约1000~1500元 实习期满:底薪1000元/月+加班费(依公司规定,按实际加班发放),月收入约1200~1800元 ^[27]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广西南宁				9月10日,富士康集团在南宁注册。据悉,富士康集团已决定投资广西南宁市30亿美元,其中今后5年电子信息产业年生产总值达到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8]	中新社南宁12月23日报到,台湾富士康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投资50亿元人民币,用于建立生产基地及3C卖场等项目,预计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300亿元人民币以上,直接用工接近4万人	
湖南长沙和衡阳					新华网长沙12月8日报到,湖南省政府8日与富士康集团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双方协议,富士康将在长沙和衡阳两地建立生产研发基地	
江苏昆山	1993年投资建厂 员工4万余人 ^[29]					富士康集团昆山三区总投资约2.4亿美元,占地1400亩。员工人数8万人 ^[30] 招工信息:年龄:17~28岁;学历不限;男女不限;待遇:底薪1500元+加班费+全勤奖+岗位津贴=2800元左右,转正后工资:1700元+加班费+全勤奖+岗位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江苏淮安	江苏淮安经济开发区成功引进了台湾鸿海集团总投资不低于20亿美元的富士康项目 ^[31]	员工数:3.6万 ^[31] 从现在到今年年底,富士康淮安科技城将有1万多人的招工需求。主要招聘16~22周岁的女性和17~22周岁的男性;员工入厂后标准工资为660元,综合工资在1000元左右 ^[34]		12月,淮安市劳动就业管理处派出专门招工小组,远赴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为富士康招工 ^[35]	招聘信息:年龄要求:22~28岁;基本工资:1400元/月;收入范围:1500~3500元/月 ^[36]	津贴=3600元左右 依条件规定公司办理社会保险、商业、医疗保险。(五险一金) ^[31] 员工数:3.6万 ^[37] 招聘信息:学历:初中以上学历;年龄:17~32岁;待遇:底薪1500元/月,月平均综合收入在2300~2800元左右。入职进行三个月考核后,底薪1740元/月,月平均收入在2600~3200元
浙江嘉善		2007年12月10日,富士康科技集团与嘉善进行项目签约 ^[38]			招工报道:9月6日,位于西塘镇的富士康项目富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招工,计划到今年年底招聘5000~7000名员工。底薪每个月1100元,加上加班收入等,月综合工资在2000~3000元左右;同时还可以享受免费吃住、洗衣服务和社会保险等福利待遇 ^[39]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四川成都					鸿海集团将投资富泰华精密电子(成都)1200万美元、鸿富精密电子(成都)2000万美元 ^[40]	招工报道:6月份左右要完成富士康成都项目25万人的招工目标。四川省内所有的市州,从去年8月份开始,就按照四川省上的要求,开始在全川之内,由地方政府出面,开始为富士康成都项目代为招聘工人
河南郑州					鸿海集团将投资鸿富精密电子(郑州)2000万美元、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1200万美元 ^[41] 8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条生产线开工,富士康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第一车间生产工人超万人,招聘期间总体岗位与应聘人员达到了1:30。原来郑州招工,管吃管住800元,而富士康是1200元起步;管理人员现在得涨到1600元以上了,技术人员基本工资2000元恐怕招不到人了。富士康郑州公司厂区明年底达产后,用工规模在15万人以上 ^[42]	3月6日,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就政府为富士康招工一事做了回应,称为重点企业服务是政府职责所在 ^[43] 招工信息:初中以上学历;17~35周岁;待遇:入职基本薪资不低于1200元/月,月平均综合收入1600~2300元以上。入职三个月考核合格标月平均收入在2500~3000元以上;在深圳工作三到六个月后调回郑州富士康工作 ^[44]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富士康(太原)科技园于2003年10月17日奠基。2004年12月投产 ^[45]			工业园区整体投资15亿美元,计划于今年全部建成投产 ^[46]	招工信息:年龄:年满17周岁未滿24周岁;待遇:基本工资750元+津贴+加班+各项奖金=1000~2000元以上 ^[47]	招工信息:年龄:年满17周岁,且不得超过28周岁;身高:男:165cm 女:155cm;学历不限;待遇:基本工资1200元,津贴加班各项奖金=2000~3000元(综合工资) ^[48]	员工数:6万余人 ^[49] 招工信息:学历:不限;年龄:16.5~40周岁;身高:男:165cm、女:155cm;待遇:底薪1350+加班+补助+全勤+奖金=2200~3000元/月(食宿免费) ^[50]
太原				《重庆晚报》8月5日报导,惠普落户重庆的笔记本电脑项目,将主要交由重庆富士康来生产。两大项目建成投产后,到2012年将形成年产2000万台外销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能力,同时其整机配套的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目前前1/3重庆工业产值	员工数:2800多人。预计到年底可以达到1万人。总体实施后可提供10万人就业 ^[51]	招工信息:年龄: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待遇:标准薪资1300元/月;9个月通过考核后薪资(底薪1600)2100~2800元 ^[52]
重庆						

续表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2月	2011年
	2007年4月2日 富士康(武汉)科技产业园项目开工奠基。富士康在东湖高新区的一期投资为10亿美元。据了解,富士康项目最终建成后,将容纳15万~20万人就业。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相机制造基地			员工数:2万人 招聘报道:6月11日,武汉市人力资源市场和一些人材市场,举办富士康新项目员工专场招聘会,并进行招工登记。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因新项目投产,急招2.8万名普	武汉富士康年前发布公告称,预计今年需新招普工3万人。今春,武汉招工总岗位数在24万个左右,在数量上,武汉富士康一家企业就占到一成多。记者发现该公司今年最新招聘简章上,员工薪资待遇又涨了一截:试用期1700~2100元,考核期可拿1900~2200元,转正后可拿2200~2800元。如此水平,将今春武汉普工1700元平均月薪远远甩在身

武汉

注:

[1]“富士康深圳工厂:员工收入主要靠加班”,资料来源于腾讯网站,载 http://tech.qq.com/a/20060622/000032_1.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2]“2006年富士康(武汉)科技产业园项目奠基”,资料来源于荆楚网,载 <http://www.cnhubei.com/200703/cal307645.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3]“富士康急招3000人后挂出不再招工横幅”,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tech.sina.com.cn/it/2009-02-19/1149283931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4]“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 内迁之争落幕”,资料来源于腾讯网,载 <http://news.qq.com/a/20100726/000107.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5]“富士康深圳招工遇冷 招聘人数规模令人疑惑”,资料来源于金羊网,载 <http://news.sina.com.cn/c/p/2010-09-03/173021034105.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6]“深圳富士康招工场面火爆 一万人”,资料来源于深圳生活网,载 <http://www.updayday.com/2010/02/022421402010.php>,2010年2月24日,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7]“[招工信息]北京富士康精密组件有限公司操作”,资料来源于中劳网,载 <http://zhaogong.chinalao.com/f39/38444/>,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8]“深圳富士康十连跳,廊坊富士康猝死,北京富士康群殴”,资料来源于南方报网,载 http://nf.nfdaily.cn/huati/content/2010-05/21/content_12147409.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9]“廊坊回应富士康北迁之争”,资料来源于中国新闻网,载 <http://www.chinanews.com/it/2010/07-22/241915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10]“富士康招工”,资料来源于北京列表网,载 <http://beijing.liebiao.com/gongrenjigong/16966504.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11]“北京晚报记者探访亦庄富士康”,资料来源于中国经济网,载 http://www.ce.cn/xwxz/gnsz/gdxw/201005/24/20100524_21438452.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12]“北京富士康招工”,资料来源于易登网,载2011年3月27日,载 <http://beijing.edeng.cn/xinxi/46269557.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13]“2006年富士康(武汉)科技产业园项目奠基”,资料来源于荆楚网——湖北日报,2007年4月2日,载 <http://www.cnhubei.com/200703/cal307645.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14]“天津富士康招工招聘”,资料来源于数字英才网,载 <http://job.01hr.com/j/h-4391170.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15]“烟台富士康集团招工招聘信息”,青岛劳派网,2008年6月28日,载 http://qgqgmzhang.blog.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total=563&totalcount=563&id=1941369&pagerow=20&pagenum=23,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16]“烟台富士康拒为8万员工缴公积金”,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网,载 <http://news.zgjr.com/News/201064/home/4488717542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日期:2011年4月19日。

[17]“2006年富士康(武汉)科技产业园项目奠基”,资料来源于荆楚网,载 <http://www.cnhubei.com/200703/cal307645.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18]“烟台富士康集团招工招聘信息”,资料来源于青岛劳派网,载 http://christenson.blog.bokee.net/bloggermodule/blog_viewblog.do? id = 1941369&totalcount = 562&total = 562&pagenum = 20&pagenum = 5,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19]“烟台富士康拒为8万员工缴公积金”,资料来源于中国金融网,载 <http://news.zgjr.com/News/201064/home/4488717542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20]“烟台富士康加薪招人招工.5万欲再造一个‘富士康’”,资料来源于中国烟台政府门户网站,载 <http://www.yantai.gov.cn/cn/html/text/jryw/2011-02-16/536292.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21]同上。

[22]“富士康与秦皇岛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中国PCB技术网,http://globalsmt.net.cn/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773&pop=1,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23]“秦皇岛富士康招聘”,资料来源于时代人才网,载 <http://www.107job.com/IKArticle.jsp? ID = 28>,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24]“秦皇岛富士康招聘”,资料来源于秦皇岛OK网,载 <http://www.qhdok.com/thread-346-1-1.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25]“富士康科技集团招工简章”,资料来源于营口人力资源网,载 <http://www.ykrizy.com/newsinfo.asp?id=438>,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26]“富士康科技集团营口科技工业园”,资料来源来源于黑龙江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网站,载 <http://www.hljitpc.com/news/displayxw.asp? Uid = 2196>,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27]同上。

[28]“富士康在南宁投资30亿美元4大领域重点合作”,资料来源于广西房地产信息网,载 http://news.gxfdc.cn/news/News0_31665.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29]“江苏昆山富士康有多少员工”,资料来源于百度知道,<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8829098.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30]“昆山富士康企业最新招聘/招工信息”,资料来源于易登网,载 <http://suzhou.edeng.cn/jiedaoxinxi/45505073.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5日。

月15日。

[31]“2011年昆山富士康最新招聘招工信息”,资料来源于专业服务网,载 <http://www.99inf.com/zyfw/jjzj/234830.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7日。

[32]“江苏淮安:借力台资促自身转型”,资料来源于江苏与台湾网站,载 <http://www.huaxia.com/js-tw/sjl/2011/04/2372344.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33]“淮安富士康科技集团”,资料来源于数字英才网,载 <http://www.01hr.com/company/a-206034003967.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1日。

[34]“富士康淮安科技城开始大规模招工”,资料来源于涟水网,<http://bbs.0517w.com/forum.php? mod = viewthread&id = 33451>,访问日期:2011年4月21日。

[35]“淮安市群策群力保富士康用工需求”,资料来源于人民网,<http://unn.people.com.cn/GB/10265512.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1日。

[36]“[招工.信息]富士康人事专员”,资料来源于中劳网,载 <http://info.chinalao.com/78/77692/>,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37]“[江苏]富士康(淮安)基础人力(实习生)2011招聘”,资料来源于鲤鱼网,载 <http://www.iliyu.com/job/html/job-812207.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1日

[38]“争夺富士康”,资料来源于浙商网,载 http://www.zjol.com.cn/05zjman/system/2008/06/11/009608453_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3日。

[39]“富士康嘉善工厂开始招工”,资料来源于嘉善新闻网,载 <http://jsxww.zjol.com.cn/jsnews/system/2010/09/07/012609452.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40]“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内迁之争落幕”,资料来源于腾讯网,载 <http://news.qq.com/a/20100726/000107.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22日。

[41]“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内迁之争落幕”,资料来源于腾讯网,载 <http://news.qq.com/a/20100726/000107.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22日。

[42]“富士康在郑州大规模招工致当地企业加薪留人”,资料来源于新华网,<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29/113820996395.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3日。

- [43]“河南省长:为富士康招工是政府职责所在”,资料来源于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载 http://www.china.com.cn/2011/03/07/content_22072008.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 [44]“[招工信息]郑州富士康招聘直留郑州”,资料来源于中劳网,载 <http://info.chinalao.com/fl87/186992/>,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 [45]“[山西]富士康科技集团·太原园区2011招聘”,资料来源于应届生求职网,载 <http://www.yingjiesheng.com/job-001-047-453.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2日。
- [46]“争夺富士康”,资料来源于浙商网,载 http://www.zjol.com.cn/05zjman/system/2008/06/11/009608453_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3日。
- [47]“太原富士康招工信息(长期招聘大量普通工人)”,资料来源于列表网,载 <http://taiyuan.liebiao.com/gongrenjigong/12372903.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 [48]“太原富士康招流水线作业员”,资料来源于网络114,载 <http://ty.net114.com/zpshengchankaifa/1001917i.html>,2011年4月19日。
- [49]同上。
- [50]“太原富士康2011最新招聘信息”,资料来源于百姓网,载 <http://taiyuan.baixing.com/gongren/>,访问日期:2011年4月22日。
- [51]“记者探秘富士康重庆产业基地”,资料来源于新浪网,载 <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20/1200421176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23日。
- [52]“富士康科技集团(重庆厂区)招工简章”,资料来源于重庆人才公共信息网,载 <http://www.cqrc.net/cqrc2009/showxxw2009.aspx?xwid=12025>,访问日期:2011年4月18日。
- [53]“武汉富士康急招工2.8万”,资料来源于财经网,载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6-12/110458354_3.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9日。
- [54]“武汉富士康今年招工计划3万冲击人才市场”,资料来源于荆楚网,载 <http://news.cnhubei.com/ctdsb/ctdsbsgk/ctdsb11/201102/tl622823.shtml>,访问日期:2011年4月16日。

据报道,富士康在华版图已经基本清晰,形成了三大生产集群。北京、郑州和廊坊将主要进行手机生产,重庆和成都则是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机顶盒,而对生产条件要求较高的苹果则继续留在深圳生产。此外,一些中型业务群也将逐渐内移,PCB(电路板)将移到秦皇岛,光电设备移到晋城,游戏机则落在烟台。^[1]

[1] “富士康6400万美元投资郑州成都 内迁之争落幕”,资料来源于腾讯网,载 <http://news.qq.com/a/20100726/000107.htm>,访问日期:2011年4月20日。

第十五章

产业转移与新工人的出路

沿海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带动了史无前例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给来自农村的人口带来了移民的机会,但是还没有为新工人在城市安居乐业提供足够的制度安排。

沿海改革开放3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产业转移的步伐。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很多是劳务输出的大省。绝大多数打工者都梦想有一天回到家乡生活和发展,因此从表面上看,产业转移对打工者实现梦想是有利的,但是现实发展会不会是这个结果呢?

阅读了众多的关于产业转移的文章和资料,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点:

- (1)所有资料都说:产业转移好,而且是一种必然;
- (2)产业转移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 (3)还没有见到谈产业转移对打工者影响的文章或者分析。

产业转移是资本的逻辑。我不反对资本,但是我认为社会不能按照资本的逻辑去运转,因为资本的逻辑也许会带来工业、工厂和工人,但是不会带来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事实告诉我们,第三次产业转移是中国向世界资本让利,而这一次国内产业转移是内地向世界和沿海资本让利。

在这里我之所以把产业转移和新工人的出路联系起来是因为:打工者都有返乡的念头,但是他/她们返乡并不是要回到村子里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工业、商业和服务行业就业。而产业转移是提供打工者实现返乡梦想的机会。但是,这个梦想是否可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转移战略的目标是否和打工者的返乡目标相吻合。

一、产业转移对农村和打工者的影响

1. 产业转移的大背景

据总结,从“二战”后到现在的六十多年中,世界经历了三次大的产业转移,第一次成就了日本,第二次成就了“亚洲四小龙”,而第三次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有人说,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从沿海到内地的产业转移是世界的第四次产业转移。

据测算,我国沿海10个省市集中了全国加工贸易的97.4%,到2010年,仅粤、沪、浙、闽4省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14000亿元。目前我国30万家外资企业70%从事加工贸易业务,国内机电产品出口的7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都是加工贸易方式。^{〔1〕}

产业转移是资本谋求低成本高利润的必然趋势。据分析,如果把中国人工资平均水平设为1,我国东部的人力工资水平约到达1.31,西部地区是0.91;我们内陆地区一般劳动力工资在1000元左右,沿海地区在1400元左右。当然工资只是成本的重要的一部分,企业在投资和转移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工资还要考虑其他成本。^{〔2〕}

为了促进产业转移,从2007年到现在,商务部已经先后认定了三批“加

〔1〕 吉守斌:“加工贸易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趋势与机遇”,载《中国发展观察》2009年第2期。

〔2〕 曲建:“如何促进内地承接沿海产业转移”,载《第一财经日报》2008年9月10日。

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2007年11月22日,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意见》中明确,国家开发银行对获得批准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将提供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技术援助贷款,对进入承接地的重点项目将提供优惠贷款条件,给予10%以内的利率下浮^[1]。

2. 河南焦作人受益于地方产业的发展

在重点访谈的5个村子里,几乎没有人直接受益于国家产业转移扶持政策。河南省北大段村位于河南焦作市,而焦作市在2007年4月被商务部确定为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地之一^[2]。从对焦作的走访来看,当地工业区周边的村落受益于开发区的就业机会,很多人就近就业而不需要去沿海打工,刚从沿海打工回来的小吴告诉我,他愿意接受低于沿海一半的工资而选择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

2010年8月,我走访了焦作市修武县郟封镇小文案村和焦作市武陟县谢旗营镇北大段村。这两个镇虽然地处不同的县但是地理位置是相邻的,因此小文案村和北大段村的距离不是很远,大概有20公里的距离。在农户走访中发现,两个村子的发展状况和外出打工的情况很不相同。在北大段村,有400多户,1800多人;劳动力有800多。外出打工的有300多人,在附近打工的有300多人;很多人去很远的地方打工,比如去东北等地做建筑工;在小文案村,大概1000户,4300多口人;这三五年才有人外出打工,以前没有;去年(2009年)可能有90多个人外出打工,今年(2010年)可能达到130多人;大多数人都就近打工。对比河南焦作和中国其他省份,如四川、贵州等地,河南就近就业的比例是很高的。

在小文案村了解到,镇里搞了一个工业开发区,还在建设中,但是已经有公司开始经营了。大用公司和一个酒精厂四年以前就在那里落户了。村长告诉我:“我们村最低有150人在大用公司上班,在酒精厂上班的也有一百几十个人。开发区还在建一个纺纱厂,据说规模将是亚洲第二。这个项目已经开始了,现在在征收农地。”这个开发区离小文案村只有1公里远,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个村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少了。而北大段村虽然离开发区只有20公里左右,但是从就近就业来讲北大段村却没有受益。

吴先生一家的故事

我在小文案村子的街道上遇到了吴先生,告诉了他我的来意,他热情地请我到他家里,我们聊了有2个多小时,也见到了他妻子、儿子和儿媳妇。他儿子26岁,儿媳妇27岁,都是初中毕业。他儿子告诉我:

“我们结婚以前在家附近工作。我媳妇静静在卖家具那儿做了一年,也在邻村的方便面厂子做过有三四年。在附近工作每天下班都可以回家。她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那两年先是怀孕然后是生孩子带孩子。我们结婚之前我也是在邻村的方便面厂那儿工作了四五年,也去过其他地方,但是都没有赚到钱。2006年的时候去过天津搞建筑;2007年夏天去过新疆做钢的安装,干了1个月;2007年的冬天在河南郑州给人家装空调,干了1个月就没活了;2008年刚过了年就去了山西,但是没有找到活就回来了;从山西回来就在家附近的大用公司上班了,大用公司做鸡的产品,干了不到一年。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去了东莞,同学介绍的,在一个厂干了快2年,最近刚辞工回来。现在打算在附近找工作,离家近。外面的工资也不怎么高,现在家里面和外面也差不多了。原来做过的那个方便面厂的工资只有四五百,但是现在这边也可以找到1000多元甚至3000元的工作,要看工种了。在家里面挣八百块钱,在外面挣一千五,还不如在家里。一个是离家近,另外家里消费低,家里有农活了还能帮着干一些。现在镇上建设了工业区,离这里很近,就一公里

[1] “商务部发布支持中西部承接加贸移新政策”,资料来源于金融界网站,载 <http://roll.jij.com.cn/news/2007-12-21/000003087819.html>。

[2] “9城市成为加工贸易转移重点承接地我省新乡、焦作榜上有名”,资料来源于河南政府官网,载 <http://www.henan.gov.cn/jrhn/system/2007/04/12/010027507.shtml>。

远。我们村也有厂子。在东莞的工作,底薪刚去的时候是七百七,现在涨到九百二,如果加班的话一个月是两千多。”

我在网上查了大用公司的信息。河南大用(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84年,注册地是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高村工业区。目前拥有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鹤壁)、焦作大用实业有限公司(焦作)、河南大用邦杰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周口)、河南大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州)、濮阳泓天威药业有限公司(濮阳)、北京大风种禽有限公司(北京)等12个分、子公司和控股企业。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是大用集团的母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06年销售收入11.3亿元,利税3530万元,出口创汇1507万美元^[1]。

3. 贵州遵义尚稽镇人尚没有受益于当地铝城的建设

贵州遵义并不在政府扶持的产业转移承接地的名单里,但是全国工业化和产业化的浪潮波及了很多边远地区,包括这里。

2010年11月我走访了贵州遵义的尚稽镇。我有这样几个印象:(1)镇上的消费水平很高,比如,一碗面要5块钱,小宾馆一个晚上的住宿费是100元。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当地人的工资水平,据说找人盖房子一天要支付80~200元的报酬。(2)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而且道路建设没有规划。有一天我们要从镇上去村里,结果走了三个方向都被没有修缮的道路拦住了,最后我们终于从一条小路找到了出路。(3)铝业看起来是当地最大的产业,厂房已经建设起来,而且还在扩建中,但是这并没有给当地人带来就业的机会。

贵州省虽然没有任何城市在商务部产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的名单里,但是这里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建设。2006年4月22日,中国铝业遵义氧化铝项目在遵义县尚稽镇大坝村奠基开工,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80万吨,总投资42亿元,建设工期3年。2010年9月15日,遵义在

线报道:

“站在遵义县尚稽镇大坝村的一处山坡上极目远眺,眼前是一座银色的铝城。在大坝村这4000多亩的土地上,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气势恢弘。2010年6月,投资47亿元人民币、年产80万吨的遵义氧化铝厂进行单机点火试产,标志着中国铝业遵义80万吨氧化铝项目正式投产。”

2010年11月26日,我走访了新民镇茶山村的返乡工友杜名明。新民镇与尚稽镇接壤,茶山村离铝厂所在地很近,只有3公里远,一期工程还没有占用茶山村的地,据说二期工程会占用。杜名明告诉我:

“村子里现在没有人在铝厂上班的,占谁家的土地谁家才可以有一个名额;不占土地的,你想去都进不去。还有人是嫌铝厂的工资低的,不愿意去,工资就1200元。村里有人在铝厂搞建筑打零工,最少是一天八十到一百多元钱;搞建筑在这个周围都是这个价钱,八十多,一百多的。在乡下的话,假如在我们村里面做房子的话,还有烟、酒这些招待;要是在外面去的话,就是自己吃生活,然后就是价钱贵二十块钱这样的。”

后来我又通过其他当地人了解到,据说铝厂里的工人有来自广西的,有来自江苏,据说都是招的学生工。

二、返乡不是回农村

“返乡”这个词在被使用的时候有很多概念上的混淆,往往阅读了上下文以后才可以明白在那个语境下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在春节前后,会有很多关于返乡的报道,这个“返乡”指的是打工者回老家过春节和亲人团聚,所以这个返乡是“短暂的回老家”。当谈到返乡创业的时候,这个“返乡”指的就是“相对长期稳定的在家乡工作和生活”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返乡创业的

[1] 大用集团网站, <http://www.doyoo.cn/introduce.asp>。

打工者因为创业失败又重新进入打工者的行列,但是在词语的意思上,“春节返乡”和“返乡创业”中的“返乡”区别很大。金融危机期间,有很多关于打工者“返乡潮”的报道,这个时候这个词的意思是模糊和混淆的。

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当打工者不是春节期间短期回老家探亲,而是相对长期稳定返乡的时候,这个“返乡”并不是要回农村,而是回到家乡的镇上、县上、市里!再清楚一些就是:返乡不是回农村去务农!

这里,我们又面临一个词汇的尴尬,到底这个“乡”指的是“乡下”还是“家乡”?在我们汉语词汇中,家乡可以指城市也可以指农村,它指的是我们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所以说“返乡”说的是“返回家乡”还是“返回乡下”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另外,当我们说“家乡”或者“老家”的时候,概念也很混淆。比如,我们可以听到人说:我们是东北老乡,这一下子就把三个省的城乡的人都包括进去了;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贵州老乡,这也包括了贵州省的城乡的人;我们听人说:我们是一个村子的老乡,等等。可以发现,虽然这两个词的地理区域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但是这两个词不歧视农村,而且涵盖的是大的区域范围。所以说,我们就有必要指出,当工友说将来想“回家乡”/“回老家”的时候,指的大多是“回老家的城镇”而不是“回老家的乡下”。

回家乡是很多打工者的想法。前面提到了焦作市郇封镇小文案村刚刚返乡的小吴夫妇,他们计划在家旁边的大用公司找工作。很多打工者仍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但是这些工友多多少少都有回家乡的念头。

2010年7月2日我访谈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黄晴。她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村子离县城只有一公里远。她是1989年出生的。她告诉我:

“我们那最近这两年变化挺大的。因为离县城近,所以都能找到一些工作。女生完孩子们等孩子们大点了可以去幼儿园以后,就可以出去找工作了,可以去超市啊、酒店啊工作。我们那现在工厂也很多,有食品厂、制衣厂、

家具厂、纺纱厂什么的。很多妇女都在那里工作,现在一个月能拿到七八百、八九百块钱。就是离家近嘛,每天都可以回家,很方便的。”

2010年11月14日我访谈了在东莞工作的何玉清,她老家是贵州的,丈夫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青龙镇红阳村。她25岁,初二的时候辍学了,18岁开始出来打工。她告诉我:

“去年(2009年)在(青龙)镇上买房了,我打算房子装修好了之后,回去一个人带小孩,让小孩在镇上上小学。也想过把孩子接到(东莞)这里来上学,但是这里的费用实在太高了。未来的打算主要看经济状况,如果现在有钱的话,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主要是想有一些本钱,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做生意。房子底下是门市,楼上就是套房。青龙镇是一个小镇,主要是农业,没有任何工业,到县城还需要三个小时左右的路程。这种情况的话做生意也难赚钱。”

产业转移的目标决定了打工者是否可以走上返乡之路。如果产业转移继续遵循资本的逻辑,继续以牺牲打工者的利益为代价,让部分打工者的返乡只是无奈之举和被动选择,那么打工者和中国整体发展都问题重重。在访谈和考察过程中,我并没有关注产业转移的问题,因此这里的叙述非常简短。在访谈中听到很多工友返乡的梦想,在阅读资料里又看到很多关于产业转移的报道,因此,在这里加上了这部分的内容。非常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工人和学者能够关注产业转移对打工者的影响,并希望中国的产业转移和整体发展能够逐步走上以人为本的轨道。

第十六章 讨论

一、毕生的血汗谋求的只是臆想的“安全感”

现在,人们几乎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和“拥有安全感”画等号了。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才算有了自己的家,所以,从城市到农村,谈婚论嫁的首要条件就是男方是否拥有住房。这里想要说的是,打工者在农村和老家的房子只是给了打工者一个拥有“安全感”的安慰,其实并没有给打工者真正的安全。打工者为了建房和买房付出和预支了毕生收入,但是到头来,这个“安全感”只是一个臆想。

打工者虽然无法回归农村也不想回归农村,但是因为在城市无法安身立命,最后很多打工者还是把“物质的家”(房子)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为了偿还买房的贷款或者欠款、为了维持自己和孩子的花费,打工者不能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必须继续打工,也就是说,即使打工者真的有一天回到自己建设的“家”(养老院)也一定是在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以后。这些人那时候就需要被人照顾了,但是谁会照顾他们呢?现在,“80后”的父母还有劳动能力,还可以照顾

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但是不久的将来,谁来照顾这些“80后”在农村的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父母?同样,等到“80后”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回农村吗?如果回去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用毕生的血汗钱谋求臆想的安全感,这不仅造成了“生活不在当下”的精神痛苦,而且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很多打工者用一辈子的血汗为自己建设的是回不去的“养老院”。

二、断裂的社会制造分裂的人

2002年孙立平老师提出了“断裂的社会”的概念。^[1]

在断裂的社会里,人们虽然处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在不同的地方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却处在不同的时代。在北京和上海是高度城市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在深圳和东莞是工业化的社会;而在很多地方的农村却还处在落后的农耕时代。

在断裂的社会里,人们虽然身在同一个地方,但是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以及生存环境却有天壤之别。在北京城市的中心是林立的写字楼、金融中心、商城和高档公寓;在城市中产阶级公寓的地下室住着保洁工、保安和小时工;在5环外和6环外住着从事着各行各业的打工者。

在这样断裂的社会里,有些生活优越的人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感觉不到也不想感觉底层人们的生活;相反,一些人故意或者假装无意地维持社会的不公,因为这样可以为其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和便利、便宜的各种服务。

过去,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方式的限制,农村的人也许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对外界的认识和感知很少,那个时候社会处于隔离状态,所以即使有社

[1] 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资料来源于360doc个人图书馆网站,载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104/14/16099_318139.shtml。

会差异,也不会直接产生社会断裂和人格分裂。现在2亿多的打工者从农村进入城市,他/她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到优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她们和这些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直接制造了无数生活和精神处于分裂状态的人,制造了无数充满失败感、对社会不满、迷茫和躁动的人:打工者下班不能“回家”;打工者的孩子在农村是留守儿童,在城市是流动儿童;打工者预支一辈子的血汗钱建设的是回不去的“家”;狭窄破旧的城市边缘的出租屋旁最重要的广告是“宽带上网和有线电视”;在水泥围墙和林立的厂房中生活的打工者热衷的是名牌、时尚、手机和婚纱照。

在断裂的社会里产生的是分裂的人。

打工者从身份上是分裂的。打工者来自农村,户籍属于农村。对于户籍来自农村的人,我们不按照他/她们做什么来称呼他/她们,而是一律称呼他/她们为“农民工”。如果说一个人同时从事农业和其他行业,那么如此称呼还有情可原,但是,我们这样称呼打工者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工作的内容,而是出于把身份看成一种标签。来自农村的人就是农民,这些人即使从事其他的工作也还是农民,因为社会只愿意给这些人农民的待遇。所以这个标签的含义不是行业的称呼,而是身份的标签。

打工者与土地的关系是分裂的。并不是所有的打工者在农村都有土地,但是很多打工者还是在农村盖房。不能成为农民,没有土地,在那里也找不到工作,但是却要在那里预支所有的血汗钱盖房子,这就是打工者与土地之间的“爱恨交织”的关系。打工者虽然从名义上没有放弃土地,但是从行动上已经放弃农业了,每个人只有少量的土地,小农户不放弃土地能有什么出路呢!如果国家不做长远打算,土地或许将被资本掳获,最后有的打工者也许会回到家乡为农场主打工。

打工者的“家”的概念是分裂的。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老了以后才能回去的地方(养老院)。在和工友聊天

的时候,开始有几次我不经意地问:“你的家有多远?”工友说:“坐火车20多个小时”,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工友理解的家是老家。还有几次,我问工友:“每天什么时候下班回家?”工友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哦,下班时间?一般是晚上9点,然后回出租屋。”我意识到,工友不认为出租屋是家。我还发现,对于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工友,工友会对孩子说“放学回家”这样的话,感觉是:无论在哪里,如果一家人在一起也许也可以勉强称为家,而且对于孩子来讲,父母就是家。

三、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下的“用工荒”

当人数巨大的打工群体处在这样断裂的、分裂的、躁动的、貌似有很多可能性却别无选择的社会里,“离开”和“流动”成了打工者别无选择的选择。离开可以只是从一个工厂换到另一个工厂,流动也许是从城市回到老家然后又回到城市。这就导致了中国现在不缺劳动力却存在“用工荒”的现象。“用工荒”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的断裂和人靠臆想来生活。

前面分析了“用工荒”的三种表现形式,“春节前后阶段性用工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断裂导致的,而“持续性用工荒”主要是由于社会断裂和精神臆化导致的。打工者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不能安居乐业,又不能回农村也不愿意回农村,所以只能在迷茫和躁动中流动,去寻找可能性,或者哪怕只是太腻烦了去换个环境。

四、让新工人在城市住下来

在打工者工资这么低的情况下,很多打工者可以用自己一辈子的血汗钱花10万、20万买房子、盖房子,如果社会和资本能够健康运行的话,打工者不用任何人的恩赐就可以在城市建立新生活。但是,社会没有沿着健康的轨道

发展,高企的房价,使居者有其屋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噩梦。

官员们为了赢取产业转移落户本地的机会而四处奔走,专家学者们论证着产业转移的趋势、优势和障碍,但是我们很难听到打工者在这个过程中声音。大中城市的房价一路攀升,一些小城镇的房价也已经大幅度上涨。为了能够拥有一个家,哪怕只是臆想中的、符号性的,打工者都要支付和预支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

当读到李昌平老师的一篇文章时,我看到了解决打工者在城市居住问题的可行性出路,下面就原文摘抄李昌平老师的文章:[1]

“‘农民工’其实是‘新工人’,已经有1.7亿人到了城里,但没住下来;未来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新工人’。每一个‘新工人’都有享受基本住房的权利,不能指望市场去完成,落实这项基本人权是政府的头等责任之一。

主要的做法就是,政府在城市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建设‘新工人’的居住区——‘新工人公社’,每个‘新工人公社’以30000人为上限,每套住房的面积在40~5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过800~1000元/平方米(和县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当)。也可以由‘新工人公社’的社员自组工程队,自主建房。保证‘新工人公社’的住房价格控制在800~1000元/平方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土地价格15万元/亩,容积率按5计算,每平方米分摊地价46元/平方米;地面建筑费用约为650元/平方米;其他辅助费用105元/平方米。在中小城市,价格可以更低一些。一对‘新工人’,工资在1600元左右,每月用400~500元供房,6~8年可以还清3.2万~4万元的住房贷款。‘新工人’就可以在城市长期住下来了。6~8年后,如果还清房贷的‘新工人’需要更大的房子,‘新工人’可以将面积在40~50平方米的旧住房按原价转让给‘新工人公社’,申请‘新工人高级公社’的标准房,每套标准房以70~8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

过1000元/平方米。还清标准房贷款的‘新工人’,如果需要更好的住宅,可以将标准房照原价转让给‘新工人高级公社’,并申请政府住房(按照工龄)补贴,进入市场买房。

政府还应当扶持‘新工人公社’和‘新工人高级公社’发展成‘消费合作社’,扶持农村‘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新工人消费合作社’联盟,降低‘新工人’生活成本。政府也要帮助‘新工人公社’建立社区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体系、文化体育设施等。

在城市建设‘新工人公社’,有利于政府集中资源有效解决‘新工人’的各种困难,也有利于‘新工人’团结互助应对城市生活,还有利于节约城市管理成本,并实现有效管理。

让‘新工人’在城市住下来,还需要农村农业政策的配合:需要逐步将农民和农村纳入公共财政覆盖范围,让农民、农村享受市民、城市同等待遇;需落实宪法‘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度,给村民集体发放土地产权证明。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和村社土地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土地金融体系,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产权,获得土地产权‘证券化’资本收益。”

在结束这一编的时候,摘录2011年“新工人艺术团”出品的第五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来表达我们对社会现状的疑问和思考:

为什么

词:孙恒

曲:根据陕北民歌曲调改编

为什么高楼越来越高,
盖楼的人一辈子连个房子都买不到?
为什么医疗水平越来越高,

[1] 李昌平:《大气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68~69页。

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教育都和世界接轨了，

孩子们上学却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人和人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物价不停地在上涨，

可怜我口袋里的工资却永远也赶不上？

为什么经济飞速地增长了，

贫富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穷人越来越穷了，

有钱的人有闲的人却越来越麻木了？

为什么物质生活越来越好了，

我们的精神和内心却越来越空虚了？

哎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为什么呀为什么？为呀为什么？

第四编

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

有积极意义,正视这些看法并进一步进行思考就是新工人主体意识形成的过程。

在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计划要写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写完了前三编以后,我询问自己:摆在自己和读者面前的都是问题,难道我们就没有希望吗?不,希望是一定存在的。那么希望在哪里?如果没有一个公平的社会,平民百姓就没有好日子过。那么什么是公平?工人们是如何看待公平的?我们有多大的机会去追求公平?该从哪里入手?如果到网上去搜索“公平”这个词,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解释、很多文章,读这些东西可以有很多启发。但是这里想要的不是海阔天空的议论、古今中外的评述,而是从工人们的视角出发,作最贴近工人现实的分析。基于前面已经做的近百个访谈带来的启发与疑问,我又到了苏州和武汉,访谈了十几位工友,和二十多位工友进行了座谈。整理了工友们的看法以后,才开始动笔写这一部分。这里选择了三个概念和一个问题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也会和前三编的讨论内容相呼应。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了中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怎么改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而且我们很多人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看法,因为现实太复杂了。但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哪怕我们的看法不成熟,形成自己的看法依然很重要,这是建设未来的基础。现在问题就在这里,看法需要用语言来描述,可是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了。大家对很多曾经使用过的词语非常反感,大家对代表“阶级性”的词语也感觉很难接受。现在,打工阶层受到资本的严重剥削,但是“剥削”这个词让很多人觉得刺耳。

一个人需要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才能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进而创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一个群体需要认清其社会地位,然后才可以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我们需要找到适当的词汇来描述我们的看法、我们自己是谁,来分析社会。这些就是所谓的主体意识。而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是新工人真正崛起的必要条件。

每次和工友聊天,我都可以体会到交流中的互相启发。很多时候,聊天以后,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一个人对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改变了,不就是变了一个人吗?我不知道工友的体会如何,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工友在讲述他/她们的生活的时候,也在重新审视自己;我也可以感受到,当我询问工友对某个问题看法的时候,交流的过程也是工友再思考的过程。书中这一部分,我把和工友的一些对话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希望从一个侧面反映工友的看法。无论这些看法是否正确、是否全面、是否对自身和社会的发展

第十七章 公 平

选择“公平”这个概念是因为：第一，如果公平不是我们社会价值观的取向，那么打工者的问题就失去了立论的基础。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没有丧失公平取向，所以打工者的问题才受到社会的关注。第二，在和工友的交流中，发现我的一个假设是错误的。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打工者们在社会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那么他/她们一定会认为社会很不公平。但是，在和工友的交流中发现，很多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很正常，有些甚至认为社会就应该这样。如果很多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是正常的，那么追求社会公平的脚步就会慢很多，打工者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就更加艰难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搞清楚工友对公平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工友为什么抱有这样的看法。中国追求公平正义的传统中有一句大家都熟知的话：群众创造历史。我很同意这句话。如果打工群体主体性意识中对公平的看法是支持资本的逻辑的，那么打工群体要想改变自身的地位和改变社会就更加困难了。

一、追求平等要从公平入手

在讨论公平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联系到其他相关的概念，比如：平等和公正。举个例子来说明公平和平等的区别，我以前看过狐狸和仙鹤一起吃饭的寓言故事，狐狸用盘子才可以吃到饭，仙鹤用盘子吃饭就吃不到，为了保证狐狸和仙鹤能平等地吃到饭，要公平地为狐狸和仙鹤提供不同的用餐工具，给狐狸盘子，给仙鹤长颈瓶。也就是说，通过公平的手段才能达到平等的目的。

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叫“公平辨正”，^[1]我对此文章中对公平和公正的分析比较认同。作者论述道：“公正和公平基本上是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但细究起来，公正和公平这两个词也有细微区别，主要就是二者所指向的对象有所不同。以法律裁判为例，公平主要是就当事人利益得失状况而言的，而公正则主要侧重于对法官（也就是第三方）行为的合理性的评价，指其行为独立、不受干扰、不偏不倚。”也就是说，要想实现公平和平等，要有公正来做保证，而公正的角色只有第三者才可以充当，不能是当事人。

基于上面对三个概念的比较，我选择用公平的概念来思考打工者的社会问题。从社会现实来看，打工者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差距很大，很不平等，这是一个结果，我们不能从结果入手来解决问题，而是要从公平这个起点来讨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3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富差距也在扩大。该如何去认识和判断这个现状？在这里，让我们通过工人的话语和视角来分析公平的问题。

[1] 贾可卿：“公平辨正”，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二、工友体会到的社会不公平

在这一小节讨论将三个方面的社会不公平:教育不公平、收入不公平和消费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很多方面,这里之所以选择了这三个方面,主要是因为访谈的工友中谈这几个方面谈得比较多。

2011年6月14日,在苏州和20位工友一起就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简单小结一下工友认为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 本地人与外地人待遇不公:东莞的平均工资,同等岗位的,本地人三千多元,外地人一千多元;苏州住房公积金,本地人都有,外地人有的有,有的没有。招工的时候本地优先。

- 付出与收入不公:基层工人的工资是最低的。派遣工和正式工待遇不同,从基本工资到福利待遇都比正式工要低。投机取巧者得利。

- 一双鞋卖价400元,工人只得到4毛钱。

- 两个大学生学历、学业都一样,有关系的大学生去政府机关,没有关系就要去自己找工作。

- 说工人有自由择业权,但是往往是工厂选我们工人,而我们没有选择权。

- 工厂对普通职工和领导的态度以及要求不同,很不公平,比如,领导可以不穿工服。

- 找工作要给中介交钱不公平,因为还是和派遣公司签合同。

- 公积金之前可以取,现在不可以取。

- 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

- 征用农民的地盖房子,农民却买不起。

- 孩子们上学的条件不公平。

- 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公平。

- 农村的老人七八十了还要为生活下地干活。

1. 教育机会不公平

中国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我没有研究过教育史,所以不能妄下结论,只能从直接的观察进行判断。我所接触的打工者,无论多么艰难,供孩子上学都是家庭决策中的首要考虑。我们的正规教育体系存在很大的弊端,但是正规教育毕竟还是孩子们和年青一代获得知识和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下面列举一些教育的不公平:

在农村:

- 很多地方村里的小学 and 教学点都解散了,孩子们都要去镇里上小学,包括1年级、2年级的小孩子。这种情况下,有的家庭不得不在镇上租房子,以便陪孩子上学,有的家庭爷爷奶奶不得不每天步行接送孩子。

- 即使是中心小学和镇上的中学与城市里的学校的教学条件相比也相差很远。

- 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长期住校,得不到父母的关照,而学校的住宿和餐饮条件又比较差、甚至很差。

在城市:

- 打工者子女和城市子女在享受义务教育上不公平。据估算,全国有2000万跟随父母到打工地的随迁子女。据凤凰网2011年9月报道,^[1]在北京有打工人员随迁子女43.37万人,其中70%在公办学校就读,其余大概10万学生在自办学校就读。这些自办学校(也称打工子弟学校)中有62所合法(有办学许可证)办学。有112所无证办学,有学生约4万人。

- 无证办学的学校随时面临被停办,4万学生随时面临搬迁、转学和失学的危险。2011年8月,北京24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涉及一万四千余学

[1] “北京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载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8/17/8459337_0.shtml。

生。北京皮村的同心实验学校虽然此次不在名单之内,但是随着皮村拆迁的日益逼近,学校不久也许也面临拆迁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的沈金花校长说:“我们学校有五百多个孩子,我们也希望他/她们可以进公立学校读书,但是由于入学条件苛刻、赞助费太高或者公立学校离家太远等原因孩子们去不了。这种情况下就要客观对待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

●随迁子女不能参加中考和高考,所以很多打工者子女即使有条件留在北京,为了上高中和考大学也不得不回到老家。

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教育:

●在北京,几乎所有这些学校都是公办的,归行业或者区/县主管。由于当地人口减少,这些学校又只允许招本地生,这些学校都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而在京的外地年轻人却入学无门。

●在外地,有很多各类职业技术学校,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学校一方面教学质量很差,另一方面职业道德丧失。在本人所调查的54名工友中,有11名上过技校,其中8名明确上当受骗;另外3名虽然没有明显受骗,但是反映学无所用。

因为穷所以没有学历——和工友杉杉的交流: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用语:仇富心理。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中国百姓的仇富心理是相当地不强烈了。在谈到贫富差距和对富人的看法的时候,工友首先想到的是富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致富的,而不是简单地看到别人富裕就眼红。下面是我和一位叫杉杉的工友的交流。通过分析,杉杉认为,打工者就没有办法和富人比,因为富人有资本、有学历、有渠道,这中间穷人可以奢望的是学历,所以失去获得学历的机会是杉杉认为最不公平的。

杉杉1990年出生,老家是湖北的,在河南济源读的中专,学的电子计算机专业,但是只学习了一年就出来实习了,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也对打工没有任何帮助。2007年开始出来打工,一直都是在苏州。2011年6月9日,我和杉杉聊天,下面是我们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的对话:

问:你觉得这个社会公平不公平?

答:有一些方面是公平的,有一些方面不公平。

问:哪些方面公平?哪些方面不公平?

答:就说贫富差距吧,富人如果很富,因为好好地挣钱,自己又能吃苦,而且有那个资本,然后他靠这个资本,再靠他自己,因为有一些本事,不管是学历还是社会经验什么的,他再有这个渠道,那他赚钱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一些的。穷人是靠劳动,是靠双手。

问:你觉得公平吗?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富人有资本、有学历、有头脑、有渠道,所以才富,按照你这个逻辑应该是公平的,是吗?

答:也不是很公平,因为穷人在教育方面很欠缺,因为太穷了,所以这个就是不公平的。

问:你开始说也公平与也不公平,而现在认识社会是不公平了?

答:我觉得富人他们有资本,他们靠他们的资本去赚钱,这样的人和穷人比较,他们是公平的,就不能比了。

问:你的意思是说富人和富人之间的竞争,可能是在一个层次上,他们之间是公平的。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了?

答:对。

2. 收入/工资不公平

在本书的第三编第十二章的“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现实”小节中,罗列了中国悬殊的收入差距现状,这里不再全部重复,只拿出其中两个数据予以强调: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1]我们关心的是:这样悬殊的收入差距到底是否公平?用什么标准和价值观来判断是否公平?谁来判断是

[1]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资料来源于共识网,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jj/article_201001206313.html。

否公平?处于不公平地位的人是否有能力来改变现状?

思考工资问题的时候,我有两个迷思:一是,我们比较容易知道穷人的工资和收入,但是很难了解富人和官员的收入和财富。我做过无数农民和工友的访谈,有时候会遇到访谈对象不想告诉我收入情况的例子,但是不多,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回忆收入状况,有时候还会一起算微薄的家庭财产的情况。但是面对收入较高和很高的人,我们就很难了解他/她们的收入和财产情况,更不可能了解官员的财产来源和财富状况。二是,我不知道工资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们很难知道各行各业的赢利情况,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商业秘密。劳动者就在这样的“黑洞”中无法知道自己的劳动价值。

同时,具体需要面对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是会随着历史阶段的不同发生变化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人民享受了平等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平等得到极大保障的同时,极端平均主义导致了生产和工作积极性的下降,那时候人们思考的是: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公平的。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这时候对公平问题的思考是:以社会不公平为前提——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福祉来谋求少数人发财致富和经济总量的增加——的发展可以持续吗?

让有钱人自己来劳动一下——和工友杉杉的交流:

2011年6月9日,我和杉杉(简介同前)聊天,下面是我们谈到社会公平问题时的对话:

问:有人说,打工的人就是这个命,就应该这样,谁让我们没有上大学,你认同吗?

答:不认同。人家学历高是因为他从小就可以接触这些方面的教育,人家能赚钱是因为他有赚钱的渠道。我们从小就不能接触,接触的都是劳动的东西,所以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平等的。

问:你觉得这种平等应该怎么体现?是工人和管理层工资都一样吗?

答:最起码在工资待遇方面,在劳动成果方面平等一下。让富人、让很有钱的人自己下来劳动,感受一下。

问:你觉得社会上多大程度的工资差异你会觉得是公平的,我觉得有差异是正常的,不应该搞平均主义,但是你觉得多大的差异是我们觉得比较公平的?

答:我觉得他们有没有钱跟我没有关系。我关心的是我的生活,我如果今天不上班了,肯定马上没有钱了,然后下个月怎么生活,每天累死累活,还有就是那边一点工资。

问: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管别人挣十万还是二十万,你关心的是你的工资水平能让你有一个安全感,不是说一定要跟别人比,是这个意思吗?

答:我只希望我的生活不是每天买东西都要斤斤计较的,一毛钱、两毛钱在那里算,去买一件衣服,贵一点的衣服都舍不得买,没有钱。还有就过年回家的时候两手空空,然后在家里面玩,把钱就花光了,一年到头存不下钱。已经出来四年了还是这样的,光光的,过年没有什么礼物带回去。

杉杉认为收入差距巨大是很不公平,原因是:

- 因为学历差异所带来的收入差异不公平,因为高学历的人往往本身家庭环境好,大家从起点上不公平。

- 普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收入差异巨大不公平,杉杉质疑道:“让富人和有钱人来自自己来劳动一下、感受一下。”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低估。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是非常辛苦的。

- 杉杉对不公平的体会主要不是出于和富人的对比,而是基于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不满。他的意思是,富人你可以富,但是穷人不能穷到一天不工作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不能穷到工作了四年都没有一点儿积蓄。

干得越快产量越增加,但工资不增加——和宋志浩聊天:

资本的逻辑是残酷的、破坏性的和没有人性的,所以它置环境破坏和工

人健康损害于不顾。资本是最不容忍民主的,所以工人不知道自己工资的秘密。资本又是最讲虚伪和欺骗性的民主的,它用各种手段让人们迫不及待地出卖自己的劳动,以便获得微薄的工资。

工人也许不知道工资结构性的秘密,但是工人知道工资是不公平的,知道工资、产量和劳动量之间的问题。2011年6月1日我在苏州和宋志浩聊天。宋志浩1990年出生,老家在甘肃酒泉瓜州,在县城上的中专,学的是选矿专业。后来在老家的矿山工作了一年,然后出来想在大城市见见世面。2010年3月来的苏州,就一直在这边工厂里打工了。下面是他的话:

“2010年10月份我进了一家工厂,已经在这里干了八九个月了。没有更好的工作,没办法。做的是数码相机和手机屏幕,触摸屏的,那个有银,银本来就有毒性的,药液也有毒,因为含有苯、乙醇那些东西。戴手套,但是那个手套很薄,一接触金属一不小心就破了。药液渗到手里是经常发生的。像自己没有什么特长和技能,没有办法。工厂里面一个月下来可以拿2000块钱。

现在年轻人都是这样,都想干快点,干完可以休息一会儿,虽然你干得越快,产量越增加,但是我们的工资还是这样,而且更累了。比如今天主管让我们做15个产量,平时就做12个,因为一般做不了15个的。他说,本来3点下班,我们1点半就干完了12个,他感觉反正这个时间也是闲着,我们可以多做几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话中给了我下面的思考:

●资本在经济核算中不计算工人的健康成本。宋志浩的工作中接触有害成分,防护措施根本不到位,但是他把这些归咎到自己没有技能,因此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资本不把产量提高和工人工资提高挂钩。

3. 消费不公平

收入不公平和消费不公平是相联系的,但是从分析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

题的手段来看,这两者又是不同的。如果简单地概括,消费有两个层次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满足需求,另一个是为了满足需要。需求是人类为了在社会中生活而要具备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需要是基于人的欲望而产生的要求,比如,我们要有住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住漂亮的别墅而不是简陋的房舍。当我们谈消费不公平的时候包括了需求和需要两个层次的不公平。有的人也许会说:既然挣不到那么多钱,就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平等和公平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已经不会再像古代社会一样接受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更何况,人民群众越来越有能力来分析不公平背后的原因。

2011年8月初,英国伦敦发生了暴乱,很多年轻人烧毁汽车、抢劫商店。伦敦一位青年说,参与抢劫是要把自己“每便士的价值都夺回来”。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评论说:“这不是饥饿或面包的暴乱。这是有缺陷的和不合格消费者的暴乱。”现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评论说:“现任首相凶猛的本能看起来更倾向于打开高压水炮,搬来催泪瓦斯部队,并使用橡皮子弹,同时油腔滑调地强调道德标准的沦丧,文明的衰落,以及家庭价值和误入歧途的年轻人令人悲哀的堕落。但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这里的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是粗暴得凶猛。凶猛的政客欺瞒他们的开销;凶猛的银行家掠夺公众的钱包;CEO、对冲基金操盘手和私募天才洗劫财富世界;电信和信用卡公司在你的账单上添上什么费用;店家搞价格欺诈;……这种光天化日的抢劫,而且是针对穷人、弱者、朴实的人,以及不被法律保护的人的抢劫,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在今天成为秩序。”^[1]

这里用英国的例子想要说明的是,首先,消费不公平一定会引发社会问

[1] “英国教授:伦敦暴乱是不合格消费者的暴乱”,资料来源于腾讯新闻网站,载 <http://news.qq.com/a/20110815/001067.htm>。

题；其次，消费不公平的背后一定有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起作用。

1900 元的工资我快养不活自己了——和工友叶子的交流：

下面我们来看看工友的消费情况和工友对消费公平的看法。2011 年 6 月 1 日我在苏州和叶子就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交流。叶子 1990 年出生，陕西人。他是 2006 年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的。在东莞打工了几年，现在在苏州打工。他很健谈，也有很多想法，下面是他说的话：

“至少在目前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的东西。拿我工作的厂来说，办公室比车间大，今年工资上涨，那些坐办公室的工资也上涨了。老板就是不停地压榨工人。我们工人是什么样的，租房是三百多块钱，我们又要穿要吃要喝，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长远的东西在里面，我需要有一定的钱找自己住的地方，这些都没有给工人考虑进去，就是给工人最少的钱，维持你活下去。

我一个月拿到手里 1900 块钱，我的花费：

房租：370 块钱。应该有 10 平方米大吧，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

吃饭：500 到 600 元就花了。如果上夜班，白天三顿饭都要自己解决。

衣服和零用：400 到 500 元。有时候也要买几件衣服，买条裤子也要八九十，那是最便宜的。我的衣服有的都穿十多年了。有时候也要和朋友吃个饭。

电话费：有时候差不多要一百多块钱的电话费，最后一个月工资就几乎就是所剩无几。我觉得 1900 块真的快养不活自己了。

存钱：以前在广东的时候虽然工资低可能还可以存上一点钱。现在在这里就感觉一个月存上 200 块钱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现在的主流的社会、那些精英觉得只要奋斗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生活，但是个人奋斗是需要一些基础的，或者是你应该有一些资源。比如两个人，他们学习都不错，一个是出生于有钱的家庭，一个是没钱的家庭，有钱的家庭供

他/她读好的学校，没钱的家庭就读不起，就不能算是公平。

至少应该让我们有体面的生活，至少应该是有吃有穿，也应该有长远一些的保障。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劳动法培训的时候，一个工人就说，他自己的要求很低，其他都可以忍受，只要求能给他提供房子住。但是现实是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想有一个安定的住的地方。如果你问我，怎么样算是安定的住的地方，我似乎也挺模糊的，就是始终想找这样一个地方，这五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发现根本没有的，找不到。这么多年了，就想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不是住别人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也有一个想法，把那个工厂看到的那些东西分析写出来，放在博客上让大家看到，至少有一个人看到，也许就影响了一个人。改变社会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对公益组织是有向往的，但是同时又有担心，不管多理想的事业，做久了也许就变成了一种工作、一种专业化的程序，与其那样，还不如在工厂里，不脱离自己的本色。”

我是这样归纳叶子的看法的：

- 他一个月 1900 元的工资只够维持“活下去”的基本消费；
- 能有一个自己住的地方是最低的要求，也是体面生活的基本需要；
- 不同意主流社会和精英们的“个人奋斗”观点，因为个人奋斗拼的是起点和资源，但是人与人的起点和资源差别很大；
- 从自己一点一滴做起，争取社会公平。

物价跟着就涨，还不如不涨工资——和工友欢欢的交流：

2011 年 6 月 5 日，我在苏州和工友欢欢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生活和工作现状，到对未来的打算，到对社会的看法。在欢欢的看法里，对未来的乐观和悲观混杂在一起，对现状则是强烈的不满。

欢欢，1988 年出生，安徽安庆人。初二没有念完就出来打工了。2008 年

开始在苏州这边打工。现在一个月工资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下面是她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现状,不能说成为富人,就是生活小康一点。有一个住的地方,然后就是家里面不愁吃,不愁住,可以供得起孩子上学,就可以了。在苏州我们是买不起房子的,所以这个想法在这里不可能实现。如果说我付出了努力,我得到了相应的回报,我就可以了,是在我们老家的合肥市里面,因为离他们家,离我们家都可以。如果说打算在合肥那里买房子,肯定就是在那地方住,不会说把房子买在老家,我在苏州这边上班,那我宁愿不买这个房子。不过,这个愿望现在不敢说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可能要到30岁以后。如果我和我男朋友相处得好,先结婚,然后先挣钱,然后再往前走。

工资一涨就什么都涨了,所以涨了和没有涨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我们在外面挣钱多不容易呀,我们都想挣一点钱带回家。苏州这边的人不会意识到我们在外面打工有多难,我们工资一涨,然后房租就拼命地往上涨,往上翻一番。2009年我刚到苏州来的时候,我住的是阁楼,100块钱一个月,后来我们工资涨到960元的时候,房东马上给我涨了40块钱房租,成了140一个月,听说现在我原来住的那个阁楼是200块钱一个月了。现在的房租都是260元左右了。

而且电费也会涨,我交8毛一度电,房东赚一点点;有的房东要1块;有的可能不赚,给你6到7毛一度电。

去年(2010年)年前我干洗一件衣服10块钱,然后过年回来我再去洗就是15块一件,一涨就是5块钱,真让人受不了。

涨价涨得太厉害了,还有蔬菜和肉也涨价了。鸡蛋以前是两块多钱一斤,去年是三块六、三块八,现在(2011年6月)是四块五。面条以前买一卷一块钱,现在是两块三、两块四,涨了一倍多。米的话,以前一块多钱一斤,现在是两块多钱一斤。以前五升的色拉油是十几块钱,现在都是二十几元、三十几元。

我跟我男朋友聊天,我说工资才涨一百多,物价跟着就涨,还不如不涨工资,跟以前那样。他说不是的,你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跟着涨了。我说那也不行,物价还是涨得让人受不了。”

可以这样归纳欢欢上面所说的话:

●谈到对未来的看法的时候,欢欢开始是乐观的,觉得将来自己可以过上小康的生活。

●但是,后来当谈到房子的时候,欢欢是悲观的,因为肯定在苏州买不起房子,只能在老家买房子。再一想,现在如果不回去就不想在老家买房子。最后一想,也许到五六十岁以后才能回老家吧。这样一想,小康生活的第一标准住房就达不到。

●欢欢对物价上涨和工资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有很大的不满。收入跟不上物价的上涨是对消费者最大的不公平。

三、一些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是正常的/合理的

在工友的访谈和座谈中,如果按照工友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到“社会是公平的”的由强到弱来归纳,可以有以下几个分类:

●认为社会非常不公平,工人和老板是阶级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公平;

●认为社会不公平,但是认为现在和过去相比,社会还是进步了,不能要求社会进步太快;

●社会是不公平,但是这很正常,所以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心态调节好了,就不觉得不公平了;

●认为社会不公平,但是认为不公平本身才公平,因为社会的进步就要靠社会不公平来实现。

记得在一次讲座中,李昌平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认识水平和认识程度决定国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大多数工友认同现状,或者对现状抱着不作为的心态,那么打工者社会经济地位就不会提高或者提高得很慢;反之,则不然。同时,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社会的变化虽然有突发性,但是更多的是渐进性。

2011年6月14日,我和20位工友就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了座谈。这个座谈的过程和结果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和教育。开始的讨论设计是想和工友们列举和讨论“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我们的体会”的。结果变成了对“社会到底公平不公平”的辩论。20位工友中,大概有10位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是不公平的,但是这是正常的;有5位工友认为没有什么不公平,而且认为社会不公平是合理的,就应该这样;大概只有5位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而且这很不合理。讨论过程中非常糟糕的是,我这个本来应该处于引导和相对中立状态的主持人变成了主辩方,和在场大多数工友进行辩论。从主持的角度,我很失败;从学习的角度,这次讨论给我很大的教育。

下面是座谈会上工友认为“社会不公平是正常的/合理的”的话语:

●不劳不食、有劳有食、多劳多食。

●因为有竞争,就有了贫富、等级的差距;竞争越大社会才能发展越快;不能因为有差距就抱怨社会的不公;社会是公平的。

●社会即人,人即社会;社会是在不公平中产出,在不公平中活跃,在不公平中竞争;不公平也是一种激励,是自然法则的一例;不公平的社会会一直延续,何止千秋万代。请勿妄想改变。

●自己赚的钱自己支配。

●坐公交车价格一样。

●现在社会让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了家,对一些残疾人有一些补贴。

●心态好!一切皆好!公平不是赏赐、不是索取;一切的公平源于自我!

我公平社会即公平。

●社会是公平的,不要想着不公平。

1. 贫富差距是竞争导致的

比较和竞争是人很自然和正常的心理。我们希望比别人漂亮/英俊、比别人穿得好、比别人住得好、比别人学习好,等等。但是恶性竞争和不公平竞争就非常糟糕。如果我们信奉恶性竞争、强盗逻辑和森林法则,那么我们就不用讨论这个话题了。那么今天国际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到底是不是公平竞争导致的?

没钱的人就要靠自己努力了——和工友谢永涛交流:

2011年6月5日,我在苏州和工友谢永涛就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交流。谢永涛1986年出生,湖南邵阳人。他初中都没有毕业就出来了。现在是技术工。月工资在3000元左右。下面是谢永涛的话: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公平的,我没有感觉公平,没有公平存在。

在某些方面来说我生来不幸,或者有些方面怪自己,第一没读什么书,第二家里条件也不好。钱可以让你增加自信的。为什么有些人有自信?他长得不好为什么那么自信,因为他家里的环境会给他自信。如果家里给的环境不怎么好,或者家里没有什么钱,那就没那么好了。

我认为贫富差距是正常的,为了国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的。贫富差别是竞争引起的,有竞争国家才会发展。

政府肯定也会适度改善一下穷人的状况,但是一下改变太大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会轻易改变的,不可能把钱分给我们,那国家不就遭罪了吗!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就要靠自己努力了。适当的时候给穷人一点补助。国家要进步,不可能为了一点穷人牺牲国家的命运啊。

我虽然说穷,但是我没感觉这个事情是错的。在每个国家都有穷人的,我们属于牺牲品。我没有怨过。靠自己努力,靠自己奋斗,希望过得更好。”

2. 理解当官的贪

众所周知,腐败是一个难以根除的社会问题,但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腐败成为普遍的甚至是可以接受的时候,那么一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了。

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指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他阐述道:“近些年来,社会溃败的迹象已经明显开始出现。其中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腐败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我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不要说社会利益了)。在此背景之下,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这种社会的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对此吴思先生有很好的分析;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社会生活西西里(西西里是意大利黑社会盛行的一个地方)化趋势出现;利益集团的肆无忌惮,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严重侵蚀;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是相当普遍的现象。”^[1]

谁可以纠正权力失控?不知道谁有答案。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人人都遗憾自己不是贪官,那么社会就会继续溃败。

崔永元在他的微博上有这样一段留言:

“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1] “孙立平: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载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ishi/special/daodededixian/detail_2011_02/27/4877743_0_shtml。

升官就会发财——和工友谢永涛交流:

2011年6月5日,我在苏州和工友谢永涛(简介见上)交流。下面是谢永涛的话:

“我们常说‘升官发财’,因为都知道升官就会发财,这是文化造就的,这个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扎下根了,我努力升官我的钱就会来了。我们打工的也会这样想,当老板的也会这样想,当官的也会这样想,升官发财。让他们贪呗,你贪归贪给大家干出一点活出来,你在那个位置,给大家搞点事情出来,你不能只贪,光贪不干活那也不象话,很多人心目中就是这样想的。

想让官不贪,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你监视我,我监视你,就像台湾一样的,如果都是自己人,不可能说两家话。每个人都想多党执政,但是又怕国家乱了,又怕有的党派被外国人控制。很多人会是这样的想,我宁愿我自己人贪,不让别人贪,我中国人干嘛叫外国人教,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我没有怨气。我能忍。是个人都知道,哪个地方的政府都有贪的。也许很多人会这样想,坐到这个位置容易吗?不容易啊!就这么几年不贪以后咋整!我有一个亲戚,一个堂哥,他读书不行,很垃圾的那种,他考高中没考好,复了一年考上了高中。我一个爷爷以前当过兵,他儿子在广东某处火车站有一个指标,后来把这个指标给了我那个堂哥。我堂哥本来在我们那里取个老婆都是问题,但是现在人家混得很好。我搞不清楚,国家干部怎么那么有钱呢,就在一个火车站,他去年买了一个房子五十多万。像我们怎么弄也挣不到50万元啊。

不合理的,但也没办法。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没什么希望。但是得生活啊,得挣钱,想比别人挣得多就得学东西。我没有什么怨言。要努力做事。想着政府哪天说支持我,那是做梦。”

下面是我对谢永涛的话的点滴思考:

●谢永涛很能理解当官的贪污,因为他可以设身处地地从当官的人的角

度去想问题,他认为治理贪官,唯一的手段是民众的监督。我想,谢永涛的话快成公理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官的能否充分接受民众监督。

3. 不公平,但是很正常

一切的不公平都不是正常的,但是改变不公平都需要一个过程。只要人与人有接触,只要群体和群体间有接触,就会产生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公平与否要取决于双方的判断而不是单方的。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在流动和移民很普遍的今天,某些人某些群体也许可以把不公平强加到其他人身上,但是不可能把追求公平的价值观从人们的思想中抹去。靠强权、暴力和资本来维持的不公平也会面临持续的和各种形式的反抗。

有些从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往往没有自信,认为不公平是合理,因为觉得农村贫困,农民贫穷,所以就该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往远里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从近里说,工业化离不开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这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朝着平等的方向发展才是合理的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谈到社会公平,我们都不能忘记毛主席,不能忘记我们曾经有过人人平等的历史时期(当然不排除中间夹杂矫枉过正和极端的做法)。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创造了打破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的现实。在旧社会的等级和特权下,人一出生就被烙上了一生难以改变的生命轨迹,而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被归零了,那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阶级差别重新出现,但是在新中国前30年有益遗产的影响下、在世界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应该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民主又不同于以前的道路。

社会不公平,但是正常——和工友张毅立交流:

2011年6月2日,我在苏州和工友张毅立就社会公平问题进行交流。张毅立,1983年出生,河南灵宝县人,2002年高中毕业。他对自己的现状还是不太满意,也就一直没有结婚。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问:你觉得这个社会公平吗?

答:社会发展得越快,竞争就越大;因为竞争力越大,社会才能发展的越快。所以肯定是有不公平的,有很多种不公平,不可能把任何事情都搞得很快。所以肯定是不公平的。

问:所以你的结论就是,这个社会因为发展得很快,因为竞争很强烈,所以很不公平。但是这是正常的。是吗?

答:对。

问:你觉得像你打工,然后挣一点工资,然后现在生活的情况,你觉得是公平还是不公平?

答:肯定是不公平的。

问:但是正常?

答:对,正常但是不公平;就是说虽然说不公平,可是是合理的。

问:不公平就应该是不合理的吧?

答:因为就是说有差距的,就会有贫富,我觉得是正常的。可以说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公平,我们说的公平,也是相对来说的,没有绝对的公平。

问:所以说即使这样的状况继续下去,你也不会有什么怨言,因为你觉得很正常,是吗?

答:不是说很正常。我们还是应该想:怎么样做才可以让差距变得更小一些,应该是这样的。

问:那就是说明你还是认为不正常,因为你如果认为正常,就不应该去改变了?

答:怎么说呢?不公平是肯定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农民工这种辛苦的条件,就是很不公平。给我们开的工资只是维持了我们最低的生活标准,根本不可能考虑其他的。为什么现在的工资这么低?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因为劳动力太多了。从农村老家出来上班,一个月可以拿到两千块;如果是在家里

面,每个月就没有两千块,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就是把人逼到城市,继续在这里上班。可是在上班的过程,我们和老板的关系就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关系下,肯定很多人会有抱怨的,经常发牢骚是很正常的事,有时候是很强烈的。这种不公平也不能说是好的。

问:你开始说合理,现在说不合理。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同一个事情能不能既合理,又不合理?

答:那就是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办法,所以说也是正常的。

问:那你就应该接受。你就不应该抱怨吧?

答: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就不会抱怨,如果看不到这种差距,我们也许就不会抱怨。每个人工资两千块,很好的,我自己吃得挺好,也有住的地方,我又没有更高的目标,然后我就会认为这个很合理,就不会有抱怨。为什么我会有抱怨?原因就是我看到这种不公平。

问:你看到什么了?

答:肯定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很容易看到。你走在大街上,你骑自行车,别人坐的是宝马,你看不到吗?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看到。

问:那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合理还是不合理?

答:我认为是正常的。

问:那你就应该接受,不应该抱怨。

答:应该说是这样。

问:那你抱怨什么哪?

答:我自己就在想,是什么造成这样的差别?为什么别人坐宝马,我们骑自行车?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肯定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才造成这样的现象。

问:是你自己的什么原因呢?

答: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这个原因。

问:那你发现了吗?

答:这个原因太复杂了。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然后我们跟别人相比,我们看到很多差距。说收入方面,然后就是说居住条件,还有很多,工作环境,工资待遇,等等。我现在自己租房,大概7平米的空间,一个月租金260元。

问:你觉得这不公平,是吗?

答:对。

问:你觉得这正常吗?

答:正常。

问:正常就应该不去改变了呀?

答:我觉得正常和改变没有什么联系的。我们觉得正常,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看到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挣钱去开宝马。

问:你觉得你有一天能开上宝马,是吗?

答:我觉得有可能,为什么没有可能?

问:你觉得怎么样才有可能?要怎样去实现?

答:这个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每个人都有可能,确实是可能。

问:为什么这么想?

答:你不这样认为吗?

下面是我的一点儿反思:

●张毅立一直说“不公平很正常”,但是其实这样说只是他的思维逻辑,并不是他的情感逻辑,从心里说,他认为不公平。他的一句话道出了他为什么觉得不公平的实质,他说:“看不到就不会有抱怨!”反过来说,看到了就会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有抱怨。当他骑自行车而别人开宝马的时候,他内心觉得不公平。公平是用“心”来评判的。张毅立之所以倾向于放弃“心的评判”是因为他觉得“反正也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思考问题不能把“很多人都这样”/“到处都是这样”和“正常”等同或偷换。前者是现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骗人的鬼话。可以说存在的都是有原因的，但是却不能说都是合理的。

●不能把“认为没有办法”和“合理”/“正常”等同或偷换。也就是说，一件事情你明明认为不公平，但是因为觉得自己无力改变所以就认为正常了。

“如果我是个老板，我也会这么做的”——和工友宋志浩交流

2011年6月1日我在苏州和宋志浩(简介同前)聊天，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答：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我都20多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方向。我有的时候想这个事情想到睡不着觉。有一次想了两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在厂里上班，以后怎么办，上了年纪怎么办。有一个人说在厂里干了9年，结婚了，手脚不灵活了。老板的心态就是上了年纪，动作慢了下来，就不跟你签合同了，我们就只能走人了。老板他喜欢用年轻的，因为手脚灵活，做活快。老板就是这样，你上了年龄，就把你的饭碗切断了。老板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老板的事，我说了对错也没用。

问：你认为对错呢？

答：如果我是个老板，我也会这么做的。

问：即使你是老板你也这样做了，但是你觉得这样是对是错呢？

答：老板应该没有想过，他就是想赚钱。

问：我现在就是问你，假如你是老板，你认为这样做公平吗？

答：我觉得要做好企业就要把员工的福利搞好，尤其是在心理方面的问题，吃、住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住房问题，这是最关键的，工资低一点儿没关系，住房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像厂里也有宿舍，就是集体宿舍，这么大的一间房子住八个人。怎么说呢，打工的没办法，就是这么一个命。

问：接着说你刚才说的事情。就是一个工人干了9年，他的手脚不灵了，

老了，把他开除，你现在的意思是这对工人不公平，但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就会认为公平，是吗？

答：不是。就是如果站在老板的角度就是好的，对工人来说是不好的。对我来说就是从哪个角度看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是别人之间的事。如果问我现在的感觉，我肯定认为是不公平的。

问：你的意思是说，作为第三者来判断就是不公平的。

答：对。对于老板来说，对他自己来说很好，对打工者这个角度来说是极不公平，就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的问题。

四、追求公平的途径

追求公平肯定不能靠嘴皮子。但是，有时候语言与书写也是思考的过程，也许对别人会有所启发。

1. 不要陷入支持社会不公平的话语陷阱中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从街头巷尾的议论到主流的媒体，我们往往会听到一些貌似合理但是实际上是谬论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语貌似有道理，所以人们也许就不深究了，甚至把它们当做“公理”（就像真理一样）。这里选择了几个来分析一下。只有挣脱这些话语陷阱，我们才能去思考真正的道理。

“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包括工人和农民”辨

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国家强盛。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用“牺牲工人和农民”是否真的能换来国家的强盛？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很贫困，那么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也不一定意味着中国是真正的强盛。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可以明白下面的道理。现在在中国，因为内需不够强大，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外需拉动投资和增长，结果我们受到世界经济的巨大控制和影响；同时，由于外贸用美元决算体系，结果迫使中国拥有了巨

额的美国国债。当借主欠了债主很少的钱,那么借主紧张;如果借主欠了债主很多钱,那么是债主紧张。再加上美国人通过印钞票让美元贬值,最后我们相当于送美国人钱让美国人花。一个国家,只有国民富裕了,内需和出口平衡了,那么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发展。

现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牺牲了,那么国家强大了吗?从一定程度上说,国家是强大了,可以和欧洲及美国抗衡了,可以去非洲投资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反思。

首先,我们牺牲的已经不是一代人了,30年过去了,已经是两代到三代人了。

其次,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是不是要被继续牺牲下去?我们很多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觉得如果中国经济和美国一样强大了,那么中国人也就都可以实现“美国梦”了。下面是我了解到的美国的相关情况:

●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美国成年人当中,有超过1%的人正在监狱服刑,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指出,美国在监狱犯人人数和占总人口比例两方面,都名列世界第一。^[1]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一个最新数字是:美国现有贫困人口4620万,达人口总数的15.1%,贫困人口比例在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最高。^[2]

●餐饮业工人中只有0.01%是工会会员,^[3]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一个女工告诉我,她在餐厅工作的半年,平均每个小时的收入就是2美元。^[4]

●很多美国大学生靠贷款上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负债累累了,有的不堪重

[1] “在监人数230万成世界第一,美国监狱为何人满为患”,载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08/0317/19/478SGE5K000120GU.html>。

[2] “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15.1%美国人活在贫困线下”,载雅虎资讯 <http://news.cn.yahoo.com/yopen/20110919/596421.html>,2011年9月19日。

[3] 2011年7月15日作者在纽约拜访了“纽约餐饮业机会中心”(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 Of New York)的一位工作人员。

[4] 2011年7月17日,作者在纽约采访了这位女工。

负只好退学。美国2/3大学生靠贷款读书,人均负债2.3万美元。^[1]

“谁让我没有能力!”辩

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绝对无法解释结构性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巨大,我们能说农村人比城市人能力差吗?我们可以说农村人没有城市人的学历高,但是学历低不等于能力低。还有,事实上,很多有近似、相同资质的人最后事业、工作和财富的差别是源于“家庭背景”。

总也忘不了我在美国纽约见到的一个女孩子的故事。我觉有些美国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美国式的个人奋斗和成功学在中国也非常流行。把社会结构性问题所造成的贫困强加到对个人能力的否定上面,这是一个阴谋。美国如此,中国也开始盛行。我在纽约和一个不堪助学贷款重负而退学的年轻姑娘聊天,她讲了自己的遭遇后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很无能,都不好意思说这些,我也不懂你为什么对我的生活状况感兴趣。”我听了她的话不禁震惊和悲哀,我问:“和你同样贷款上学不堪重负的人很多吧?”她说:“是。”我说:“那你为什么说怪你自己无能!和你一样如此聪明(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获得了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她是因为学费涨价和生活费贷款而不堪重负的)年轻的人却要靠政府粮票(政府给贫困人口的补贴,一个月发200美元的食品券)生活的人不少吧?”她说:“是。”在美国,大选的日子从来不定在周末或者假日,所以很多工人即使有投票意愿也很难请假去投票。在美国,被开除的员工就无权上诉雇主了,所以员工在职时不敢投诉怕被开除,而被开除后又没有资格投诉了。在和这个姑娘聊天中间,她对我说:“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富有。”我就想,这个“美国梦”植入的信息好强大呀,可以在如此严酷的现实中发挥作用。

这里想说的是,当打工子女在城市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当打工青

[1] “美国2/3大学生靠贷款读书人均负债2.3万美元”,载维普资讯 <http://oldweb.cqvip.com/ndoasp/webdetail.asp?ID=31797844>。

年不能得到公平的培训机会、当公共资源被权势和资本所瓜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来责备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这不是自卑的问题,而是不明是非和没有社会责任感的问题。

2. 打工者要理直气壮争取社会公平

打工者的看法会有不同,一些人可能认为:我在农村挣不到2000元钱,到城市能够有机会挣到钱,我已经很感激、很感恩戴德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另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们为城市发展和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得到的回报和我们的贡献不相匹配,很不公平。我觉得判断的绝对标准应该是人性所归的标准:道德的标准。而具体的标准是什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拿打工者在城市被当做二等公民来对待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不符合道德标准,既不符合社会道德也不符合经济道德。

在和工友的交流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在很多工友眼里,公平与否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下结论的直白的判断。原因是,工友在做判断的时候,不是基于自己此时实际状况的感受,而是从老板的角度去考虑,或者说,工友会想象如果是老板会怎么做。一些工友这样告诉我:“我肯定认为不公平,但是老板不这么认为,而且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会这样对待工人。”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工友可以设身处地地为老板着想到底是哪个原因?是因为理解人都是自私和利益至上的,所以接受现实;还是,为了将来当上老板以后也可以继续像老板那样,所以现在不反抗?

从社会道德标准来说,书中第三编第十二章阐述了“生活由‘当下’决定”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观点。农村的老年人和城市中的年青一代完全不同。老年人是通过个人经历的纵向对比来感受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相对隔离的社会空间里,人们倾向于纵向地来看待和评价事物。在城市中打工的年青一代就不同了。打工给打工者带来的不只是工资收入,而是整个视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在人口高度流动而且持续流动的社会里,人们通过即时和当下的横向对比来感受自己在社会中的

位置,从而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如何应该由在哪里工作和生活而决定,而不是一个人从哪里来或者老家在哪里来决定。

3. 追求机会公平/教育公平

追求社会公平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永远的争取和努力。争取社会公平也需要有人手点,机会公平是争取社会公平的起点,而教育机会公平又是机会公平的起点。

追求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是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的。在2008年3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1]旗帜鲜明地指出,“真理是思想追求的首要价值,而公平正义则是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首要价值”。2010年7月13日至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2]

本章的前面分析了教育不公平的具体表现。考虑到打工者面临的具体问题,要想解决打工者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下面几个关键点:

- 让打工者子女在城市享受平等教育机会;
- 工厂企业的上班时间应该更人性化和以孩子为中心来设计,以便父母可以有时间照顾孩子;
- 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打工群体提供廉租房/廉价房的服务,让打工者在城市住下来;
- 考虑到打工群体的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应该同时在留守儿童集中的学校和社区为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支持服务。

4. 追求消费公平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发

[1] 温家宝:“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资料来源于中国网,载 http://www.china.com.cn/2008lianghui/2008-03/18/content_12946346.htm。

[2] “温总理眼里实现社会公平‘最伟大的工具’是什么?”,资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载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12608642.html>。

表的文章“消费公平决定社会公平”，〔1〕我很同意刘副所长的观点。文中论述道：“以循环的思维来分析，起点更加重要。经济循环的起点，也就是市场游戏参与者的能力，其是否公平，是由消费公平来决定的。而作为起点的消费公平，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上一轮循环的结果——收入、财产差距。对于下一轮经济循环来说，这是既定的历史条件，无法选择。二是政府对起点的干预——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来改变消费的差距，使那些缺乏收入而无法满足基本消费的人群也能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能力，从而彻底改变‘没钱不消费’这个逻辑所造成的能力鸿沟。政府在每次经济循环起点上提供的公共消费，如教育、医疗卫生、培训、低保、救济、社保等，都会有效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包括下一代的消费能力。这种消费能力的改善可以累积起来产生长期影响，从而使每一轮经济循环的起点更加公平，为校正下一轮经济循环的公平结果打下基础。如此一来，在市场经济循环中，贫富差距就不至于快速扩大，就可以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控制好社会贫富差距。”

这里想补充的是，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对于个人来讲，应该是付出和获得相符、利益和责任并存。当我们承担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以后，社会也应该承担对我们的责任。所以，获得公平的教育、医疗和社保等并不是伸手向社会索取，而是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健康关系。

5. 追求公平工资

刘植荣在他的“世界工资研究报告”〔2〕（2010年发表）中详细罗列了中国工资水平和世界工资水平的比较，他总结道：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

界平均为70%。这些数据就是警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打工者没有劳动合同，即使有劳动合同也是企业主导的劳动合同，工人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位。在这一情况下，公平工资和其他利益根本无法保障。在“中国集体谈判论坛”网站上读到了《集体谈判制度研究》〔1〕，在2011年7月卷首语中，姜俊禄说道：“劳动法的核心在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并非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劳动合同。”这让我想到了德国。在德国，大概有20%的工人是工会会员，但是集团合同是行业合同，所以集团合同谈判下来以后覆盖行业内的所有职工，包括那些非工会会员。在德国，工会的全部运作经费来自会员的会费，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会的独立性。没有工人的组织就没有集体谈判和集团合同，也就没有公平工资。

在这一节的结尾跟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11年出版的第5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

有一天

词：孙元 曲：潘志雄

有一天 山川河流是我们的
 有一天 土地矿藏是我们的
 有一天 森林空气是我们的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做的衣服是我们的
 有一天 烤的面包是我们的

〔1〕 刘尚希：“消费公司决定社会公平”，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4月16日第5版。

〔2〕 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非洲32个国家最低收入超中国”，资料来源于共识网，载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qqsww/qqqj/article_201001206313.html。

〔1〕 “集体谈判制度研究”2011.7，资料来源于“中国集团谈判论坛”网站，载 <http://www.jtpp.cn/a/data/journals/2011/1019/2137.html>。

有一天 失去的手指是我们的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有一天

山川 河流 大地 田野

森林 空气 衣服 面包

有一天

是我们的

第十八章

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说到自由,一个人可以不明白自由的学术概念,但是人对是否自由都会有感觉和体会。在和工友的接触和交流中,我发现,工友对自由的理解和体会是很具体的,而这些具体的体会也正体现了自由的核心内容,但是这些也许往往不是学术讨论中自由概念的关注点。这里选择自由这个概念进行讨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促进学术概念的讨论直接和现实生活相联系,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或者只回顾历史而不结合现状;第二,这里对自由这样一个朴素概念的讨论是从打工者的视角出发的,这样的视角一定和其他群体对自由的体会和视角不同,这样也正好说明了概念的具体化的重要性,也说明了为什么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产生分歧、对立,甚至斗争。

在线新华词典是这样定义“自由”的:^{〔1〕}

(1)政治上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某些行为不受干涉的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通信自由等。公民行使这些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

〔1〕“自由”,资料来源于在线新华词典,载 <http://xh.5156edu.com/html5/2775.html>。

自由和权利。自由和纪律不可分,缺一不可。

(2)“必然与自由”。必然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即事物本质所规定的联系和趋势;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然与自由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必然是自由的基础,自由不能脱离必然而存在。自由不排斥必然,而是包含必然。掌握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并达到一定目的时,必然就转化为自由。必然与自由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转化和发展。

(3)不受约束:自由活动,自由发言。

(4)自作主张: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新华字典对自由的定义分成了三类:定义(1)是政治含义上的自由;定义(2)是哲学含义上的自由;定义(3)和(4)是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自由。

从政治上来讲,自由是一种权利;从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生存逻辑及世界观来讲,自由是发现和尊重规律后的结果;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来讲,我们可以有是否觉得自由的一种感受。在这里,我们姑且只涉及最后的这个自由的范畴。当自由是一种个体感受时,有些感受是绝对的,比如,腿不好使限制了行走的自由,这样的失去自由的感受是绝对的,不用比较就可以直接感受得到。但是大部分关于自由的感受都是通过对比得来的,或者说通过对比而变得清晰和明确。既然是一种感受,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谈的是谁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参照系是什么或者说指标是什么。

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样和开放,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都前所未有的地体会着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自由的信息空间。但是这些信息和视野带给我们的只是可能性,可能性和可获得性的差距越大,人们就越感到不自由。

下面的几个小话题是我从和工友的交流中提取出来的,肯定有以偏概全之嫌。希望这些和工友、农民的交流所得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朴素的启示。

一、对自由的认识和体会

1. 时间都不属于我自己,哪有自由!

下面的内容是对我和工友叶子的交流的总结。叶子的话反映了在他所在工厂的用工制度下工作的工人的体会。听了叶子的叙述和分析以后,我自己也深有感触。我没有进过工厂,主要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和家务劳动。如果问我对自由的理解,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通过聆听叶子对自由的理解,我体会到,对于很多工人来讲,他们需要的自由是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是身体不被控制和监视的自由。

叶子1990年出生,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人。他2006年年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在东莞打工了五年。2010年来苏州打工。下面是对叶子的话的总结,及我和叶子的对话。

上班时间

“在广东那边上班时没有觉得那么不自由,上班上四个小时后可以回到出租屋,又可以吃一顿饭,又可以休息。可以睡一会儿,也可以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然后接着上班。我感觉不会那么没有自由。在苏州这边就感觉特别没有自由,一整天被限制在那里。早上我们五点钟要起床,然后去厂里面,厂里面七点开始上班上到晚上七点,几乎就没有出厂的门口,一天就待在厂里,就感觉特别别扭。但是你又意识到,其实我们不进厂又能做什么呢?业务员又要不了这么多人,我们要吃饭肯定要进厂做。确实是没有自由。”

上四休二

“我现在在索尼厂,这里实行‘上四休二’。表面上看,一年365天中上四天休息两天确实休息得挺多的,一共有差不多两个月的休息时间。但是其实

不是这样,其实一年下来,我们就有30多天是属于自己的,其余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准备,为工作而准备。这样说吧,我1号和2号上白班,我3号的中午开始就要睡觉为了晚上上班做准备,否则晚上坚持不下来,这就没有了半天。3号、4号上夜班,5号白天要睡觉,那么就没有了大半天,所以这6天下来,就只有6号这一天是真正的休息了。其实就是工作5天,休息1天。”(作者补充:“上四休二”的“四”天中,每天上班时间都是十二小时,但是,加班时间却只算两到三个小时,因为去掉了吃饭的时间。这四天里的加班费都是按照平常上班的1.5倍来算的,就基本没有双倍工资了,除非加班时间在“二”天里面)

重复

“你问我,我是否觉得有受限制的感觉,我觉得那种限制还体现一点就是,你要不停地重复一样的动作。”

上厕所

“你要上厕所你就要带离位证。如果上厕所没有离位证,被人家抓到会罚款,确实是挺不自由的。”

老板要的就是你的时间

“比如上星期有一天,应该三点钟给我们下班,结果人家不给你下班了,机器坏了,需要修好以后赶产量。就让你站在那里,你玩也行,给你加班费。我就觉得对工厂来讲,工人的工资是小意思,但是你就得在车间里,老板要的是你的时间。”

“时间就是命呀。把命卖给人家了还是赚不到钱。但是有的工人会觉得很好。比如老板过年过节小恩小惠给你一些吃的,咸鸭蛋、毛巾这些东西,还组织你去吃吃饭,唱唱卡拉OK。难道这还不人性化吗?星期一让领导给你

问好,这还不够人性化吗?讽刺呀!人家都要了你的命了,你还要感谢人家!”

被人盯着

“最明显的就是时刻被别人盯着,就是做任何事情,做一个动作,做一个产品,都被别人盯着。”

怕挨骂,有精神压力

“我们车间是无尘车间,要把眼睛包起来,鼻子都包起来,只露两个眼睛,太空服一样的,就是为了降低不良率。但是有时候,有那么一个不良品,他就要骂你,要罚款,在某种程度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力。”

市场经济和自由

问:有些人说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了,大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自由了,你觉得是吗?

答:我不觉得,有钱人自由,工人不自由,工人根本没法自由。有钱人已经垄断了所有的信息,他们有了了解政府的渠道,有了了解商业秘密的渠道。如果我们去市场经济,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最多去开小杂货店,就了不起了,这个小杂货店,说不定哪天还得关门。说白了,还是出卖劳动力。这种市场经济就是不自由的。

问: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语告诉你,如果你没有体会到市场经济的好处,那就说明你没有能力。

答:这种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很多层面,包括学校里面,各种专业,为什么现在那些学社工的不去做社工,要去车间,要去当老板?因为那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人们脑子里了:“我要赚钱,我要做老板”。

2. 留下来是对不自由状态的无奈接受甚至认可

2011年10月25日,我去了重庆西永开放区。在开放区的宣传栏里看到了厂区规划,富士康规划的总员工数为10万人,并在2010年年底达到了5万人的规模。我在那里接触几名富士康的员工。据我访谈的员工估计,这里本地(来自四川和重庆)工人占到85%以上,工人流失率很大。这个厂区已经运行了两年,很少有工人干到两年的,干满1年的也不多。

我访谈了一个叫小容的女工,她1994年出生,来自重庆奉节县,在这里打工半年了,当时是一个流水线上的小组长,一个月如果一天都不休息的话工资可以拿到3000多元。她说在这里工作压力太大、太累,她打算干到春节前就辞工回家,想去学护理。她说:“无论以后在什么地方,反正不会在富士康。”

我还访谈了一个叫小彪的23岁的员工,他也来自重庆奉节县,在富士康打工快两年了。他在总务部门工作。我们聊到工资的时候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可以问一下你的工资多少吗?”

答:“公司有规定,不可以互相告诉工资的。”

问:“你觉得公司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答:“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隐私。”

问:“你觉得工资保密这样的规定是对员工有利还是对公司有利?”

答:“我没有想过,反正公司就这样规定的。”(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问了我,我觉得对员工不利。”

按照平均工资来讲,富士康的工资比其他企业要高一些,但是富士康的员工流动性是非常大的,究其原因,跟工作环境压力大和没有自由度是很有关系的。小彪和小容工作性质不同,小彪在总务部门工作,不在生产线上,从工作内容到工作时间都相对轻松和灵活,所以小彪已经快在那里工作两年了。但是,从我们上面的对话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小彪已经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了公司对信息沟通和自由交换信息的限制。

3. 几位农民的体会——人民公社和现在的对比

从这段时间的访谈和访谈分析中,我发现,年纪大的人在谈感受的时候是纵向对比的,倾向于通过和过去的比较来评价现在的状况;而年轻人倾向于通过横向对比来评价现在的状况。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很不相同的。纵向对比可以让我们总结过去,吸取历史教训;横向对比更多地提示我们如何面对现在和展望未来。

2010年8月我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北大段村做访谈,下面是村子里几个人的对话:

村电工:

“对比人民公社和现在,这时候比那时候强得多,人民公社的时候,农民吃了饭都去地里干活,吃大锅饭。不像现在,你想出来打工就打工,你想干啥就干啥。那时候物价低,原来一公斤菜八分钱、一毛多,现在好几块。社会在进步,现在生活比过去强多了。”

村小学退休物理教师:

“现在和过去比较一下,现在股份制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等于社会财富增加了。穷困的差别大了。这样下去,以后贫富差别会更大。”

一村民:

“现在盖房子,一户比一户盖得高,地基抬高了,水排不出去,就会泡坏旁边其他的房子,没办法,邻居都在盖,我也得重新盖。村里没有人管。”

村里的物理老师:

“土地不应该允许买卖,如果允许买卖的话,就会出现乞丐,就会有人家

里一无所有。因为这个地有人买啊,我卖了,钱用完了,怎么办?没钱了,社会就会动荡,没钱了就去抢啊,偷啊。”

在上面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人的评价是不同,因为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

●电工认为人民公社的时候不自由,吃大锅饭;现在人可以自由外出打工。

●村民认为,现在村里没有有效管理,村民盖房随意抬高地基,逼得邻居为了防止地基被泡坏,也得盖房。随意抬高地基的人享受了没有治理的“自由”,而被迫盖房的人被这种“自由”所害。

●村里的一位老师认为,农村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如果那样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

二、寻找自由

1. 留在这个厂就是因为觉得挺自由的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很多工友换工作非常频繁,有的一年换好几次工作。但是我也遇到一些工友,在一个厂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当我问及为什么在一个厂可以干到这么久时,工友往往提到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厂比较自由。下面就具体举个例子来看看工友的体会。

陈满贤(女),重庆奉节县吐祥镇齐岭村人,1976年出生,小学毕业,1996年2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打工了。她说她现在上班的厂子工资并不高,但是之所以这两年一直在这里上班,是因为在这里自由、心情比较愉快。她说:

“我们厂是五金厂,主要是生产窗帘杆。这里工资低,底薪1100元,加班按劳动法计算。以前一个月可以加班60小时,后来按照法律只允许加36小时,我们全部员工就罢工了,罢工之后现在同意一个星期可以加班15小时。

厂里100多人,女工多一些。多数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的一般做不了多久就跑了,因为工资不是很高,加上工作对年轻的人来说还是很辛苦的。我觉得这里虽然工资低,但是挺好玩的。我不想进制衣厂,我以前在制衣厂上过班,上了两年多,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制衣厂没货做的时候,抢货抢得打架,而且有时还要讲关系。在现在这家厂感觉轻松。老板是美国人,美国的老板比中国的老板还是好一点,一切都按照劳动法办,也不像其他厂那么黑,上班的时候可以随便走动,换岗位也可以,互相也可以简单说一下话,打电话也可以。”

2. 自己开店也难得自由

工友对自己开店和在工厂上班的看法不一样。有的喜欢自己开店,觉得不受别人的约束;有的相比之下喜欢在工厂上班,因为觉得省心。2009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和北京做过100多名工友的调查,在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两名工友中就有一名希望将来可以自己开店或者创办企业。这中间想自己开店的多些,因为创办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资金更高些。有这样打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希望可以提高收入;另一个就是觉得为自己干比较自由。但是,自己开店可以获得工友想象的自由吗?自我就业的人也许不需要承受老板和主管的约束,但是要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成本核算的压力;很多还要承受贪污腐败的成本和压力。根据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自我就业/开店的打工者每天要工作12到18小时,天天开业,没有休息日。下面两个故事可以从两个侧面反映工友开店的具体情况。

故事:睡觉的时间都很少

2010年11月15日我在东莞访谈了开快餐店的王福兰。她37岁了,1993年开始出来打工,以前在工厂做过。两年前生了女儿以后,因为需要休养,而且带女儿也不好找工厂,所以就与丈夫一起开了一家快餐店。她告诉我:

“这家店前期投入花了两万元，每个月的租金一千三百元，再加上水电，合起来一个月要一千五百多元。生意还可以，但是现在物价太高，所以赚得也不多，一个月除掉开销之后，两个人一共也就四五千元左右。很辛苦，早上七点钟要起床，晚上一两点钟才睡，所以睡觉很少。开店比起在厂里打工，要自由很多，而且感觉会好些。反正是自己的。不过我老公早就不想做了，觉得太累了。的确太累，从开店以来我瘦了二十多斤，但是我还是想继续开。老公说不开店后再慢慢看做点其他的。在老家做生意也不好做，以前在老家的镇上也卖过衣服，但是没有什么钱赚，做同样生意的人太多，除非有什么本钱生意就好做。我们这一行现在也不太好做，主要物价上涨得太快，卖高了没人吃，卖低了又没什么利润。”

3. 给工人灵活工作时间的一家小型乡镇企业

很多的现代企业都实行了所谓的规范化管理，在我看来，规范化往往意味着：以企业为中心、以生产为中心；缺少甚至丧失人性化或者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

2011年10月我去了四川省金堂县。金堂县是全国最早组织农民外出打工的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同时，金堂县也是全国最早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创造条件的地方，1998年就建设了第一个“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园区”。在金堂县，我有机会访谈了一位返乡创业的女企业家。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她给我讲述了她的打工经历、创业经历、扶持他人创业的经历等。她的企业里的人性化用工模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知道她的这种管理模式在大城市、大工厂一定被看做不规范和落后的，在乡镇企业中也不一定得到提倡，但是我在她的企业管理理念中看到了最珍贵的东西：让管理模式适应人的需要。这样的企业管理模式是工人获得自由的前提。下面是周总的部分谈话内容：

“我老家是金堂县赵镇的，1970年出生。我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因为

当时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差的。我1988年高中毕业后，在县里的国土局工作了三年，工资每个月70块，觉得工资太低了。别人说外面的世界好，就想往外面跑。1991年年初，县里劳动局帮助中外合资公司招工，是一家美国的合资公司，做蚊帐的。我就去了，我们一起去的有40多个女孩子。当时工资一去就是400块，哇！高了好多倍了嘛。1992年的时候，经过老乡介绍，我去了珠海一家织衣厂，工资一下子涨了一倍，一个月800多块，有时候可以到1000多块。后来又去了东莞的一家鞋厂，因为那里老乡多些。1994年下半年，我开始在东莞卖菜。我开始拿了一个摊位，后来又要了几个摊位，最多的时候我有6个摊位。我雇人帮我卖菜。一直做到1998年。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1万多块，不好的时候一个月也有2千到3千，反正没有赔过。

做到1998年的时候我大概就有十一二万块钱的存款了。存了那么多钱的时候了，我妈就说叫我回家。回家之后，在我表叔的技术支持下，我开办了猪鬃厂，一直做到现在。在这十多年中，我又支持我们当地其他人开办了十多家猪鬃厂。

现在我厂里有80多个工人，上个月的平均工资达到了1800多块。我们是计件的，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挣到3000多块，最少的也有几百块的。我们的管理制度跟外面不一样。我们那里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女的；她们的老公基本上都是在外打工的；土地现在基本上是转给承包户了，都没有土地了；她们在家里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所以我们的上班时间和管理机制就是要让女工既可以上班又可以照顾家里的事情。别的厂是上午8点和下午2点上班，我们这里上午10点钟来也可以，下午5点钟来也可以。大家很自由的。女工如果有事，一天两天不来我也不管，但是十天半月不来就要跟我讲一下了，因为有时候会赶货。反正就是很人性化的管理。

我们厂旁边有好几个食品加工厂，他们对工人的管理就很严格，早晨必须按时上班，上个厕所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厂里的工人别人请都请不去的，他们厂的工人只要我要，他们就要跑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的工资也不高，

一个月也就是1000元多点儿。”

三、“无奈选择”就是没有自由

无奈选择是在无法实现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其他选择。回顾书中打工群体所面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处处面临的都是无奈选择。

在打工者的归属问题上,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是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不会预想到的现状。十年和二十年前,多数打工者接受在城市打工而最终返乡这样一个归宿,但是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同了。在第一编第六章,本书讨论了“主动选择和无奈选择”。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提出了“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的概念。调查对152名工友进行了访谈,在被问及“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时,多数(65%)工友回答说“回老家”;在被问及“你以后的打算是什么?”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9%)的工友回答说“回老家”。第一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无奈选择,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来说明工友的主动选择。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在城市生活,就应该可以选择归属在城市,这样的主动选择并不是无理要求,而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道德选择。

我们都熟知“用工荒”现象。在第三编第十四章本书详细讨论了这个现象。打工者在和企业的角力中处于弱势,但是打工者的力量在于用脚投票,就是离开,这是弱者的武器。使用这个武器使得打工者工作和生活不稳定,但是离开和跳槽是打工者无奈的选择。像机器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是无奈的选择,离开这枯燥的没有前途的工作也是无奈的选择,必须继续打工又是无奈的选择。劳动本应是创造财富和创造幸福的途径,劳动本身本应是快乐的,但是在今天,劳动变成了一种无奈选择的工作,这让劳动和自由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和逻辑。

人的不自由还体现在心灵的迷失上。一个人如果有方向,一旦实现不了,会觉得不自由,但是仍可以继续努力。一个人如果找不到前途、没有了方向,那么连不自由的滋味都体会不到,就更不知道自由的滋味了。工友宋志浩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我都20多岁了,还没有自己的方向。我有的时候想这个事情想到睡不着觉。有一次想了两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想去厂里上班,以后怎么办,上了年纪怎么办。”工友张毅立对我说:“现在我就是很多事情也想不明白。我现在一直在想,20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把自己的目标建立在将来活得更快乐还是活得更更有钱,这个我想不通。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

自由和方向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找,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也是跌跌撞撞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单纯的“有钱”绝对不能给一个人带来真正的自由。《金融时报》2011年4月26日报道:^[1]“中国最富裕的一批国民当中,接近一半的人考虑过投资移民……亿万富翁中,约27%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如今,无论是最普通的人民群众,还是投机资产泡沫获取暴利的商人、抱有实业之心的企业家,乃至位高权重的官老爷,每个人似乎都在抱怨工作生活的苦累艰辛,生存环境的恶劣危险。”中国政府不缺钱,但是中国人民失去了方向更失去了安全感。难道中国人的自由只有在国外才能找得到吗?到了国外就找到了吗?穷人出不了国就永远也找不到自由了吗?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11年出品的第5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

[1] “找出中国新富移民的根源”,资料来源于金融时报中文版网站,载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267>。

未来时代

词：全桂荣 曲：姜国良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在经济的绞索里被宰割变卖
我们是这个星球上的主人
却在自己建造的家园里疯狂变态

在权势的尸堆上糜烂腐败
当脓血混杂着流淌在外
苍蝇和蚊子腆着肚子尖叫
复仇者的牙齿也合了起来

在丑恶的现实中看不到理想
看不到希望也看不到未来
是谁掌控了我们的脑袋
不再用朴实的真理做热烈的喝彩

在丧失自我的现实里没有了理想
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未来
是谁掌控了我们的脑袋
不再用朴实的真理做热烈的喝彩

让我们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力量和信念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
去开创属于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释放出澎湃的热血

理想和生命在手中主宰
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
去开创正义与公理的时代

第十九章 道 德

这里选择道德这个概念是基于下面的考虑：第一，一个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的时候，公平和正义自然得不到伸张。今天，打工群体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与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直接相关。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进而谋求打工群体的公平合理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需要依靠打工者自身，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打工者对道德的看法和他/她们自身的道德水平。第二，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会用法律来规范，但是道德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就是道德越来越人性和民众化的过程、就是人民的道德逐渐被法律所保护的过程、就是人们不仅用道德去衡量他人也同时主动来要求自己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讨论道德问题可以促进我们对很多其他关键问题的讨论，包括前面讨论的公平和自由的问题。第三，由于一些道德宣传过于说教和空泛，所以在社会上尤其在年轻人中间有一种对“道德用语”的反感，但是这不等于年轻人真的不讲道德，所以，我感觉我们有必要在新时期用非说教式的方式来对道德问题进行讨论。

维基百科对道德的定义是：“指衡量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

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道德和文化有密切关系，有些时代又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人类的道德有共通性。不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1〕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问题，这里把道德分成了三个层次：

- 第一道德：每个人都有争取生存和劳动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
- 第二道德：不因为实现个人的发展和追求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 第三道德：承担社会责任。

可以这样从上面三个层次来分析打工群体的状况，从第一道德来讲，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是他/她们的生存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从第二道德来讲，打工者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并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既得利益者不应该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损害打工者的利益；从第三道德来讲，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国家、政府和全体人民的社会责任。

提倡道德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2011年温家宝总理展开了一系列的网友对话，在谈到房价问题的时候，总理说：“在这里我也想说一点对房地产商的话，我没有调查你们每一个房地产商的利润，但是我认为房地产商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你们应该对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你们的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2〕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的时候，更是强调了道德的问题。温家宝总理指出〔3〕：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绝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

〔1〕“道德”，资料来源于维基百科，载 <http://zh.wikipedia.org/wiki/道德>。

〔2〕“温家宝与网民对话就抑制房价说：我还有信心”，资料来源于人民网，载 <http://house.people.com.cn/GB/14016030.html>。

〔3〕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资料来源于人民网，载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8740639.html>。

势人群的福祉。

在和工友交流的过程中,我往往使用良心这个词,而较少使用道德,因为良心更通俗和口语化。良心是自己内心深处本能的对是非的判断。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我的良心告诉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良心和道德有很多重叠,但是它们也有不同。道德观念会更多地结合社会化的东西,而良心更本能一些。这里我们不去深究概念了。

一、工友对道德和良心的看法

“到底什么是良心呀?”——和工友叶子聊天

2011年6月1日,在苏州访谈了工友叶子(简介同前)。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问:你觉得咱们这个社会那些老板或者是工友之间,大家还会按照良心做事吗?

答:这个年头怎么会谈良心,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每个人头脑都发热,都是想去赚大钱的。我觉得你要是问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关于良心的问题了。

问:你很有良心吗?

答:什么叫良心?我真的不知道。

问:你有没有良心,你自己觉得?

答:要是问我,我肯定觉得有。

问:对啊,那你为什么说别人没有?

答: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真的感觉不到,真的。都想着去疯狂的赚大钱,谁还会想这么多,所以才会有毒黄瓜那些东西出来。

问:但是工友,你身边的工友,他们没办法去坏良心,去赚大钱啊?

答:我觉得他们整天忙着上网、上班,要不就是陪女朋友,还会做一些梦如何去当老板。怎么看得到什么良心呢?

问: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用来判断有没有良心的标准。

答:是,不搭边。我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大家就是很浮躁的。说到良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看。可能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东西。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挺行尸走肉的了。你觉得良心到底是什么呢?

问: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我觉得良心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你,不用讲大道理,人凭心来判断的对与错。良心这个东西只要你是人,你有人心,你就知道。比如说毒黄瓜,不用去讲,所有人都知道,没良心。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良心,大家就不会去责备毒黄瓜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良心,但是会不会按照良心做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一个人明明知道坏了良心但是还是去做,那是因为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一些欲望淹没了他的良心。

从叶子对话中,我的体会是:

●社会中的很多现象表面上和良心并不直接相关,比如:年轻人上网、很多人浮躁等。如果一个年轻人不求上进也不关心社会,那么只能说他/她不具备第三道德(在本节的引言部分,我把道德分成三个层次,第三道德指的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但是不能说他/她不讲良心。

●“赚大钱”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怎么赚到的大钱。“毒黄瓜”的事情是人人喊打的,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良心不容。但是靠打工者廉价劳动力来赚大钱这个事情却不是人人喊打的。就像前面一个工友说的:如果我是老板我也会那样对待工人。在这样一个道德观双重标准(我是工人我认为不公平;我是老板我就认为公平)的情况下,追求社会公平和打工者权益的保护就步履艰难。

老板要赚钱,就是要想办法压榨工人——和工友叶子交流

问:我最近读到一位教授的书,他谈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

盾。他说利益之争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它意识形态化。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他的意思。比如说,工人和老板,有利益的纷争,他的意思是利益的纷争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就让工人可以去提自己的意见,跟老板去权衡,这样就不要把它看成是敌我矛盾或者是阶级矛盾。你怎么认识这样的一种看法?

答:我觉得这是鬼话了,如果是那么容易的话,要政府干什么,政府也可以关门。这本身就是对立的阶级,老板要赚钱,就是要想办法压榨工人。

问:假如说,你因为什么样的机遇,你变成老板了,你的意思是你会变成另外一个阶级吗?

答:肯定的。老板赚钱,再有良心也是压榨工人的。

问:我觉得我们也不应该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不要市场了不要老板了。那你认为是不是说只要有企业有市场,就一定会存在剥削压迫和矛盾呢?

答:这是肯定的。除非你是国企会好一些,私有企业阶级肯定特别厉害。国有企业都有一种民主参与,那就是不一样了。以前的国企跟这个不一样,里面的管理所有的工人都可以参与起来,现在这种工厂,就不是国家有一定的控制权,而是处于私有的。

和叶子的对话引发了现在中国社会避而不谈的一个话题:阶级斗争。我的思考是:

(1)老板/资本家是不是都不讲道德?

(2)在现在的社会状态下,是不是讲道德就当不成老板?

(3)资本家和工人是否有不同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不同的道德标准?

“老板对别人可以不讲良心,对我(亲戚)应该讲良心吧!”——和工友杉杉交流

杉杉 1990 年出生,2007 年开始出来打工,一直都是在苏州。2011 年 6 月

9 日,我和杉杉聊天。杉杉告诉我,她最开始在一个亲戚开的小厂里打工,厂里有二十来个工人,所有人没有社保,所有人每天都上十个甚至十一个小时的班。老板,也就是她亲戚,还拖欠工资。下面是我们的一段对话:

问:你觉得老板讲良心吗?

答:我以前在一个亲戚开的厂里上班,我喊老板的爸爸为爷爷,还是比较近的亲戚。他完全没有把我当亲戚看待,做事做错了他会骂,然后工资还不给结清,也不给我交社保,每天工作时间十个小时,每周上六休一的那种,我觉得很多都是违法了,已经侵害了我的权利了。

问:他对所有工人都那样,并不是针对你吧?

答:对。厂里其他人说我是皇亲国戚,就是说我是老板的亲戚,但是实际上老板也没有把我当他亲戚。对亲戚就不要那么狠嘛。

问:对别人怎么样没有关系是吗?

答:对别人?这方面我没有去想。我就是觉得他是我的亲戚和长辈,他应该照顾我。他后来还拖欠工资,我就不干了。看在亲戚面上,我没有去告他。我就是觉得我不干了,他再侵害别人和我也没有关系了。

和杉杉的对话给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1)和杉杉的聊天中,她对亲戚抱怨的原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抱怨的不是她亲戚的行为本身,而是她亲戚没有区别对待她。我们假想一下,如果杉杉的亲戚对她有别于其他工人,没有骂她、没有克扣她的工资,那么杉杉是不是就不会抱怨了?

(2)很多时候,我们只在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才会抱怨,也就是说,在不公平甚至违法的社会现象面前,只要事不关己,很多人的态度是就是视而不见、听而未闻、满不在乎。其实这样的道德水平最后会伤害很多人,也会伤害到自己。杉杉告诉我,她后来去了其他的工厂,继续遇到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待遇,她感觉对未来非常迷茫。

(3)工人的道德水平将最终决定老板的道德水平。

(4)前面我讲道德分成了三个层次。当我们只关心第一道德,而不关心第二道德和第三道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第一道德都无法保证了。

二、工友的道德选择

“那个工作太没良心了,就不继续做了!”——和工友赵恒平聊天

从赵恒平的故事里(故事详见第一编第一章的“工作很不稳定”一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没有良心,那就是:欺骗顾客是没有良心的。很多时候,定义一个概念是很难的,但是当我们拿出一个实例的时候,就很容易理解。2010年6月24日,我在北京访谈了赵恒平。赵恒平的话给了我下面的思考:

●赵恒平说,卖商业保险不是人干的,因为其实就是内行人骗外行人。是什么原因让“欺骗顾客”成了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呢?

●我认为那些靠欺骗卖出保险的人违反了我所说的“第二道德”。一个人如果快饿死了而偷了别人的吃的,没有人会去谴责;但是一个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富裕而骗了别人是违反道德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和社会是否谴责这样的一种不道德? —

●赵恒平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去骗人,所以他自己选择离开。他的选择不是社会要求的,而是自己良心的驱使。

“商人就是利益最大化”——和工友陈若水交流

我们不能掉进一些迷惑人的话语陷阱里。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财富,给很多行业带来了商机,这些是好事。改革开放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商人为了牟利不择手段,所以人们会发出“商人就是利益最大化”的感叹。但是问题其实不在商人和商业活动本身,而是商业规范和商业道德的问题。

2010年7月1日,我访谈了当时在深圳工作的陈若水。若水是湖南株洲人,1980年出生,初中毕业。家里5口人,爸爸妈妈在农村老家,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也在外面打工。若水1997年开始外出打工,在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地打工有十多年了。

下面是若水讲的他做豆芽的故事:

“1998年,我跟我姑姑、姑父学的做豆芽和卖豆芽,她当时在番禺一个菜市场搞蔬菜批发,她们也自己做豆芽批发。后来我想自己做豆芽,为了不抢我姑姑的生意我就去深圳那边找地方,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地方,而且对那边又不熟悉,当时就没有做。

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大舅舅合伙做豆芽。我一直有这种想法,我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成为一个有钱人,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要钱来实现。其他的东西我就不会,做豆芽来钱比较快一点。

做豆芽成本高。要挖井,而且是深井,因为它的用水量是非常大的,每隔三个小时就要淋一次水。还要盖棚,还要买做豆芽的材料。做豆芽不能在市中心的,要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用的水是没有受污染的,是比较清洁一点的水,要不然做出来的豆芽就很容易烂掉或者变成其他的颜色。

做豆芽比较辛苦。豆芽需要每隔三个小时淋一次水,晚上也是,早上还要3点钟起床去运豆芽,正是一天最好睡的时候。因为我们做的豆芽是放在批发市场去卖的,豆芽本来靠的就是薄利多销,一千多斤豆芽,我们用人力三轮车拉到批发市场去批发,一车是800多斤。我们那个时候3点钟起床,一般运豆芽要2个小时,5点钟左右全部运到市场上,5点钟开始批发,7点钟左右要批完,1000多斤的豆芽在2个小时要卖完。有的时候碰到大的客户的话就特别快了。

豆芽销售最大的客户是工厂,因为豆芽很便宜,一般厂里面的食堂至少一周会吃两餐豆芽,多的会吃四餐。豆芽一个是很便宜,另外一个是很方便,

往锅里面一倒,放点调料就可以吃了。但是,在工厂里面的工友一看到豆芽就反胃,因为是用锅水煮出来的,只放了一点调料在里面,捞上来就给人吃。一般是不会炒的,放一点水然后把豆芽往里面一扔,油盐什么都往里面一洒。因为量太多了,根本没法炒,几百个人的厂,上千个人的厂,菜大多数是煮的,我们家里喂猪的时候就是大锅煮。

那个豆芽不像家里做的豆芽,这里的豆芽从下豆到变成豆芽,只要五天就可以卖,用的激素特别多,有增白、增肥、无根的很多种激素,敌敌畏有的时候也会用上,用的量小。

2003年的时候一直在闹‘非典’,那个时候生意非常差,我们找的那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做出来的豆芽不漂亮,应该是水源不好,总是带有一点黑色,销路也不是很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一直没钱赚。到下半年的时候就不想做了:一个是没赚到钱;还有一个原因,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无奸不成商,有的时候做出来的豆芽有点烂了,但是只要有人买你还是会把它卖掉。作为一个商人就是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像我们那个时候,明知道这个豆芽卖出去给人吃了会不好,但是又想赚钱,这样时间一久人会不舒服,后来我就不想做豆芽了。”

从若水做豆芽的故事里,我有下面的一些思考:

●若水说,为了快速生豆芽他们会加很多激素,甚至敌敌畏。这样的做法不知道是否很普遍。若水做了半年豆芽以后就不做了,一个是因为赶上了2003年“非典”没有赚到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觉得昧良心久了,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若水通过良心的自我约束不再做有害健康的豆芽卖了,但是市场上的豆芽估计都是和若水一样的方法做出来,大家都在吃,做豆芽的人也没有因为良心发现而停止生产或者生产健康些的豆芽。所以说,良心和道德是不能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的。

●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道德败坏,是因为按照道德良心行事的人靠自觉,并且得不到体制的鼓励;不按道德良心行事的人不仅不受惩罚,而且得利。

●若水说:“商人就是利益最大化。”我同意若水的观点,但是,我不认为是商人导致了道德败坏,商人道德败坏是因为商人牟利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导致的。

三、“讨命钱”下老板的选择——道德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从我的工作性质来讲,我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工厂或者公司的老板。即使有机会接触,这些人也不会接受我的访谈。下面讲的故事是一位在公益机构工作的朋友讲给我的,是她真实经历的故事:

“我的一位亲戚找到我,说我们重庆奉节县的老乡出生产事故去世了。厂方说给上了社保,不想再给予其他任何赔偿。请的律师又只会跟厂里争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只好请假来到东莞。出事的老乡叫王开达,他去世的时候34岁。2009年1月出的事故。他当时在东莞塘厦一家机械加工厂工作。他是技术人员,负责售后的技术服务。出事时在厂里工作了6年。他家里还有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子。他妻子当时在塘厦的一家电子厂上班。儿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

我们无法得知事故发生的具体过程,因为跟他一起去的另一个技术人员被他们厂方给藏起来了,不让我们见面。

他死了以后,家里就来了一堆人,他的爸爸、妈妈、儿子、妹妹、表哥、叔叔。还加上本来就在东莞这边打工的他的几个表弟。厂方要求他的亲属过来的,厂方安排他们住宿吃饭。”

(第一天)

“我过来之后,有一个部门经理正好就在宾馆那里和家属谈这个事情,他说补五万块钱就很好了。我当时就说:‘补五万块钱太少了,也不合理,人的生命是没有价钱的,你们给五万块钱就想了事,那是不可能的。’

当天晚上,我们就把我们要求的补偿列了出来:

●他儿子现在11岁,还需要上7年学,需要多少钱;还有他18岁之后上大学的钱,我们也要算下来;

●然后就是他父母。他父亲59岁,差一岁到60岁,社保就不赔;母亲差三个月到55岁,社保也没得赔。我们按照他父母可以活到75岁这样算的生活费;

●还有是他妻子的抚恤金。在《工伤条例》里面没有妻子这一块补贴,因为她自己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她自己可以劳动。但是我们觉得至少从精神伤害角度要给她一些抚恤金。

我们把这些写到一张纸上,加起来大概有八十万元。”

(第二天)

“第二天我们去厂里。厂方请了他们一个法律顾问过来,法律顾问说:‘这个事情你们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死者他在工作当中是操作违规了,具体的过程我们不想再提了,反正他就是违规了。’

我说:‘这样啊。不过呢,虽然我不是很懂法律,可是我也看过《工伤条例》,不管他是否违规,还是机器发生故障,在《工伤条例》里面都是无过错责任。’

我这样说了以后,那个法律顾问就说:‘还有一点,《工伤条例》说了,厂方买了社保,是可以不用再赔偿的。’

我就说:‘《工伤条例》也没有说厂方就不赔;它也并没有写明,厂方不需要再承担任何责任。毕竟王开达在你们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他对你们厂做出的贡献难道就值这么一点点钱吗。而且他这个人就是在这里没有了,那你们厂方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第三天)

“这一天,厂方的关键人物都没有出现。一个厂里的经济顾问在那里跟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说:‘我是学经济的,工厂都要讲究成本核算的。如果厂子垮台了,大家都得失业。你们要求厂里给一个人就赔偿那么多,如果再出事故,那厂里怎么能够承受得起。’

我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认为,你们的成本核算不应该把宝压在工人不出事上,你们应该核算如何加强工伤预防,在预防上投入到位,就不用花大价钱进行赔偿了。更何况,生命的价值是无法衡量。人都没有了,你跟我算什么经济账呀。’”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

“然后等一天没有消息,等两天也没有消息,就说他们在讨论。我们天天在宾馆里等,吃饭也不给我们钱了。厂方支付的宾馆费用押金也已经不够了,他们也不来支付。到了第三天,一个部门经理过来说:就给10万,不会再多给了,这是最大限额的一个数目了。”

(第七天)

“已经是腊月了,要过年了,这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王开达这个人平时工作特别勤奋,和工友的人际关系也很好。得知他死了之后,工人自发捐款就捐了两万块钱。没有任何人说提出要捐款,就是工友自发的,这个人一百、那个人两百的。有一个工友给王开达的老婆发短信说:‘明天要出货,后天全厂吃团圆饭。’吃团圆饭就意味着要放假了。这样可不行。我们马上商量对策。”

(第八天)

“我们研究了整个厂区的情况。厂区是封闭的,有三个铁门,电动的那种。我们就叫两个老人一个人守一个门,母子两个守正门,就站在门那里,不让出货。死者的儿子就抱着父亲的遗像跪在那里。

他们厂方报警了,来了很多警察,联防队的也来了很多,开了一车人过

来。这些人看了一下情况,看到那个孩子抱着遗像在那里,他们也没有说话,也没有干什么,就在那里看着。有一个警察过来找我,他说:‘你们这样做还是有点踩线了。’我说:‘踩不踩线我还真不清楚,我也不懂法律,作为一个家庭,一条生命没有了,又得不到相应的赔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那个老人家跟我说了,如果拿不到赔偿他也不活了。’

最后劳动站的站长劝我们,说不要干扰厂里出货,他保证给家属一个满意的答复。有了站长的话,我们才放行。”

(第九天)

“厂方还是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给我们答复。我们就去劳动站。让死者的儿子一直跟着站长不离开,走到哪里跟到哪里。最后站长急了,直接给香港的老板打了电话。老板是女的,香港人,她在香港,一直就没有回来。厂里很多管理人员也是香港的。”

(第十天)

“估计劳动站站长的电话起了作用。厂方终于找我们谈了,而且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厂方的代表说:‘现在我们都诚心诚意来谈,你也不要说80万,我们也不说那个10万,我们就诚心诚意谈,你现在给我一个数,到底赔多少?我就说:‘小孩子的12万,没得谈,是一定要给的,然后就把父母生活费减了一下,合起来26万。’厂方减去了社保赔的8万多,在社保的基础上答应再补偿18.8万。”

听了朋友给我讲的她斗智斗勇的真实故事,我被她的智慧和勇气所折服,为死者和家属悲哀,为无数其他没有获得些许赔偿的死伤工友不平。

我的感触很多:

(1)厂里那个法律顾问的角色。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懂得《工伤条例》里的“无过错责任”,那么法律顾问对死者操作违规的无端指责就会造成家属的心理弱势。可见工厂法律顾问的角色不是维护法律的公正性,而是欺骗不熟悉

法律条款的工友和家属。

(2)厂里那个经济学家的角色。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懂得一个最朴素的道理:生命无价;如果不是我的朋友懂得劳动保护投入是工厂必须的投入,那么经济学家草菅人命的逻辑会让死者家属觉得很不正确却无言以对。

(3)我不知道是否该感谢劳动站的站长。

(4)最重要的一个体会,也许也是并不让人吃惊的一个体会:这个工厂的老板的选择并不是基于道德的选择,而是基于各方压力的无奈的选择。但是,这各方的压力却是以道德为坚实后盾的。而且三个层次的道德同时对工厂产生压力。

(5)如果没有我的朋友的帮助,估计她的老乡很难拿到那么多(虽然并不多)的赔偿。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自身不掌握道德武器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为自己争取公平。问题是,拥有道德武器的前提是一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

如果我们不具备反驳那个法律顾问和经济学家的思想和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护自己利益的道德观念和在这个观念指导下所能拥有的道德武器。

在这一节的结尾跟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07年出品的第二张专辑《为劳动者歌唱》中的一首歌曲

劳动者赞歌

曲:韩国歌谣 词:孙恒

离开了亲人和朋友,
踏上了征战的路途;
为了生活而奔波,
为了理想而奋斗。

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有智慧和双手,

我们用智慧和双手，
建起大街桥梁和高楼。

风里来雨里走，
一刻不停留，
汗也撒泪也流，
昂起头向前走。

我们的幸福和权利，
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
劳动者最光荣！

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
劳动者最光荣！

第二十章 家在哪里

说到“家在哪里”，与其相对应的可以是“魂归何处”，也就是说，提到家的时候，可以包括几层意思：第一是物质的家。指的是居住的空间，主要指的是住房。本书列举了很多关于住房和居住条件的调研，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第二是情感归属的家。这又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对家乡和父母的情感牵挂和依恋；另一个是小家庭中夫妻、情侣的情感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状态。本书列举了很多关于家庭团圆状况的调研结果，并进行了相关的讨论。第三是精神诉求。一个人也许有住房、有家庭，但是他/她仍然觉得迷茫，因为他/她也许对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或者“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对于打工群体来讲，尤其是新生代打工群体，在物质、情感和精神三个层次都存在很大的缺失和问题。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样严重的社会现象，所以才进行了这个研究，才写了这本书。

“家在哪里”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问题。不同人的能力、特长和特点不同，他/她对“家”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会有不同。但是，当一个人数巨大的群体同时面对着“家在哪里？”的迷失和“无家可归”的惨状的时候，“家在哪里”的问题就不再是个体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中国现在有

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就是人数庞大的打工群体面临“在城市待不下”和“回农村回不去”的迷失状态。本书的主旨倡导就是:当打工群体已经做了主体性选择以后,社会和政府应该本着公平和道德的原则和打工群体一起建设转型社会、和谐社会。

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导致割裂是移民的特点。对于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来讲,这种割裂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家庭不能团圆。

(2)生存、发展所依靠的地点不能给移民以安全感,导致生存地、发展地和安全地的物理断裂,同时导致移民精神归属的臆化。

让我们回顾一下表8(见第一编第三章“家庭团圆”一节)所反映的情况。表8是深圳某厂某车间工人家庭团圆的状况。丈夫、妻子和孩子全家团圆的比例只占21%,其他家庭都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割裂的方式不同,主要是孩子和父母分离。

让我们回顾一下表3(见第一编第二章“下班之后‘不能回家’”一节)所反映的情况。表3是东莞某厂某车间工人买房和盖房的情况。34名工人中有20人(占59%)有房子。有房子的工人中,除了一人在打工地深圳买房子了以外,其他人都在在老家的镇上/市里买房,或者在老家的村子里盖房。这样的现象就是我所说的“生存地、发展地和安全地的物理断裂”。打工群体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已经持续了30多年了。第一代打工者和新生代打工者的打工动机和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农村和农业不能给人们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打工者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由于城市房价高、生活消费高、对打工者子女教育区别对待等原因,打工者在城市无法安居、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所以,就导致了打工者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在老家买房和盖房这样的一种精神臆化。

在老家有房子所带来的安全感也许只是一种想象。一些打工者的确在老家买了房子或者盖了房子,但是这就真的能实现老有所居和老有所养吗?

不一定,因为:(1)如果农村和农业进一步溃败,如果小城镇的发展举步不前,那么打工者即使在老家有住的地方也难以维持生计;(2)当老人没有自理能力以后,哪个在外打工的子女可以长期回老家照顾父母呢?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会首先考虑建设物质的家。精神是在物质的基础上发育出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建设物质的家,那么精神的家就会与之相统一地发育出来。但是,当一个人物质的家处于割裂状态的时候,那么一个人的精神必然臆化。

一、“我就是要在(苏州)这边上班,不想回家”

——工友谢永涛的看法

2011年6月5日,我在苏州访谈了工友谢永涛。我们交流了对“家在哪里”的看法,谢永涛1986年出生,湖南邵阳人。他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了。下面是他的话:

“我就是要在这边上班,不想回家。

我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我们一家7口人,只有一亩五分田,一个人吃都不够,哪能养这么多人。我还没有娶老婆,我弟弟还没有娶老婆,等都娶了老婆就更没有办法了,怎么吃?怎么住?不可能的事情。

我已经定亲了。等生了孩子以后,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可以在老家带着,但是要出来到城市读书。为了小孩,为了下一代,我必须在外打工。就是说,希望孩子在外面长大,哪怕自己苦一点,也不希望放在家里。

我们不能把目标定得太长了,根本没用,现阶段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你说我想在苏州买房子或者安家,我肯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办不到呀。最便宜的房子要三四十万,好一点七八十万,打一辈子的工也没有这么多钱呀。”

谢永涛的话给我的体会是:

●从生存角度来讲,谢永涛全家7口人在农村家里一共才1亩5分田,根本无法生存。这就是本书第二编的题目:回不去的农村。

●从安全角度来讲,打工一辈子也无法在苏州买得起房子。这就是本书第一编的题目:待不下的城市。

●从发展角度来讲,谢永涛想得更多的是下一代的发展,所以他说:“希望孩子在外面长大,哪怕自己苦一点,也不希望放在家里。”这就是本书第三编的题目:迷失在城乡之间。

二、“体面的生活的第一步是有自己的地方住”

——工友叶子的看法

2011年6月1日,我在苏州访谈了工友叶子(简介同前)。我们交流了对“家在哪里”的看法:

“至少应该让我们有体面的生活,至少应该是有吃有穿。低保是一个方面,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应该给我们长远一些的东西。有一次和一个工人聊天,他也说:‘我自己的要求很低,只要求能给我提供房子住,其他的我都能接受。但是现实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想有一个安定的住的地方。

如果你问我,怎么样算是安定的住的地方,我似乎也挺模糊的,就是始终想找这样一个地方。这五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发现根本没有的,找不到。这么多年了,就想在城市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不是住别人的,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肯定不会回农村。农村不属于我们,城市也不属于我们。我有时候会想,去找一个小院吧,去城市的边缘找一个小院。但是我知道这是幻象。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要改变,不改变就没有办法生活。真的逼得人没有办

法了。”

叶子的话给我的体会是:

●一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住的地方是家的基础,也是体面生活的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很多打工者不能在打工地拥有自己的房子,也一定要在老家拥有自己的房子。

●认识到“农村不属于我们,城市也不属于我们”,发现打工多年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住的地方,叶子的结论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要改变,不改变就没有办法生活”。这样一个结论是建设性的。

三、“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我就该有能力创造一个稳定的物质的家”——和工友杨春明的交流

2011年6月16日,在武汉采访了工友杨春明。杨春明1990年出生,老家是河南商丘。他当初高考成绩非常好,大大高出一本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因为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就放弃了上大学。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问:刚才你说了,你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走向成功的机会。那是一个什么机会呐?

答: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机会,就是在等。以前想过,但是现在都不想了。那个时候想着好好干,只要干得好,就会更上一层楼怎么怎么样。但是时间长了,就知道了。社会太复杂了,没有用的。

问:那你觉得什么是你认为是成功啊?

答:自己做的事情得到老板的认同,就目前来说这就是我认为的成功,以后再怎么想现在就不知道了。

问:你不已经成功了吗?都当班长了。

答:我现在这样不是成功。

问：那你的成功是什么，当经理？

答：不是当经理，是能够参与企业，意思就是说我的想法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即使我做个出力的我也愿意。

问：就是能够参与到企业的运作里、决策里，就是说你的想法对这个企业的运作起得到一定的作用，是吗？

答：对。哪怕我当一个最底层的，只要我的想法能够得到上面的参考，我也愿意。什么官啊，都不想，就是官也是闲官，看着还不够烦人的。我想着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坐到办公室我迟早有一天也会和他们一样，不是聊天就是上网，我还太年轻了，不想那样，太懒了。

问：你现在觉得你的家在哪里？

答：在我老家。

问：为什么觉得那是家呢？

答：因为那是我的根本。

问：怎么叫根本？

答：不能说在哪个地方落脚哪个地方就是家，真正的家只有一个，就是你的根——家乡。

问：你将来会回去吗？

答：不会回去的。

问：你觉得你将来会在哪里？

答：说不准。

问：在武汉？

答：也有可能是在武汉，也有可能我干一段时间就去其他地方了，这都是说不准的。

问：那就是说，在你看来，家和根是一个情感上的东西，不是现实中、物质中的东西，是吗？

答：在物质中，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家。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真正的家只有

那一个，有一句关于爱情的话可以用在这里：你的一生可以爱很多的人，但是真正让你心疼的只有一个人。家也是，走到哪里，处处是家，但是真正的家只有一个。

问：你刚才说我们要是有能力创造一个家？

答：创造一个物质上的家太难了。因此我希望的是，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我的收入就应该有条件让我为自己的家庭创造一个稳定的物质的家，这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

和杨春明的交流给了我下面的体会：

●杨春明的话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工人的精神实质。他说，他不需要做官，也不想坐办公室，他可以在最底层，只做出力的，但是他现在的成功标准是：自己得到企业的认可，也就是自己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从他的话里，我体会到了工人的劳动价值观。

●在谈到“家在哪里”的时候，杨春明说：“创造一个物质上的家太难了。因此我希望的是，如果我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我的收入就应该有条件让我为自己的家庭创造一个稳定的物质的家，这是我们需要去争取的。”他的话代表了工人的诉求。

2010年8月，我听了李昌平老师做的关于“全球化、中国拐点、中国道路与中国工人的使命”的讲座。其中有一段话让我深有感触：“未来30年，中国走什么道路？还是不是像前30年一样的走？中国的工人阶级有没有前途？中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如何和我们中国所走的道路有关。中国能否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所决定的。……只有靠我们工人阶级自己。有什么样的工人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所以我说工人阶级先进性决定中国未来的命运。”

对于打工者的前途和命运我有很多观察和思考，很多同行和学者也有很多研究和思考，但是决定打工者命运的是打工者自身，这里说的不是打工者

中的个人是否可以改变自己一个人的命运,而是打工者群体是否可以改变这个群体的命运。但是群体再大也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的,所以说,打工者个体的思想和认识决定了自身和群体的命运,并且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我们的家在哪里?物质的家、情感的家、精神的家都在哪里?迷失状态是痛苦的状态,但是希望这痛苦带给我们的是思考和觉醒,希望思考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主体性。让我们先找到“我是谁”,然后再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家。

在本书的结尾跟大家分享新工人艺术团2011年出品的第5张专辑《就这么办》中的一首歌曲:

回家

词曲:姜国良

每个寂寞疲惫的夜,
总有一盏灯在为你亮着;
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
总有一扇门为你守候着。

因为听过许多无奈的叹息,
所以我们不再唱别人歌;
因为看见太多流泪的眼,
所以我们不再追逐繁华的梦。

手牵着手,一起朝前走;
手牵着手,一起回家;
手牵着手,风雨同舟;
手牵着手,一起回家……

后记

关于书名

我最初起的书名是《新工人——家在哪里?》,编辑认为书名里面带问号感觉我们没有观点和方向,我觉得很有道理。打工群体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的确迷失了,但是新生代打工者的诉求是很明确的,虽然在诉求难以实现的时候同样感觉迷失,但是这样的过程带来的是主体意识的崛起。最后,我们定下书名《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迷失反映了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但这却是崛起的基础;崛起是打工群体的未来,也是中国的未来。

我从事研究工作多年,从来都是我找出版社,这是第一次出版社编辑找到我。其实编辑找的不是我,而是我们位于北京皮村的机构。编辑看重的是我们机构所服务和关注的打工群体。编辑说:“如果可以出版这本书,也是为这个群体做了件事情。”

研究工作与社会活动以及社区活动的结合

本书是“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下简称“博物馆”)研究工作的一部

分。“博物馆”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于2008年5月创办的。“博物馆”的宗旨是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进而推动打工者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促进中国工人群体的健康发展。我们不仅通过记录打工者的故事来记录打工群体的历史,还通过对历史的描述和解读去创造历史。围绕本书的研究成果,“博物馆”于2012年1月1日开展了主题为“新工人——家在哪里?”的图文展览,此展览将在2012年度持续展出,并围绕该主题开展各种社区活动。

作者对工友的回访

2011年10月,我写完了本书的初稿,草印了200本进行内部交流和征求意见。2011年11月,我带着初稿去东莞回访一些工友。工友看到他/她们的故事被写在了书里,都很惊喜,特别是看到自己或者亲友的照片时更加觉得亲切。下面是我和工友王福连的对话:

问:你看我写的东西,觉得有用吗?

福连:还可以。很真实,这个书给我一本好不好?我回去看一看。

问:好的,你愿意看,我很开心呀,因为有时候会担心……

福连:担心没人看?

问:对,担心没人看。我做调研和写这个书付出很多精力,现在写出来了,自己会想,别人会不会觉得有用。所以你愿意看,我就很开心。你觉得这个东西会起到什么作用吗?

福连:不知道呀,我也在想,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你去年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想,采访这么一下搞什么呢。

问:但是,你能接受我的访谈,说明你是支持我们的,对吧?

福连:支持的人肯定占多数。肯定好多人都认为是好事。

更让我欣慰的是,当和工友第二次见面聊天的时候,气氛和初次见面非常不同,有些“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感觉。我的再次到访是出乎他/她们意料的,我的再次出现大大增加了他/她们对我的信任。他/她们隐约感到,我原来不是他/她们生命中不会再出现的过客。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虽然只过了一年的时间,但是很多工友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让我更加意识到做跟踪访谈的重要性,在这里就不详述了,在下一本书里再和读者分享。

吕途

2012年4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 吕途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118 - 3756 - 1

I. ①中… II. ①吕… III. ①民工—现状—研究—中国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0760 号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

吕途著

责任编辑 高山
装帧设计 后声文化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20 毫米×960 毫米 1/16

版本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印张 23 字数 280 千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3756 - 1

定价:3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